

声 明

本刊仅作为学术交流与出版平台,所刊载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刊立场。本刊坚决反对抄袭、伪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可靠性由作者全权负责。

本刊为开放获取期刊。所有发表内容均采用CC BY-NC 4.0协议许可。读者可以免费获取、阅读和非商业性分享,但使用时必须明确注明作者和出处,且不得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出 版 单 位: 拾华出版有限公司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 顾 问: 胡 斌
联 系 地 址: 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2C号凯悦
商业大厦6楼602室
E - MAIL: rwvk@shiharr.com
联 系 电 话: +852-9749-5505
投 稿 平 台: <https://ojs.shiharr.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pISSN 3104-5014
eISSN 3104-5022
发行范围: 全球公开发刊
出版日期: 2025年9月25日
发行定价: 免费赠阅
版权许可: 



更多科研资讯可关注官方公众号



9 773104 501001

人 文 學 刊

2025年
第四期第1卷

月刊

编辑部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顾问: 胡 斌

【法学编辑部】

主 编: 刘 玮
副 主 编: 陆 瑶 唐旭晨 唐丽云 苏咏喜
编 辑: 王 正 曾 霄 裴 耘 石 鑫 汪 淇 李明旭 诸葛成影
青年编辑: 张红军 姬红杰 江 涛 张 力 田笑潇 殷 玥 左芸菲 任志鹏
出版顾问: 马子研 胡奕帆

【教育与体育编辑部】

主 编: 何小兰
副 主 编: 龚雅哲
编 辑: 周鸿璋 鹿艺馨 苏文杰 刘洪铭 白天昊 吕文欢
青年编辑: 洪 阳 徐文佳 袁 骁 蒋心毅 王日娴
出版顾问: 曾维民 刁培鑫

【艺术学编辑部】

主 编: 莫 岚
副 主 编: 王媛媛 周白云 郝 爽 刘 飞 刘梦雨 郭胡合璧 李嘉乐 蔡 佩
编 辑: 黄 杨 刘 颖 宋彦霖 赵 洋 贾效田 刘济君 赵沃林 王镜皓 王俊翰
张 鹏 金黛彤 李一帆 何 蕴 张靖博 袁 浩 冯志超 兰正焱 罗木英
青年编辑: 谢 民 成 玥 杨喜超 祝鹏飞
出版顾问: 胡 斌

【经济与管理编辑部】

主 编: 周钰淮
副 主 编: 陈 坚 王 峥 郑旭刚 咎 琳 林东武 张湘晗
编 辑: 任晓华 谢常骏 刘亦璇 方 敏
青年编辑: 邓子琳 尚清雅 罗笑颖
出版顾问: 郭 杨

【文学与新传编辑部】

主 编: 侯本塔
副 主 编: 冯浩源 韩文涛 戚 昊 李国平
编 辑: 胡 港 井兴龙 包云龙 任韵灵 蒋瑀宸 王昊祥 孙玉豪 李 芮 佟 彤
吕淑娟 田诗昂
青年编辑: 金字恒 黄 芊 吴宗译
出版顾问: 李显坤 吴元超 颜俊志

【历史与哲学编辑部】

主 编: 宋朝红
副 主 编: 曹 栋 孙苡森 崔梦泽 李伟强
编 辑: 曾 浩 王伟康 吴栩薇 刘宇航 许嘉杰 熊晨曦
青年编辑: 田宇洋 赵文雯 范记川 王芳芳 解 娇
出版顾问: 范宇飞

出版策划: 莫 岚 桂 军
营销策划: 谭瑞将 孔维旭 孙玉豪 颜俊志
技术编辑: 范哲文 刘霜尧 杨开路
装帧设计: 金黛彤

目 录

教育与体育

- 01 纪实与展现：体育报告文学中的身体叙事研究
张统舟、朱祥明
- 08 校企合作模式下人工智能培训的实践与探索——以泰迪智能科技与高校合作为例
周钰淮、马雷猛、朱紫健
- 16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三重向度
连桐

艺术与设计

- 22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的空间隐喻
舒晨茜
- 26 中国音乐剧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与反思——以《蝶变》出海韩国为例
林檎

经济与管理

- 31 区域对比视角下中国中部省份县域地名分布特征——以安徽省为例
杨开路、毛翰臣、陈金泉、赵继涛

文学与新传

- 40 《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刘勰为他正名，历史还他清白
刘志义
- 47 论释家文学的写作传统及其意义
周梦
- 53 集体记忆理论视域下陕北说书中的苦难与救赎
师小康
- 61 时代性、多样性、崇高性——简论子嫣纪实文学集《岁月的彩虹》
罗红宇
- 66 叙事的神学：远藤周作小说对天主教困境的文学解答
陈思丞
- 73 智能时代媒体人的算法焦虑与应对策略
章彤、王雪涵、刘敬如

- 79 站到词与词之间:论托卡尔丘克《云游》的媒介超越性
姜星宇
- 84 基于平台算法视角的热词语义演变机制研究——以抖音热词“红温”为例
李可欣
- 95 虚拟具身与数字交往:手游玩家主体性建构的具身传播研究——以《王者荣耀》为例
刘敬如、王雪涵、章彤

历史与哲学

- 103 晚清民国时期舟台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台湾日日新报》为中心
茅佳琦、李伟强
- 108 “时空结合”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张开、吴振华、贺军亮

法学

- 115 新时代英模人物宣传学习:价值意蕴、内在机理和优化机制
王升
- 121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渊源、移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樊超
- 129 双向赋能:广东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耦合机制及实践路径研究
周小红

纪实与展现：体育报告文学中的身体叙事研究

张统舟¹，朱祥明^{1*}

(¹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体育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体育报告文学是一种融合体育文学与报告文学的特色文体，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定性分析法从叙事特色、符号叙事特征与意涵表现三个维度对体育报告文学展开研究分析。分析体育报告文学中的叙事特征与身体符号的叙事功能和意义，探究身体作为基本叙事载体时的多样表达形式，揭示身体符号在体育报告文学中的多重叙事功能，分析身体叙事中身体符号的机理特征。

关键词：体育报告文学；身体符号；身体叙事；叙事载体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55>

Documen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 Study on Body Narration in Sports Reportage Literature

Zhang Tongzhou¹, Zhu Xiangming^{1*}

(¹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Sports reportage literature is a unique literary genre that integrates sports literature and reportage literature. This paper employ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conduct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sports reportage litera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symbolic narrative features, and connotative expression. It analyzes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reportage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body symbols; explores the diverse forms of expression when the body serves as a basic narrative carrier; reveals the mult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body symbols in sports reportage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ody symbols in body narration.

Keywords: Sports reportage literature; Body symbols; Body narration; Narrative medium

引言

体育报告文学往往围绕某一体育事件或体育现象展开，而所有体育事件或体育现象都是由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来推进开展的，所呈现的基本主体单位是体育事件中的“人”，身体即“人”这一主体单位所外显的重要符号意象，作为独特的载体，将“人”这一基本活动单位的动作进行外显，是开展相关体裁作品创作与叙事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口，通过研究体育报告文学的叙事方法和相关理论，探索“身体”与其独有的叙事特色的结合，对于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体育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促进读者对体育世界的认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体育报告文学的叙事特色

在探究身体作为叙事载体在体育报告文学中的机理特征之前，我们需要认识到，身体并不会

作者简介：张统舟（2005-），男，安徽安庆人，zxc0531@139.com。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学、运动哲学。

朱祥明（1997-），男，云南昭通人，422045320@qq.com，硕士。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哲学、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

通讯作者：朱祥明，通讯邮箱：422045320@qq.com

单独作为表现形式出现在作品之中，其往往作为体育运动这一完整实践过程的个体化外显单位，作为“人”的一种指代性符号出现在叙事中，因此，在进行身体叙事的探索前，首先需要研究体育报告文学的基本叙事特色，才能进一步探索身体在其叙事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形式。

体育报告文学作为体育文学与报告文学交融的产物，以真实性和批判性为特质，以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为基础，是体育领域的深度调查报告，运用文学的笔墨和艺术手法及时地“报告”体育领域中发生的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事件^[1]。体育文学泛指围绕体育运动相关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与体育交叉领域的独特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用文字定格体育运动的力与美，通过叙事张力揭示体育与社会、个体与时代的深层互动。报告文体是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近似于散文的文学体裁，以真实事件、人物和社会现象为核心，融合新闻报道的纪实性与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汇聚社会批判与审美价值。二者各自兼备的叙事表现特色与叙事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在进行体育报告文学创作时，首先要分析体育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叙事特色。

1.1. 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融合

体育报告文学以真实的体育事件为核心素材，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显著特征。在创作体育报告文学的时候，所体现的真实性并非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要求作者通过严谨的田野调查，深入现场、广泛搜集资料、多方采访取证，确保文本的客观可信。同时也要求在文本创作上借鉴和吸收文艺作品在情节布置、文章结构、人物描写和小说语言上的优长，将小说和新闻的优点进行交融。这也就造就了体育报告文学所特有的叙事特色，它立足于体育赛事、运动员的真实经历等，如实记录体育领域中发生的点滴。这种基于真实体育事件的叙事，为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可信度基础，使读者能够相信并深入理解体育背后的故事。在创作体育报告文学时，所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对体育事件的简单记录，为了使其更加吸引读者的关注并且创造所期望的文学价值，也就意味着它还需要在真实的前提下具备文学性。

达到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辩证统一，超越简单的事件复现，就是通过艺术加工实现“事实、思想、艺术、观赏”的统一。文学性使得体育报告文学能够超越单纯的新闻报道，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报告文学的审美与报告文学的功能并不冲突。报告文学创作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书写时代、反映现实^[2]。通过文艺手法塑造美感，提高作品的叙事魅力。在强调真实性的同时，作品还需借助丰富的文学手法来提升其艺术魅力。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丰富内心世界。比如当运动员面临重大比赛压力时，通过描写他们的紧张、焦虑、坚定等复杂情感，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运动员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品质。采用侧面刻画与正面叙述相结合的手法，环境与场景描写、旁系叙事穿插背景，让读者投入其中，产生联想，从而更贴近故事情节，让作品的塑造更加完备与具象化，避免直白叙事的单一枯燥，使作品兼具艺术性与美感。

1.2. 叙事结构的多元化

在体育题材的新闻报道中，通常采用单一的客观描述书写其内容，偶尔穿插所报道角色的采访语句，内容过于单调。体育报告文学往往为了呈现丰富的故事情节，让叙事过程更加全面与深入，会在创作时采用多元化的叙事结构，通过时空交错的复调叙事，结合顺叙、倒叙与插叙，打破线性束缚，在叙事视角上呈现出多样性，既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也有深入角色内心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叙事层次，还利用宏观、微观、大背景下的综合视角有机结合，为读者构建立体的内容观，从而达到叙事的全面与深度。

通过构建多元化叙事结构模型（见图1），运用多元的叙事角度来完善事件的组成，将事件分为三部分：事件主体；事件内容；事件背景。通过多元化的叙事结构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宏观视角表达：体育事件的宏观描写，采用组织者或旁观者的全局角度。从宏观角度对体育事件进行叙述，让读者了解体育活动的整体概况和发展脉络。组织者或旁观者通常站在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能够把握体育事件的各个方面，在写作时通过客观视角描写其所述事件活动的整体样貌，为读者建立初步的大局画面。

微观视角补充：体育事件内化后的主观视角，参与者或经历者的个体角度。微观角度的描写从参与者或经历者的个体角度出发，深入挖掘他们在体育事件中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并且通过叙事手法将其主观的内发情感表象化。这种视角能够让读者更加贴近体育事件的核心，感受到

运动员们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代入第一视角进入事件,让叙事更加完备。在创作体育报告文学时,运动员通常是体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在训练和比赛中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挑战。通过第一人称或限制性视角,展现运动员个体对身体符号的感知,将个体的微观视角补充至宏观的叙事整体,从而使得作品的故事线与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和具有观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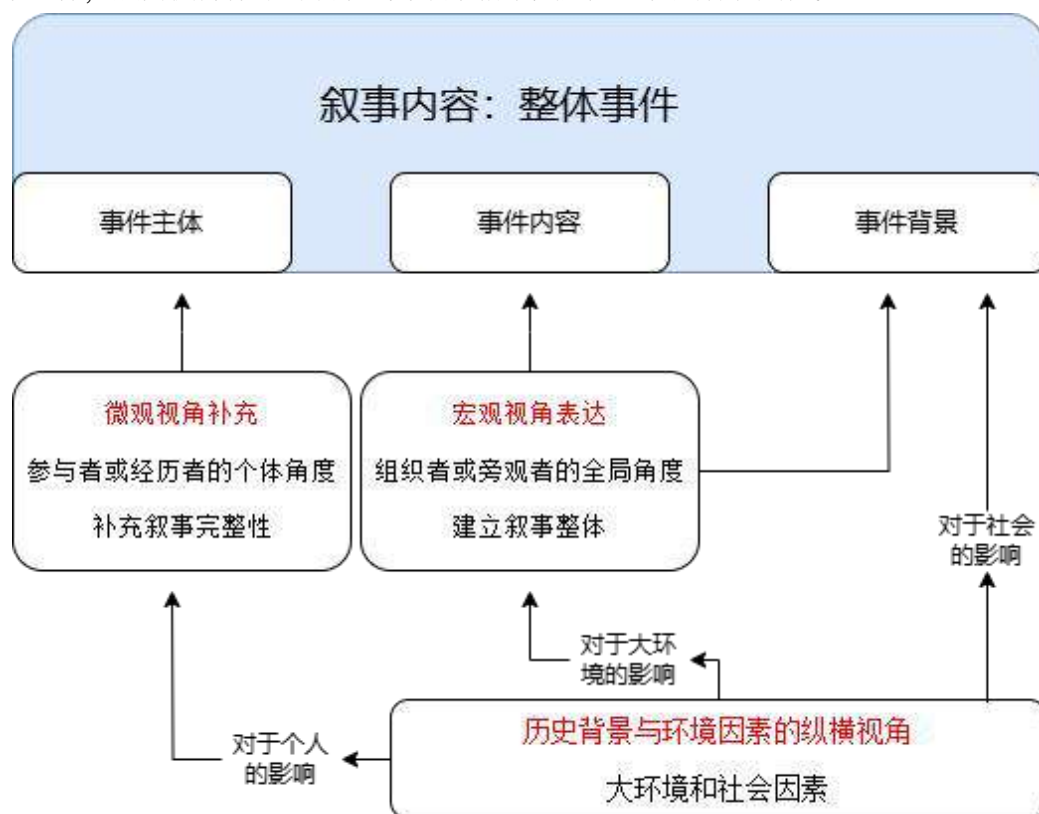


图1 多元化叙事结构模型

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的纵横视角：通过描绘大环境和社会因素来间接证明。事件总是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不存在孤立的情况。从历史与环境的多维角度进行叙述，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体育事件的含义和价值。纵向地看，将体育事件置于历史的长流中审视，探究其发展过程和规律。例如对于某项体育运动的进展，可以追溯其起源和早期发展，掌握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和变迁。这种纵向分析有助于读者把握体育运动的发展脉络和影响因素，构建起对全文背景和叙述结构的基本理解。横向地看，关注体育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选取一场体育赛事作为写作主题，需适当描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通过描绘赛事举办地的社会风貌、民众生活方式等，揭示体育事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社会因素同样能从侧面证明体育事件的重要性与影响力，这些侧面的描述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体育事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升故事叙述的完整性和深度。

2. 体育报告文学中身体作为叙事载体时的表现

在体育报告文学的创作中,题材往往以体育运动的参与者——“运动员”作为主体,可以将“运动员”看作一个具象化的“人”而“人”的关键组成即为身体与意识的结合,通过文字的符号化转变,将“人”的身体状态具象化、数据化,即构成了身体符号。这意味着身体是极为关键的叙事载体。通过对身体符号化,运用文字写作手法将身体符号转化为易让人理解与感受的语言,通过细致和写实描写,生动展现体育运动的激烈表现力、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以及体育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2.1. 身体符号叙事中的形式转化

作者在文本叙事中,使读者感受和共情其所想表达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通过语言、意象、结

构等符号系统构建意义网络,将抽象主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叙事文本,让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接受作者所构建的意义网络,将善于理解的语言文字符号化合为所期望表达的叙事文本,从而达到叙事效果。符号学领域中普遍认为,符号的表意过程为“意图—文本—解释”,这个过程与计算机的数据解码过程类似,因此符号也常常与数据挂钩,而身体符号的表意过程本质与其一致,身体符号叙事表达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意表事实—语言处理—解码转达”。而身体作为一种媒介、一种符号构建着文本的深层意义。同时,身体也是作为一种替代策略,作为一类重要的替代符号参与叙事的过程,文字通过具身化叙事策略,将运动员身体转化为多重语义的符号系统。符号叙事学以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基础,强调叙事是“能指”与“所指”的动态结合。赵毅衡提出,叙述是“用符号手段再现具有可跟踪性的事件序列”,其本质是作者通过符号编码传递意图,读者通过解码实现意义重构。“身体”叙事,无论是真实的肉体叙事,还是符号化或话语化的叙事,都对文本的叙事和情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贯穿在文本内部,涵盖主人公身体,心智发展,并延伸到文本的外部,涉及作者的身心状态和读者身心共鸣^[3]。

2.1.1. 个体单位的具象刻画

身体姿态与动作的精准描绘,身体符号的微观叙事建构;观测身体符号的总体表现就是观测“人”的身体的一切姿态,在微观层面,身体细节的书写既承载生物性特征,亦被编码为文化象征物。体育报告文学中,对运动员身体姿态和动作的精准描绘是展现身体符号的基础。作家们通过细腻的观察和生动的文字,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动作的符号化表征遵循“技术语言—诗意转换”的语言符号解码机制,使身体符号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形成“运动美学—文学意象”的延展关系。语言文字符号与身体动作符号互相解码,通过认知感官的思考过程,构建主体经验与客体世界的知觉中介,实现身体感知的文学转译。在《中国姑娘》中对女排队长曹慧英的描写“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而在赛场上对她的描述则是“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展现了她“铁姑娘”的一面。而当面对裁判的不公平待遇时又“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生动、个性地展现了曹慧英顾大局、坚强、直率的性格特点。运用生动的艺术细节刻画人物^[4]。微观细节是叙事作品艺术生命的寄托,没有身体姿态与动作的精准描绘,就不可能达到报告文学作品所期望的写实与达意双重要求。

2.1.2. 身体的空间延续

体育场馆或自然环境的具象化投射,身体符号的场域化再生产;通过空间叙事,构建身体与环境的互构关系,使竞技场成为身体语言的展演场域。大环境与场景描写是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其作用超越单纯的背景铺陈,是构建文本意义网络的核心机制。这种描写通过空间与符号的双重编码,实现叙事结构的多维度重构。在创作中搭建符号数据化场景,将人物与事件置于同一时空下,利用全场景的符号构架凸显完整全面的叙事线路。采用“场域+个体=全局”的架构模型,将个体符号与环境符号在特定的领域立体结合,使得环境背景具象化,投射进身体符号细节,从而阐述故事全局,让整个叙事过程更加清晰与完备。同时能够确定具体化的时空定位与历史语境,构建氛围营造与情感共振的场域。例如在描绘比赛事件时,体育场馆往往是体育赛事的重要场所,其氛围对运动员的表现和观众的感受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体育报告文学通过对体育场馆氛围的细腻描绘,能够将读者带入到比赛现场,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身体符号在场域化下的深度展现。运用语言文字的表象绘画,将自然环境的衬托与烘托交汇进活动的表现,增强体育报告文学的感染力。使展演场域的符号投射到个体的符号,以大衬小,将空间的叙事感官转化为身体叙事的表达力量。

2.2. 身体符号作为叙事载体时的多维呈现——力量符号与美学符号

体育运动的魅力就体现在“力”与“美”的结合,通过文字的艺术表达将这种结合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创作中对其特色的呈现是多维度、全方位的。通过生动的场景描绘、深入的情感挖掘、独特的语言风格、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精准的“力”与“美”的捕捉和表达,将体育运动的激情、力量与美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仅能让读者感受到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更激发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向往。作为体育运动的本体,“人”的身体往往是传达“力”与“美”

的第一载体,身体符号就成为了身体形象的直接体现,更是叙事进程的重要推手,身体叙事的呈现过程就是通过符号化的过程来“力”与“美”的具象化表达,它不仅承载着个体的生理特征和情感体验,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力量符号:体育运动对人们的印象常伴随着健硕的肌肉和激烈的身体展示,采用身体姿态的精准描绘是在创作体育作品时最直观展现的途径,而这就需要结合解剖学观察与艺术表现技巧,通过肌肉的发达程度、动作的力度和速度等外在特征来体现。从物理层面开展对运动员本身身体的力量展现,将身体力量的物理性呈现在叙事中,运用身体姿态的符号化描写,不仅展现了运动员的生理特征,更揭示了其背后的训练历程和精神追求,辅以对运动员动作姿态的精准捕捉和生动描绘,将体育竞技的激烈与紧张、运动员的拼搏与坚持,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物理性的力量呈现不仅能够增强叙事的视觉冲击力,还能通过身体的力量感来象征人物的坚韧、勇敢或权威,塑造人物的力量形象。身体力量在叙事中还会通过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呈现,在许多文化中,身体的力量被视为一种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某些部落文化中,身体强壮的男性往往被视为领导者或英雄;在现代社会中,力量形象也常与职业成功、社会地位等联系在一起。通过描写人物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以及他人对其身体力量的评价和反应来展现身体力量的社会性意义。这种社会性呈现不仅反映了身体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还揭示了身体力量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能够揭露体育运动事件背后特殊的社会化意义,同时也侧面映射着作品所主要描写对象“人”的具体特质,通过力量这一替代符号来展现描写对象的能力与地位,赋予其所希望赋予的一些隐含价值与含义。而这就是身体符号的隐喻性呈现,作为一种隐喻,用来表达更深层次的情感、心理或精神状态。书写一个身体强壮的人物就可以象征着其内心的坚定和勇气;而一个身体虚弱的人物往往代表其内心的脆弱或困境。通过人物的行为、心理描写以及与其他人物的互动来实现身体力量的隐喻性呈现。这种隐喻性呈现能够使叙事更具深度和象征意义,让读者通过身体力量的象征符号来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的主题。

美学符号:身体作为基本符号,从身体本身出发建构着多种多样的哲思,而对于身体本身的审美建构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重要论点,按照建构的方式的不同,舒斯特曼(Shusterman)将身体美学分为三个维度:分析的身体美学、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和实践的身体美学,其中对实用主义和实践的身体美学的发现是舒斯特曼美学研究的特色。身体的活动一定是伴随着某一特定动作展开的,每一次动作都存在着一个指向的实践意义,通过符号化的表达,将实践意义赋予审美解读,就达到了身体美学的基本展现。

美的展现与表达离不开身体,它必然是身体的某一行、动作、实践活动的延伸。而在体育报告文学中,通过对写作对象进行符号化处理,运用细腻的文字表现手法,着重描绘运动员的动作、姿态及表情细节,将运动员的动作姿态以艺术化的语言呈现,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够立即感知并接受其中蕴含的美学观念,而这就达到了“美”的呈现效果。通过优美的文字和生动的形象,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优雅姿态和迷人风采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身体美的外在呈现就主要体现在身体的外观特征上,包括身材、容貌、皮肤质感、姿态等,这种外在呈现能够使叙事更具吸引力和审美价值,让读者通过身体的外在美来感受人物的魅力和故事的美感。身体动作塑造人物身体的形美、力量美、姿态美等就是身体美学的创造过程,在不违背真实的运动动作设计一般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身体动作的重组或重新设计来对角色的身体进行再创造,以此丰富内容的观赏价值。同时身体也常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叙事中用来表达更深层次的情感、心理或精神状态。在刻画人物时,一个美丽的人物往往象征着纯洁、善良或希望;一个丑陋的人物就常被赋予象征着邪恶、丑恶或困境。通过人物的行为、心理描写以及与其他人物的互动来进行表达转换。这种象征性呈现能够使叙事更具深度和象征意义,让读者通过身体美学的象征来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的主题。体育文学反映人类生存中的体育活动,其本质就是对体育中美特征的反映。文学的形象性语言创造出完整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在受众心中构建起立体而生动的图像,跳脱出科学、判断、推理的演绎模式让文学形象具有可感知性[5-1],再结合以报告文学所独特的真实性、时效性、功能性,使得体育报告文学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与美学价值能够成为其特殊的意义标杆。

力量符号展现了体育运动中身体所蕴含的强大能量和不屈意志,而美学符号则根植于身体的体验,具体体现为身体在运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和谐、优美与灵动。力量符号和美学符号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这两种符号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共同构

成了体育报告文学独特的身体叙事特征。这种力量与美学的融合叙事能够创造出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让读者感受到身体的多重价值,再回顾其符号化之后的共生过程,这种多维符号的转换不仅增强了叙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还使叙事能够承载更丰富的思想和主题,并且揭示出身体的多重价值。身体不仅是生理存在的载体,还承载着社会文化的意义和象征价值,让读者不仅能知晓作者所希望书写的事件本身,还能进入深度层次的思考领域,反思体育运动事件背后对于身体与人性、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3. 体育报告文学中身体叙事的教育价值与时代意蕴

身体作为叙事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体育运动的激烈与壮美,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教育内涵,同时在其丰富的哲思反馈背后,也影射着对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身体符号作为具体化的叙事单位,在体育报告文学中承载着丰富的时代内涵,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展现出体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融,以及体育人物与时代背景的互动。

3.1. 教育价值

文学作品的教育价值存在于文本本身和其附带的内在含义,体育报告文学通过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对身体符号承载的叙事体验进行文学化重构,不仅在于用文字定格体育运动的力与美,更通过叙事张力揭示体育与社会、个体与时代的深层互动,使其承载的不仅是物理层面的运动表现,更转化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载体。这种转化过程体现了报告文学对真实性的坚守,通过身体叙事传递出超越竞技的深层价值,对读者产生多维度的教育作用。利用事实锚定与精神升华的双重性传达所期望对读者产生的教育效果,往往在一次次事件的阐述中嵌入内涵与价值,从而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深度思考体育事件背后的精神领域,从中得到激励、启发、价值观塑造。

身体力量的描写转化让读者能够从符号化的数据建构中获得关于身体作为力量与坚韧的象征意义,通过真实记录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身体表现,作品展现了身体的力量、耐力和韧性。这种身体符号的呈现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教育内涵,即暗示读者通过努力和坚持,可以实现目标,提升自我,这也是体育精神最直观的体现,我们将其视为身体符号的具象榜样作用,角色的励志故事所传达的坚韧不拔的品质能够激励读者在面对困难时保持永不言败的毅力。同时通过对运动员日常训练和生活方式的描写,也展现了身体作为健康与自律的象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从运动员身上学到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这也是体育题材的作品所经常传达的一类积极观念。并且在书写时利用符号结构的转变,更加具体与精细的叙事过程更易让读者引发情感共振,这种情感共鸣突破传统说教模式,使道德教育实现“润物无声”的渗透。同时体育运动的题材经常连带着一些对于体育项目、生理知识的阐述,这些知识穿插在故事之中,在体现文本必要的文学真实性的同时隐性地对读者施加知识输出。身体符号在叙事中还作为团队与协作的象征,通过描写运动员之间的默契配合、相互支持和共同奋斗,展现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这种身体符号的呈现传递出一种集体主义的教育意义,即个人的努力只有在团队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例如,描写篮球运动员之间的传球配合、足球运动员之间的防守协作等,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团队协作的力量,培养读者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这些情感与思想的引导尤为重要。它们能够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助于培养同理心和责任感。体育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能够引导读者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

3.2. 时代意蕴

体育报告文学承载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拼搏与进取是其核心内涵。不同时代背景下,体育运动展现的拼搏精神各具特色,但都深刻反映社会发展需求和人们的精神追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亟须振兴,体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这一时期的体育报告文学中,身体符号所体现的拼搏精神与国家建设热情紧密相连。运动员们凭借顽强意志和坚韧毅力,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家赢得荣誉,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体育文学呈现热潮,各种类型的体育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体育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尤其是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表达歌颂和宣传类的“冠军文学”大量涌现。同时,这一时期以竞技体育为主的中国体育迅速发展,在国内外取得优异的成绩,“升国旗”“奏国歌”

“夺金牌”成为全民关注的体育亮点^[5-2]。体育成为与国际接轨、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平台。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身体符号所体现的拼搏精神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更高目标的追求。运动员们不仅展示身体力量，更象征着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这种拼搏精神与时代所倡导的奋斗精神相契合，激励着读者追求卓越、勇往直前。现当代作品中，运动员不断挑战身体极限，突破自我，这被赋予创新精神的时代内涵。身体符号的极限挑战叙事展现了运动员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与智慧，以及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这种挑战不仅是个人的突破，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此外，身体符号叙事也反映了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运动员的身体成为文化符号的一部分，通过媒体传播和商业运作，影响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审美取向。国际体育赛事作品创作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汇聚一堂，展现各自独特的身体特征、运动风格和文化背景。创作者们通过对这些运动员身体符号不同特点的描写，展现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交流的丰富性。通过体育运动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活动载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得以相互展示和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育报告文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描写，成为记录时代、反映社会、传承文化的重要文学形式。它激励着人们在体育精神的鼓舞下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我与时代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 [1] 李秋怡. 当代体育报告文学在青少年体育教育中的育人价值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2.
- [2] 刘浏. 审美困境与报告文学自身特殊性——兼论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J]. 当代文坛, 2020, (03): 48-53.
- [3] 姚娜.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J]. 学理论, 2014, (30): 121-122.
- [4] 邹建世, 王飒. 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文学价值浅析[J]. 语文建设, 2013, (35): 78.
- [5] 刘叶郁. 体育文学审美特征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17, (12): 198-202.

(主编: 侯本塔 编辑: 黄芊 校对: 金黛彤)

校企合作模式下人工智能培训的实践与探索 ——以泰迪智能科技与高校合作为例

周钰淮¹, 马雷猛¹, 朱紫健^{1*}

(¹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人工智能系,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现今全球数字化转型中,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 引发对高素质复合型数字人才的爆发式需求。高校虽在 AI 理论教学有基础, 但受实践资源、产业衔接等限制, 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更新滞后、教师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广东泰迪智能科技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的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构建“校企协同、学训融合”生态, 通过系统 AI 培训, 为校企合作培养 AI 人才提供典型范例。本文用案例研究与混合研究法, 剖析项目的实施背景、模式、内容、成效及问题。培训效果评估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立体体系: 定量分析学生技能认证通过率、实习成绩、薪资等; 定性通过企业导师访谈、毕业生调研、教学督导评估收集反馈。研究创新在于突破企业单向输出模式, 建立“双向赋能”机制——企业获理论支撑, 高校借技术平台更新教学资源。本文深度剖析该校企合作项目人工智能培训的实施背景、模式构建、内容设计、成效与问题, 并针对性提出优化策略与未来展望, 以期对 AI 教育领域的校企协同育人提供全面且具实操性的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培训; 人才培养; 产学研协同; 教育改革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69>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under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A Case Study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edd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ou Yuhuai¹, Ma Leimeng¹, Zhu Zijian¹

(1 Depart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arl River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ore engine driving development, triggering an explosiv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digital talents. Although universities have a foundation in AI theoretical teaching, they are constrained by pract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tegration,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lagging curriculum updates, and insufficient practical capabilities of

基金项目: 教育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41105211164732);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41006627083635);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项目 (2024HZZLGC005)

作者简介: 周钰淮 (1989.02-), 男, 四川成都人, 博士研究生, 曾就读于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 计算机视觉、技术经济与管理

马雷猛 (1988.08-), 男, 硕士研究生, 北京化工大学毕业, 汉族, 山东省嘉祥县, 助教, 研究方向: 计算机视觉、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 朱紫健, 通讯邮箱: zhouyuhuai520@126.com

teachers.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ject between Guangdong Tedd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Zhujiang College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s built an ecosyste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Through systematic AI training, it provides a typical example for cultivating AI talents through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This paper adopts case study and mixed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model, content,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ject. The training effect evaluation adopts 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cludes students' skill certification pass rate, internship performance, and salary; qualitative feedback is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enterprise mentors, graduate surveys, and teaching supervision evaluations.The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lies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one-way resource output by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ing a "two-way empowerment" mechanism - enterprises ob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while universities update teaching resources through technical platform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model construction, content design,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AI training in this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AI educ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Talent cultivati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驱动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型 AI 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1]。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虽在 AI 理论教学领域奠定了扎实基础，但受限于实践资源匮乏、产业衔接度不足等现实瓶颈，普遍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教师队伍实践经验欠缺等困境，难以培养出真正适配产业需求的 AI 人才。

近年来，学界已围绕 AI 教育及校企协同育人展开诸多探索，在《人工智能教育的挑战与机遇》中指出，AI 教育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但未深入探讨产业实践与课堂教学的具体融合路径。Barr 和 Stephenson 通过对北美高校校企合作项目的调研，总结出“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共建”等模式，却忽视了协同过程中利益分配、责任划分等机制性问题。国内学者则强调，AI 技术迭代速度与教育周期存在天然矛盾，提出需建立动态课程调整机制，但未涉及如何通过校企协同破解这一矛盾的实操方案。综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模式构建或单一环节优化，缺乏对校企协同育人中系统性培训体系、长效运行机制及实践成效的深度剖析，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在现有研究围绕 AI 教育及校企协同育人已形成部分成果，但在核心维度的深度与系统性上仍存空白。下表从 AI 培训模式、评估方法、合作机制三大关键维度，对代表性研究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主体/文献	AI 培训模式	评估方法	合作机制	核心结论	局限性
黄荣怀等 ^[1]	跨学科课程体系（无具体实践路径）	未提及量化评估，侧重理论效果描述	未涉及校企资源分配与责任划分	AI 教育需打破学科壁垒，强化技术与教育融合	缺乏产业实践与课堂教学的具体融合方案
Barr & Stephenson	订单式培养、实习基	以企业反馈为主，	企业单向输出资	北美校企合作可提升学	忽视利益分配、责

研究主体/文献	AI 培训模式	评估方法	合作机制	核心结论	局限性
国内学者（未特指）	地共建	评估维度单一	源，高校被动接收	生就业适配度	任划分等机制性问题
	动态课程调整（无实操方案）	仅关注课程更新频率，无长效评估	未构建校企协同的动态响应机制	AI 技术迭代与教育周期矛盾需通过课程调整缓解	未提出校企协同破解矛盾的具体操作路径
	AI 技术辅助教学（侧重工具应用）	以学生课堂表现为核心评估指标	无明确校企合作框架	AI 可优化教学效率,但需匹配教育目标	未涉及产业需求导向的培训体系设计
Woolf B P 等 ^[7]					
OECD ^[8]	通用型 AI 教育框架	宏观政策效果评估，无微观个体数据	强调政府主导，弱化校企自主协同	AI 教育需兼顾技术能力与伦理素养	缺乏校企利益平衡与资源整合的实操机制

从批判性视角看，现有研究存在三大共性的不足：模式碎片化：多聚焦“订单培养”“实习共建”等单一模式，未形成“理论-实践-产业适配”的系统性培训体系，如 Barr & Stephenson 的研究仅停留在合作形式层面，未深入技术培训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评估表层化：评估多依赖单一数据（如企业反馈、课程更新频率），缺乏“过程+结果”“定量+定性”的立体体系，且无统计显著性检验，难以验证培训成效的真实性，如国内学者未涉及就业适配率、技能认证通过率等长效指标的追踪；机制缺失化：普遍忽视校企“双向利益诉求”，要么强调企业单向输出资源（如 OECD 研究），要么仅关注高校教学需求，未建立“企业获理论支撑、高校获技术资源”的双向赋能机制，导致合作难以长效持续。

综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模式构建或单一环节优化，缺乏对校企协同育人中系统性培训体系、长效运行机制及实践成效的深度剖析，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在此背景下，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携手开展的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构建起“校企协同、学训融合”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性的人工智能培训，为破解 AI 人才培养难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样本。深入探究该合作项目中人工智能培训的实施路径、运行机制及实践成效，不仅能够为校企合作培育 AI 人才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更对推动 AI 教育改革、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本文以校企协同育人项目为案例，采用质性与量化结合的研究方法，聚焦三大核心问题：一是设计“校企协同、学训融合”模式在人工智能培训中的实施路径，剖析核心环节；二是探索该模式保障校企资源整合与利益平衡的运行机制；三是评估其对学生实践能力、教师队伍建设及产业适配度的实际成效。研究预期在理论上完善 AI 教育校企协同育人成果，构建分析框架；实践中为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 AI 人才提供操作指南，助力 AI 教育改革。

1. 校企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培训的基础与准备

1.1. 合作主体与项目背景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与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学

研协同育人项目为单一案例,通过深度剖析双方合作模式及培训体系构建过程,揭示校企协同培养 AI 人才的实践逻辑。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长期关注 AI 人才培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建设中,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教学经验与师资储备,致力于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广东泰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AI 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多年,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开发了一系列 AI 解决方案,具备丰富的产业实践资源与技术服务经验。双方基于“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核心理念,启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期望通过深度合作,构建适应 AI 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高校与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同时,面对高校 AI 人才培养的现实痛点,以及区域产业对 AI 人才的迫切需求,泰迪智能科技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通过共建实践基地、开发特色培训课程、深化产学研协同等方式,构建“学-训-用”一体化的 AI 人才培养体系^[3]。一方面,为 AI 产业输送具备扎实理论基础与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推动双方在科研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提升校企双方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1.2. 培训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OBE 教育理念融入

首要目的以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 Based Education, OBE)以学生最终学习成果为驱动,强调教育目标的明确性、教学过程的针对性以及学习成果的有效性,要求从“学生应达成的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评价标准。在本项目中,OBE 理念贯穿培训体系构建的全过程:

深入调研 AI 产业岗位需求,结合企业实际项目案例与技术发展趋势,明确学生经过培训后需掌握的核心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知识层面,需掌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 AI 核心算法原理,熟悉至少一种主流 AI 开发框架^[4];技能层面,具备数据预处理、模型搭建、训练与优化能力,能够运用 AI 技术解决金融、农业、制造等行业的实际问题;职业素养层面,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创新思维以及对 AI 技术伦理与行业规范的认知。将这些产业需求精准转化为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训体系构建指明方向。

以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起点,倒推培训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评价标准的设计。课程体系方面,先明确学生需具备 AI 项目开发能力这一关键成果,再设计包含算法实践、项目实训、行业应用案例分析等模块的课程,确保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教学方法上,采用项目式教学(PBL)、案例教学(CBL)等适配实践需求的方式,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提升技能。评价标准则以学生的项目成果、实践表现为核心依据,构建“过程+结果”“校内+企业”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是否达到培养目标。

1.3. 培训资源筹备与整合

校企共同投资建设 AI 实践基地,作为培训的核心硬件平台。企业投入高性能服务器、算力设备,以满足 AI 模型训练对计算资源的高需求;同时,提供经过合规处理的行业数据集,为学生开展真实场景的项目实践提供数据支撑。高校则提供场地资源,负责实践基地的基础运维与管理,保障硬件平台的稳定运行。通过共建实践基地,搭建起集“教学、科研、实践”于一体的硬件环境,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与产业实际应用接轨的设备与数据资源。

企业开放自身研发的 AI 开发框架、工具平台,如自主研发的数据分析与建模平台,该平台集成了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评估与部署等全流程功能,方便学生进行 AI 项目开发实践。同时,企业梳理并共享成熟的 AI 项目案例库,涵盖智能客服系统开发、工业质检图像识别、农业产量预测等多个行业应用场景,每个案例包含需求分析、解决方案、代码实现与效果评估等完整内容,为培训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5]。高校教师则结合自身理论教学优势,梳理 AI 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开发配套的线上线下教学课件、实验指导手册等,整合形成“理论知识+实践案例”的培训素材库,为培训内容的实施提供全面支撑。

组建“双师型”培训师资团队,整合高校教师与企业技术专家的优势。高校选派在 AI 理论教学方面功底扎实的教师,负责讲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基础理论知识,传授算法原理与数学

推导方法。企业派遣具备丰富项目经验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长期参与产业一线的 AI 项目开发
与实施，熟悉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难点与痛点，负责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实践，讲解产业场景中的
技术应用技巧、工程化实现方法以及行业需求分析。通过“理论讲授+实践指导”的协同教学模
式，保障培训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提升培训质量。

1.4. 评估机制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

为科学衡量培训成效，本项目构建“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全流程评估体系，结合问卷调
查、深度访谈、成果对比三种实证方法，形成多维度数据支撑。

1.4.1. 培训前评估：基准线测量

评估指标：包括 AI 基础知识掌握度、实践技能起点、学习动机强度、职业认知清晰度。

数据来源：通过标准化测试卷检测知识与技能水平；发放《培训初始状态问卷》收集动机与
认知数据；对 10% 的学生进行预访谈，记录学习目标与困惑。

分析路径：采用描述性统计确定群体基准水平，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比不同专业背景学生
的初始差异，为个性化培训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1.4.2. 培训中评估：过程性监控

评估指标：课堂参与度、阶段性任务完成质量、团队协作表现、问题解决能力。

数据来源：教学管理系统记录的考勤与互动数据；项目管理平台提交的阶段性成果；小组互
评表及企业导师现场观察记录。

分析路径：运用趋势分析法追踪指标变化曲线，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参与度 - 任务质量”
关联强度，对连续两周表现不达标学生启动一对一访谈，诊断瓶颈原因。

1.4.3. 培训后评估：成果性检验

评估指标从四方面维度进行分析，对知识维度进行核心算法原理考核通过率、技术文档撰写
规范度等；对技能维度进行结业项目成果、行业案例复现成功率；将素养维度进行企业导师评分、
团队项目答辩得分；将长效指标进行 3 个月内就业适配率、用人单位满意度。

为验证培训成效的显著性，本研究在原有指标体系基础上，补充具体量化数据与配对样本 T
检验检验培训前后差异是否显著，显著性水平 $\alpha=0.05$ ），形成“数据+统计+质性”的完整证据链。

1.4.3.1 培训后评估指标与统计结果

评估 维度	核心指标	培训前均 值 (%)	培训后均 值 (%)	统计结果 (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论
知识 维度	核心算法原理考 核通过率	42.3	89.7	$t=-12.68, p<0.001$	差异极 显著
	技术文档撰写规 范度	38.5	85.2	$t=-10.35, p<0.001$	差异极 显著
技能 维度	结业项目成果达 标率	29.1	91.5	$t=-15.72, p<0.001$	差异极 显著
	行业案例复现成 功率	31.7	87.9	$t=-13.24, p<0.001$	差异极 显著
素养	企业导师综合评	56.8	88.4	$t=-9.86, p<0.001$	差异极

评估 维度	核心指标	培训前均 值 (%)	培训后均 值 (%)	统计结果 (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论
维度	分 (百分制)				显著
	团队项目答辩得 分 (百分制)	52.4	86.7	t=-11.53, p<0.001	差异极 显著
长效 指标	3 个月内就业适 配率	- (未就业)	78.3	- (无前置数据)	成效显 著
	用人单位满意度	- (未就业)	89.6	- (无前置数据)	成效显 著

1.4.3.2 数据来源与分析路径

数据来源：结业考核试卷（120 份）与项目验收报告（120 份）；《培训效果反馈问卷》（有效回收 118 份）；优秀学员（20 人）及合作企业 HR（8 人）的深度访谈记录；6 个月就业跟踪数据表（120 人）。

分析路径：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比 120 名学员“培训前-培训后”的知识、技能、素养指标差异，结果显示所有可对比指标的 p 值均 <0.001 ，表明培训对学员能力提升具有极显著效果；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多指标综合得分，培训前综合得分为 43.2（百分制），培训后为 88.5，提升幅度达 104.8%；通过内容分析法提炼访谈高频词，企业导师提及“实践能力强”（32 次）、“适配岗位需求”（28 次），用人单位提及“上手速度快”（25 次）、“团队协作佳”（21 次），质性结论与量化数据高度一致。

所得的数据来源进行结业考核试卷与项目验收报告；《培训效果反馈问卷》；对优秀学员及合作企业 HR 的深度访谈记录；就业跟踪数据表。分析路径的数据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比培训前后的成绩差异；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多指标综合得分；通过内容分析法提炼访谈中的高频评价词，形成质性结论。

2. 针对学生的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与内容

2.1. 核心技术模块

机器学习基础：从经典的监督学习算法入手，详细讲解算法原理、数学推导过程以及适用场景。结合泰迪科技在零售行业的客户分类预测项目案例，让学生理解如何运用决策树算法对零售客户进行分层，实现精准营销。通过 Python 编程实践，指导学生使用 Scikit-learn 库搭建简单的机器学习模型，完成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模型训练与评估全流程操作，掌握机器学习算法的基本应用方法。

深度学习进阶：聚焦深度学习前沿算法，包括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及其变体，以及近年来广泛应用的 Transformer 架构^[6]。在计算机视觉教学中，融入产业级应用案例，如利用 CNN 进行工业质检图像识别，讲解如何对产品缺陷图像进行标注、构建 CNN 模型、训练与优化模型以实现高精度的缺陷检测。在自然语言处理方向，结合基于 RNN 的文本生成任务，以及基于 Transformer 的预训练模型在文本分类、情感分析中的应用，借助 TensorFlow、PyTorch 框架，指导学生完成模型搭建、训练与部署，深入理解深度学习算法在复杂场景中的应用原理与实现技巧，提升技术实操能力。

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视觉实践：在自然语言处理（NLP）教学中，开展多样化的项目实训。例如，基于企业积累的海量电商评论数据，让学生运用 NLP 技术进行文本分类、情感分析以及关键信息抽取。通过实践，学生掌握 NLP 技术栈，并理解其在客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价值。

2.2. 实践环节的多层级强化

依托共建的 AI 实践基地, 开发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与模拟实验平台。在线课程学习平台整合了 AI 理论知识讲解视频、教学课件、课后练习等资源, 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进度, 随时随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与巩固。模拟实验平台则提供虚拟的 AI 项目实践环境, 涵盖多种行业场景的模拟项目^[7]。通过校内模拟实践, 学生熟悉 AI 项目开发的基本流程, 积累基础实践经验, 为参与真实项目实训做好准备。

组织学生深入泰迪智能科技及合作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 参与真实的 AI 项目开发全流程。在智能工厂项目中, 学生参与生产流程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建模, 协助企业技术团队完成项目开发部署, 亲身感受 AI 技术如何提升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质量控制水平^[8]。通过亲身参与真实项目, 学生掌握实际问题的分析方法与解决技巧, 提升实践技能与职业认知, 明白 AI 技术在产业应用中的价值与挑战。

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 AI 相关竞赛, 企业为参赛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 包括技术指导、数据支持以及竞赛培训。在竞赛过程中, 学生需运用所学知识, 团队协作攻克复杂问题, 如在“基于 AI 的城市交通拥堵预测”竞赛题目中, 学生需融合交通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等多环节知识, 提出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参与竞赛,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团队协作与问题攻坚能力, 同时优秀的竞赛成果也为学生未来就业、深造积累竞争优势, 部分学生凭借竞赛奖项获得企业实习与就业的优先机会。

2.3. 国际视野与产业衔接的拓展培训

积极引入国际先进教育资源, 与海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学术交流合作机制。组织学生参与国际 AI 学术会议, 聆听全球顶尖学者分享最新的 AI 研究成果, 了解国际 AI 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9]。选派优秀学生参加海外短期实习、交流项目, 让学生深入国外 AI 企业的工作环境, 接触国际前沿的 AI 技术应用案例, 学习先进的技术应用理念与项目管理经验。通过这些国际交流活动, 拓宽学生的技术视野与行业认知, 提升其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

充分依托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的区位优势, 联动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 开展产业调研与实习实训活动。组织学生走访大湾区内的 AI 企业, 通过企业参观、高管座谈等形式, 了解区域 AI 产业发展现状, 包括 AI 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布局与应用案例^[10]; 同时, 深入探讨产业未来趋势, 如 AI 与元宇宙、区块链的融合应用方向, 以及企业对 AI 人才的技术需求与职业发展路径。安排学生到这些企业进行实习, 参与贴合大湾区产业需求的 AI 项目。通过产业调研与实习实训, 让学生熟悉大湾区, 为毕业后融入大湾区就业市场夯实基础。

3. 以校企合作为主的规划总结

3.1. 校企合作的未来展望

未来, 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校企合作培训需持续深化。一方面, 拓展合作广度, 联动更多行业企业、国际资源, 构建更开放的 AI 人才培养生态; 另一方面, 挖掘合作深度, 在 AI 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入协同, 为 AI 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助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总之, 泰迪智能科技与高校的校企合作人工智能培训, 为 AI 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样本, 虽存在问题但优化空间广阔, 持续探索完善将为 AI 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 [1] 黄荣怀, 王运武.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趋势与实践案例[J]. 开放教育研究, 2020, 26(1): 10-19.
- [2] 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EB/OL]. (2021-04-13)[2024-01-01].
- [3] 李廉水, 王春艳.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 经济学家, 2021(3): 32-40.
- [4] 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M]. Worth Publishers, 2020.
- [5] Acemoglu D, Restrepo P.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02): 3-30.

-
- [6]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3[R]. 北京: 中国信通院, 2024.
- [7] Woolf B P,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and trends [J].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2020, 30(1): 1-21.
- [8] OEC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The future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 [R]. OECD Publishing, 2021.
- [9] Siemens G. Connectivism: 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 Distance Learning, 2005, 2(1): 3-10.
- [10] 王赞, 张磊. 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12): 56-60.

(主编: 何小兰 编辑: 袁骁 校对: 金黛彤)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三重向度

连桐^{1*}

(¹ 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 在新时代育人格局变革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已成为增强育人实效性的关键突破口。这一转向不仅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应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战略要求的关键举措, 更是突破传统教育模式时空局限、实现价值引领与学生成长需求深度契合的创新实践。面对教育对象主体性增强与价值多元化的新态势, 高校需立足生活化教育理念重构育人体系, 从内容载体、育人效能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推进转型,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 切实提升高校育人工作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关键词: 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生活化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60>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he Everyday-Life Orientation Shif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New Era

Lian Tong^{1*}

(¹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ransforming the educational landscape in the new era, the shift toward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daily life has become a crucial breakthrough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This shift is not only a key measu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respond to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but also an innovative practice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and achieves a deep alignment between value guidance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al needs. Faced with the new realities of student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subjectivity and value pluralism, universities must re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integrated education. This involves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tent and delivery,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he goal is to genuin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student growth, thereby tangibly enhancing the affin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s educational mission.

Keywords: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fe-Oriented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既是理论知识的实践场域,也是价值观内化的重要载体。

作者简介:连桐(2001-),女,浙江杭州,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通信作者:连桐,通讯邮箱:1138504223@qq.com

立足新时代，探索思政课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对于拓展教育场域、创新教育方式、提升育人成效有深远意义。

1. 价值向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深层动力

1.1. 逻辑起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诉求

立德树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共同阐明了教育必须突破课堂这一单一场域，实现理论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正面临着教育目标抽象化、教育方式单一化、教育效果表面化等现实困境，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往往难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生活化转向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引导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感知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而言，即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现实生活场景，引导学生在日常琐碎中体悟道德准则，于人际交往间彰显人文关怀。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得以从抽象理论的高空落地生根，在具体实践中焕发生机。场景化、浸润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具身体验，从而有效破解知行分离困境，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推动教育过程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生成的升级。这本质上是对“知行合一”的创造性转化，通过知识获取与实践应用的辩证统一，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新时代的政治教育正经历从“理论灌输”向“生活浸润”的深刻转型。这不仅是方法论的创新，更是教育本质的回归。通过生活化转向，高校能够更好地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使价值观教育真正实现入脑入心，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的新时代青年提供根本保障。

1.2. 内生动力：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应然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2]学生主体性发展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内生动力，体现了教育本质的应然追求。

从哲学维度看，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是价值观内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指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实践主体。主体性发展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和自主建构，而非被动接受和机械记忆。强调通过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使其在真实情境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反思与意义建构，从而实现从被动向主动的角色转变。可见，学生主体性发展不仅是教育过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教育本质回归的核心路径。从现实维度看，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表现为价值判断的独立性、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和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侧重单向灌输，致使教育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偏差。生活化转向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通过创设真实的教育情境，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使其在主动参与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从历史维度看，主体性教育理念是对中国古代教育中“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孔子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体现了对教育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作为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生活化教育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完成了传统教育智慧的现代诠释。

因此，以学生主体性发展为内生动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向，不仅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达成教育目标的关键路径。生活化转向通过创设真实的教育情境，激发学生内在动力，支持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彰显。

1.3. 外部推力：社会历史变迁的时代语境

全球化、信息化与现代化的交织演进，深刻改变了社会的运行逻辑与个体的生存方式。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工细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趋势，消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适配性。与此同时，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对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生活化转向正是对这一时代语境的积极回应，将教育内容融入社会生活，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社会转型期的教育革新往往与时代语境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

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育人范式。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正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积极回应。从应对表层的教育适配性问题,到深层呼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提高育人实效性。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随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本质,在于将教育内容深植日常生活,引导学生在真实文化情境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

基于此,在实现民族复兴、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已成为教育实践的重要命题。回应时代语境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形式上贴近生活,运用契合大众认知习惯、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进行价值引导。生活化的本质在于突破传统理论照本宣科的局限,运用贴近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传递核心价值理念,使意识形态教育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现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生活化转向的要求尤为迫切,尤其需要创造符合其认知特点、触动心灵的新话语体系。要善于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口味、走心的新话语吸引人、打动人、滋润人,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图景,满足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用轻松活泼、雅俗共赏的新话语讲解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凝聚好中国共识”^[3],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语言形式和理论魅力增进学生认同感^[4],将规范化的政治话语转化为贴近学生现实的生活话语,力求让思政课成为兼顾温度与力度的课程。

2. 问题向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现实困境

2.1. 教育内容与生活实践的疏离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生活实践的疏离,本质上是理论教学体系滞后于时代变迁的结构性矛盾。当前课程体系仍以理论框架的完整性为优先考量,侧重单向度的理论阐释,一些教师教学话语脱离学生实际,教材语言占据教学主导,简单做教材知识的“搬运工”,课堂教学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对教学内容进行话语转换^[5-1],导致课程内容既缺乏对新兴社会现象的深度探讨,也难以促成理论阐释与时代命题的有机共振。教材更新虽会定期纳入最新政策表述,但在根本上尚未超越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导致理论与生活之间的认知鸿沟无法弥合。

这种理论教学与现实生活的割裂,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呈现为相互关联的两种困境。一方面,课程中沿用的道德叙事与学生在数字时代的生活体验之间存在认知断层。教学案例仍停留在前数字化时代,如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发生于实体空间的传统道德事件,而对学生实际遭遇的虚拟消费欺诈、数据隐私侵犯等新兴现实问题则鲜有触及,导致课堂传授的道德规范难以迁移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主流的教育传播方式与学生已形成的认知习惯存在明显差异。在短视频催生的瞬时认知模式影响下,学生倾向于碎片化、图像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但课堂仍普遍采用“大水漫灌”式的理论讲解。由此,青年对碎片化信息接收、传播的能力和习惯,与主流意识形态强化的政治信仰培育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现实张力^[5-2]。这就导致学生即便能复述“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依然对诸如外卖平台算法对骑手的隐性剥削现象缺乏认知;熟记“网络文明”规范,却在面对网络暴力时难以做出恰当的道德抉择。这种教育内容与生活实践的脱节将导致“学用分离”现象: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课堂所学知识极少与现实生活相关联,仅有少数学生能够主动运用所学理论剖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这不仅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使得其在人才培养的关键进程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2.2. 教育方式与生活场域的适配冲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信息获取途径以及价值观念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仍然固守“课堂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无法回应青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与生活实践。

从实践形态来看,当前高校的体验式教学普遍存在浅表化倾向。多数高校的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局限于参观革命纪念馆、观看主旋律影片等程式化活动。这类活动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历史记忆,但由于缺乏后续的讨论与反思环节,学生难以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指引,使得“打卡式”实践既难以构建连续性的教育场景,也无法创设真实的价值观教育情境,容易使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表演性学习,而非内化于心的价值认同,最终让教育过程陷

入“形式在场而实质缺位”的实践困境。从教育媒介来看,教育载体与生活场景存在明显脱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以课堂单向灌输为主,缺乏与大学生生活场景的有效衔接。这种脱节不仅削弱了教育的实效性,还可能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疏离感甚至抵触情绪。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教育目标与实现路径的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做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但当前教学方式多数仍停留于封闭课堂内的理论说教,德育活动仅限于向青少年解释道德规范,将道德伦理、政治理论等强加给他们,而将道德体验和生活实践置之度外^[6]。这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与学生的生活实践出现割裂,难以激发学生内在的价值认同与行为自觉。

2.3. 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互动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式教育,而是双向的启发式教育,只有激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学生两个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既发挥前者的主导性,又发挥后者的主体性,才能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育人目标^[7]。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实践过程中,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断裂成为制约育人实效的突出问题。这种断裂既表现为传统教育模式的路径依赖,又折射出生活化转向中主体间对话机制的建构困境。

传统课堂中自上而下,由教师把控内容导向的讲授方式仍占据主体地位,学生主动提问与表达的机会相对稀缺。这种教学模式将导致知识传递的机械性,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参与空间也同样受到限制。当课堂讨论只局限于教材观点的复述与验证,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思想困惑便难以融入教学场域。脱离生活情境的课堂互动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实现从“理论认知”到“价值认同”的转化,削弱了生活化转向的实践根基,师生交往的生活化维度也因而呈现明显分离。进一步而言,教育主客体互动的结构性缺失,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的疏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多聚焦于课堂考勤、作业提交等事务性环节,鲜少触及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需求。教师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往往依赖标准化测评数据,而非基于生活场景的深度对话。

随着教育交流退化为程式化的管理流程,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丧失了通过生活实践培育价值观的应有功能。生活化评价体系的缺位更加加剧了互动异化,考核机制过度依赖试卷分数与量化指标的现实,迫使师生互动围绕考点解析展开。教师的教学设计不得不压缩生活案例的讨论时间,学生的个性化成长诉求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评价模式,实质上压缩了教育主体与客体深度对话的可能性,难以形成持续性的育人效应。当理论传授替代价值对话,管理流程遮蔽情感联结,量化考核消解生活体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向便将面临价值引导与个体发展需求相脱节的实践困境。

3. 实践向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路径探索

3.1. 聚焦生活, 筑牢思政教育内容之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就是要将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转变为日用不觉的生活氛围^[8]。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向,需以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深度融合为内核,构建具有现实张力的内容体系。传统教育模式中,理论阐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疏离,导致价值观教育悬浮于认知表层。破解这一困境,需从内容重构与载体创新双向发力,使思政教育扎根于学生的生活实践,通过系统性设计将思政教育根植于学生的生活实践,实现从“理论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行为自觉”的完整转化。

在内容设计层面,建立问题导向的课程架构,将社会热点、现实困惑与理论命题有机联结。通过分析网络舆论中的价值冲突、剖析职业选择中的伦理困境、阐释公共事务中的责任逻辑,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议题。在探讨“集体主义”时,结合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协作实践,揭示个体价值与公共利益的辩证关系;在解析“文化自信”时,可依托地域文化传承项目,引导学生从生活经验中体悟文化基因的当代意义。在载体创新层面,突破课堂空间的物理局限,构建浸润式教育生态。活化校史资源重现历史场景中的精神传承,梳理校友典型事迹展现时代命题下的价值抉择,借助新媒体平台搭建互动讨论空间。通过多维载体的协同作用,实现教育内容从单向输出向双向建构的转化。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教师角色的范式转型。教育者需实现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引领的质性跨越,这种转型要求教师具备三重素养:一是把握时代脉搏的洞察力,善于从青

年亚文化现象和数字化生存困境中捕捉教育契机；二是开发教学资源的转化力，能够将生活场景中的常见现象升华为道德教育的鲜活素材；三是遵循认知规律的建构力，基于当代大学生偏好直观体验的思维特征，开发微叙事创作和情境模拟活动等参与式育人载体。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打破“悬浮态”，在生活实践中完成价值观的落地与生长。

3.2. 精准施教，提升协同育人综合效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需突破抽象价值观的认知隔阂，以具身化路径激活生活场域的教育势能，通过身体参与的生活实践，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行动框架。

在核心要素建设方面，着力构建科学规范的实践育人框架。一是明确层次化教育目标，宏观上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设定阶段性培养目标，微观上从价值认知、情感认同、行为养成三个维度细化实践标准；二是构建专业差异化思政融合路径，针对理工类学科强化科技伦理意识培育，面向人文社科领域深化社会价值导向研究，结合艺术学科特性厚植文化自信根基，构建差异化思政教育体系，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三是完善校园浸润机制，通过公共事务参与平台、数字化文化体验空间等建设，形成常态化价值渗透网络；四是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建立校地联动的实践教学基地，开发社会服务项目资源库，形成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五是优化评价反馈体系，建立包含过程性记录、实践成果评估、社会效益反馈的多维评价指标，实现育人成效的动态监测。在体系优化层面，强化实践育人系统的纵横衔接。纵向维度上，优化思政课程内容，依据不同年龄段大学生的认知特征与发展需求实施梯度式教学：低年级侧重情境建构与价值澄清相结合的引导性教学，高年级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心理疏导的实践性教学，同步运用教育大数据实现精准施教，兼顾群体特征与个性发展；横向维度上，基于第二课堂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耦合性^[9]，创建“三维融合”育人模式，推进实践育人向专业教学、校园文化、社会服务的多维渗透，形成“思政+专业”“思政+文化”“思政+服务”的融合育人路径，通过课程共建、项目共研、资源共享打造立体化实践育人共同体，坚持在“介体传播叙事内容”上精准发力^[10]。

3.3. 多维共建，创建思政教育实践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系的创新需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以系统化思维为基础，构建多方协作、空间联动与长效运行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优化教育要素的结构性关联，实现从零散实践向系统化运作的转型，为价值观的深度内化提供可持续支撑。

首先，构建多方协作的教育网络。针对教育主体分散化问题，建立学校、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学校层面需强化内部资源的统筹协调，形成教学与实践的有机衔接；家庭层面注重价值观在生活场景中的自然渗透，通过日常互动深化教育影响；社会层面探索公共事务与教育目标的衔接路径，将社会实践转化为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载体。通过责任共担与资源共享，形成多主体协同发力的教育格局。其次，探索教育空间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在价值观培育中的互补优势，深挖实体环境与数字平台的教育功能：在物理空间中，通过文化符号的隐性教育功能传递价值理念，例如将校园景观转化为精神传承的具象表达；在虚拟空间中，依托技术手段整合思政教育资源，创建灵活互动的学习场景，促进教育资源的跨时空流动。重点强化不同空间的功能互补与内容衔接，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思政教育网络，使价值观培育突破传统场域的限制。最后，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运用大数据追踪学生价值观发展，记录实践参与、行为选择与价值演进的动态轨迹；建立多元主体评价模型，整合教师观察、同伴互评与社会反馈数据；设立专项支持计划，鼓励师生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实践项目。通过制度化保障与标准化建设，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兼具创新活力与可持续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阐释向生活扎根的质变。

参考文献：

- [1]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 2021-03-07(1).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1).

- [3] 胡中月.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优化的三维审视[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 (09): 47- 50.
- [4] 敖永春, 张振卿. 网络环境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指导[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 (Z2).
- [5] 白显良.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亲和力的逻辑生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 (04): 93- 98.
- [6] 王玉香, 王正坤. 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风险与应对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0, 39(03): 67- 72.
- [7] 王晓丽. 学校德育“生活化”的内涵意蕴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10): 276- 280.
- [8] 漆勇政, 张贵礼.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党史教育的意义、原则和路径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10): 140- 144.
- [9] 孙旭红, 顾琪.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现实挑战及优化策略——大学生网络圈群视角[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02): 35- 43.
- [10] 曾德生. 充分发挥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价值[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 (08): 38- 40.
- [11] 王莎, 马晓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评价的内涵、向度及进路[J]. 大学教育科学, 2025, (04): 54- 60.

(主编: 何小兰 编辑: 袁骁 校对: 金黛彤)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的空间隐喻

舒晨茜^{1*}

(¹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杨浦 200092)

摘要: 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影片《地下》, 以一群反法西斯游击队员从二战至波黑内战期间的命运为主线, 艺术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南斯拉夫民族的历史轨迹。影片通过建构一个“没有天空”的地下城市, 隐喻被遮蔽与扭曲的民族精神空间。以黑仔为代表的游击队员长期困守于地底, 在战火恐惧与对铁托的忠诚中陷入历史的滞停。“地下”既作为物理生存空间, 也作为精神隐喻空间, 形成上下映照而又彼此对峙的象征结构。

关键词: 《地下》; 空间隐喻;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81>

The Spatial Metaphors in Emir Kusturica's UNDERGROUND

Shu Chenxi^{1*}

(¹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Yangpu, 200092, China)

Abstract: Emir Kusturica's film UNDERGROUND traces the fate of a group of anti-fascist partisans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Bosnian War, artistically represent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Yugoslav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constructing the "Underground" city, the film metaphorically portrays a obscured and distorted national psyche. The partisans, represented by Crni, remain trapped underground for decades, suspended in history between the fear of war and loyalty to Tito. The "underground" serves both as a physical space of survival and a metaphorical mental space, forming a symbolic structure that reflects and confronts the world above.

Keywords: UNDERGROUND; Spatial Metaphors; Emir Kusturica

引言

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空间意象与隐喻, 展示了南斯拉夫自 1941 年至 1992 年之间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该片以荒诞与狂欢为叙事基调, 将半个世纪的战争与个体命运交织于“地上”与“地下”的双重空间中, 呈现出一部充满哲学反思与政治寓言的现代史诗。在当前电影与文化研究领域中, 空间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 被广泛用于分析权力机制、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然而, 针对《地下》一片中空间结构所承载的隐喻系统性及其与历史虚无主义、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 仍有待深入挖掘。

本文旨在借助空间隐喻理论, 尤其是源于认知语言学并延伸至文化批判领域的隐喻研究, 对《地下》进行文本细读。空间隐喻不仅指向物理空间的象征化使用, 更涉及心理、社会与政治维度的空间化认知。在《地下》中, “地下”不仅是物理避难所, 更成为被遮蔽的历史、被操纵的集体意识与扭曲的时间体验的隐喻载体。本文将通过分析电影中地上与地下空间的对立、渗透与反转, 揭示库斯图里卡如何以空间诗学解构官方历史叙事, 并探讨其乌托邦想象是否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叙事的可能。

1. 地上的历史及其倒影

作者简介: 舒晨茜 (1999-), 女, 江西鹰潭, 硕士, 研究方向: 文化研究

通讯作者: 舒晨茜, 通讯邮箱: Yuanshi5452@163.com

库斯图里卡并非简单呈现历史,而是通过“戏中戏”这一独特的空间嵌套结构,展示历史叙事的建构性与虚幻性。第一场戏中戏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剧院,舞台上看似界限分明,但黑仔的闯入瞬间击穿这道看不见的第四堵墙,也将观众从戏剧的“虚构”拉回刺杀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本身极具偶然与荒诞,暗示了历史进程的非理性,这也体现了库斯图里卡对历史思考。

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在第二场戏中戏中被推向极致,冷战时期电影片场作为一个高度可控的模拟空间,完美隐喻了铁托时代官方叙事对历史记忆的改造。马克被塑造成英雄,而娜塔莉娅则被异化为客体,空间的权力结构直接定义了人物的身份。马克、娜塔莉娅作为真实人物和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演员并置于片场,形成一个镜像般的混淆空间。历史如电影,取决于谁的镜头、谁的剪辑,影像技术成为空间隐喻实现的助手,塑造出一个看似真实却“去真实化”的历史倒影,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对影像对选择组合,更加使得影像和真实相去甚远……另一些不足取的特征,如被动、感动和依附,则归于女性所有。”

第三场戏中戏出现在上述电影拍摄现场。地下室被猩猩炸开通道后,黑仔与儿子约凡意外进入片场延续他们脑中继续了20年的那场战争,地上与地下世界融合,但因各自对历史的记忆不同而发生流血冲突。当地上和地下的通道意外开启时,欢愉和毁灭并存,兴奋与恐惧共生。被蒙蔽之人眼前隔着一层厚雾障,对现实的恐惧阻碍了他们探得真相,即使如此接近。这层雾障对电影中的片场导演来说是马克写的回忆录,对二战结束后仍穴居地下室的人而言是马克利用新闻塑造的安全牢笼。“战争和灾难更强的连结性和接近性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使得人们渴望回首过去,不停地把它翻来翻去,寄望于找到少许延续性和稳定性……就在20世纪的战争记忆潮失去控制之际,我们日渐遭受到技术无意识的影像,滑向战争失忆。”阻隔地上与地下世界的不仅是可见的泥土、墙壁,还有作为战争工具的新闻,而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无法与外界失联,回到自己的地下室,却又时时身处新闻编织的地下世界。

若仅从时间线索理解这部电影,它似乎成了历史纪录片,而库斯图里卡想通过这部电影传达的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记忆和对历史的解读,而是为人类开启一条通向彼此、过往、头顶天空的通道。电影中,那些被压在地面之下的人,处于低氧的环境里逐渐麻醉,溺毙,作为地上谎言的倒影,被永远滞留在地底。空间隐喻具有普遍性,不同语言中的空间方位词具有相似隐喻义,如法语、德语、汉语中的“上”表示杰出、繁荣,“下”表示虚伪、衰亡,“空间隐喻实际上是物质世界中空间概念的一种延伸。”其源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及以具体解释抽象的思维方法。电影标题“地下”(UNDERGROUND)具有双重隐喻意义。一喻指马克、黑仔这群人的身份为地下党;二喻指地下的生活实际为地上谎言的倒影,特别是冷战时期,政治家们仍固守地下状态,保持过去的二战思维。地下室具有庇护功用,能抵御外界侵扰,但地下室同时也是一个封闭空间,虽然自给自足,但是却易让人陷入自满。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指出:“想象力用无形的阴影筑起了‘高墙’,让自己置身于受庇护的幻象中,或者反过来说,想象力在厚墙背后发抖,无法信任这一道道坚实的壁垒。”库斯图里卡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以疑问的姿态面对自己身临的一切,读书时代的他与内文卡在墓园相约,突然倒立,“我就保持着这个姿势,凝视着我最爱的景色,一切都是颠倒的……上即是下,天即是地”。库斯图里卡拥有穿行于谎言筑起的这座想象力高墙的能力。

2. 地下的错位的生活与真实

与地上世界由媒体构建的虚幻相比,“地下”空间初看是一个受庇护的避世所,实则是一个更为精细的规训机器。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指出:“它(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马克通过虚假的空袭警报、新闻广播和武器生产与运输,将地下空间转化为一个永恒的战时状态,从而实现对群体时间和身体的绝对控制。在外界灾难带来的恐惧和内心信仰的不断强化中,这群躲藏在地下的人已经活出了一套长期生存模式。

在这个封闭的规训系统中,“旋转”意象成为核心的空间隐喻,象征着历史的循环与无法摆脱的宿命。约凡的婚礼让黑仔、马克、娜塔莉娅三人得以齐聚,酒过三巡,三人共围一圈唱起歌曲MOONLIGHT,摄影机由下往上拍摄,和20年前船上三人合唱此歌的画面一致,娜塔莉娅顺势登上乐队所在的转盘,每旋转来一圈,就捶打她面前的男人一次,并癫狂地吼出自己马克及过去20年血污般生活的控诉,黑仔开始怀疑娜塔莉娅的忠诚及她与马克二人的关系,马克继

续学马在地上扭动，三者的纠缠就这样无尽循环。旋转意味着从起点即终点，衔尾蛇符号刚好是一个旋转着的圆，此符号象征着循环，三者最后一次的旋转空间出现在波黑内战时期，成为腿残的马克被亲弟弟伊万打得几乎死去，他与后来赶来的纳塔莉娅最终被黑仔的军队手下以军火贩子之名就地处死，并倒上汽油，将其尸体点燃，燃起的尸体围绕着倒挂耶稣像旋转。弟弟伊万也是残缺的，他与动物一同生活，保留了更原初的状态。在倒挂耶稣像前，伊万对哥哥马克下死手，黑仔也阴差阳错接手之下行了了结了他的生命，兄弟相残是库斯图里卡对南斯拉夫内战的理解。

而动物意象，如鲶鱼、大鹅、猩猩则隐喻了在长期规训下，人性向原始、野蛮状态的退化。鲶鱼首次出现在黑仔加入共产党的庆祝之夜，湿答答地被鱼贩从水桶中捞出，毫无生意，而后的画面是醉酒的马克纵情花柳院前；鲶鱼第二次出现在黑仔与纳塔莉娅的婚礼现场，它嘴里塞了一个西红柿，却不时扭动身体，死而未僵。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等的动物，更加粘稠、模糊，象征着人性比较低劣的部分。大鹅脾气暴躁、十分聒噪，每次出现都充满着混乱和喧闹，这种生命样态给人以真实的恐惧。地下室收容了很多动物，猩猩索尼陪伴伊凡数十年，“生活在地下室里的那只猴子也并非看起来那样简单，它实际上象征人在完全封闭状态中的蠢笨状态。”^[7-95]他们彼此拥抱，酒神式狂欢是唯一抵抗现实暗无天日的办法，醉酒、歌唱、狂舞是他们向命运妥协的最小单元行动。地下人生产出的枪支等武器被收纳在一个个印了猴子头像的木箱中，给马克带来巨额财富，空袭警报响起，这些人会全部躲进一台坦克中，戈兰·格西克认为“地下室中的坦克型号明显是M-84，它是南斯拉夫战争工业与加盟共和国中合作成果的骄傲”^[7-43]，他们生产的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但战争工业存活依赖于战争持续进行，只是他们是被牺牲的一方。南斯拉夫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与电影中地下世界之于地上世界的作用重合，属于被操纵和利用的一方。

地下的错位不仅存在于地下室，猩猩索尼几炮轰开地下室后，展现出已被难民、偷渡者、非法交易者利用的直通欧洲各国首都的地下通道，这个地下世界嘲弄着地上已建立的、看似牢固的规则。除了这一条有形可见的通道，还有一条需要借助想象力连接的通道，入口是地下室的水井。约凡的婚礼给地下室带来未有的婚礼，新娘在绝望之时选择投井自尽，她做出这个选择前，井已多次出现，婚礼用的捧花被她抛进井里，顽皮孩子们踢的球也被大人丢进井里，井是相对地下世界而言更下一层的空间，被理解为是单向度的，透过新娘的选择，可见井还指向死亡，“‘井’是人类灵魂与肉体的最后归宿点，是一种死亡的吞噬与地狱入口的诱惑，也是人类悲惨命运的象征。”^[8]黑仔最后的选择也证实了这一点。黑仔在得知自己的命令竟杀死老友后痛苦不已，回到地下室，一头栽入井里，向更深处游去。“井”作为通向更深层地下的垂直通道，构成了对规训空间的终极逃离，但它指向的并非自由，而是死亡。

3. 超越荒诞世界的乌托邦想象

水流作为连接肉体世界和灵魂世界的虫洞，将一切复位。电影的第三场婚礼在铜管乐声中重置了人的关系，牛群游上岸，马克和纳塔莉娅从远处跑来参加约凡的婚礼，黑仔上前迎接，三人携手跑向人群。马克依旧不让纳塔莉娅多喝酒，自己喝完壮胆后，给她戴上戒指，黑仔见状也给自己的老婆维拉戴上戒指，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情欲、立场等导致的错位在这场婚礼得到修正，他们并没有忘记过去，而是选择原谅彼此。电影以伊万的一段话作结，他不再口吃，讲述未来的乌托邦愿景，最后一句话与电影开头的字幕重合，构成首尾相衔的结构。这块乌托邦从大陆分裂，飘向河流，飘向远方。美好的愿景给予疮痍满目的城市抚慰，现在的贝尔格莱德成为全球夜之都，酒精、性欲、金钱麻痹着这片土地受伤的神经，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河水升腾起水汽，复归宁静。

库斯图里卡以乌托邦想象医治巴尔干区域的深度幻想症^[7-230]，为像他一样仍对未来怀有憧憬之人撞开一片丰饶土地，与大地分割时，以内心善意联结新秩序的机会来临，只是这一切的前提为个体的完美^[9]，库斯图里卡在电影的最后留下的乌托邦反射出照亮现实残忍的光。电影中，最后一组镜头搭建出如梦般完美的空间，这里没有背叛、私心、战火、疾病，所有人原谅过去，重新营构生活。同时，马尔库塞认为面对全面异化的社会，“可能性出路在于乌托邦理想图景的重构，并通过这种重构来唤醒人的意识。”^[10]话语机器的奖惩机制将人驯化成没有批评力的机器，用生存为筹码激发人自身求生欲望，建立起听话即获得奖赏的认知通路后，人就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自动缴械，放弃思考力。战争给生命带来最直接的威胁，创造了这种通路形成的外部环境，即使威胁不可见，但新闻媒体借助科技投影出掌权者需要人们了解的“真实”，构造出一个巨大

的地下室,借助各类信息传播介质强化外部危险,一如奥威尔的《1984》中真理部的运转机制。严肃现实的反面是荒诞,对权力的扭曲渴望在铁轨中得到生长空间。被视作蝼蚁的残酷讽刺下,出路未被完全封闭,复活给予重新开始及继续发展的可能^[11]。

南斯拉夫民族组成复杂,由地处巴尔干的各斯拉夫人构成,不同民族因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性格不同,且因历史原因,人们的信仰不同,他们虽然被统称为南斯拉夫人,但内部差异巨大。黑仔、马克、纳塔莉娅三人刚好对应南斯拉夫民族性的三个面,黑仔身上兼具残暴与柔情,马克表现出狡诈、重情、易背叛的特点,纳塔莉娅身上附着了美丽与情感,混杂着忠诚与背叛。他们彼此不同,又彼此陪伴;彼此伤害,又彼此相爱。铁托去世后,无法维系不同种族之间的平衡,大家相互厮杀,让这块土地上充满了暴力和血液。

影片结尾的乌托邦以一场水上婚礼和一块从大陆分离、飘向远方的岛屿这一空间意象呈现。这无疑是库斯图里卡提供的关于和解与新生的最强烈隐喻。婚礼对巴尔干人有特殊意义,这是属于巴比代尔们的酒神节,是超越荒诞世界的乌托邦想象,前两场婚礼总“在‘真’‘假’之间转换”^[7-129],这两场婚礼流露出的多是不安和狂躁,这些混乱在最后一场婚礼上被化解。法国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提出:“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欢乐更具有凝聚力。就民族记忆而言,悲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它们强调责任感,要求其成员共同努力。”^[12]但这个空间的分离性与漂浮性在提供一种纯粹理想境界的同时,也暗示了其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的脱节。它更像一个审美救赎的象征,而非一个可行的方案。

4. 结语

综上所述,《地下》通过地上、地下与水上的三层空间隐喻,展现了权力如何通过空间与身体进行运作,主要围绕建筑和身体这两类物质形式展开^[13]。深刻反思南斯拉夫的历史悲剧。库斯图里卡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历史的偶然性,更将视角投向个体命运,“个人或者说普通人,在历史剧变中的命运需要被关注”,赋予那些在历史夹缝中生存的普通人以深刻的悲剧性与人文关怀^[14]。这三重空间共同构成了一步关于囚禁、欺骗与渴望超越的民族寓言。

参考文献:

- [1] 华昊. 媒介再现与社会真实建构[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64-67.
- [2] 安德鲁·霍斯金斯, 李红涛. 连结性转向之后的媒介、战争与记忆[J]. 探索与争鸣, 2015(7): 106-114.
- [3] 董莉. 空间隐喻的辩证思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23(6): 31-33.
- [4] [法] 加斯东·巴什拉著. 空间诗学[M]. 龚卓军, 王静慧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7: 30.
- [5] [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著. 我身在历史何处[M]. 苑桂冠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 82.
- [6] [法] 福柯著.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5): 155.
- [7] [塞尔维亚] 戈兰·格西克. 解构库斯图里卡: 幕后笔记[M]. 柳迪善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
- [8] 余丽珍. 论陆文夫小说中的“井”意象[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4(1): 16-18, 21.
- [9] 周春生. 对莫尔乌托邦政治理念的新认识[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8(2): 53-59, 72.
- [10] 周来顺. 异化形态的批判与革命——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研究[J]. 理论月刊, 2009(12): 45-47.
- [11]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现时乌托邦”和“多种多样的乌托邦”[J]. 王逢振译,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报), 2008, 47(3): 102-105, 113.
- [12] 石硕.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6(3): 1-12, 205.
- [13] 高燕. 论福柯的空间思维及其美学意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23-133.
- [14] 王笛. 文学怎样进入历史的视野[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4(4): 43-47, 67.

(主编: 莫岚 编辑: 祝鹏飞 校对: 金黛彤)

中国音乐剧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与反思——以《蝶变》出海韩国为例

林檎^{1*}

(¹ 宁波诺丁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国际传播系,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 近年来, 中国原创音乐剧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 但系统性探讨其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适应的学术研究仍较为有限。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 梳理了跨文化传播理论、文化适应模式及音乐剧海外传播的研究进展, 揭示了中国音乐剧“走出去”过程中仍存在的研究空白。以原创音乐剧《蝶变》出海韩国为案例展开, 本文进一步分析其在舞台呈现、叙事结构、文化符号转换及观众接受方面的调适策略, 并结合现有研究进行比较与反思。研究发现, 中国音乐剧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出“保持文化核心”与“适应目标市场”的双重路径, 文化中介群体在改编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 而共享的历史记忆为跨文化情感共鸣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文不仅总结了相关研究的现状, 还提出了“三重机制”的分析框架, 以期为中国音乐剧及其他表演艺术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 中国音乐剧; 文化适应; 《蝶变》; 软实力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97>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Musicals: A Case Study of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in South Korea

Lin Qin^{1*}

(¹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ingbo, Zhejiang, 3151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issemin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ese original musical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ave deepened, yet systematic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i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remain limited.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ynthesiz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del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musicals, while identifying existing gaps in scholarship on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musicals. Using the case of the original musical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staged in South Korea,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its adaptive strategies in stage presentation, narrative structure, cultural symbol transformation, and audience reception, and situates these within comparative scholarly discuss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hinese musical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pursue a dual pathway of “preserving cultural core” while “adapting to target markets.” Cultural mediators play a pivotal bridging role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while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provides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fostering emotional resonance. Beyond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fold mechanism” analytical framework, aiming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作者简介: 林檎 (2001-), 女, 浙江玉环, 硕士, 研究方向: 音乐传媒与戏剧理论研究

通讯作者: 林檎, 通讯邮箱: Qinlinmusical@gmail.com

musicals and other performing art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musical theatre;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soft power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加速,音乐剧作为一种融合叙事、音乐、舞蹈与表演的综合艺术形式,逐渐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1]。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原创音乐剧不仅在国内快速发展,也开始积极探索海外舞台。《蝶变》作为首部完全基于中国文化创作并获正版授权在韩国上演的原创音乐剧,其演出不仅是一种艺术交流,更是中韩文化互鉴与文化软实力互动的生动实践^[2]。

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梳理中国音乐剧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揭示学界在“走出去”进程中存在的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西方音乐剧的本土化改编^[3],而针对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系统性探讨仍然稀缺。尤其在东亚语境下,中韩文化背景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在审美传统、叙事习惯和历史记忆方面仍存在差异^[4]。

在此背景下,《蝶变》为分析中国音乐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拟聚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音乐剧在跨文化传播中应如何处理“文化核心”与“市场适应”的张力?这一争议直接关系到作品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及文化身份的保持。预期发现是:中国音乐剧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保持文化核心”与“适应目标市场”并重的双重路径;文化中介在改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中韩共享的历史记忆为情感共鸣提供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三重机制”分析框架,以期为中国音乐剧及其他表演艺术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启示。



图1 蝶变海报(原版及韩版)

1. 文献综述

1.1. 跨文化传播理论

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揭示了中韩在符号理解与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中国文化更依赖共享语境,而韩国观众则更习惯直接的舞台表达^[5]。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模型进一步表明,中韩在集体主义倾向与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音乐剧在不同文化中的接受度^[6]。这些理论为解释《蝶变》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调整提供了基础框架。

1.2. 软实力与文化外交理论

奈(Nye)的软实力理论指出,文化产品是国家形象建构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资源^[7]。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出海”不仅是市场行为,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路径,其传播过程承载着国家文化身份的表述与价值理念的输出^[8]。因此,《蝶变》的出海不仅是一次艺术的传播,也具有较强的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

1.3. 文化适应与文化挪用理论

Ng的文化适应与文化挪用理论强调,跨文化传播并非简单移植内容,而是一个再解释与再创造的过程^[9]。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原创音乐剧在海外演出中常常需要在叙事节奏、舞美符号和人物塑造上进行调整,以兼顾文化核心的保留与目标市场的接受习惯^{[10][11-1]}。这一过程不仅是文化的再生产,也是文化意义的重构。

1.4. 研究空白

总体来看,西方音乐剧在非西方语境下的本土化改编已有较多研究,韩国音乐剧的国际化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经验^{[12][13]}。然而,关于中国原创音乐剧跨文化传播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一是缺乏全面的文献综述,研究成果零散且缺乏整合;二是缺少基于东亚区域的实证研究,案例材料有限;三是对文化中介作用和海外观众接受度的研究深度不足^[14-1]。在此背景下,《蝶变》这一案例为分析中国音乐剧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适应的机制提供了独特契机,也为深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参照。

2. 核心理论

2.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综合运用半结构式访谈与文本对比分析两种研究方法。(1) 半结构式访谈:对象包括《蝶变》的制作人、导演、演员以及韩国本土评论人,旨在揭示该剧在出海过程中所做的创作调整与市场策略。(2) 文本对比分析:选取中韩版本剧本进行对比,重点分析历史背景设定、文化符号呈现、叙事节奏与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差异,并结合现场演出观察与媒体评论加以验证^[11-2]。案例选择《蝶变》主要基于两点:其一,该剧是首部完全基于中国文化创作并在韩国获正版授权演出的原创音乐剧;其二,该剧改编与接受过程集中反映了中国音乐剧跨文化传播的多重挑战与机遇。

2.2. 文化符号的转化与再译

《蝶变》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为叙事背景,这一空间符号在中国观众语境中承载着殖民史与现代化的双重记忆^[13-2]。对于韩国观众而言,这一意象并不熟悉。制作团队在保留核心文化符号的同时,通过韩语转译、演前导赏等方式,帮助观众理解其历史内涵并建立与剧情的联系^[14-2]。这种策略体现了在跨文化传播中“保持文化核心”与“适应目标市场”的双重要求。

2.3. 叙事结构与舞台节奏的调整

原版《蝶变》在叙事上更注重抒情铺陈,而韩国观众更倾向于紧凑的情节推进。因此,韩版在保持主要剧情框架的同时,缩减了部分独白与慢节奏段落,加强了戏剧冲突和情节转折。这种调整不仅保证了文化核心的表达,也使叙事结构更契合韩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2.4. 文化中介的桥梁作用

在《蝶变》的跨文化改编过程中,导演、翻译、演员等文化中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不仅完成了语言层面的精准转换,还在表演细节、舞台调度与情感传递上进行针对性调整。通过中韩演员的联合排练与深度交流,韩版既保留了原作精神,又贴近韩国观众的观演心理。这一过程凸显了文化中介作为跨文化沟通桥梁的不可替代性。

2.5. 观众接受与反馈

调查与媒体评论表明,韩国观众对该剧的音乐和舞美给予了积极评价,尤其是融合中国传统旋律与现代配器的音乐元素,引发了观众的浓厚兴趣^[11-3]。然而,对于涉及中国近代史的情节,由于历史语境差异,部分观众理解存在障碍,需要借助节目册、字幕与导赏进行补充说明^[15]。社交媒体上的观演反馈也显示,《蝶变》在韩国观众中引发了对中国文化元素的二次解读与再传播,进一步延伸了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力。

2.6. 三重机制的理论提炼

结合上述案例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国音乐剧跨文化传播的“三重机制”:(1) 文化核心与市场适应的平衡:通过在舞台表现与叙事节奏上作出调整,同时坚持保留中国文化的核心符号。(2) 文化中介的桥梁作用:导演、翻译与演员等群体在双向沟通中实现了语境与审美的有效对接。(3) 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的激活:中韩两国共享的近现代史记忆为观众提供了天然的共情基础,增强了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这“三重机制”不仅有助于解释《蝶变》的出海经验,也为中国音乐剧乃至其他表演艺术在

国际舞台的传播与文化调适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3. 反思与讨论

通过《蝶变》赴韩这一案例可以看出，中国音乐剧在跨文化传播中需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3.1. 文献综述的再反思

前文中的文献综述表明，学界在跨文化传播、文化适应与文化外交等领域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然而，通过对《蝶变》的案例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三个不足：其一，多数理论强调“文化核心”与“市场适应”的二元对立，但对二者如何动态平衡缺乏操作层面的深入探讨；其二，对文化中介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实际作用关注不足，而《蝶变》的成功正说明中介群体的关键性；其三，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历史记忆在跨文化情感共鸣中的作用，这在中韩案例中尤为突出。因此，案例分析不仅验证了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也提示我们需要对相关研究进行深化和修正。

3.2. 案例的启示性与局限性

《蝶变》出海的经验为中国音乐剧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文化核心的坚守与市场适应的灵活调整可以并行不悖，文化中介在双向沟通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共享的历史记忆能够成为情感共鸣的有效纽带。然而，这一案例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其经验具有时间的阶段性与偶然性，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普遍模式；其次，韩国观众的接受基础与文化邻近性为传播效果提供了便利，但在文化差异更大的语境中是否同样奏效，仍需进一步验证；再次，现有分析更多集中于舞台表演环节，而对市场机制、政策支持等结构性因素的考察尚不足。

3.3. 音乐剧跨文化传播的未来展望

《蝶变》出海韩国的案例说明，中国音乐剧在跨文化传播中必须在“文化核心”与“市场适应”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现有研究在文化中介作用与历史记忆激活方面仍显不足，案例分析提示这两者对于跨文化传播成效具有关键意义。未来中国音乐剧的国际化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深化，以形成可持续的传播机制。

参考文献：

- [1] 张燕, 吴波. 中国音乐剧的引进与原创性探讨[J]. 江苏经济日报, 2024(09-27): T03-T03.
- [2] Hall E T. The Silent Language[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 [3] Choi J. The Globalization of Broadway Musicals: Reception and Adaptation in Non-Western Contexts[J]. Theatre Studies Journal, 2011, 25(3):112-125.
- [4] Lee M, Lee Y.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usicals on Korean Popular Thea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rforming Arts, 2015, 19(2):221-237.
- [5]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6.
- [6]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7] Nye J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8] Li J. The Rise of Chinese Musical Theate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Economic Influence[J].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2016, 9(2):55-74.
- [9] Ng K.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0] Wu K. Cultural Confluence: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ynergies in Chinese Juvenile Musical Thea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2023, 11(2):192-199.
- [11] Shin S. From Shanghai to Seoul: The Reception of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in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2019, 8(3):123-135.

[12] Xiao Y. A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and Crossover Operation of Musicals[D]. Beijing: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2016.

[13] Lee H. Postcolonial Parallels: Cultural Themes in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and South Korean Historical Drama[J]. Journal of East Asian Performance, 2021, 15(2):45-61.

[14] Li M.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Musicals: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as a Case Study[J]. 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5, 32(4):52-71.

[15] Kim S. Audience Recep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Korean Adaptations of Foreign Musicals[J].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2020, 12(1):101-118.

(主编: 莫岚 编辑: 杨喜超 校对: 金黛彤)

区域对比视角下中国中部省份县域地名分布特征——以安徽省为例

杨开路^{1*}, 毛翰臣¹, 陈金泉¹, 赵继涛²

(¹ 云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²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山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2801)

摘要: 地名是文化景观核心要素, 反映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本文以安徽省县域地名为例, 综合运用 GIS 空间分析与区域对比法探究中国县域地名分布特征。构建自然环境类(山水型、方位型、资源型)与社会人文类(传承型、寓意型、聚落型)的二类六型地名分类体系, 并将安徽省划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区域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安徽县域地名自然与人文类大致均衡、内部差异显著, “山水型”占优“资源型”稀少; 二类地名以皖中为中心向南北递变(人文类递减、自然类递增); 六型地名区域优势各异且分布契合区域地貌与文化。研究旨在揭示中国腹地省份县域地名文化地理分异特征, 为地名保护、区域文化认同提供参考, 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提供文化支撑。

关键词: 文化地理; 地名; 区域对比; 安徽省; 县域尺度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9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Level Toponyms in the Central Chinese Provi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mparison — A Case Study of Anhui Province

Yang Kailu^{1*}, Mao Hanchen¹, Chen Jinquan¹, Zhao Jitao²

(¹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Yunnan, China; ² Quanzhou City, Quangang District, Shanyao Street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362801)

Abstract: Toponyms are core element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aking county-level toponyms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regional compariso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unty-level toponyms. A toponym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wo categories and six types"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tegory (landscape-related type, location-oriented type, resource-related type) and the social-humanistic category (heritage-based type, implication-oriented type, settlement-related type). Anhui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Northern Anhui, Central Anhui, Southern Anhui)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humanistic toponyms in Anhui's counties

作者简介: 杨开路 (1995-), 男, 安徽阜阳, 硕士, 研究方向: 社会文化地理、农户生计、区域发展、地理教学理论

毛翰臣 (2005-), 男, 天津, 学士, 研究方向: 社会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地理教学理论

陈金泉 (1998-), 男, 广东茂名, 硕士, 研究方向: 经济地理

赵继涛 (1997-), 男, 安徽阜阳, 学士, 研究方向: 医学、地名文化

通讯作者: 杨开路, 通讯邮箱: lqhny@foxmail.com

are roughly balanced, with significant internal differences - the "landscape-related type" is dominant while the "resource-related type" is rare; the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toponyms show a gradient change centered on Central Anhui and extending to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humanistic toponyms decreases, while tha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oponyms increases); the six types of toponyms have distinct regional advantag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gional landforms and cultures.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cultural-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level toponyms in inland provinces of China,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oponym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offer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Strategy.

Keywords: Cultural Geography; Toponyms; Regional Comparison; Anhui Province; County Scale

引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长期战略。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中国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但仍面临创新能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挑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为战略深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中部发展向“质量效益型”转型^[1]。在区域振兴实践中,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核心价值已被明确凸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便提出,需依托中部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2],强调了文化保护与发展在区域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地名,堪称文化遗产领域的“活态印记”,其背后凝结着厚重的历史脉络、独特的地理特征、多元的民族风情与鲜活的社会记忆,更是构筑地方文化身份、凝聚群体归属感的核心载体。深入挖掘与探究地名的内涵,不仅能为语言学、历史学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关键学术支撑,更在延续地域文化根脉、夯实民族文化自信、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以及激活文化旅游价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安徽位于中国中部地带,其文化地理分布在中国范围内极具典型意义。省内疆域纵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流域,自然地貌呈现出清晰的过渡特征:北部是开阔平坦的黄淮平原,往南逐渐过渡为起伏和缓的江淮丘陵,至南部则转变为层峦叠嶂的皖南山区,地形种类极为多样。与之相呼应的是,安徽的文化风貌也展现出鲜明的多元融合特质:淮河以北的皖北区域,长期受中原文化的深度影响,形成了质朴爽朗、豪迈大气的文化风格;长江以南的皖南区域,属于传统江南文化的核心辐射圈,文化底蕴深厚且尽显雅致细腻;而处于两大区域之间的皖中地带,则成为南北文化碰撞交融、实现过渡与创新发展的独特空间。这种“一省涵括三大文化地理区域”的独特格局,让安徽成为浓缩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特质的“微观范本”,也为开展地名与文化地理关联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适宜的案例样本。

既往研究或聚焦于小尺度区域地名的演变机制^[3]和某一类型地名的研究^[4],缺乏宏观空间格局的洞察;或着眼于中等区域的整体分布特征^[5]和地名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6],欠缺内部亚区域的精细对比与理论升华。鉴于上述研究空白,本文以安徽省全域县级行政区地名为核心研究素材,通过搭建系统科学的地名分类框架,融合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文化地理区划方法,系统剖析安徽省县域地名在不同文化地理分区内的分布特征与规律,深入探究并论证中国地名命名逻辑与空间分布模式背后的深层机理,以期在地名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及中部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实践,提供兼具实证价值与理论意义的参考依据。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数据主要包括安徽省县级行政区地名数据及其地理位置信息。地名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24版)、民政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https://dmfw.mca.gov.cn)以及安徽省各地市县官方发布的地方志与地名志资料。县域质心点坐标根据县域面数据进行质心算法计算得出质心坐标。运用QGIS3.28,将每个地名转化为点状矢量数据。安徽省及各地市的行政区划边界矢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用于制图与空间分析的基础底图。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一种混合方法框架,将定性分类与定量空间分析相结合,包括:

(1) 区域对比法 (Regional Comparison Method): 依据自然地理界线(淮河、长江)与历史文化特征,将安徽省划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大区域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揭示地名分布的区域分异规律。

(2) 核密度估计法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该方法是一种用于估计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在GIS空间中用于计算点要素在周边邻域内的单位密度值,从而生成平滑的密度表面。本研究运用此法绘制不同类型地名的核密度分布图,以便于直观识别其空间聚集的“热区”(即核心区)与“冷区”(即边缘区)。

(3) 地名层法 (Toponymic Stratum Method): 参考赵思文等^[7]在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研究中的用法,通过GIS叠加分析 (Overlay Analysis),将不同类别(如山水型、传承型)的地名点图层进行空间叠加与融合,从而综合可视化多种地名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重叠关系与组合特征。

(4) 方向分布-椭圆法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 参考Gong J^[8]对标准差椭圆用法的观点,通过计算点数据集在空间上的平均中心、分布方向与离散程度(标准差)来生成椭圆,从而定量描述地理要素分布的整体方向性、中心趋势与聚集程度。本研究用以刻画不同类型地名分布的主导方向和扩散范围。

2.基于文化地理的安徽省县域地名分类体系

2.1.安徽省县域地名的代表性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省份县域地名研究的极佳样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缩影^[9]。其代表性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地位。从地理上看,安徽省位于中国中部腹地,淮河与长江两大天堑横贯其间,将其地理分割为差异明显的北、中、南三部。这种格局与中国整体西高东低、三大阶梯并存且地貌丰富的基本国情高度相类似,不仅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缩影^[10],安徽整体也像一个浓缩的中国。其次,从文化上看,安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与交汇地之一。皖北是中原文化的南缘,皖南是江南文化的腹地,皖中则是江淮文化的本体区。文化是影响地名的核心要素之一^[11]。历史上,吴楚文化、中原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孕育了徽商文化、桐城派文学等独特地域文化形态。相较于河南(中原文化过于单一强势)或江苏(东部沿海,历史早期开发程度相对边缘),安徽内部文化多样性更丰富^[12],过渡特征更显著,更能代表中国地名命名中所蕴含的“多元一体”文化特征。

2.2.安徽省县域地名分类体系

2.2.1.体系构建原则

为确保分类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本研究分类体系的构建遵循以下三层递进的原则:

(1) 概念界定的独特性与清晰性 (Conceptual Uniqueness and Clarity): 即分类时需保证分类体系中每一个大类与小类,均具备明确具体、互不重叠的定义表述。这是构建分类框架的核心前提,核心目标是从理论定义层面彻底规避模糊不清、边界混淆的问题。以具体类别为例,需明确“山水型”地名特指直接关联自然地貌实体(如山脉、河流)的命名类型,而“资源型”地名则指向以具体物产资源(如矿产、作物)为核心依据的命名类型,从概念根源上实现二者的清晰区隔。

(2) 分类维度的独立性与平行性 (Dimensional Independence and Parallelism): 确保各大类(如“自然环境类”与“社会人文类”)以及其下属的各小类(如“山水型”、“方位型”、“资源型”)处于同一逻辑层面,且分类标准(维度)相互独立、互不交叉。这个原则关注的是分类框架本身的结构,它要求各个类别如同树状图的分支一样,从同一个节点分出的分支之间是平行关系,而非包含或交叉关系。

(3) 实例归类的互斥性与排他性 (Mutual Exclusivity in Categorization): 在前两个原则的基础上,该原则要求在具体操作中,任何一个地名实体都必须且只能被归入一个最符合其核

心得名缘由的类别中。这是分类结果的保障性原则，确保不存在一个地名同时属于多个类型的情况，从而避免重复计数和逻辑混乱。

2.2.2.分类体系内涵

基于上述原则，并综合考量地名命名受自然与人文双重驱动的基本规律^[13]，参考路娜等对天津地名文化景观构建的分类体系^[14]，本研究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安徽省县域地名的分类体系——两类六型分类体系。该体系将地名划分为“自然环境类”与“社会人文类”两大类别，其中，自然环境类包含三个类型：山水型、方位型、资源型；社会人文类包括传承型、寓意型、聚落型。本体系旨在系统揭示地名得名来源与其所处地域自然背景和历史人文脉络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安徽省这个典型的地理背景下，“自然环境类”地名集中展现出人地互动过程中，人们对地理实体的直接认知与直观描述。如皖南山区，因地貌以山地、水域为主，“黄山区”“泾县”等地名便直接源于当地显著的自然地貌特征。其中，“方位型”地名则多分布于地势平坦、方位标识作用更易凸显的皖北平原，“阜南县”便是典型代表；“资源型”地名虽整体数量不多，但铜陵市的“铜官区”这类依托地方特有矿产资源命名的案例，仍清晰反映出安徽部分区域对自然资源的早期认知与开发利用。从另一维度来看，“社会人文类”地名深度承载着地域历史积淀与文化发展轨迹。像“萧县”等“传承型”地名，延续了古国、古城及历史政区的脉络，留存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怀宁县”“广德市”等“寓意型”地名，蕴含着治理者或民众对安宁生活、德政建设等理想愿景的追求；而“聚落型”地名中，江淮与皖南地区常见的“圩”“寨”等通名，更是直接映射出历史时期基层聚落形态、防御体系构建及水利工程建设对地名形成的深刻影响。这种地名分类方式不仅在概念层面实现了类别间的互斥性与体系完整性，更精准契合了安徽南北地理风貌迥异、人文内涵多元的现实特征。

表 1 安徽省县域地名分类体系及主要用字示例

Category	Type	词源特征
自然环境类	山水型	山、峰、岭、岗、河、江、溪、湖、泉、潭、泾、泗等
	方位型	东、西、南、北、中、上、下、前、后、阳（山南水北）、阴（山北水南）等
	资源型	金、银、铜、铁、煤、林、茶、桑、麻等
社会人文类	传承型	古国名（如“宿”、“蓼”）、古邑名、历史人物姓氏、历史事件称谓等
	寓意型	宁、安、康、泰、福、寿、广、德、惠、和、平等表美好吉祥之字
	聚落型	镇、集、店、铺、埠、港、街、圩、寨、堡、关等

2.3.安徽省三大地理区域的划分

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形成与分异的物质基础。安徽省依据淮河与长江这两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并结合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人文景观差异，可划分为三个特征鲜明的亚区域：

- （1）皖北地区：指淮河以北区域，主要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 6 个地级市全域，以及滁州市的明光市、凤阳县、定远县和六安市的霍邱县。该区域属黄淮平原，地势平坦，是传统农业区。文化上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为儒家文化核心区，民风淳朴豪爽，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和人口密集区。
- （2）皖中地区：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区域，核心范围包括合肥、六安（不含霍邱）、滁州（不含明光、凤阳、定远）3 市。该区域以江淮丘陵为主体，是南北过渡地带。文化上属于江淮文化区，兼具北方中原文化的务实与南方楚文化的灵动，历史上是南北文化交流与拉锯的前沿，形成了兼容并蓄、过渡性强的文化特征。
- （3）皖南地区：指长江以南区域，包括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 7 市。该区域以皖南山区和丘陵为主，山水环绕，地貌复杂。文化上属于徽州文化（新安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核心影响区，历史上因徽商崛起而文教昌盛，宗族观念强，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村落，文化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

3.结果与分析

3.1.安徽省县域地名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本次研究共统计安徽省县域地名 104 个，其中皖南 45 个、皖北 39 个、皖中 20 个。从“社会人文类”与“自然环境类”两大类型（Category）的区域占比（图 1）及地名核密度图可见，地名类型分布呈现“皖中人文主导→皖北自然略优→皖南自然主导”的梯度递变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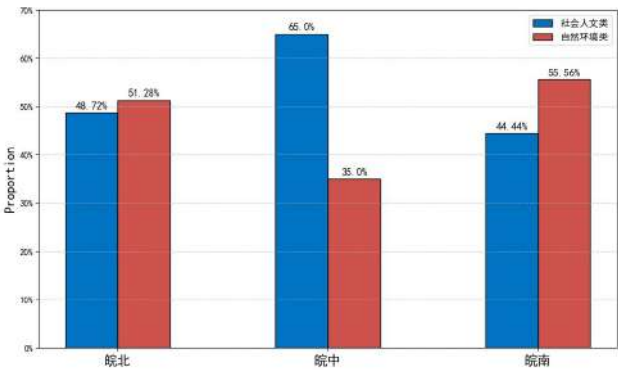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县名 Category 类型统计

(1) 皖北：自然环境类轻微领先，人文与自然接近平衡

自然环境类地名占比 51.28%，略超社会人文类（48.72%），两者差距不足 3 个百分点。从核密度图看，自然环境类高值区集中于阜阳、宿州等淮河平原腹地，与皖北水网平原的自然格局契合；同时社会人文类也有一定密度，体现皖北作为中原文化延伸区，人文资源（如古聚落、历史交通节点）与自然景观（湿地、平原地貌）的均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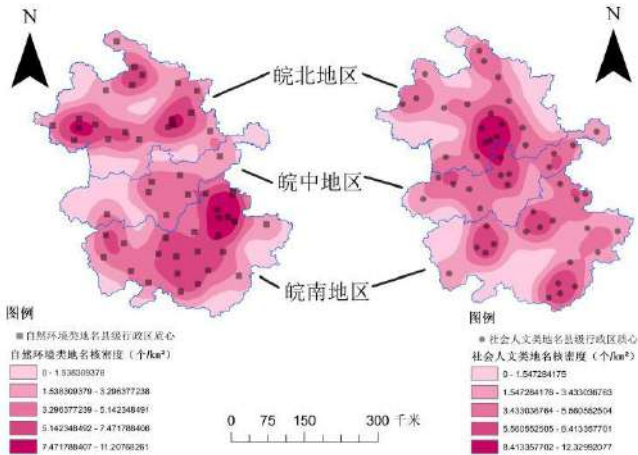


图 2 区域两类地名核密度分析

(2) 皖中：社会人文类绝对主导

社会人文类地名占比 65%，远高于自然环境类（35%），是三大区域中唯一“人文属性强于自然属性”的区域。结合地名核密度图（图 2），社会人文类高值区以合肥及周边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反映皖中（如合肥、六安等地）作为庐州文化、江淮文化核心区，历史人文活动（行政建制、文化传承等）对地名的塑造作用更突出。

(3) 皖南：自然环境类明显主导

自然环境类地名占比 55.56%，显著高于社会人文类（44.44%）。核密度图显示，自然环境类高值区覆盖黄山、池州等山地水系密集区，与皖南以黄山、新安江、皖南古村落为核心的自然文化资源分布高度一致，反映自然本底对地名类型的强势塑造。

整体而言，从皖中向皖北、皖南，社会人文类占比持续递减（65%→48.72%→44.44%），自然环境类占比持续递增（35%→51.28%→55.56%），形成与区域地理文化特征高度匹配的梯度分布。

3.2.区域地名类型空间分布

依据地理文化差异将安徽划分为皖北、皖南、皖中三大区域，进一步分析“传承型、寓意型、

山水型、方位型、聚落型、资源型”六类小类型 (Type) 的分布特征 (图 3), 提取每个区域六型中排名前三型的地名 (前三型地名占比均超 60%), 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解析空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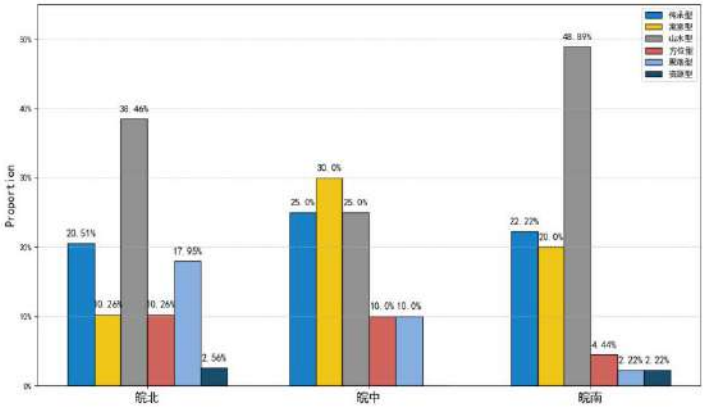


图 3 区域县名 Type 类型统计

(1) 皖北地区：自然与人文协同，“山水为面、聚落为点”

从图 4(a)的标准差椭圆看：山水型地名的椭圆覆盖范围最广，长轴呈东北-西南走向，与淮河及其支流（涡河、颍河等）的流域走向一致，反映山水型地名对皖北水网平原自然格局的依附性，这与小类型中“山水型占比 38.46%”的特征呼应；聚落型地名的椭圆更紧凑，核心区与“地名类汇聚区”（粉色区域）高度重叠，集中于利辛、固镇、谢家集等县域，体现皖北平原区农业聚落长期集中分布的特点，契合“聚落型占比 17.95%（三区域最高）”的分布；传承型地名的椭圆范围介于两者之间，分布相对分散，反映中原文化传承在皖北各区域的广泛留存，但未形成极强的空间集聚。



图 4 皖北地区 Type 前三型县域地名分布

空间格局上看，皖北因平原水系的自然基础，山水型地名呈“面状”广泛分布；同时农业聚落的长期发展，使聚落型地名在核心区“点状”高度集聚，自然与人文类地名形成“山水为面、聚落为点”的协同格局。

(2) 皖中地区：人文集聚核心，自然分布外围

结合下面的标准差椭圆（图 5）来看，虽然皖中地区寓意型地名的椭圆范围较小，但核心区与“地名类汇聚区”（粉色区域）高度重合，集中于合肥市区及周边（瑶海、蜀山等区），体现皖中人文核心区对寓意类地名的集聚作用（如寄托政治理想、文化吉祥的地名），与“寓意型占比 30%（三区域最高）”的特征匹配；山水型地名的标准差椭圆长轴呈东西走向，覆盖了舒城、庐江等地，与皖中江淮分水岭、巢湖等山水资源的分布一致，说明山水型地名仍以自然本底为依托，但分布范围限于外围自然区域；而传承型地名的椭圆最为紧凑，集中于合肥主城区附近，反映了皖中核心城市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聚焦作用。

因此，在总体空间结构上，皖中形成“人文集聚核心、自然分布外围”的格局，与“社会人文类绝对主导”的大类型属性高度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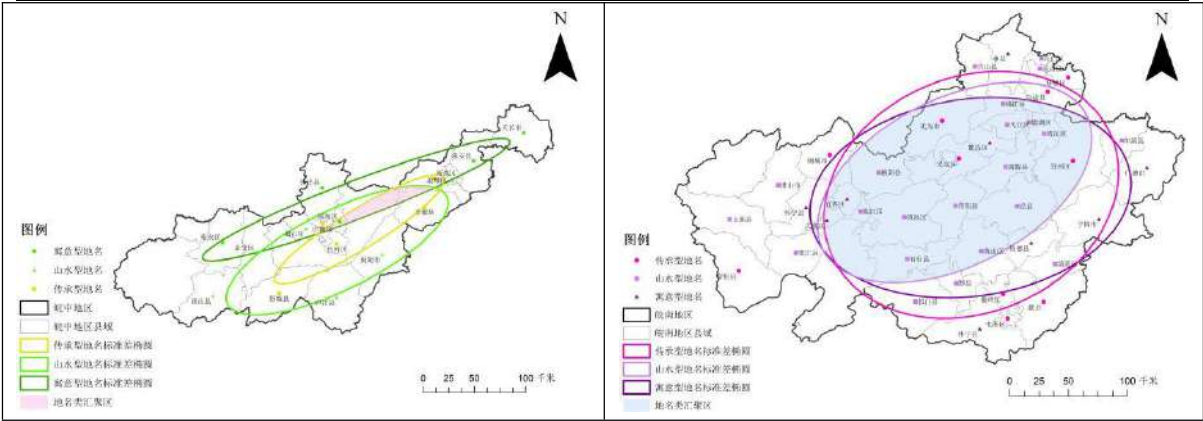


图 5 皖中（左）、皖南（右）地区 Type 前三型县域地名分布

(3) 皖南地区：山水垄断核心，文化延伸内涵

从图 5 可以看出，皖南地区的山水型地名几乎覆盖整个“地名类汇聚区”（浅蓝色椭圆区域），且椭圆长轴与皖南天目山-黄山山脉、新安江水系走向一致，直接体现了山水型地名对皖南山地、水系的紧密依附，这是“山水型占比 48.89%（三区域最高）”的空间表现。另外，传承型地名的椭圆范围稍大，除汇聚区外，在桐城、宿松等地也有分布，反映徽文化、桐城派文化等历史传承的广泛性对地名的影响。寓意型地名的椭圆与山水型、传承型重叠度高，说明寓意类地名往往依托山水资源或人文传承赋予内涵，如黄山周边地名既体现山水特征，又蕴含“吉祥”“祈福”等文化寓意等。

总体空间分布上看，山水型地名以“垄断性覆盖”构成皖南地名的核心标识，传承型、寓意型则是对山水资源文化内涵的延伸，共同形成“山水为核、文化为翼”的格局。

3.3.区域地名内涵比较：地理-文化-地名的耦合机制

上面可以看出，安徽三大区域的地名类型差异是地理环境基底与历史文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此作用通过“大类型属性引导—小类型功能分化—空间格局响应”的链条，形成中部地区省份县域地名命名的“地理-文化-地名”的耦合体系。

(1) 地理环境：自然本底的“先天塑造”

自然环境对于地名命名有着重要影响^[15]。皖北地区属于淮河平原，地势平坦且开阔，淮河及其支流在当地形成密集水网，同时高地区也是华北平原南缘延伸区。平原地貌与水网湿地既为山水型地名（如“涡阳县”因涡河得名）提供基础，又为农业聚落发育创造条件，因此自然与人文类地名占比相对均衡。皖中地区位处江淮之间，是长江与淮河的过渡带，自然环境相对两区比较平和（巢湖水域、江淮丘陵等）。这种“中庸式”的自然本底，为社会文化要素（行政建制、文化传承）的积淀提供了空间，使社会人文类地名成为主导。皖南地区以黄山山脉、天目山脉为骨架，新安江、青弋江等水系纵横分割，山地丘陵占比超 80%。独特的山水格局直接催生大量以山、水命名的地名（如“黄山区”“青阳县”等），这解释了皖南地区“自然环境类占比 55.56%、山水型占比 48.89%”的地名现象。

(2) 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后天雕琢”

皖北地处中原文化向南辐射的关键地带，历史上既是历代兵家争夺的交通枢纽，也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在历史进程中，中原文化的深厚传承（例如古聚落的命名传统）与农业开发的持续推进（催生大量乡村聚落），让“传承型”“聚落型”地名得以广泛保留，与自然类地名共同形成分布均衡的格局。皖中地区的合肥，自战国时期便以“庐邑”之名存在，此后长期作为庐州府治所，是江淮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其历史上的行政中心地位、科举文化的繁荣发展（如“庐州书院”的兴盛），加之近现代作为省会城市的集聚效应，不断将丰富的人文内涵融入地名体系，使得寄托政治文化理想的“寓意型”地名与延续历史称谓的“传承型”地名，成为当地地名的突出类型。皖南地区因历史上山水阻隔的地理特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徽文化圈。尽管徽商的崛起与新安理学的兴盛为地名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意蕴，但山水地貌始终是该区域最核心的识别标志。因此，由于传承型、寓意型等文化类地名多依托山水实体而存在，因而并未改变“山水型”地名

在当地的主导地位。

(3) 类型层级：属性与功能的“有机融合”

大类型的“人文/自然属性”是区域地理文化的总体表征，小类型则是这种表征的具体功能细化。皖北总体特征表现为“自然略优、人文不弱”，小类型以“山水型”（标识自然本底）为核心，“聚落型”（记录农业文明）、“传承型”（留存中原文化印记）为支撑，体现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塑造”；皖中则表现为“人文主导”→小类型以“寓意型”（承载文化理想）、“传承型”（延续历史记忆）为核心，“山水型”为支撑，体现人文对地名“内涵赋予”的主导；皖南独具特色的山清水秀使其县名“自然主导”明显，小类型以“山水型”（定义区域标识）为绝对核心，“传承型”“寓意型”为补充，体现自然对地名的“基础限定”与文化对自然的“内涵延伸”。

以安徽为代表的中国中部地区县域地名类型的区域差异，是地理环境“先天塑造”与历史文化“后天雕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通过类型层级的属性与功能的“有机融合”，最终形成与区域禀赋高度匹配的“地理-文化-地名”耦合体系。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安徽省县域地名的系统分类与空间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安徽省县域地名总体特点：安徽省县域地名构成丰富，自然环境类与社会人文类地名大致均衡，但内部结构差异显著。其中，“山水型”是全域最具优势的地名类型，而“资源型”地名极为稀少，反映了传统农业文明对地名命名的深刻影响。

(2) 二类地名的区域分布趋势：以皖中为中心，向皖北、皖南两侧递变——社会人文类地名占比从皖中的 65.0%，同步向皖北（48.72%）、皖南（44.44%）递减；与之相对，自然环境类地名占比从皖中的 35.0%，同步向皖北（51.28%）、皖南（55.56%）递增，呈现出“中心——两侧”的清晰梯度变化规律。

(3) 六型地名的区域优势与方向性：皖北以山水型（38.46%）为核心，聚落型（17.95%）和传承型（20.51%）为重要支撑，分布方向与黄淮平原的广阔性和中原文化的延展性相符。皖中以寓意型（30.0%）和传承型（25.0%）为主导，方向上凸显其作为人文荟萃之地的特征，与历史上州府治所集中、儒家文化浸润深密切相关。皖南以山水型（48.89%）绝对主导，其他类型均处于从属地位，分布高度集中于南部山区，与黄山山脉及皖南水系走向高度吻合。这种分布方向与各地区的核心地貌特征和文化扩散路径高度一致。

(4) 反映的中国中部地区县域地名命名规律：本研究案例表明，以安徽省为代表的中部地区传统县域地名的命名深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影响，其空间分布是人对自然环境认知与人文历史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地名分布格局有效地记录和反映了区域文化地理分异：总体上自然环境类地名占据优势；在开发历史悠久、政治文化核心的区域，人文类地名更具优势；而在自然地理标识性强或开发相对较晚的区域，自然环境类地名则更为突出。地名成为了解区域历史开发序列、文化形态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活地图”。

4.2. 讨论

地名文化是中华地方文化宝库中极具价值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中部崛起的背景下，深入探寻地名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地理特质，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价值。一方面，挖掘并解读地名背后的故事，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文化辨识度与旅游吸引力（如当前地名中的黄山区，其核心标识“黄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重要符号；徽州区则因承载“徽州”这一历史地名，凝聚着徽文化的深厚底蕴，二者均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 IP），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梳理清楚地名中蕴含的本土文化地理元素，有助于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进而为文化的传承延续与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研究旨在通过安徽省这一微观缩影，初步揭示中国中部地区省份县域地名分布的内在逻辑与驱动机制，即地理环境是地名形成的物质基础，而历史人文进程则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塑造和升华。文中所采用的“文化地理区域对比”框架与多方法融合的分析路径，为理解更广大地域的

地名文化格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构建的分类体系力求贴合安徽实际,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但若要推广应用于全国,其普适性仍需进一步检验与完善,需要纳入更多维度的指标。其次,安徽主要以汉族文化和农耕文明为主导,其结论对于理解中国多元文化交融区(如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的地名命名规律存在局限。这些地区的大量地名源于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16](如西藏“墨脱”(藏语发音意为“花朵”)、内蒙古“鄂托克”(蒙古语发音意为“部落”或“疆域”)等),其地名命名的逻辑、包含的文化内涵和空间分布规律可能与汉文化占主体的地区存在系统性差异。未来研究应将这些地区纳入比较视野,构建更能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综合性地名分类与解释体系,从而更全面地展现中国地名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Z]. 2021.
-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R]. 2023.
- [3] 范文静, 刘碧娴, 霍斯佳. 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遗传演化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5, 39(06): 59-67.
- [4] 范文静, 吴雨农, 霍斯佳. 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分析——以交通类地名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44(08): 1678-1691.
- [5] 张治弘, 张争胜, 张念杰, 等. 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研究, 2025, 44(03): 809-824.
- [6] 薛樵风, 金晓斌, 郭畅, 等. 基于地名自动匹配的历史聚落空间重建与特征分析——以清代晚期的苏州府为例[J]. 地理学报, 2025, 80(07): 1825-1839.
- [7] 赵思文, 胡希军, 金晓玲, 等. 古航道视角下聚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湖南沅水流域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43(01): 214-235.
- [8] Gong J. Clarify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2, 34(2): 155-167.
- [9] 徐国利. 再论安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J]. 理论建设, 2015.
- [10] Bao S, Lu L, Zhi J, et al. A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provincial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ing i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4, 16(6): 2248.
- [11] Guo Y, He P, Huang J. Spatial and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distribution in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and its conservation significance[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5: 1-32.
- [12] Chen X, Fang G, Kang J, et al. Language culture and land use: a case study of the dialect cultural regions in Anhui Province, China[J]. Land, 2025, 14(3): 648.
- [13] Spencer J E. Chinese Toponyms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geographic realities[J]. Geographical Review, 1941, 31(1): 79-94.
- [14] 路娜, 曾佩枫, 张海平, 等. 天津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02): 194-201.
- [15] Rasulov A, Saparov K, Nizamov A.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tigraphic layer in toponymics[J]. Current Research Journal of Pedagogics, 2021, 2(12): 61-67.
- [16] Guo Y, Wang L, Huang J. Evolution of toponymic cultural landscapes in Xinjiang’s Yulongkashi River Basin[J]. npj Heritage Science, 2025, 13(1): 428.

(主编: 韦卓艺 校对: 金黛彤)

《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

——刘勰为他正名，历史还他清白

刘志义^{1*}

(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子云他简单而复杂, 沉寂而讽味。他的文已登峰造极, 他的才何以八斗量。“扬子比雕玉以作器”此话给刘勰带来启发。《文心》藏有两个事关扬雄的秘密尚未被学界阐发, 一是作为“文之枢纽”的《宗经》, 唯有扬雄与孔子、子夏有言在该篇, 说明刘勰把他与圣人及其高徒等量齐观; 再者, 出现在《书记》篇的“扬雄曰:”是《文心雕龙》唯一以人名“曰”称谓的句式。他为屈原悲, “心壮”长卿赋, 有了《反离骚》, 才有“文之枢纽”之一的《辨骚》。他不是一个媚俗的人, 所以“耆老久次”被人笑白。他被世人讥为“白圭之玷”, 至今蒙受不白。《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 刘勰在为他正名, 历史还他以清白。

关键词: 扬子; 《宗经》; 曰; 《辨骚》; 知音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382>

Study on Yang Zi Yun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Liu Xie Clears His Name and History Restores His Reputation

Liu Zhiyi^{1*}

(¹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Zi Yun is simple and sophisticated, calm and sarcastic. His literature stands at the peak of perfection, and his genius is immeasurable. Yang Zi uses metaphor to express jade-carving like making artifacts, which brings Liu Xie inspiratio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ontains two secrets concerning Yang Xiong that have not yet been revealed by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one is only Yang Xiong following Confucius and Zi Xia, solely three figures, appeared and spoken in the key Chapter of *Revering the Classics*, which means Liu Xie sees Yang Zi as the same as saint and saint's disciple, another is the “Yang Xiong says:” appeared in the Chapter of *Epistolary Writing*, this sentence pattern expressed by a figure in Chinese spelling “yue” is really so special that it's the only time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He is sorrow for Qu Yuan, applauding for Si Ma Xiang Ru's poetry, his poem *After Li Sao* directly stimulates Liu Xie to have the key Chapter of *Evaluating Sao*. He isn't a person who tries to please the public, so his official position always can't be promoted, and then be laughed by others, and even be ridiculed by world as a stain on flawless jade, and so far still be suffering injustice. Reading through Yang Zi Yun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one can see how Liu Xie has cleared Yang's name and why history should restore his reputation.

作者简介: 刘志义 (1965-), 男, 山西临县, 硕士, 研究方向: 文艺学

通信作者: 刘志义, 通讯邮箱: hklzy@public.szptt.net.cn

Keywords: Yang Zi; *Revering the Classics*; Yue; *Evaluating Sao*; Discrimination

在《文心雕龙》庞大的作家群体，扬雄无疑是最常被引用、剖判、观照的一位。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人，祖先发迹于周之晋，其姓盖由于晋之扬侯，其作《反离骚》有云：“或鼻祖于汾隅”“流于末之扬侯”^[1]可为证。统计显示，扬雄名姓及其作品、言状在《文心》出现四十三次，刘勰有时把他和其他作家像司马相如、王褒、刘向、班固一视同仁，称之马、扬或扬、马、王、扬、雄、向、扬、班等，说明他在文学或文章上的成就与诸位不相上下，难分高低；有时昵称子云，全书竟用到七次之多，可见刘勰对扬雄颇为亲切，十分喜爱，尽管两人异世隔代，相距五百年；有时以扬子称，用到两次，分别出现在《宗经》和《才略》两篇，以示对扬雄敬仰之情。

1. 扬子由来小考

子，是先秦诸子称谓，“子曰”更是特指孔子说。刘勰并非第一个称扬雄为扬子的人，他在《诸子》给子下过一个定义叫“博明万事为子”，很值得玩味。扬子之称最早见诸其自著的《解嘲》《解难》篇“客难扬子”“扬子笑而应之”等，与扬子同时期的桓谭是最早在公开场合称扬雄为扬子的文章达人者，“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2]语出《汉书·扬雄传》，所言甚是。《汉书·楚元王传》更是把扬子载入“自孔子后”的“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的“数公”行列。刘勰之后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称司马迁、相如、扬雄是汉之时“最其善鸣者”^[3]，在《原道》称“荀与扬也”紧随孟子之后把荀、扬二子视为仅次于孟子的儒家道统传人。南宋王应麟《三字经》“五子者，有荀扬”把荀子与扬子并而列之，则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凡此种种，说明汉时能以子相称者，寥寥数人，扬子之称，实至名归，扬雄是孔子之后西汉王朝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其贫，晏如也，其经玄妙，其篇籍具存，其文足以师范，其人可为后世法。

2. 文心何以雕龙

扬雄在《文心雕龙》的首次亮相是在《宗经》篇，“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以含文也”，该篇可是《文心雕龙》五十篇的第三篇，也是“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与《原道》《征圣》《正纬》《辨骚》相前后，居五篇之中正位。扬子所谓“五经”即《宗经》所宗之经，具体来说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儒家经书，刘勰视之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扬子雕玉之说，见诸其《法言·寡见》“玉不雕，珣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4]扬子并不反对为文写作字斟句酌的雕玉工夫，认为经典之作没有文饰的加工是成不了经书的，这与《序志》“古来文章，以雕縠成体”的观点一致，也与《文心雕龙》书名来历有一定关联。传统以为，《文心雕龙》的书名缘自《序志》“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之说，但细究此话，“岂取”已含否定意，文章需要雕饰没错，但“雕縠”要得体、成体统、合经意，这才是“雕龙”要义所在，如此才能达到“五经含文”的目的，而非“雕龙爽”般华丽的形式上的精雕细刻才叫“雕龙”。骏爽阐发邹衍时文，与“谈天衍”竞名，被人称为“雕龙爽”虽然华美，但总归表面工夫，是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有违五经“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致用”“实记”“言志”“据事”“辨理”等“表里之异体”的实事求是精神。《文心雕龙》之“雕龙”并非“雕龙爽”的翻版再造，而是受到扬子雕玉作器五经含文之说的启发才得此书名而来。“雕龙”，除了有形式的雕饰，还要有内容的赋予，对于过分追求文辞华丽的“雕龙爽”，刘勰和扬雄都持否定态度。刘勰在《时序》篇批评“骏爽以雕龙驰响”是“出乎纵横之诡俗”，即纵横家诡谲适俗的游说习气。扬子《法言·吾子》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批评辞人作赋“丽以淫”不合法度，败坏文风。扬子还在《法言·吾子》追悔自己“雕虫篆刻”的童子赋，“壮夫不为”，主张君子不做“尚辞”之人，要“事之为尚”，提倡“事、辞称则经”，以“诗人之辞丽以则”为准则，这些观点都对刘勰产生影响，在《诠赋》《体性》《情采》《物色》等篇俯拾皆是，足见二人学究渊源。《文心雕龙》的精神实质在“心哉美矣”，这是《序志》篇首章里的一句话。《尚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5]之说，刘勰是接着《尚书》继续来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文心惟美的。他还对古文献《琴心》《巧心》仰慕不已，在《序志》特别把“为文之用心”与这两部典籍等而视之，他试图在扬子雕玉说基础上接着扬子继续说。

3. 扬子出现在《宗经》

扬雄对刘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引用“扬子比雕玉以作器”在《宗经》篇，是别出心裁，意有所指。该篇不同于其他诸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别的篇目引用人物众多，错综其间，而《宗经》里出现的人物却仅有三位，身份特殊：一是孔子，“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删”是说孔子有删订《诗》《尚书》《春秋》等经书“大宝”之功，“述”是说孔子为《易》作十翼，大放异彩，为《礼》正五教，不遗余力。再是子夏，“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子夏所叹，见之于《尚书大传》，亦可参见唐书法家欧阳询《卜商帖》“商曰书之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三便是扬雄，他把五经含文比作雕玉作器。孔子是圣人，出现在《宗经》，理所当然；子夏作为孔门四科文学科的高徒，和子贡同为孔子“始可与言《诗》已矣”之人，以《诗大序》和《子夏易》行世，出现在《宗经》，名正言顺。那么，扬子出现在《宗经》，刘勰是怎么考虑的呢？从三人出现顺序看，夫子作为至圣先师领衔，子夏作为弟子随后，扬子作为后学殿后，刘勰如此排序，隐含儒家道统传承，文脉相袭，由此突出扬子儒家正宗地位。从全篇结构布局看，作为《宗经》所宗五经的总制作人和总导演，孔子在第二章现身，总揽全局，此“则圣人之情”，语见《征圣》；子夏出现在五经之一“《书》实记言”的第四章，就《书》而叹，阐发文义，体现其作为孔门高徒的独到创见；扬子出现在“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第九章，比作文如雕玉，宗五经以含文，回望夫子“大宝咸耀”，接应子夏“昭昭”之文明，“离离”之言行，“开学养正”，顿然生辉，反映其作为后学大儒，与至圣前贤理念贯通，一脉相承。刘勰如此巧安排，意在凸显扬子儒家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正所谓“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是也，语出本篇。

从《汉书·扬雄传》记载的扬子自身经历看：他曾倾慕相如，作《甘泉》《河东》《校猎》《长杨》四大赋，一举成名，奠定其在汉文学史上的文坛领袖地位。他悲屈原不被容，作《反离骚》，可见其才情。相如之赋非但劝止不了汉武帝好神仙习气，反倒使武帝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这件事使他终于认清赋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现实，于是辍笔不复为，转而仿《易经》作《太玄》，力求“要合五经”“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可谓继孔子“十翼”和《子夏易》后对五经之一的《易》真正做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用二十七年时间坚持做“异语”整理，成书《方言》，见《答刘歆书》，搜索奇字作《训纂》以晓音义，开古代语言文字学先河。他甚至怀疑太史公《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于是仿《论语》，作《法言》，旗帜鲜明维护圣人之道，捍卫儒家正统，与当时弥漫泛滥的神学迷信划清界限。用《法言·吾子》的话说，他是“窃自比于孟子”，可见其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宁可“耆老久次”不为立功利禄，也要为儒家张目。借韩愈《进学解》一言，扬子之于儒，“可谓劳矣”，其志在立言立德也。

就是这样一个扬子云，刘勰未引入其他人物，唯独把他放进《宗经》，与夫子、子夏相俦列，让他们同篇发声，目的显而易见是肯定扬子宗五经大宝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推崇他文学还有文字、文章、方言、异语等专门学术上的造诣和功力。孔子谦虚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扬子则怀有“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之志，见《汉书·扬雄传》。他这种述而有作、扬名立万的立言心愿，与《序志》所透露出的刘勰本人意愿“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心思产生同振共鸣，刘勰虽然不像扬雄“耆老久次”，但做官最高只做到舍人，立功非其所愿，立言立德才是他们共同的诉求，如此便不难理解刘勰为何把扬子列入《宗经》篇与孔子、子夏相提并论，说到底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是把立言立德作为毕生追求矢志不渝的人。包括扬子之后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性嗜酒，家贫”“箪瓢屡空，晏如也”与《汉书·扬雄传》“家素贫，耆酒”“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同出一辙，可见两人渊源不浅，可惜的是，陶潜未入刘勰视野，未被载入《文心》，遑论《宗经》，成为学界一件至今未解之悬疑。也包括韩愈，其《进学解》与扬子《解嘲》《解难》异曲同工，连语气笔调都是一样的，正因“或嘲雄以玄尚白”，才有《解嘲》问世；也因“有笑于列者”之连问，才有韩子《进学解》充满风趣的解答。至此，《宗经》者何？宗者，尊也；经者，敬也。所尊者五经，所敬者三人，扬子有与焉。

4. 千古知音聚首

“博明万事”的扬子云，学有所自，必也。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比他早出生一百二十年的同郡乡人司马相如，“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成式”，其实，司马相如对刘勰的影响同样巨

大,《文心雕龙》所引司马相如次数远多于扬子。扬雄和刘勰二人对相如之赋过分华丽有批评是不假,但那是爱之深责之切。可要说哪一位前人对扬子影响最深切,则非屈原莫属。他“怪屈原文过相如”,很好奇屈原的文才怎么比相如还强,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对屈原投江而死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他也拟《离骚》,写出《畔牢愁》《广骚》《反离骚》,可惜前两篇失佚,仅《反离骚》独载于《汉书·扬雄传》得以传世。也就是说,扬子所模拟圣经前贤而成的三部传世文献《太玄》《法言》《反离骚》中唯《反离骚》为文学著作。《离骚》对刘勰的影响同样至深至切,他把《辨骚》列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已很能说明问题,他甚至打破常规,把体现《诗经》精神的《明诗》排在《辨骚》之后,《诗经》可是五经之一的传统经典,刘勰这么做是需要理论勇气的。《离骚》同样也是司马相如喜欢的,这从刘勰《辨骚》“马、扬沿波而得奇”可见一斑,长卿和子云沿着屈原开辟的航道溯游从之,觅得佳人,探得珍奇,正是《离骚》这件大宝让司马相如、扬雄、刘勰三子奇妙相遇,萃卦辞“乃萃,若号”之谓也。

当然,《离骚》本就是一篇奇文共欣赏的屈原个人杰作,篇幅之长,前所未有。自“奇文郁起”,屈原时代的人读之如此,扬子和刘勰时代的人读之如此,之后、现在、以后的人读之亦如此,其文学性无与伦比。《诗经》自然历史悠久,但这部诗集毕竟从民间来,集体创作而成,加之官方配乐,夫子删削,经则经也,文学性自当不如《离骚》,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明诗》排在《辨骚》之后,并没有贬低《诗经》的历史地位,尤其《明诗》“赞曰”所谓“风流《二南》”的讽喻精神,朗风劲骨,是刘勰特别欣赏的一种文学精神,这在《文心雕龙》的一些有韵之文的关键篇章均有体现。刘勰最欣赏扬子的也是这点,他在《辨骚》比较过淮南王刘安、东汉王逸、西汉宣帝和扬雄四大家对《离骚》的评价,特别指出“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正是扬子的这一句为刘勰总结诸说得出“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结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扬雄讽味”中的扬雄,也是他名字在《文心雕龙》中继《宗经》之后的第二次现身。“讽味”者,风味也,讽与风同,有强烈的现实关注和社会关怀,《诗经》十五国风体现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味即味道,是艺术的品味,文学的追求,是文之为文的重要标志,没有滋味的文,味同嚼蜡。“扬雄讽味”恰恰包含着这种现实与艺术双重考量的美学意蕴,基于此他才能得出《离骚》“体同《诗·雅》”的独照见解,被刘勰直接引用。可惜扬子解说《离骚》的这篇专著失传,但他的只言片语已引起刘勰足够重视,用在《辨骚》,难能可贵也。

“扬雄讽味”,不仅得刘勰赏识,与扬子同朝为官的桓谭,字君山,对此也深有同感,《通变》引曰:“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刘”则刘向。所引“美而无采”的“新进丽文”指盛行当时的玄虚谲纬文风,是与“讽味”风格相对立的存在,桓谭反感前者,更喜欢刘、扬直指现实又不失其美的“讽味”言辞,“常辄有得”,不吝赞美,刘勰随后以“此其验也”表达对桓谭欣赏,更是对刘、扬褒扬,同理心溢于言表。建安风骨诗人曹植,也是扬雄的拥趸,对“讽味”之说感同身受。《练字》引曰:“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陈思即曹植,字子建。所谓“趣幽旨深”,只有细细品尝,方可得其真味,揣其风骨。“师传”者,师乎“扬、马之作”也,“博学”者,“博明万事为子”之前贤也,扬子不其是者?刘勰对陈思肯定扬子的话,深表认同,在该篇紧接子建道,“岂直才悬,抑亦字隐。”,指出扬、马所用辞理,格调幽隐,才高悬绝,唯有“临文”以“讽诵”,才可从“义训古今,兴废殊用”中味之入髓。以君山之望,子建之才,他们尚且称道扬雄,刘勰服膺其说,与他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

按《汉书·扬雄传》,扬子《反离骚》,本是为祭奠屈原而作,他的本意并不想把它留在世上,所以他每写完其中篇章,就“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畔牢愁》《广骚》之所以失传,是否也被扬子投江凭吊屈原,可备一说。扬子如此做,是其性格决定的,“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这是刘勰在《体性》对扬子性格的概括。沉默冷静,深不可测,意味幽长,把自己用心血写成的美文沉江馈鱼,与《渔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一样悲壮,可见其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是真正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弦,情不自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哀吊》评价扬子凭吊屈原的那句话,“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隄。”其中也涉及对《反离骚》的评价。“思积功寡”,见仁见智,思屈原之痛彻,日积月累,“思积”是也;扬子本如《汉书·扬雄传》载,是个“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之人,立功非扬子所愿,“功寡”与多,又于扬子何有;子云“志隐而味深”,秉性促就,形势使然,藏而不露,隐而待发,“意深《反骚》”所言极是。至于“辞韵沉隄”,只有细细品读原作,才能领悟《反离骚》真味,感悟扬

子良苦用心，“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纷累以其渙浚兮，暗累以缤纷。”，此其一，“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此其二，“吾累忽焉而不早睹？”，此其三，还可举例若干，气韵回环，联字叠音，累累无尽，纷纷扰心，纯洁被污，怨天不轨，悔之晚矣，味之沉沉，不其“辞韵沉腿”乎！

秦之后，模仿《离骚》者层出不穷，最成功者，汉初贾谊是一位，其作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据说也为《离骚》作赋以传，刘勰是否亲阅，未知，但在《辨骚》有特别提及，再就是西汉末扬子的这篇《反离骚》，与贾子《离骚赋》双璧呈辉，光耀古今。扬子作《反离骚》虽说并非刻意让它流传于世，但也未必没有轩翥奋飞于屈、贾、淮南之间的雄心壮志。多少年后，他立下鸿愿，发誓“辍不复为”童子赋，不就是为了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壮夫，“求成名于后世”吗？刘勰最是懂扬子之人，他虽然征圣、宗经，但仍不拘一格，从《离骚》的文学性出发，置《辨骚》于《明诗》等诸篇之前，收之为“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这是独具慧眼的有意而为之，刘勰与扬雄心照不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同样一件事，那就是，扬子以作家、文学家身份亦步亦趋于屈子，刘勰以文论家、文章学家的资格为屈子发声；《反离骚》悲屈子不被容，不遇命，在为屈子鸣不平，《辨骚》则在为屈子正名，更在为《离骚》这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定位。扬子生前，“人希至其门”，鲜有知己，他的《太玄》一度被戏称“用覆酱瓿”，刘勰是扬子沉寂多年时后遇到的知音。他受扬子《反离骚》鼓舞，从“扬雄讽味”得到启示，他是在接着扬子继续讲，他何尝不是在蹶迹屈、宋，踵逐贾、扬，尝试以理论的形态把《离骚》作为“金相玉式”规范固定下来，使之“百世无匹”，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文章写作者永以遵从的恒久至道，不朽楷模。

“知音其难哉！”，这是《知音》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扬子可谓知屈子之人，刘勰可谓知扬子之人，刘勰和扬子可谓屈子旷世知音。《知音》篇引用扬雄的地方有三处，一是“酱瓿之议，岂多叹哉！”，为扬子《太玄》不被今人识见而叹惜；再是“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曾出现在桓谭《新论·道赋》：“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桓君山间接证明该话出自扬子和与扬子对话的那位叫王君大的习剑之人，刘勰引用此话是为了说明博观的重要；三是“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这句引言最重要，事关屈子、扬子、刘勰，三巨子在《文心雕龙》首次聚首。他们像围炉夜话，像席地而坐，像《兰亭序》“悟言一室之内”，吐露心声，袒露怀抱，把盏言欢，畅谈文道。伯牙、子期再续缘。屈原说，众不知我的异采，彦和说，何须待众人，有知音在，足矣；扬子说，我好沉博绝美文采，彦和说，浮浅之人非所待，自有知音在。正可谓，子期、伯牙缘未尽，再续千年不了情。

5. “扬子曰”有讲究

刘勰对扬子的观照和体贴，有时入微到一个字上。《文心雕龙》有《练字》篇，专论字，字，作为“言语之貌”“文章之宅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曰”在《文心》就是这样一个有讲究的字。“子曰”最能见出弟子们对孔子的尊敬之意。“赞曰”自不必说，《文心雕龙》总共五十篇，“赞曰”就出现五十次。除此而外，“曰”在书中便罕见，用的最多的是“云”“称”“言”“谓”等，因为称呼最景仰的人用“曰”比用其他字显得更加庄重。以图书“曰”者，可以统计出来的仅有六次，以人“曰”者则仅有两次。图书如《原道》“《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诏策》“‘《周礼》曰：师氏诏王’”，《史传》“‘《曲礼》曰：史载笔’”，《议对》“‘《周书》曰：议事以制’”，《封禅》“‘《丹书》曰：义胜欲则从’”和“‘《绿图》曰：桀桀雉雉’”。这些书籍要么是传世经典，像《易》《周礼》《曲礼》《周书》，要么至今尚未出土，像《丹书》《绿图》，说明刘勰特别重视它们。以人“曰”者的两次，一位是出现在《铭箴》的臧武仲，他是《论语·宪问》里提到的孔子心目中四位“成人”之首位，他曾因带兵入侵邾国吃败仗被当时的鲁人编顺口溜辱骂，“臧之狐裘，败我于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左传·襄四年》有纪，刘勰《诸隐》亦有提及，“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但孔子以为吃败仗的原因在国君不在臧武仲。《铭箴》如是说：“臧武仲之论铭，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所“曰”事关“正名”，及“非礼”能否入铭，《左传·襄公十九年》最早记载此事，刘勰从《左传》直接引用，说明兹事体大。但严格意义来讲，此处之“曰”并非刘勰特意加上，而是《左传》里本来就记载有这

个“曰”字。另一位就是扬雄，他是刘勰在洋洋四万字《文心雕龙》特意以人名曰的唯一的一位。《书记》首章第三句即是：“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所“曰”八个字，两颗心：心声，心画。这是两颗文学的心、艺术的心，是为文之用心的那颗心，是《文心雕龙》书名含着的那颗心，是刘勰文心惟美思想中最本质的那个核心。为什么是“扬雄曰”呢？因为刘勰宗他，敬他，服膺他，就像让扬子出现在《宗经》与孔子、子夏同列一样。但为何是臧武仲和扬子用“曰”字表示呢？他俩称得上“成人”，都值得尊敬，这是一个原因，再者二子生前都被国人深深误解，遭不白之冤，刘勰为他们鸣不平，恐怕也是一个原因。扬子因王莽治刘歆子文字案惧怕受牵连，“从阁上自投下，几死”，后免难，但京师人非但不理解同情，还编顺口溜讥讽他“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两人命运何其相似乃尔！一方名帅，一代大儒，刘勰是在用一个学者的良知文人的心不仅为他们鸣不平，更为他们代言表功。

6. 扬子的两篇文

《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呈现给我们的精彩惊奇远不止这些。他是西汉的王臣，但他毕竟在王莽新朝时期生活将近十年时间，受当时社会风潮濡染在所难免，所以研究扬子需要实事求是。刘勰肯定也注意到扬子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评论他这段期间的创作时显得颇为谨慎。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篇：一是《元后诔》；再是《剧秦美新》。两篇作品均与王莽存在关联。王莽篡政，历史评价不高，正因此，与王莽相关的人和事也被严重低估，遭到不公正对待，扬子便是深受其害者，他的《元后诔》《剧秦美新》也难逃厄运。

按《汉书·元后传》说法，“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短短四句，文字精炼到无与复加的地步，可惜，如此精彩绝伦的美文，连班固这位以信笔著称的大文豪尚且只敢附录四句，不敢全文登载，不就是因为“莽诏”的缘故吗？此风一长，波及刘勰。《诔碑》曰：“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而‘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刘勰给出“烦秽”这样不堪的评语，不也是被“莽诏”乌贼吗？不过刘勰笔锋一转，马上以一“撮”字缓颊，认为扬子以“沙麓”成篇，是该诔最大亮点，总算回归文本，走进扬子，客观公允，可谓妙评！“沙麓”乃一典故，好事者以春秋时有“沙麓崩”“圣女兴”传说，神化元后是“圣女”出身，非比凡人。《汉书》未附录全文虽有缺憾，但班固能从《元后诔》“撮”出“沙麓之灵”四个字作为“其要”，也算扬子一知音。其实，抛开政治原因或人为因素或外部干扰，《元后诔》堪称扬雄绝笔。为什么这么说？汉元后公元13年崩，扬雄公元18年卒，这篇诔文应是扬子去世前不久所作。但从文笔看，他气壮清朗，笔健骨挺，毫看不出垂垂老矣态，惟见其心态复杂，既顾新室，又念汉朝，时空错乱，无所适从，前跋后蹇，倍感煎熬。即便如此，仍不失为鹰扬豪强的雄文大作，读之让人不得不服其力劲才盛。现择六句，可与《元后传》四句对勘比照：“沙麓之灵，太阴之精。天生圣姿，豫有祥祲。作合于汉，配元生成。”。用语近乎神！何来“烦秽”？

最是《剧秦美新》也因为与王莽存在交集，蒙受“白圭之玷”不白之冤有年，屈煞子云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美学著作多矣，但鲜有以“美”命名或篇名的，《剧秦美新》虽不归于美学类著作，但是一篇有历史影响力的古籍。其篇名以“美”标举，这在中国传世文献图书名目中有开先河的意义。但它就是一篇美文，一篇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类作品，有扬子的一些关于天地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感悟在里头，像成周、仲尼、《春秋》、兆民，道德仁义礼智等传统价值观念，不断闪现其间。最有味道的是他对秦这段历史做了创见性梳理，有些观点甚至贾生《过秦论》所不能及，如“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是一幅当时知识界真实写照的画面。他在小序直言不讳《剧秦美新》受到司马相如《封禅》影响，“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以彰汉氏之休”。《封禅》是长卿生前的一部封笔神作，子云作《剧秦美新》何尝不是想接过相如大纛，以期新王朝有新气象，新时代有新希望。他这么做何错之有？何罪之有？扬子在小序还说：“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从中至少可以解读出三点内容。首先这是他的心血之作，“肝胆”“腹心”可见；其次篇名是他自己确立的，不是后世定的，亦非借他人之手，捉笔操刀；最后这是他的“极思”之作，即经过深思熟虑已达极致的作品，说明他自己很认可这篇作品。关于“极思”一说，刘勰最为看重有感悟，他在《封禅》简称《剧秦美新》为《剧秦》，直接引用“极思”予以点评，“观《剧秦》为文，影写

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认为扬子此作虽闪烁其辞，又神又鬼，有不实、不宜、不合经义的地方，但骨气尚存，制作典雅，辞无不达，已臻造化，故已“极思”到不遗余力的地步。班固最早把扬子的《剧秦美新》拿来与司马相如的《封禅》对比，认为前者“靡而不典”，后者“典而不实”。刘勰直接引用班固观点在《文心雕龙·封禅》，一分为二评价扬子此文得失，足见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才是子云“千载其一”的知音、知己。

7. 结语

研究扬雄，须读其《太玄》《法言》，背诵《反离骚》，然后方能识其为人，走进他的精神世界，知刘勰何以对他称而道之。扬雄姓名及灼见散见在《文心雕龙》各个篇章凡四十三处之多，从中可以解读出扬雄与刘勰间非比寻常的学究渊源和知音关系，尽管两人相隔五百年。《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带给我们太多的新思考，他在《宗经》的出现，体现刘勰对他的推崇，“扬雄曰：”在《文心雕龙》唯一以人名曰方式出现，彰显扬子作为一代大文豪所说的话在刘勰心中的份量。《文心雕龙》之“雕龙”是从“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衍化出来，无关“雕龙奭”。从“扬雄讽味”到《反离骚》再到刘勰《辨骚》可见证文学如何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变奏。《知音》涉及扬雄的引言有三处，屈子、扬子和刘勰，可谓千古知音三巨子。《剧秦美新》以“美”命篇名，《元后诔》以“沙麓”增辉，如何重新认识扬雄这两篇有争议作品的价值，刘勰的点评或给今人带来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17：859.
- [2] 班固. 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17：873.
- [3] 钟基，李先银，王身钢译注. 古文观止下·送孟冬野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01.
- [4] 扬雄撰，韩敬注. 法言·寡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172.
- [5]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四书五经·尚书·大禹谟第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9：220.

（主编：侯本塔 编辑：金恒宇 校对：金黛彤）

论释家文学的写作传统及其意义

周梦^{1*}

(¹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88)

摘要: 自佛教东渐, 释家文学渐兴, 形成了诸多富于特色的写作传统, 例如渔父词、山居诗、十二时歌、威仪辞等, 尤其呈现出了释家赓续前人前作的传统意识。写作传统的形成, 既源于释子相似的生存空间、宗教信仰和行为规范, 亦是文学接受中的“期待视野”以及“避难趋易”创作心理的反映。释家文学写作传统不仅为世人提供了关于某一创作类型的成熟写作范式, 还成为了佛教用以唱道宣教的有效载体。从本质上看, 这些赓续传统的释家创作, 其写作宗旨并非呈现文学性, 而是意在凸显宗教性, 宗教意义才是其根本价值所在。

关键词: 释家文学; 写作传统; 程式化; 唱道功能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50>

A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Trad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Buddhist Literature

Zhou Meng^{1*}

(¹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China)

Abstract: Since Buddhism spread eastward, Buddhist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flourished, giving rise to many distinctive writing traditions, such as fisherman's lyrics, mountain-dwelling poems, the twelve-hour songs, and ritualistic poetry, particularly demonstrating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in inheriting the work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e formation of the writing tradition not only stems from the similar living space, religious beliefs and behavioral precepts of the Buddhist monks, but also reflects the "expectation vision" in the literary reception and the creative psychology of "avoid the hard, choose the easy". The writing tradition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us formed not only provided the world with a mature writing model for a certain type of creation, but also became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Buddhism to preach. Essentially, for these Buddhist works that inherit the tradition, their writing purpose is not to present literary quality, but to highlight religious nature, and their fundamental value ar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Keywords: Buddhist Literature; Writing Tradition; Stylization; Preaching Function

引言

自 20 世纪以来, 随着佛教研究蔚然成势, 释家文学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 学界对于释家文学的研究, 多聚焦于释家文献的整理与作家作品的考辨分析, 鲜有从“文学传统”理论的角度审察者⁽¹⁾。实际上刘勰《文心雕龙》、希尔斯《论传统》、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等中外著作均有对传统的具体阐释。从传统理论角度视之, 释家文学中不乏写作传统, 诸如开悟偈、净土诗、渔父词、梅花百咏等。近年来相关研究已初具成效, 且随文献渐开, 风气呈愈盛之势。例如, 祁伟耙梳了佛教山居诗写作传统, 进而将禅宗“拟寒山”诗、禅宗十二时、禅宗祖师赞等引入写作传统研究范畴⁽²⁾。此外, 伍晓蔓、周裕锴《唱道与乐情——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率先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释家词写作传统研究》(项目编号:ZGW24204)

作者简介: 周梦 (1990-), 女, 江西南昌,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佛教文学

通讯作者: 周梦, 通讯邮箱: 995687609@qq.com

措意于释家词写作传统,梳理了宋代禅宗渔父词的创作面貌^[3]。另外,商宇琦《规制与拟制:论隐元拟寒山诗及其独特性》^[1]、谭洁《禅宗下火文的历史流变及其文化意蕴》^[2]、李瑄《清初山居诗的空间开拓》^[3]、周梦《中峰明本乐隐词的写作范式及影响》^[4]等,虽未标举“写作传统”,却也呈现了写作传统研究的诸多特质。虽如此,释家文学中仍有诸多独具特色的书写传统久湮陈笈、不获寓目,例如宗纲偈、佛祖赞等。可以说,从“写作传统”角度检视释家文学,还存在长足的发展空间,更遑论运用中西方传统理论,把握传统的“同一性”与“变异性”,呈现写作传统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基于此,本文近绍祁伟、周裕锴的研究路径,并开拓性运用“文学传统理论”,分析释家文学中的写作传统,进而探讨释家文学偏好赓续传统的原因,剖析其恪守传统的文学价值与宗教意义。

1. 释家文学赓续传统的表现

何谓传统?希尔斯认为,“传统”是指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5-2]。一种文学样式能称之为“写作传统”,至少需具备三个核心要素,一是其写作需有一定的规模,而非限于一时一地的一人一咏;二是沿袭时间的持续性,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至少持续三代人;三是相关写作具有相对独立而固定的写作形态,即思想内蕴、外在形式、艺术手法等的趋同性创作,这是传统形成的关键要素。若以此标准衡量,释家文学中的很多创作类型,诸如潇湘八景诗、渔父词、下火文、祖师赞、威仪辞等,不仅广泛存在于诗、词、文、赞、偈等各类体裁中,创作规模甚大,历时悠久,还清晰呈现出鲜明的“同一性”特征,极其契合文学传统应有的属性。

在这类追慕传统的释家文学中,常常表现为对某一文类有开创之功的古德之作的仿拟。这在释家渔父词、十二时歌、牧牛颂、祖师赞等的写作中均是如此。比如,渔父词在后世赓续的是船子德诚和保宁仁勇的写作范型,即以《渔歌子》著题咏事和以《渔家傲》咏古德遗事两大写作系统^[6]。十二时歌中,仿拟的是宝誌和尚与赵州从谏的写作规范,一者是偏向直接表现佛理,一者是在日常烦恼中寄寓“平常心是道”的禅机。牧牛颂中,则以宋代普明禅师、廓庵师远之作最为典型,尤其前者,因其图“象显而意深”,其诗“言近而旨远”,逗机广大,传唱深远,丛林赓续广泛。而且,这种对前人前作的赓续,常常表现为从内容呈现到形式选择,全方位的重复与沿袭,具有显著的范式写作倾向。

内容方面,表现为同一文类的写作有特定的主题内容。总体上看,释家文学写作传统“在不同的艺术外壳之下包裹着‘虽大同、却小异’的宗教精神”^[7],即主题大抵表现为赞佛、唱道、写心,而具体到各写作类型内部,则又有其自身特有的内容表达。例如,“渔父词”写渔隐生活,侧重表现逍遥自由、赞颂古德遗事;“十二时”则以十二时辰中的日用烦恼,寄托时间流动下恒常的修道之心;“山居诗”着笔于山居日常,表现的是隐于山林的淡泊与闲情;“下火文”则依托佛事仪式,度化亡灵、抚慰生者,洞察生死一如的禅机。可以说,不同类型的释家文学写作传统,皆有其内容主题的独特性,这亦是其能够形成写作传统的重要原因。

形式方面,基本是沿袭同类型作品的初创者的作品形式。比如乐隐词仿拟的是中峰明本词,一般为十六首《行香子》,以“秋、游、茶、霞、香、凉、蓉、松、锋、龙、非、飞、夸、茶、闲、山”为韵脚;十二时歌的形式不脱宝誌与赵州之作,为十二支曲子组成的定格联章,这十二支曲子多以半夜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禺中巳、日南午、日昃未、晡时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发端,各曲子分别以十二地支为韵脚,辅以“三七”组合句式,韵位密集。这在沿袭传统的其他释家文学类型中,亦是如此。比如威仪辞是对行、住、坐、卧“四威仪”的咏叹,其典型体式即组词四首,分别以“山中行”“山中住”“山中坐”“山中卧”发端,常用三言、五言、七言的单式句。如元代高峰原妙《威仪辞》。其云^[8]:

山中行,步高身尽轻。拟飞去,惟恐世人惊。
山中住,黯淡云无数。誓相去,共守无生路。
山中坐,静看落花堕。问何为,待结团圞果。
山中卧,月落猿啼过。正堪眠,石室从教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赓续传统的释家文学,虽不同类型的作品外在形态有殊,然它们却皆具

形式上的共性,即显著的民间特质,表现为:语言通俗质朴,重视节奏韵律,韵位密集;偏好使用“单式句”句式和源自民间的词调;多为“联章体”形式。比如在搜检到的270首渔父词中,其中,141首句句押韵,109首五句有四句押韵,17首四句有三句押韵,2首六句有五句押韵,1首九句有六句押韵,均属韵位密集之属;句式方面,266首为纯单式句,2首以“单式句”为主,仅2首为“双式句”;整体形式方面,在40家50题270首释家渔父词中,有33题253首属“联章体”^[9]。而这种表述通俗浅易,注重密集押韵,偏好“单式句”和“联章体”的民间审美倾向,在其他恪守传统的释家文学写作传统中亦属常见,例如乐隐词、十二时歌等。

从深层角度看,这些恪守传统写作规范的释家文学之所以会在内容、形式方面表现出程式化特质与民间审美倾向,本质上是受到了唱道宣教写作目的的影响。佛教通过借助民众喜闻乐见的呈现形式,用一种易于理解与接受的程式化写作模式,以实现劝化大众、阐扬教风的初衷。所谓“然有乐于讴吟,则因而见道,亦不失为善巧方便,随机设化之一端耳。”^[10]旨在服务于唱道宣教这一宗教写作目的。

2. 释家文学赓续传统的成因

中国古代释子有着相近的精神信仰、生活境遇、行为律令,“尊重传统”的意识较文人更为浓厚,某种写作传统一旦定型,他们几乎不厌其烦地重复创作,甚至是以“牺牲”自身的个性为代价。廖肇亨在论及释家山居诗就曾发问:“这些现象似乎都与现今强调个性的美学标准背道而驰,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许多同类型的作品?如果这样的作品形式缺乏个人音声的独特性,为何还有这么多人不断创作?是否可能体现其他的社会意涵或文化价值?才能不断获得当时僧人(以及许多诗人)的青睐,纷纷投入创作的行列。”^[11]事实上,不止是山居诗,在整个释家文学中,写作传统都具有强大影响力。释家文学何以会有如此浓厚的传统意识,这是值得思考的,其中包含诸多复杂因素。

首先,这与释子封闭的生活环境有关。释家主张“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12],释子或藏身寺庙,虔心修行;或幽栖林泉,结庐山居,读经度日,参禅终年,少有交游,更无俗务,月月如斯,年年依旧。封闭的生活环境与日常生活的相似性,让释子对传统的重复写作有了最直接的现实依据,不断响应传统的重复性写作,实际上也是对日常生活重复的一种消解。十二时歌中,释子已体察到了生命的重复。智严《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曰:“夜复晓,晓复夜,昼夕递迁何日罢。”^[13]惠洪《禅和子十二时偈》云:“吾活计,无可观。但日日,长一般。”^[14]明州明觉《十二时》又名《往复无间》,“往复无间”即往而复来,循环不息的重复之意。这说明,释子们已然洞察生活的“重复”真相:一日之十二时,即日日之十二时的写照,亦是释子们一辈子的生活写照。坚守传统的重复写作与释子们封闭而重复的生活密切相关。

同时,封闭的生活环境亦不利于释子冲破写作传统。因为“一旦一种意见变成了既定的,它就难以破除了,人类依恋于他们的各种传统,宁愿遭受极大的痛苦,也不愿在外部压力下抛弃它们。”^[5-2]传统的变迁与解体是写作者理性、想象力等内部因素,与外来传统的压力、环境变迁、信息传播等外部因素的综合结果,而释子封闭的生活环境极难形成对写作传统的抵制和变迁力量。这是释家文学写作传统强大的直接原因。

其次,这是释家内部推崇“古德”的产物。释家有浓厚的崇古敬德意识,白云守端曾言:“事不稽古,谓之不法。予多识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盖今人不足法”,又云:“变古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终不为也。”^[15]倡导追慕古人、恪守经典。这种尊崇“前言往行”的稽古、忆古情结几乎贯穿于释家文学。

梳理释家文学写作传统的发展脉络,几乎每一个写作传统的开创者皆是备受崇敬的先贤古德,如对渔父词有开创之功的德诚,乐隐词书写第一人中峰明本,拟寒山诗的渊源者寒山,山居诗的初创者贯休,十二时的最早写作者宝誌。职是之故,经由这些声名显赫的高僧之手,其作品也有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后人对其作品的唱和、步韵,融合了对其人的崇敬和感激,沿袭传统是写作者向大德靠拢的自觉行为。于是,在写作传统书写中,后人还要不厌其烦地提及,其是对大德的唱和,如撈智智静《和中峰国师乐隐辞》、憨璞性聪《和中峰乐隐词》等;莲峰清素《和古德歌十五首韵》更是直接标举其是向“古德”创作的靠拢。这在十二时、山居诗等的写作中亦比比皆是。

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的激发下,释子赓续前辈缔造的写作传统,还有一深层原因,那就是

潜意识里的“求同”心理。在开创者圣洁光辉的辐射下，赓续传统的群体创作形成了一种有关共同宗教信仰的“集体记忆”，释子通过遵循写作传统这一仪式化活动，使写作者个体得以快速加入到群体中，有了与群体其他成员产生情感认同的可能。而这个群体不仅仅是文学群体，更是由高僧大德们以文学创作联结的宗教群体。从本质上看，释子在创作上的这种“求同”心理，亦是出于释家对传统、对古德的尊崇，以及对佛教至真至深的虔诚与信仰。

当然，释家文学对写作传统的沿袭，还具有一般文学传统延传的普适性原因。例如，从接受美学与创作心理的角度审察，创作时的期待视野与人们对惯用程式的自然选择，极大影响了创作者对写作传统的遵循。在文学创作中，人们易受过往经验影响，形成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产生惯性、程式的刻板印象。而人们心理思维中这种定向的“先见”“前结构”，决定了创作者难以摆脱写作传统的束缚。此外，从“避难趋易”的心理来看，继承传统的程式化写作有例可循，操作简单，对创作者有强大吸引力。而受日常宗教仪式的模式化、重复性濡染的释子，更容易不自觉模拟经典、赓续传统。这亦是释家文学写作传统生命力强大的重要原因。

3. 释家文学赓续传统的意义

与传统文人创作相比，释家文学因创作者的释子身份，而兼具文学与宗教双重属性，故对其的评价不能剥离写作者的宗教身份，而仅从文学角度评鉴。相反，在这些尊崇权威、恪守传统的释家文学中，宗教唱道目的反而远远超过了其文学写作目的。

从文学视角考量，释家文学写作传统的重要价值即为世人提供了关于某一创作类型的成熟写作范型。比如潇湘八景书写，从北宋时期惠洪确立基本范式，到后世文人持续丰富其内涵，再到深刻影响周边国家的诗歌创作，其虽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各异的风貌，但核心特质依然不变，表现为内容上歌咏“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八景，并呈现出了禅意化倾向；形式上是组诗八首，以八景分别为八首诗歌的题名。这种关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写作范式，在其他写作传统中亦是如此。包含在各写作传统中的惯例和规范，长期影响着后代的创作。

当然，赓续经典、沿袭传统必然会带来缺乏个人音声的同类型作品的大量产生。因为“同一性”是传统最为核心的特质，稳固的写作形态是传统形成的关键原因。而“同一性”指向的恰恰是相似的、重复性的程式化写作模式。如果考虑到了这点，则不难理解这类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重复性创作。而这也是赓续传统的作品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某种“传统”缔造成形后，并不意味着永远一成不变，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吐故纳新，历史的风会以及天才的涌现会不断丰富传统的内核，赋予其新的生命。因此，“传统”也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否则便会从僵化中走向僵死。释家文学写作传统的发展进程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比如，释家渔父词的题材内容即发生了从“著题咏事”到“依调填词”的新变，词调运用亦经历了从《渔歌子》到《渔家傲》的重大变异。

虽然这些赓续传统的释家文学呈现出的变异是“同一性”制约下的新创，并未对传统内核起到颠覆性变革，但其仍意义重大。正因有这些新变，后世文学对前人写作的赓续才变得更有意义，因为这说明它并非是一种完全照搬的模仿，只是以一个广受认可的写作模式，来表达自我的主体精神，指向的是更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这正如洛特曼所言：“完全的、无条件的重复在诗歌中是不可能的。通常，文本中单词的重复并不意味着概念的呆板重复。尽管这种重复是一致的，但它总是显示更为复杂的语义内容。”^[16]

受创作者的释子身份影响，写作者是兼有文学创作者和宗教唱道者双重身份，甚至在很多时候，其释家身份是凌驾于文学创作者之上。因此，对于这些释家文学写作传统，考量其宗教意义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且往往其宗教意义越强烈，则传统写作形态更稳固，书写范围亦更广泛。

纵观释家文学各写作传统，其无一例外均具有神圣的唱道色彩，这些业已形成写作传统的文学类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本意义，而具有了“以之作佛事”的宗教意义。比如山居诗的书写，破山海明认为作山居诗是“即尘劳而善作佛事”^[17]；钱谦益认为写山居诗是“以诗句作佛事”^[18]；雪峰如幻亦云：“若律以诗人体格，则风雅委地矣。”^[19]在释家视域中，作山居诗并非单纯的文学行为，实为作佛事教化众生，乃“为义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20]。释家文学另一写作传统“拟寒山诗”亦是如此，其“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而机趣横溢，多足以资劝戒。”^[21]认为寒山诗不能以普通诗

歌视之,而具有劝化众生的宗教意义。即使是与佛教戒律抵牾颇深的“小词”,只要具备唱道性质,亦不失为“以诗馀作佛事”,比如牧牛词,所谓“况佛说多会译而为经,如《华严》十三大世界微尘偈数,流入中国者尚十余万偈,偈亦声音佛事。设以诗馀作佛事,如呆翁牧牛图词,何词之不可为也?”^[22]既然释家文学写作传统具有“作佛事”的宗教意义,那么沿袭传统亦不失为投身佛事的表现。

进一步看,释家文学写作传统的形成与沿袭,实际上也是与唱道功能的建构相辅相成。一方面,宗教唱道色彩加强了相关创作在丛林中的影响,随着赓续前人前作的规模渐广,经世代累积,同类作品愈多,最初的个体创作遂汇聚为群体创作,逐渐凝定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写作传统由此形成。另一方面,当相关创作俨然具有了丛林“传统”的写作意义,那么后世的相关创作,则必定受到写作传统内核的规制,即凸显宗教的写作旨向,结果就是宗教唱道功能进一步被强化。因此,从宗教角度看,这些赓续传统的作品宗教性远远超越了其文学性,成为了佛教用以唱道宣教的最佳载体。

虽然这类富于写作传统意义的释家文学,常被指责因程式化创作而导致个性与创新的缺失,然而事实上,这些赓续传统的释家创作,其写作宗旨并非呈现文学性,而是意在凸显宗教性,宗教意义才是其根本价值所在。因此,单纯从文学审美与创作个性的角度,来批判这种陈陈相因、缺乏创新的程式化的写作,实际上并不合乎情理。相反,如果这些作品具备颠覆传统的个人音声的独特性,其反而违背了写作者的宗教创作初衷,从宗教书写的标准看,反而算不上释家视域下的优秀作品。

注释:

(1) 近年来,释家文学的“题材”与“文体”研究一直是重要的关注话题,成果颇丰。因“题材”“文体”“写作传统”三者的研究内容多有重合,因此“题材”与“文体”研究颇易被混淆为“写作传统”研究。从内涵的角度看,写作传统呈现了传统渊源、形成、发展与变化这一完整的时间链,并对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进行了写作规范。因此,“写作传统”与“题材”“文体”有诸多重合,但又有微妙的差异。首先,“写作传统”在“文体”的基础上,是有题材上的鲜明指向性,比如山居诗、拟寒山诗、潇湘八景诗、渔父词、十二时歌、临终偈等,因此常见的某一类文体中,是可能包含多种写作传统的,职是之故,“写作传统”与“文体”有别,但又因受“文体”之限制,而具有“文体”的诸多特质。其次,“写作传统”虽具有题材上的鲜明指向性,但又与题材有别,“题材”往往仅指向内容方面,“传统”则关涉外在形式与内蕴等全方位的要素。同一写作传统的词作一定是同题材的作品,反之,同题材的词作却未必可纳入同一写作传统。以释家山居词和乐隐词为例,两者均是山林题材的书写,乐隐词是山居词,但并非所有山居词都可称之为乐隐词。只有那些同时具备乐隐词体式、意象、内容、情感内蕴等各方面同一性特点的词作,方可纳入乐隐词写作传统范畴。基于此,相较于“题材”与“文体”,“写作传统”是一个涵盖内容与形式、文体与主题的更宏观的综合概念。因此,这些指向释家文学题材与文体的研究,不能与写作传统研究等量齐观。但因为“写作传统”“题材”“文体”三者内涵多有重合,释家文学的题材研究与文体研究成果,对写作传统研究亦颇有借鉴价值,不可轻易放过。例如,侧重“题材”研究者,其间的“牧牛诗”研究,有林绣亨《禅宗牧牛主题研究》(《玄奘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蔡荣婷《唐五代禅宗牧牛诗初探》(收录于《“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唐代文学论丛》,中正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侧重“文体”研究者,比如“佛事文体”研究,有张慕华《敦煌写本佛事文体结构与佛教仪式关系之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冯国栋《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以像赞与疏文为例》(《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等。其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传统研究,但对写作传统研究确有丰富的借鉴意义。

(2) 祁伟《佛教山居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论述了佛教的山居传统,梳理了佛教山居诗从唐代到清代的发展,概括了山居诗的主题类型与表现的宗教精神,论列的释氏诗人达三十余名,较好地呈现出佛教山居诗的写作传统。此外,祁伟还有《宋元禅宗十二时歌的书写方式与宗教意图》(《学术交流》,2016年第7期)、《“风骚”与“风颠”:禅宗拟寒山诗写作传统中的传承与变革——兼论“寒山体”的特征》(《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分别爬梳了禅宗十二时歌和拟寒山诗的写作传统。上文与禅宗祖师赞、宋代禅林笔记等写作传统研究,先后收录于《宗风与宝训——宋代禅宗写作传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与《禅宗写作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

(3) 伍晓蔓、周裕锴《唱道与乐情——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梳理了宋代禅宗渔父词的创作进程,全书分为三卷,上卷“宋代禅宗的‘唱道之词’——《渔家傲》系禅宗渔父词”,中卷“借自文人传统的书写——《渔父》系渔父词”,下卷“‘渔父家风’的意义构造——《诉衷情》系渔父词”。该书是在周裕锴《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中国俗文化研究》,2003年第一辑)的基础上发展丰富的,为较早寓目于释家词

写作传统的研究。另外,周裕锴《典范与传统:惠洪与中日禅林的“潇湘八景”书写》(《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还梳理了禅宗“潇湘八景”写作传统,写作传统渐成为释家文学研究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商宇琦.规制与拟制:论隐元拟寒山诗及其独特性[J].闽江学院学报,2019,(03):1-9.
- [2] 谭洁.禅宗下火文的历史流变及其文化意蕴[J].兰州学刊,2015,(07):65-73.
- [3] 李瑄.清初山居诗的空间开拓[J].江西社会科学,2025,(03):142-150.
- [4] 周梦.中峰明本乐隐词的写作范式及影响[J].名作欣赏,2025,(02):45-48.
- [5] 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6] 周裕锴.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J].中国俗文化研究,2003(01):38-55.
- [7] 祁伟.禅宗写作传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1:1.
- [8] [元]参学门人编.高峰原妙禅师语录[M]//卍新纂续藏经:第70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697.
- [9] 周梦.中国古代释子填词之原因及其词学史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23,(06):89-97.
- [10] [宋]晓莹.罗湖野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65.
- [11] 廖肇亨.中边·诗禅·梦戏——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M].中国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8:277.
- [12] [唐]净觉集.楞伽师资记[M]//大正藏:第85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289.
- [13]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1196.
- [14] [宋]惠洪.林间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07.
- [15] [宋]净善编.禅林宝训[M]//大正藏:第48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025.
- [16]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M].王坤,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179.
- [17] [清]印正编.破山禅师语录[M]//嘉兴藏:第26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88.
- [18] 忏庵居士编.高僧山居诗续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8.
- [19] [清]如幻.瘦松集[M]//禅宗全书:第6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525.
- [20] 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选辑[M]//大藏经补编:第16册.中国台北:华宇出版社,1999:709.
- [21] [清]永瑢编.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77.
- [22]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222.

(主编:侯本塔 编辑:黄芊 校对:金黛彤)

集体记忆理论视域下陕北说书中的苦难与救赎

师小康^{1*}

(¹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以集体记忆理论为框架, 探讨陕北说书对苦难记忆的建构与救赎功能。陕北说书通过仪式化展演、身体实践及记忆之场的苦难建构, 将自然与社会的苦难凝练为符号化表达。盲艺人以失明之躯、三弦悲音及艺术表现手段再现饥荒、战乱等创伤, 同时又通过仪式消解以及剧目演唱实现群体心理治愈。陕北说书既是苦难的活态档案, 又是地域文化精神的艺术展演, 其“苦难—救赎”的双向叙事揭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 陕北说书; 集体记忆理论; 苦难; 救赎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90>

Suffering and Redemption in Shaanbei Storytell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Shi Xiaokang^{1*}

(¹ College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demptive function of suffering memories in Northern Shaanxi storytelling. Through ritualized performances, embodied practi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ffering within memory spaces, Northern Shaanxi storytelling distills natural and social hardships into symbolic expressions. Blind storytellers, through their physical limitations, the mournful tones of the three-stringed lut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reenact traumas like famine and war. Simultaneously, they achieve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healing through ritual dissolu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epertoire. Northern Shaanxi storytelling serves both as a living archive of suffering and an artistic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Its dual narrative of “suffering-redemption” reveals the life philosophy of the grassroots populace.

Keywords: Shaanbei storytelling;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Suffering; Redemption

引言

陕北地区历史上因地理环境及社会动荡等因素, 自然环境恶劣, 天灾人祸频发。陕北说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 盲艺人作为“苦难的承受者与传递者”, 以三弦与唱词为工具, 将群体的苦难记忆代代相传; 贺敬之更是将陕北说书视为“陕北的叙事诗”, 认为其不仅是地方文化的瑰宝, 更是“陕北劳苦大众苦难的、爱情的、抗争的史诗”, 因此苦难便是陕北说书不可不谈的核心命题。前人对于陕北说书中曲目内容的苦难意识进行了细致分析, 同时也具体分析了苦难产生的背景, 但忽视了说书者这一关键角色以及庙会仪式中陕北说书对苦难记忆的建构与传播。而生活在这片苦难土地上的民众如何消解苦难, 得到治愈, 这才是研究陕北说书苦难意识的关键, 而本文则从“苦难”与“救赎”两个维度对该研究进行推进。

1. 陕北说书苦难意识成因

作者简介: 师小康 (2001-), 男, 陕西延安, 硕士, 研究方向: 民间说唱文学

通讯作者: 师小康, 通讯邮箱: 2943562029@qq.com

陕北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旱灾、风沙、洪涝等灾害频发。明代276年间共发生大旱104次,平均每2.68年一次,其中1628-1644年崇祯年间连年大旱达到顶峰,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明代记录重大水灾43次,嘉靖(1522-1566)与崇祯年间为高发期,洪水冲毁农田、房屋并引发黄河泛滥^[1]。定边县近百年有6次强沙尘暴记录,如1926年、1983年风力达10级以上的沙暴导致人员伤亡、牲畜死亡及农业绝收。旱灾常伴随蝗灾与鼠疫,如1930年代陕北鼠疫致万人死亡;地震则以受周边波及为主,明代共记录42次。清代至民国的306年中,陕北旱灾发生年达193年,平均每1.55年一次;水灾发生年242年,平均每1.26年一次^[2]。1928-1933年大旱导致粮食减产,引发大规模人口死亡与流迁,妇女儿童被贩卖,性别比例严重失衡^[3-1]。陕北说书《遭年谨》中的:“人吃人,狗吃狗,外甥锅里煮舅舅。前街上立下卖人市,后街上挖开埋人坑。头等女人六百铜,二等女人四百文。十七八的女娃光脊背,口噙草标自卖身”^[4-1]。“外甥锅里煮舅舅”的血腥书写—这并非艺术虚构,而是苦难记忆的凝练:前街“卖人市”里十七八岁的女娃光着脊背口噙草标自卖其身,后街“埋人坑”中饿殍堆积成伦理崩塌的见证。苦难是艺术的母体,结合上述真实历史记载,陕北说书这段书词并不是艺术虚构,而是苦难的艺术沉淀。还有《刮大风》中用夸张的手法描述陕北风沙天气的破坏性:“上天刮在凌霄殿,入地刮进鬼门城。直刮得大山抹了顶,直刮得小山磨得又平平。千年的大树连根起,万年的古石乱翻滚”^[5-1]。用戏谑夸张的手法与当地谚语:“三年两头旱,一年不早遭水患”^[3-2]形成了苦难叙说联动。当现实苦难超越人类承受极限时,说书人便转向《请神》《送神》的仪式叙事,在“事主门上保平稳”的祷词中寻求虚幻庇护,这种超自然依赖恰是绝望心理的艺术显影^[4-2]。

该地区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历史上长期作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前沿,自周代至明代,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等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反复争夺此地。南北朝时期大夏、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占据陕北,两宋后西夏、金政权控制该区域,直至明代才被中原王朝稳定统治。唐末至宋,党项族崛起引发西夏与北宋长期战争,范仲淹、狄青等将领驻守陕北,战争导致人口流散、土地荒芜。北宋诗人陈陶笔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的哀叹,映射了战争对平民的摧残。明末1628-1633年陕北大饥荒引发李自成起义,起义军与明军拉锯战加剧社会崩溃,崇祯年间出现“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的伦理崩塌^[5-2]。灾荒与苛政交织常引发动荡,如1928-1933年大旱期间匪寇横行,灾民因饥荒沦为盗匪,陕西人口锐减^[3-3]。陕北民歌《卖娃娃》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在这次大饥荒中卖儿鬻女的惨状^[6]。1947年胡宗南率军队进攻延安,强征存粮,民众被迫“跑胡宗南”,村庄十室九空。说书人韩起祥家三代长工饱受阶级压迫,自身又经历饥荒、疾病、家族离散^[7]。底层个体的苦难史诗,在说书人韩起祥身上得到最鲜活的注脚。他家三代长工的血泪史,叠加天花致盲、饥荒逃荒、妹妹被三升米贩卖,家族离散,最终淬炼出《翻身记》中“十口人四个碗,粥照人影”的经典书词。地主“猪肉白面家常饭”的奢靡与贫农“五谷断绝吃草根”的绝境形成刺目对比,当“一根绳子绾空中”的自杀冲动化作三弦琴弦上的悲音,说书艺术便完成了从个人苦难到集体记忆的转化^[8-1]。

陕北说书就是在这片苦难土地孕育而出的,已有相关学者根据实地考察与文献整理深入考究了陕北说书最早源于上古巫觋传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后流落民间,形成“盲人说书”传统,后与宋元说唱、明清鼓词、宗教渗透、文人改造等因素多元融合而流传下来。盲人因身体缺陷无法从事农耕,转而以说唱谋生。明代《西湖游览志余》载杭州瞽者“学琵琶唱古今小说以觅衣食”,陕北盲艺人同样通过“弹起三弦定准音,东头收了吃东头”的流动表演维持生计,形成“行乞辅助”的基本形态^[9-1]。民间艺人的口传陕北说书起源是源于“三皇说”:即天、地、人三皇,三皇太子眼瞎被赶,路遇蝎子,抽筋制成琵琶演奏,后太子升天登基。总而言之,是三皇创造了琵琶,“留下了瞎子说书在人间”。另一口传版本是说书艺人韩起祥口述陕北说书源于“三黄”,即黄姓三兄弟受奴隶主压迫被赶,在行乞路途中创造出来。总之,无论是从历史考证陕北说书的艺术起源,还是艺人的口传起源,二者共同指向了一个历史文化背景:陕北说书源于劳苦大众的苦难实践,它是底层人民谋生手段,离不开苦难的土壤。

陕北说书中的苦难既是自然地理的,也是历史人文的;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这种多维度、跨时空的苦难呈现,使陕北说书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成为记录中国底层社会生存史诗的活态档案。而盲艺人自身作为“苦难承载者”与“苦难讲述者”的双重身份,则赋予这种艺术以独特的真实性与震撼力。

2. 陕北说书苦难集体记忆的建构

集体记忆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的,他剖析了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个体记忆的建构和发展,强调“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10-1]。同时也进一步指出,仪式是强化记忆的重要手段,通过还原仪式中的时间、空间、人物使人们身临其境,从而使仪式中的记忆潜移默化地沉淀在人们的身体行为中,将现在与过去相关联,集体记忆便延续了集体认同^[10-2]。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记忆理论,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他的关注重点是集体记忆如何保存和传承,科学的提出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两种方式。在康纳顿的描述中,在重大的历史时刻社会记忆通过纪念仪式来传承,而在日常生活中则通过潜移默化的生活习惯来沉淀^[11-1]。集体记忆理论为解析陕北说书提供了钥匙。作为黄土高原的文化活化石,苦难的建构过程是综合作用的过程,是一个有机整体:陕北说书艺人通过周期性庙会表演构建起仪式化记忆场域:三弦声响中,说书人用方言韵白建构苦难的集体记忆,观众在群体共鸣中完成集体苦难的治愈与救赎。说书人与三弦自身就是苦难的符号,也是乡村仪式活动的重要主体,做为表达人民诉求,沟通神灵的中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说书人,继承着先辈留下的仪式与传统,在庙会或者窑洞中向神灵表达着人们对生活的诉求,用高超的技艺,将苦难视听化,将生活符号化,突显着地域精神文化。

2.1. 记忆的展演:仪式与体化实践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到,“假如存在着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存在于纪念仪式中”^[11-2]。通俗来讲,这种程序化的仪式活动是传承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通过固定人的行为、某种姿势让人产生记忆,这种记忆就是仪式活动传达的信息。陕北说书主要有两种演出形式,根据表演场所的不同,分为家书与会书。在陕北地区说书人受到庙会会长或事主邀请前往表演,这一活动对艺人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说书人的收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说书人每到一个村庄往往表演一两个月。以说书人为核心的这类仪式活动,通过固定化的程序将所有的人、事、物集结在一起,保存和传达着乡村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观念。

会书是陕北说书的主体形态,每年单一庙会的时间是固定的,不同地区庙会的时间不同,不过大多数集中在农历的三至五月。陕北说书是庙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会书也由一系列的固定仪式和演唱故事组成。庙会仪式开始前的一个重要程序—请神,即奉请三界诸神降临会场接受供养。说书人在会长的带领下进入殿内,点香焚表后跪拜,便开始说唱。说唱过程比较神秘,大多数艺人只用三弦伴奏默唱,说书人每称一神,会长则需要不断焚表。请神仪式结束后,说书人口头施礼,走出庙门。之后便开始后续的书场活动,每一场之前都需参神,一般由师傅或水平较高的弟子说唱,开头的说唱程式内容基本一致:丝弦一响震天堂,参天参地参五方。香焚在炉中蜡点在台,满堂的诸神我们参起来……接着便按神灵的高低大小,依次参拜。参神结束时,通常唱:“满把黄香炉中焚,七十二位灵神都参动。不干不净多担承,免弟子无罪论古人。”仪式便暂告结束,接着正式开场,演唱书文。小段、正本演唱完毕后还需要安神,休息后再说下一场。每一场的程序都是固定的,即:参神—演唱正本—安神。持续几天的庙会活动结束后,会长焚表烧香,说书人默唱送神书词,恭送诸神灵返回本位。家书,又称为口愿书,通常为村民为报答神恩,兑现事主之前的承诺,在自家中演唱,仪式程序与会书大致相同:设坛请神—参神、说唱正本、安神—送神。

每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在陕北地区,人们的庙会活动核心是祈求风调雨顺,希望神灵庇佑。在仪式中说书人和民众用身体重演着过去、记忆着过去,记忆着从先辈哪里学到的经验。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传承方式主要靠仪式来完成,而仪式的展演必须靠身体来完成。艺人们的身体是传递记忆的主要媒介,因而仪式性动作是人们对苦难记忆的主要形态,陕北说书的体化实践源于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说书人从小受到的艺术锻炼,到出师后完成的一场场仪式,其动作、唱词、对神灵的跪拜、程序的严谨、替民众祈福都是再现他师傅曾经的实践,用自己专业的仪式操演维护着这一行业的神圣性,他也是苦难的承受者,为民众代言也是为自己代言,诉

作者简介:师小康(2001-),男,陕西延安,硕士,研究方向:民间说唱文学

通讯作者:师小康,通讯邮箱:2943562029@qq.com

说着苦难，用虔诚的唱词祈求神灵的庇护。说书艺人的表演不仅是口头叙事，更通过身体动作和声调变化，将信仰、禁忌和历史记忆“刻写”在参与者的身体经验中，通过代际传承和反复操演，将地方信仰体系内化为社区成员的共同记忆，即使参与者未必完全理解仪式的象征意义，也能通过身体参与感知其神圣性。群众个人还愿活动中的动作、姿势等也是唤起苦难记忆的手段，虽然苦难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一亲身经历的体验感已经固化到了个人的身体之中。“交往记忆所包含的，是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这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其典型范例是代际记忆”^[12-1]。集体广泛参与，共同传承着这一仪式，这种仪式靠一代代人反复的体化实践传承了下来。并且仪式具有显著的规则性，它被操演的同时也要求操演者必须遵循规则，共同维护群体情感以及价值。每个人都赋予了仪式的象征意义，如果有人违反规则，就会被认定对群体的伤害。在固定时间、固定场合、固定的程序、固定的人员参与，即使时隔多年，当事人再次参与其中也会有着他几年前一样的感触，仪式程序是稳固的，刻写在人们身体之中的情感价值是不变的。

从上述列举的仪式化程序和群众的身体实践中可以看出，陕北说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仪式开始的时间、仪式发生的地点、仪式的符号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稳定的仪式体验。仪式展演不仅集结了民众对神灵崇拜的思想感情，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活动。其请神仪式作为一种民俗仪式，为当地民众集体记忆的塑造提供了特定情境和文化空间，无论是请神唱词、安神、送神等都是其所承载的记忆元素，能为村民们带来不可忽视的苦痛历史回忆。集体记忆最重要的保存方式就是不断的重复，仪式中的所有生活范式、价值观念、神灵崇拜会在重复的仪式中得到重现。这不仅是记忆的重复，也是历史的重复。“事主门前保平稳”的唱词包含着先辈们的期许，也带着后辈们的希望。不论是会书的请神仪式还是家书的请神仪式，在整场仪式化程序中，每个观众和表演者都处在同一场景和地点，都是仪式的参与者，并在共同参与中获得共享的安全感，仪式表演会一次次的唤起村民的苦难集体记忆，延续着对过去的认知。同时，严密的请神仪式和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情境氛围赋予观者一种敬畏感和崇敬感，在这种共同情感的支配下，观者对陕北说书的集体记忆会深刻地映入脑海。整个仪式虽然有封建色彩，但也折射出过去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尤其是在当时那个经济和医疗不发达的那个年代，民众饱受苦痛，寄希望于神灵庇佑，祈求风调雨顺，免受饥荒病痛之苦，这些仪式依然会在反复操演中巩固着苦难的集体记忆。

2.2. 记忆的储存：记忆之场

仪式所塑造的记忆空间目的是为了纪念集体所共有的记忆，回忆根植于被唤醒的空间，记忆空间作为可辨识的场所，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发挥着一种相对不变的鉴定和延续作用^[13]。这种空间能够建构集体记忆，并使群体的心理状态得到释放。不管是庙会还是家中窑洞，每位村民传承乡村集体记忆，这种实体空间为村民广大记忆提供了稳定的物质空间支撑。诺拉的“记忆场”概念是哈布瓦赫理论中记忆载体的集大成者，其理论不仅包括了哈布瓦赫所强调的物质性载体，也通过象征性记忆场概念，整合了仪式研究以及记忆符号研究等抽象的研究层面^[14]。物质性记忆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场所，是人们长期与自然、生产共同互动的结果，在物质性场域中，记忆无处不在，通过符号的形式浓缩在物质性记忆场之中，使自身具象化；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特征，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可以通过体化实践稳固的保存下来，从个人的经验提炼为群体生活的共同特征，例如风土人情、乡村故事等。

“纪念仪式塑造的记忆空间最重要的是纪念性，纪念的是某种象征与符号，是能够传递几十代的东西”^[15]。视觉所能看到的庙宇中肃穆的神像、斑驳的壁画、摇曳的烛火与缭绕的香雾，共同营造出“人神共处”的阈限空间。听觉中说书人的三弦琴声、沙哑的唱腔与观众的交织，形成“苦难音景”。信众跪拜时膝盖接触冰冷石板、焚烧黄表纸的灼热感的触觉。陕北庙会以寺庙为中心，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的协同作用，构建了一个“神异化”的苦难展演空间，庙会作为“记忆之场”，通过感官的仪式性操演，将自然苦难转化为神圣叙事中的“天命考验”，赋予苦难以超越性意义。窑洞作为陕北日常生活的核心空间，其独特的穹顶结构（拱形屋顶、封闭式布局）在说书活动中成为“微型记忆场”：穹顶的弧形设计使说书人的声音产生回响效应，唱词在密闭空间中反复震荡，形成“苦难的共鸣腔”。听众的叹息声被放大，个体伤痛升华为群体共情。窑洞通过空间物理性与身体亲密性，将苦难记忆从公共仪式下沉至私人领域，完成“神圣苦难”到“世俗苦难”的叙事转换。而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裸露地表与说书词中的“十年九旱、饿殍遍野”直接呼应。干涸的河床、龟裂的田地成为无需文字注解的“自然记忆场”。说书人跋

涉高原赶庙会时,脚底砂石的粗粝触感、风沙烈日扑面的刺痛感,地理困境被铭刻为文化基因,在特定的环境中艺人更容易唤醒相关的记忆,表演相关的内容曲目,高原狂风的呼啸声与说书人的嘶哑嗓音交织,自然之力与人性坚韧在听觉层面达成“苦难即命运”的史诗共鸣。黄土高原不仅是苦难发生的背景,更是记忆的主体—地理景观内化为“苦难”的文化符号,塑造地域身份认同,这既是物质性记忆场,更是象征性记忆场。

而说书人和三弦更具有浓烈的苦难象征意味。“过去不能被依原样全盘保留,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11-2]。作为符号载体的人的独特象征也被建构为记忆符号,可以将人们的精神力量附着于之上。说书盲艺人是底层人民最具苦难色彩的群体,传统观念认为说书是盲人的“专属饭碗”,明眼人涉足被视为不道德,导致盲人群体长期被限制在底层职业中。这一行业只有“寺观作佛事”时方获尊重,折射边缘生存状态。盲说书人长期以行乞为生,生活极度依赖他人施舍。明眼人也会与盲人争夺说书行业,盲人群体为维护生存权益激烈反抗,甚至导致明眼人遭围殴致残^[9-2]。苦难对于盲艺人来说并不是个例,而是行业特征,“群体的记忆通过个体来实现”^[10-3]。《陕北说书考察》中记录的艺人王学师3岁眼盲,命运多舛,老年也因说书落下“职业病”半身不遂;2014年白志强导演的纪录片《边走边唱》上映,导演用两年的时间记录陕北盲人说书队队长李守旺的生活:在一场几小时的表演中原定价400元,被事主压价扔下二百块钱被主家赶走,类似这种事情已成常态;黄新力的《陕北盲说书人》摄影集用相机记录了盲人说书宣传队的日常生活:盲人宣传队收入随时代变迁骤减,1985年后演出场次、组数和地域逐年缩小,1990年账目出现亏损,2008年每人年收入仅2000-3000元。队长进入主家门前就即兴编唱,讨赏钱时还有仔细辨认真伪。劳动强度极大,盲人需每日徒步数十里山路,每季走访近300个村庄,全年行走上千公里,路途中也时发生意外,2002年冬过无定河冰面开裂,险遭掉河。日行百里讨生计,夜宿破庙避风寒,身体劳损与意外风险并存。队长李守旺4岁因高烧失明,儿子入赘他家,因盲人身份缺席儿子婚礼(不仅仅是身体经济原因,更是怕给儿子丢脸的自我贬低),妻子因跌入山崖致骨髓炎去世。张广春从“青年突击队长”沦为盲艺人,心理落差导致他曾多次自杀未遂,“我算过命,瞎子命硬,阎王不收”,他将苦难转化为生存的黑色幽默,展现底层对宿命的反讽式无奈接纳;张成祥3岁患天花失明,晚年患肠癌无法演出;王白厚:队内最长者,擅演悲情戏,唱到冤情处“以袖代巾泣不成声”。马国荣:半盲者,负责探路牵引,冬季冰面行走时用棍子敲击试冰。高文学夫妇:盲人夫妻档,表演时琴瑟和鸣,日常相互扶持翻越山梁。盲艺人表演时的“狰狞”表情,并非刻意夸张,而是情感迸发的本能—苦难通过身体语言直击观众^[16-1]。盲艺人手指因常年弹奏三弦变形,关节粗大、布满老茧,《翻身记》中“指头磨成光片片”也并不是艺术的虚构。三弦的蝎尾造型,象征艺术在毒害中淬炼出美,这片土地既带给了人民“回归土地”的安全感与踏实感又有着“困于土地”的宿命感与窒息感,“受苦人”这一方言称谓浓缩着超越我们想象的坚韧与勇气。

失明身体的苦难符号、乐器的悲情转译、行走的受难仪式、表演的痛感共享、唱词的记忆层累,这些盲艺人用残缺的身体篆刻着黄土地的苦难记忆,他们是苦难集体记忆的主体。

2.3. 记忆的沉淀:苦难的艺术展演

陕北说书的苦难展演有着系统的表演体系,从书目主题、书词、艺人的演唱技法、艺人的辅助表演手段无一不向人民诉说着过去的痛苦体验。

陕北说书传统书目以战争、公案、流浪等主题为核心,通过程式化的叙事手法与极具冲击力的细节描写,深刻展现社会动荡中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悲剧命运。在战争主题中,作品常以数字串联的程式化表达强化战争的残酷性,如《九九歌》以“二九赵王下河东,三九杨文广被困”等数字序列勾勒战争史诗;而《杨宗保表功》则以“大伯父替宋王赴死、二伯父为八王尽忠”的重复套语铺陈杨家将满门忠烈却“保国忠良没下场”的悲壮结局。与此同时,公案主题则直指阶级压迫下的民生疾苦:《双头马》中窦阁老强抢民女、兵部侍郎张天顺遭权臣倾轧;《金镯玉环记》里范公子强占民女致其毁容、王巧女为保清白投河自尽,这些情节均揭示权势阶层对百姓的压迫,而徐县官畏惧权贵劝人息讼的描写,更折射出司法体系对底层诉求的漠视。饥荒叙事则以触目惊心的感官描写突破伦理底线,形成强烈的集体记忆共振。在对饥荒进行叙事时,艺人更加强调对饥饿的感官冲击和伦理崩塌来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这是痛苦体验的艺术沉淀。如韩起祥书词中的陕北饥荒:“树皮吃尽草绝根,妹妹被卖三升米”;以及“针尖小米数着卖,十家九户断口粮”

的灾荒叙事。还有对饥饿的身体化书写，如“光脚片子走冷地，头上搭拉一条破手巾，饿的我腰疼腿软头发晕”的感官体验刻画个体生存困境。通过“人吃人，狗吃狗”等突破人伦的极端情境，将饥荒上升为对社会秩序的彻底解构，战争与饥荒的双重书写，最终共同指向人民的苦痛体验。

陕北说书是说唱的艺术，用苦调与方言来展现痛苦的体验最为直观。陕北说书中故事内容的基本走向以及喜怒哀乐的表现主要靠音乐来表现，一般评述用平调，描写战争等一些激烈场面用武调，高兴时用欢音调，悲凉场面时用苦音调，最伤心时用苦调。曹伯植先生在《陕北说书概论》中从乐理角度，细致分析了《王巧翻身》中平音苦调的运用：开头便一唱三叹，人到伤心处，气不够用，给人一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挖了野菜当饭用”的最后一字，在演唱时拖长音越来越弱，后接着三个切分音，给人以抽泣感^[17]。艺人的技艺远不止此，如果是说到伤心痛苦时，艺人们低沉委婉地“哎”一声，或一句唱完到最后一个字拖哭腔后，艺人们屏住气，不再出声，就听见在琵琶或三弦上轻挑慢揉出那断断续续的“吟—吟”的琴声。犹如妇人们一口接不上一口的抽泣声，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哭腔用到最悲处，往往与滚白连接。滚白也叫哭白，它无板无眼无固定旋律，根据字数多少，由艺人自由演唱。这些东西可能是艺人们在生活中听到妇女们的哭坟等进行模仿，同时借鉴吸收戏曲中的滚白，完全用陕北的哭腔来叙述。韩起祥在演唱的《翻身记》时对此技法运用的较为纯熟，唱词如泣如诉，听众犹如亲身经历，让人潸然泪下。陕北说书在韵辙使用率最高的是中东辙：ong\iong\eng\ing、人辰辙：in\en\un、汪洋辙：ang\iang\uang 这些韵辙具有明显的地域发音特征，唱词韵辙浑厚园融，艺术表达上更具有力量感；有时也用“逼、踢、黑”等字短促收尾，强化压迫感，入声字密集：“账债垒得像蜂窝，逼得财主踢场门”，增强顿挫感入声爆破更易表达浓烈的情感。方言语词使用对当地人来说更具有粗砺感和亲切感，搭配说书人嗓音腔调使表演更具有苦难色彩。

艺人在演出时也会同时使用辅助性的表演手段，来增强表达效果。作为一门听觉的艺术，说书人在演唱的过程中使用重复性的程式结构，延长了听众的品味时间，打破了原有听众线性听取的结构，听众可以反复品味以及回忆自身的苦难经历，与说书人达成共鸣，如使用四季十二月结构：将十二月或者节气、节令与朝代历史结合叙述的《十二月歌》、《说朝代》；还有使用次序程式铺叙家族苦难：三辈子都是揽工汉，祖祖辈辈受苦辛。我爷爷拾地主揽工把腰压坏，我父亲九岁揽工累断筋，我大哥下窑掏黑炭，四哥从小卖拾人，三哥出家当和尚，二哥携了十五年工……冬天吃粗糠窝窝掺榆皮，到夏天树叶野菜当饭用……春天借上一斗米，到秋天利就是片打滚”^[8-2]。艺人的动作以及神态的辅助性表演也非常重要，“七十多岁的盲人正扯着嗓子，腿上摇着刮刮板，手腕晃着马扎扎，怀抱一把没了漆色的大三弦，涨红着脸，脖子暴着青筋，使劲地吼着，声音仿佛来自他的身体深处……当戏中演到有一民女哭诉冤情时，老人的唱腔由慢变快，进而到怒不可遏。炕下的观众鸦雀无声，继而双目紧闭，以袖代巾一片泣声。”老艺人全身心投入，通过肢体动作（摇板、晃腕）和表情（涨红脸、暴青筋）强化情感张力，带动观众沉浸。“老人甩了上衣，只身穿一件粗布汗衫就说开了……当冤仇已报时，台下与台上同唱，院落吼声如雷”^[16-2]。表演者脱衣的即兴动作，展现狂放不羁的舞台风格，引发观众共鸣。

3. 苦难记忆的救赎与治愈

若是一味的讲述苦难，艺术便毫无意义，人们更不会在艺术中寻求短暂的解脱。当三弦的声波在沟壑间荡开，陕北说书便不再是简单的曲艺展演，而成为一方水土的集体疗愈仪式。艺术的治愈力量是无穷的，说书人在演奏过程中，情到极致，会将自身的生命能量释放出来，在艺术中释放自身压抑已久的苦痛，获得短暂的疗愈；群众在听书过程中同样也会得到心灵的治愈，《陕北说书考察》中记录的苦命艺人白志亮：“开始的请神仪式和小段由张成祥（白志亮弟子）演唱，白志亮坐在旁边不停地抽烟一句话不说。到了中场休息时，张成祥拉着二胡伴奏、几名村民突然唱起民歌，气氛渐渐狂热起来。白志亮似乎受到感染，突然从炕棱上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对铜铃，边唱边跳，活像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似的。在这片刻的瞬间，他的情感得到了释放，淤积于内心的不堪忍受的生活的重负和苦闷，都借着艺术的狂欢而消散了”^[9-3]。盲艺人指尖的韵律，既承载着黄土地沉淀的苦难重量，又生长出超越生存困境的精神藤蔓。这种植根于民间智慧的艺术形式，通过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审美符号，创造出独特的“苦难转化机制”：个体的呻吟在程式化的唱腔中被淬炼为群体共鸣，现实的创痛在叙事重构中升华为文化韧性。艺术在此展现出双重救赎力量——既是对集体记忆的温柔包裹，亦是对生存意义的永恒诘问与回答，最终在声腔起落间

完成从历史伤疤到精神图腾的蜕变。

村民每年度举办的庙会活动以及不定期的家书还愿活动对普通大众来说是巨大的仪式救赎,民众通过祈祷、还愿等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向神佛祈求各种愿望得以实现,这种周期性、重复性的宗教仪式,缓和了个体以及群体的创伤体验。陕北庙会仪式的深层动因,源于农耕文明对自然威力的敬畏与无力。面对干旱、蝗灾等不可控的生存威胁,民众将恐惧投射为庙会、祈雨法会等仪式行为。当震天锣鼓穿过沟壑,自然威慑力被具象化为可触碰的祭祀流程,集体焦虑通过仪式程序获得象征性掌控。民众通过焚香叩拜、许愿还愿等庙会仪式,向龙王、菩萨等地域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周期性、重复性的信仰实践,以象征性手法应对农耕社会的生存危机与个体焦虑。在香烟缭绕与集体仪式场域中,个体的不安被消融于群体性祝祷的声浪,心灵因神圣秩序的介入而获得短暂安宁。这种以肢体动作(叩拜)、声音符号(祷词)和视觉展演(神轿)构建的仪式系统,既是对灾祸恐惧的具象化展演,亦是对心理紧张的审美化疏导—人们在抬神轿中将生存危机转化为文化能量,最终在群体共鸣中实现从“畏天”到“敬天”的心理平衡。庙会不仅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更通过陕北说书、戏剧等复合性文化活动,调节黄土高原单调的农耕节奏,使参与者在信仰仪式与民俗娱乐的交织中,既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又完成心理压力的集体宣泄与精神净化。庙会仪式以共享的信仰符号与集体行动,编织起地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网络。当乡民跟随神轿翻越同一道山梁,齐声呐喊时,个体的孤独感被群体共振消弭,离散的生存经验因仪式参与而凝结为“共苦同甘”的文化契约。这种基于神圣空间建构的族群认同,通过年复一年的香火传承,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精神同频的“命运共同体”。当自然灾害或生活困顿降临时,庙会中形成的心理纽带便自然转化为互助共济的行动自觉—祈雨仪式中的集体跪拜不仅是向神灵求告,更是对“一方水土共担风雨”的族群承诺的反复确认,最终使个体的苦难在群体帮扶中治愈。

陕北说书的剧目中没有悲剧。不同于佛教因果轮回的虚无底色,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大团圆结局,陕北说书剧目中的大结局是农民对正义必胜的朴素信仰,是人民群众生活理想的反映—落难书生必中状元,欺压良善者终遭惩处。这种刚性理想主义既是对现实压迫的象征性反抗(如反贪官情节),亦是对群体尊严的集体宣誓。创作者在叙事中夹杂苦难程式与情节,又以“喜剧必然性”消解苦难的绝对性,使听众在结局中重获生存勇气。如书生前期遭受了各种苦难,到结局却是大团圆结局,而且还是好事成双甚至成堆,让主人公应接不暇。人们对负面人物的塑造也非常巧妙:对邪恶势力的惩罚也抱有极大的宽容善良的一面,对坏人的惩罚十分又分寸,除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不可赦免,一般的恶人只会让他们向人民大众低头,落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对懒汉、二流子等一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会集中突显他们可笑的一面,给他们以警醒,劝他们改正向善。这种朴素的理想结局,是与群众爱憎紧密联系起来的。在人物刻画方面,说书人用夸张笔墨塑造“身高丈二、力拔山河”的英雄形象,将尚武精神转化为对生命力量的极致礼赞。对英雄食量、武艺的铺陈并非浮夸,而是黄土儿女对抗贫瘠的精神投射—当现实中的农民躬身耕作时,书文中的豪杰正以肉身力量劈开命运枷锁。这种浪漫化叙事将劳动美学升华为文化符号,在“打富济贫”的传奇中,弱者借想象完成对现实秩序的诗意颠覆,说书艺术本质是群体心理治疗术。劝世主题是陕北说书的核心,说书人将书词演化为道德契约,婆媳矛盾在艺人弹唱中悄然化解。劝世段子以“故事镜子”照见人性弱点,又将农民智慧编码为“尊老孝亲、勤劳本分”的生存哲学。

“集体记忆既包含在社会记忆中,也包含在允许公共化的文化记忆中。社会集体记忆不再是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具体操演的记忆形构,从而催生了凝聚力强劲的集体身份,民族记忆作为一种生物的和政治的记忆尤为如此”^[12-3]。当说书人三弦响起,个体的道德焦虑被转化为集体伦理共鸣—听众既在书文投射中完成自我规训,又在“共听共议”间重构村落情感共同体。这种朴素的理想主义的艺术创作,与陕北农民豪放、豁达、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分不开的,劳苦大众在与自然搏斗中养成了一股积极进取、抗争苦难的气质,这种气质在黄土高原沉淀为独特的地域人文精神。

4. 结语

互联网的发明与运用深刻影响了人的行为与生活。相较之上一世纪说书人与听众所处的实在的时空环境,联网造就的虚拟网络时空成为人的记忆萌生的实在时空延展的场域,对社会集体记

忆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媒体,互联网正改变人的记忆模式,同时也导致了集体记忆的“快餐化”。陕北说书《刮大风》在网络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也不乏有戏谑之词,无法感同身受前辈与自然抗争的精神力量。“传统既在代际的‘交往记忆’中被活态地传承并不断地重构,又在‘文化记忆’中通过有组织的、被客体化的经典文本与仪式等形式得以保存”^[12-4]。三弦、庙会、窑洞、黄土高原这些文化符号,传承着人们对苦难的记忆,这些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创新更新,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修正自身的符号意义。现如今,艺人创作《说书人》唱词中不仅有:“我又恨着天,又恨着地,不知是何人留下这说书”的苦难记忆,还有“政策也改了,就大不相同”的对新时代的美好赞扬。对艺术发展来说,陕北说书这门艺术要被大众接受,不仅要关注艺术形式,更应该立足于艺术的核心精神,去唤醒更广大群众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传承,既是对过去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责任。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冲击下,陕北说书的苦难内核,成为维护地方文化独特性,突显艺术地域精神文化的重要方式。

集体记忆理论阐释了“苦难记忆”这一文化现象,而中国传统村落社会中“苦难—救赎”的生存哲学,实地的回答了苦难为什么存在的哲理。陕北说书一方面建构着苦难,一方面又消解的苦难。它通过艺术化的叙事,将苦难转化为凝聚群体、传递价值的精神资源,并在当代语境中持续激发对历史、人性与发展的深层思考。

参考文献:

- [1] 侯虎虎,王天强.明代陕北自然灾害与民生[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25(05):51-54.
- [2] 耿占军,仇立慧.清至民国陕西水旱灾害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29(01):39-47+56.
- [3] 王亚莉.抗战前后陕北的灾荒救济与人口变动[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06):64-71.
- [4] 曹伯植.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短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290.
- [5] 计六奇.明季北略(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5.
- [6] 王六.陕北民歌300首[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7:56.
- [7] 孙宏亮.红色说书人:韩起祥陕北说书口述史[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7:21.
- [8] 韩起祥.翻身记[M].西安:长安书店,1963:6.
- [9] 孙宏亮.弹起三弦定准音:陕北说书考察[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 [10]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 [11] [英]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
- [12] [德]杨·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3] 袁同凯,房静静.论记忆的空间性叙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53-60.
- [14]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9.
- [15] 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2012,44(07):134-137.
- [16] 黄新力.陕北盲说书人[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15.
- [17] 曹伯植.陕北说书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110.

(主编:侯本塔 编辑:吴宗泽 校对:金黛彤)

时代性、多样性、崇高性——简论子嫣纪实文学集《岁月的彩虹》

罗红宇^{1*}

(¹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 作为子嫣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岁月的彩虹》通过典型人物与事件记叙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历程。文章从题材、手法与思想三方面剖析作品价值:其一,题材选择具鲜明时代性,聚焦西藏经济、文化、医学等领域的平凡人物,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深度结合;其二,写作手法呈现多样性,运用电影分镜头叙事、环境细节刻画与人物动作神态描写,增强画面感与感染力;其三,思想情怀彰显崇高性,涵盖博爱的家国情怀、温暖的人文情怀与热忱的赤子情怀,展现西藏发展中的精神力量。该作品以真实的笔触与艺术的表达,成为反映西藏时代变迁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 子嫣;《岁月的彩虹》;纪实文学;时代性;西藏发展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305>

Contemporary Relevance, Diversity, and Sublimity — A Brief Discussion on Ziyan's Documentary Literature Collection "Seasons' Rainbow"

Luo Hongyu^{1*}

(¹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Seasons' Rainbow" is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ary literature by Ziyan, which chronicles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ypical characters and ev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of the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subject matter, technique, and ideology. Firstly, the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cusing on ordinary individuals in Tibet's economic, cultural, medical, and other fields, deeply integrating personal destini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Secondly, the writing techniques exhibit diversity, employing cinematic narrative sequencing, detailed environmental depictions, and vivid portraiture of characters' movements and expressions, enhancing both visual imagery and emotional impact. Thirdly, the ideological depth reflects sublimity, encompassing boundless patriotic sentiment, warm humanistic care, and sincere childlike innocence, showcasing the spiritual strength within Tibet's development. With its authentic brushstroke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work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text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ve journey of Tibet.

Keywords: Ziyan; "Seasons' Rainbow"; Documentary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Development of Tibet

引言

《岁月的彩虹》是作家子嫣(原名张琦)的纪实文学作品集。集子中的作品通过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记叙了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全书共收录十篇文章,二十余万字,创作时间跨度达十余年。为了采写文中所涉的人物和故事,子嫣在西藏日喀则、山南等地亲自进行考

作者简介:罗红宇(2003-),女,湖北十堰,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罗红宇,通讯邮箱:1214660353@qq.com

察和采访,以典型人物与事件为切入点,记录西藏在新时代的发展变迁。她的写作不仅注重事实的真实性与逻辑性,更融入深厚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共鸣,体现出纪实文学特有的叙事张力与人文温度。本文以“时代性”“多样性”与“崇高性”为核心线索,借助文本细读与主题分析的方法,试图阐释该作品的多重价值,同时对其叙事策略与伦理立场展开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反思,以拓展相关研究的讨论视野。

1. 题材选择的时代意义与叙事功能

纪实文学的核心使命在于记录时代、反映现实,时代性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尺度。正如报告文学理论所强调的,优秀的纪实作品需紧扣时代脉搏,成为“时代的艺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副主任黄国辉说:“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内心对题材的情绪应和充分调动,是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感悟力和建树的。”^[1]当代纪实文学研究著名评论家李炳银也说过:“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必须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矛盾有一种参与的自觉。”^[2]在这一点上,子嫣做到了。在《岁月的彩虹》中,她广泛摄取经济、文化、医学、边防等多个维度的故事,将宏观历史嵌入微小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诞生于她笔下的人物多为平凡的普通人,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普遍流露出一种博大的家国情怀。她所选择的大多是关于西藏各方面重大发展的叙事题材,同时伴以人物记述的有机结合,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地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微宏观”的交织叙事结构,从而全面展现西藏的飞速发展。

例如在《薪火传承济群生》《藏族优秀企业家的赤子情怀》和《见素抱朴,应机而化》三个篇章中,子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记述了藏医名家格桑旺堆、优秀企业家单增和文艺工作者平措扎西的成长历程,分别反映了西藏在医学、文化和经济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通过子嫣的文笔,我们了解到勤恳敬业、心系百姓的藏医格桑旺堆。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刻苦学习,出师后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总是抢在死神之前救济苍生,在医学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在他的努力下,藏医药学的发展实现了中西结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了解到出生于普通农家,敢于尝试、不怕失败的企业家单增。他从建筑工地最基层干起,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初心,对工作扎实认真。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文化知识,从施工队中脱颖而出。从副队长到队长再到经理,他任劳任怨地工作,并且重视员工教育,以德服人,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企业领导人。在面临国家给予的机遇和任务时,他勇挑重担,在发展公司业务的同时激励员工,做到了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最终使公司成为了西藏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柱。我们还了解到博览群书、热爱文学,善于观察生活,不断进行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平措扎西。他的作品涉及小品、散文、小说等多种题材,始终面向大众。怀着创作的赤子之心,他对作品十分认真和严格,创作出了大量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使西藏文学的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

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纪实文学更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子嫣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大故事”,成功将西藏的发展叙事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命经验,也赋予纪实文学以强烈的代际记录功能,从而强化了文章的时代性,彰显了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稳步前行与熠熠生辉。

2. 叙事策略的多样组合与艺术真实

优秀的纪实文学不仅需要真实的内容,也需要艺术的表现力。报告文学这种题材不像新闻报道那样,只有事件梗概,它必须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必须有生动的形象化的细节。子嫣在《岁月的彩虹》中展现了写作手法的多样性,具体体现在其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环境描写的逼真再现以及人物刻画的细致入微上,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画面感、感染力和艺术真实感。她通过多声部叙述,将个体记忆与历史语境交织,使文本既具宏观视野又不失微观温度。尤其在细节处理上,常以极具象征意味的物象串联人物命运,如老照片、经幡、铁皮茶盒等,赋予日常事物深层意涵。这种写实与抒情相融的手法,不仅提升了文学性,更让读者在真实基础上感知情感的流动与时代的脉动。

首先,她运用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手法,十分注意切换视角。子嫣的笔尖仿佛一台现场摄像机,通过切换对不同人物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各不相同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例如《浴火重生》这一篇章真实地再现了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大地震对西藏日喀则部分地区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子嫣在这一篇章中记述了许多人物:地震面前心系百姓、迎难而上的共产党人和人民警察;危难时刻不弃亲人、安抚民心的村干部西绕坚参;面临危险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阿佳次丹和尼姑白

确……通过对他们在地震中的一举一动的细致描写，子嫣让读者感受到了于危难面前共产党人伟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父母与子女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同事朋友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种种感情相互交织，对读者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让人热泪盈眶。通过多重视角的切换和场景的快速剪辑，地震发生时的混乱与救援的紧迫感得以强化，这就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作者“亲历”和“在场”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打破了作者和读者在生命体验层面上的壁垒和界限^[3]，提升了文章的视觉动态与情绪冲击力。

其次，子嫣十分擅长对环境的具体描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作品中，子嫣具体描述了当时地震的状况。通过她的文字，灾难的现场瞬间重现于眼前。例如，她是这样写地震初始：“整个山体都在摇晃，紧接着就见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山上翻滚而下，大地仍在震动……街道上已是房屋倒塌，乱石堆迭，山河轰鸣，混杂着人们惊慌的哭喊声求救声。”^[4-1]仅用只言片语便把人们的恐惧具象化了。再如她描写人民警察前往灾区前路途中偶遇余震的场面：“踏上前行路，入眼皆是坍塌损毁景象，且余震频仍，眼看着河谷撞击发出震天巨响，令人恐惧；道路上多处被塌垮下来的巨石砂砾掩埋而找不到路径，只能顺着峭壁边沿摸索着迂回前进；低头小心地探寻着路面，又不时有大小石头从山峰上飞滚而下掠过头顶，随时都有被飞石击中的危险。”^[4-2]这段环境描写则更加具体细致，震耳欲聋的声响、破败不堪的路面、不时飞滚的落石……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碍着人民警察的脚步。如此险境，人民警察们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只为和时间赛跑，赢得更多的抢救机会，这种心系苍生的博爱情怀让人动容。子嫣对环境的刻画如同魔法，给予了读者穿梭时空、回到现场的能力，让人身临其境，细腻体味。

最后，子嫣对具体情境中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得细致入微，能够让读者直观地了解到人物的具体形象和内心世界，缩小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浴火重生》中，自治区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清科身为共产党员，做到了临危不乱、迎难而上。为了安抚百姓，他第一个站出来，说道：“现在我们和外面联系不上，在场的党员干部和人民警察，就代表着党中央代表着国家和政府，我们必须首先克服恐惧心理，勇于担当，站起来做广大群众的主心骨！”^[4-3]在一片悲戚之声中，他大喊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于是，年轻人们接二连三地站了出来，组成了抢险突击队，迅速展开了救援工作。他的话语铿锵有力，仿佛定海神针一般，展现出共产党员坚不可摧的魄力和张力。

再如她对中国电信抢险队员汪金奎在余震中勇攀高层建筑进行抢修的描述：“他一阶阶拾级而上，队友们在下面提心吊胆地看着，突然，房屋一阵摇晃，真实的天摇地动！人们一片惊呼，汪金奎也吓得一激灵，几秒钟后他定了定神继续往上走，感觉自己摇摇晃晃地走在摇摇晃晃的世界上。终于上到楼顶，开始专注工作，依序对卫星站天线对星、固定、检测、调试，突然又发生强烈余震，随着楼体的猛烈摇晃，汪金奎瞬间整个人被甩向楼下，危急时刻，下意识地紧紧抱住天线支撑杆，与死神擦肩而过。楼下的队友们惊呆了！回过神后，大声呼喊他，他瘫软在地无力应答，几分钟后，向队友说了句‘我没事’，又扶着铁架子站起来，用微微发颤的手继续工作。”^[4-4]在这一惊心动魄的片段中，子嫣对汪金奎进行了具体的动作、神态描写。“吓得一激灵”“定神往上走”“紧紧抱住”“瘫软在地”“无力应答”“微微发颤”等一系列描写将当时险要的情境真实地再现于读者眼前，让读者在不自觉之间也为人物捏了一把汗。在如此危险的情境下，汪金奎将困难和恐惧一一克服。子嫣通过细节描写，将这位勇敢敏捷的英雄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这不仅还原了危急情境，也刻画出人物真实的恐惧与克服恐惧的勇气，避免将英雄符号化、扁平化。

这些手法共同强化了作品的“艺术真实”，在事实报道之外赋予文学以情感和道德的感染力。子嫣的成功在于，她未停留在表面的事件重现，而是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冲突，从而实现了纪实文学“人事双叙、情事交融”的美学追求。

3. 精神维度的崇高性与伦理情感

当代纪实文学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说过：“优秀的报告文学，对于读者来说，不光是见识的增广，同时也应是心灵情感的洞明。它可以改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也往往影响或改变社会的知觉。”^[5]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也说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实录了时代之本真、蕴含着历史之深远、抒写有精神之崇高，而且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美学的方式加以达成的。”^[6]子嫣的作品不仅记录了西藏的发展，更传递出一种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核心在于其思

想情怀所彰显的崇高性。在美学范畴中,“崇高”指向那些体积巨大、力量强悍、令人恐惧又因其超越性而最终激发敬畏与振奋感的事物。子嫣是一个以西藏为精神家园的作家,她的文字流露出对西藏深沉的眷恋与热爱,这是毋庸置疑的。她笔下人物所体现的博大家国情怀、牺牲精神、坚韧意志以及对文化使命的担当,正是伦理道德和精神价值层面的崇高,具有超越个体、震撼心灵的力量。

首先,子嫣笔下记录的主要人物普遍具有博大的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在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太阳照在玉麦乡》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捍卫领土主权的桑杰曲巴一家,还是《雪山下的忠诚护边人》中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戍边巡逻、揪出百多起异常越境事件的村民嘎罗布;无论是《浴火重生》中在危难面前敢为人先、舍己为人的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清科,还是《薪火传承济群生》中矢志不渝、坚持初心地传承和研发藏医药学的学者格桑旺堆……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一种博爱的家国情怀。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但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崇高的——时刻心系着祖国和人民。子嫣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特征紧紧联系起来,通过刻画小人物,将其至高无上之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

其次,子嫣作品中的人物还展现出温暖的人文情怀。在《雅砻的欢唱》中,子嫣记述了西藏山南地区藏医医院的发展历程。通过她的文字,我们了解到山南地区的藏医医院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氛围浓郁。“医院的大厅、走廊、候诊区、诊室,住院部的大厅、走廊、护士站等等所有办公区域和公共场所,处处有序地张挂着一些优美的画框和宣传小板,内容除了《四部医典》的名言警句外,还有源自《本生经》、《入菩萨行论》、《佛子行》、《萨迦格言》等传统典籍的语录。有龙树、俄曲妥美等历史人物名句,也有堪布·次朗、催陈坚参等现代名藏医的语录……各病区的宣传展板紧紧围绕文化建设内容,或向病患者宣传藏医药文化理念,或对就医者提出文明行为的规范标准。”^[4-5]医院还编写了《住院病人民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教化方式,体现出山南地区藏医医院不仅尽职尽责地医治病患的身体,而且尽心尽力地引导教化着病患的心灵,体现出温暖如斯的人文情怀。

与此同时,子嫣所写的人物还怀有一颗热忱的赤子之心。他们不忘初心、刻苦奋斗,为西藏的发展谱写出一段又一段辉煌的新篇章。如文中记述的藏族优秀企业家旦增没有随波逐流跟随大众学开车,而是坚持在自己热爱的瓦工技术上下狠功夫,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最后成为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再如淡泊名利、心系苍生的藏医名家格桑旺堆,在取得成就后并没有骄傲自满、居高临下。年长的同事对他的正常晋级横加刁难,他也毫不在意,而是保持一颗对医学的虔诚之心,矜矜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只为把藏医药学“发扬光大,直至终生”。又如热爱文学、热爱故乡的文艺工作者平措扎西花费七年时间走遍自己的家乡日喀则的每个角落,尽可能地收集全面的信息,加以自己对故乡的全部爱意,写就出一本著作《寻迹——在喜马拉雅山脚下》。

“阅读这些颇具原生态气质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这一概念……正是这份由乡愁长年累月孕育而成的深切情怀,才衍生出强大的生命力量,支撑着一位已不年轻的作家、一位民俗文化学者,不畏旅途的劳顿辛苦,不惧事务的琐屑繁杂,耗费七年时间,日光灯影下翻阅一本又一本新旧书籍,寒来暑往间深入一个又一个幽隐之地,一步步探赜索引,一项项条分缕析,拨开历史烟云,掸清岁月尘埃,对被遗忘的史实力求还原,对被隐没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显微。”^[7]这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故土家园的真情回望,这样真诚的书写,更寄予着一位游子对故乡亲情的深情回馈。这种情感深沉又热烈,足以让家乡以之为傲,让读者为之动容。

上述这些情感与品质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们超越了个体利益的局限,体现出某种普遍性的道德价值与生命理想。它们不是被说教或美化而来的,而是通过真实可感的故事自然流露,因此具备较强的感染力和认同基础。

综上,子嫣的《岁月的彩虹》不失为值得一读的报告文学。子嫣挑选的题材具有典型性和突出性,加以她巧妙地运用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方法,具体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境与画面,使文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她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但却在艺术形象性的塑造上做到了精妙绝伦。她擅长捕捉细节,力图展现出人物心理更深层次的思想境界,让读者与当事人达成共鸣。这种能够精准地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文学,真实地反映出了时代发展的特征。无论是于作者自己还是于读者,都是巨大的精神养分,体现出文学的温度,激励着文学的不断发展。

4. 学术反思: 典型之外的沉默与待开拓性

在充分认识其价值的同时,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这就涉及到一个经典的命题——关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与复杂性。《岁月的彩虹》聚焦于各领域的正面楷模和英雄人物,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的家国情怀、牺牲精神和赤子之心构成了崇高感的主体,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价值。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同所有社会变迁一样,部分会伴随适应、困惑。例如发展带来的观念冲突、身份认同的转变、对现代性的适应与保留传统的矛盾等,在本书中尚未得到充分呈现。若作品能在讴歌时代楷模的同时,也适度关注和呈现普通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更复杂、更多元的心路历程,或将使作品对西藏社会变迁的描绘更具立体感和普遍共鸣,也能更全面地展现时代精神的复杂面向。

“报告文学文体对以现代性为轴心的时代精神的契合就不仅表现为单纯的追寻,它还在另一层面上表达出对现代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最终成为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文化批判性的核心内涵之一。”^[8]纪实文学作为时代记录与反映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它不应仅是时代的颂歌,更应是时代的镜子——反射光辉,也照见斑驳。只有包容完整的人性图景与复杂的社会意识,才能真正实现“真实的艺术”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

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贡献。^[9]尤其在目前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实文学更应当获得充分的关注与研究。“其实,一个社会的基础和稳定、生机和希望,更多地取决于基层民众的品性、行动及情绪感受表现。基层民众是社会生活的源头,是社会这棵大树的根。”^[10]因此,模范叙事是重要的,但社会图景的丰富性同样值得关注。在叙事中纳入更多元的经验与视角,深入挖掘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助力西藏文学实现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表征,从而更好地承担起记录时代、沟通文化、凝聚认同的文学使命,同时在新时代中获得更广泛的读者认同与学术关注,这是藏族文学作家共同的创作初心与目标。

尽管如此,《岁月的彩虹》的成就和价值仍然是显著的。子嫣以其扎实的采访、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为读者奉献了一部记录西藏新时代壮阔征程、颂扬人性光辉与崇高精神的诚意之作。它不仅是对西藏发展的生动见证,也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画廊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一笔,其温度与力量将持续激励读者。本书在书写楷模、歌颂崇高的主旋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叙事经验。若能在未来创作中进一步拓展题材覆盖的广度与心理描摹的深度,尤其是在典型之外寻找更多普通人的历史踪迹与内心回响,子嫣的写作将不仅具备感动人心的力量,更可能迈向更具批判性与包容性的社会史诗。

参考文献:

- [1] 黄国辉. 子嫣《岁月的彩虹》:守得云开见月明[EB/OL]. 中国作家网, (2021-07-14)[2025-09-20].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14/c404030-32157246.html>
- [2] 李炳银. 文学的目标和报告文学的力量[J]. 名作欣赏, 2019, (19): 5-12+2.
- [3] 张莹. 求新立异: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报告文学创作传播的成功之路——以加央西热《西藏最后的驮队》为例[J]. 阿来研究, 2024, (01): 143-150.
- [4] 子嫣. 岁月的彩虹[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20.
- [5] 李炳银. 生活与文学凝聚的大山——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阅读与理解[J]. 文学评论, 1992, (02): 17-30.
- [6] 丁晓原. 报告文学: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文体建设[EB/OL]. 中国作家网, (2022-12-26)[2025-09-2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1226/c404063-32589987.html>
- [7] 子嫣. 乡愁济世长——读平措扎西的散文集《寻迹》[EB/OL]. 藏人文化网, (2020-01-07)[2025-09-20]. <https://www.tibetcul.com/wx/zhuanli/pl/32954.html>
- [8] 王晖海. 报告文学: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J]. 文学评论, 2003, (03): 167-175.
- [9] 谢颖. 让民族文学之花灿烂盛放[N]. 人民政协报, 2024-08-26(012).
- [10] 李炳银. 在民间生活中发现大美[N]. 文艺报, 2022-08-22(002).

(主编:侯本塔 编辑:黄芊 校对:金黛彤)

叙事的神学：远藤周作小说对天主教困境的文学解答

陈思丞^{1*}

(¹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作为日本战后代表作家，远藤周作因其天主教徒身份及作品中深刻的宗教探索而备受瞩目。文章以“叙事神学”为理论视角，聚焦远藤文学如何通过小说叙事为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困境提供独特的文学解答。通过细读《我·抛弃了的·女人》《沉默》与《深河》三部核心作品，分析其笔下森田蜜、罗德里戈与天津等关键人物的塑造轨迹，揭示远藤周作如何运用文学手段——从“圣女”的世俗救赎到“叛教者”的神性解构，最终抵达“恒河行者”的多元共融——逐步瓦解天主教唯一神论的排他性，重构契合日本泛灵论土壤的“人性之神”形象。远藤周作的文学实践不仅展现了一条天主教“日本化”的有效路径，即通过苦难分担、沉默解读与神圣包容实现信仰的本土转化，更在文学层面完成了对宗教道德范式的独特塑像，为跨文化宗教传播困境提供了深具启示的叙事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远藤周作；叙事神学；天主教；日本化；文学解答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88>

Narrative Theology: Shusaku Endo's Literary Solution to the Catholic Predicament in His Novels

Chen Sicheng^{1*}

(¹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China)

Abstract: Shusaku Endo, a prominent postwar Japanese writer renowned for his Catholic faith and profound religious explorations in literature, offers a unique literary solution to the predicament of Catholicism in Japan through his novels,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narrative the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pivotal works—*The Girl I Left Behind*, *Silence*, and *Deep River*—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key figures such as Sugimoto Mitsu, Rodrigues, and Ōtsu. It reveals how Endo employs literary devices to progressively dismantle the exclusivity of Catholic monotheism and reconstruct an image of the "human-divine" compatible with Japan's animistic tradi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unfolds through narrative trajectories: from the secular redemption of the "saintly woman,"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divinity embodied in the "apostate," to the pluralistic inclusivity of the "Ganges pilgrim." Endo's literary praxis not only delineates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Japanization" of Catholicism—achieved through shared suffering, reinterpreted silence, and divine embrace—but also accomplishes a unique portrayal of religious morality within literature. His work thus provides a deeply insightful narrative solution to the predicament of cross-cultural religious transmission.

Keywords: Shusaku Endo; Narrative Theology; Catholic Predicament; Japanization; Literary Solution

引言

作为日本“第三代新人”作家，远藤周作以其作品中深刻的天主教主题，成为战后日本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天主教作家。川西政明在评论远藤周作的文学世界时指出：远藤周作的文学是

作者简介：陈思丞（2001-），男，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通信作者：陈思丞，通讯邮箱：hattoheiji@163.com

由十二岁时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二十七岁至三十岁三年间的法国留学生活和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间的病床生活构成^{[1]68}。因其自小皈依天主教的教徒身份，远藤在文学创作中对于天主教进行了诸多思考，其中包含着质疑与反思，早在他《崛辰雄论笔记》中便指出了日本国与宗教间的冲突，进而挖掘属于自己独特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观。他的创作不仅延续了由法国作家伯纳诺斯、莫里亚克等人开创的天主教文学传统——即在叙事中探索信仰、罪恶与救赎的复杂关系，更将这一传统带入东方文化语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学叙事风格。格雷厄姆·格林对其“20世纪天主教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家”的评价，恰当地体现了远藤在这一文学链条上的重要位置。远藤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叙事神学”，即神学思考应通过叙事而非教义阐述来实现，强调在具体的故事与人物经历中展现信仰的实践与体验。远藤周作通过《我·抛弃了的·女人》《沉默》与《深河》三部代表作中森田蜜、罗德里戈与天津这三个关键人物的塑造，完成了他对天主教“日本化”问题的渐进式思考：从森田蜜所体现的个体道德实践与世俗圣洁，到罗德里戈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与神学解构，最终抵达天津所代表的宗教多元与包容理想，这三个角色形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演进脉络，不仅反映了作家个人宗教观的成熟过程，也为天主教与日本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层层深入的艺术解决方案。

1. “圣女”的自我救赎——森田蜜的宗教性

在远藤的创作中，《我·抛弃了的·女人》（以下简称《我》）往往被大众所忽视。作为远藤1962年肺病痊愈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人们认为这是一部面向大众而非文学阅读者的通俗小说。台湾学者林水福曾得到过远藤本人的亲口认可，即“在创作生涯中所有作品里最喜欢的是《我》。”而林水福由此将《我》译介至中国，才引起了部分读者的注意。

《我》讲述了一个很简单故事，由于最初是在日本期刊《主妇之友》上连载，所以作品采取了类似日记体的写法，以男性视角吉冈努为中心的便命名为“我的手记”，以女性视角森田蜜为中心的便命名为“手腕上的痣”。通过两个视角的结合，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故事的梗概：身为大学生的吉冈努无所事事，一次巧合结识了森田蜜，可吉冈努对森田蜜的气质感到不快，多次利用并诱奸了森田蜜，甚至断绝来往。而大学毕业后，吉冈努接近富家女三浦真理子，并最终与她结婚。而森田蜜对于曾经在她心中对她释放出善意和“做了那种事情”表达喜欢的吉冈努念念不忘，多次试图联系吉冈努。她先后经历了药厂女工到红灯区的妓女，最后被误诊为麻风病而住进郊区的麻风病院，期间唯一与外界的联系是和吉冈努见了一面和大街上远远望见了幸福的、曾经是同事的三浦真理子，最后她死于车祸。森田蜜死后，麻风病院的人给吉冈努寄了一封信，在信中描述了森田蜜在麻风病医院的经历和对吉冈的思念。吉冈在全文的最终站在屋顶上，“可是我却有种寂寞感”^{[2]257}。

这种寂寞来源于吉冈努对于森田蜜的怀念，也来自于对于现在生活的体认，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宗教的认识。“这修女所信仰的神，要是真的存在，那么这就是神透过那样的痕迹对我们说话？”^{[1]257}。森田蜜进入麻风病院后，她在修女处获得和解，并且成为一名不算正式的修女，而最终在履行修女的日常任务时死去。吉冈努看到了宗教对于森田蜜的力量，但事实上，在远藤的创作中，森田蜜本就是作为一个宗教的化身而存在的，即所谓的“圣女”。而森田蜜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即宗教化身在人间实现的自我救赎。

作为略带些悲剧性色彩的角色，森田蜜的经历令人不忍卒读。从宏观上说，在阅读森田蜜时会很容易将其看成托尔斯泰笔下类俄国女性角色的道德至臻的形象，但森田蜜身上所体现出的宗教性却是比前者更为突出。森田蜜并非天生的宗教信仰者，她最初只是药厂一个普通的女工，吉冈努只是将其“像小狗般抛弃”^{[1]21}。吉冈努在诱奸后与其断绝来往。而森田蜜陷入单方面对吉冈努的爱情中难以自拔，想要将自己的工资预支出来，买一件自己无数次路过的橱窗里的上衣。然而她撞见了同事妻子田口太太和其儿子。田口先生将钱用于喝酒与赌博，家中入不敷出，森田蜜心中的某个声音对她进行道德上的劝诫：“可是，还有比责任更重要的东西呀！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把自己的悲伤和别人的悲伤联结在一起，我的十字架是因此才有的”^{[1]85}。尽管森田蜜不懂得这句话其中的含义，可她还是将自己来之不易的工资赠予了田口太太。这种无私地和他人悲伤连接且感同身受的，正是天主教所倡导的博爱。这也是吉冈努回忆时将其称为“圣女”的一个原因。

森田蜜在去往麻风病院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人，这位老人穿着救世军的制服，身后贴着一个

传单,即“爱你们的神”。这样的老人,森田蜜曾经在他手中购买过十字架赠送给吉冈努,又被吉冈努无情丢弃。在此刻,远藤终于提出了自己对于天主教的怀疑,他的宗教观初现端倪:“要是神真的存在,为什么毫无理由地让像我这样的女孩这样不幸呢^{[1]176}?”这种与社会相抽离的独立处境,正是日本战后精神失落的人们精神象征,森田蜜因为某种疾病被社会孤立,恰似天主教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处境,更是日本当代社会人们精神的处境。远藤以森田蜜为典例,将宗教与社会融为一体,同时发出了对宗教的沉痛质问。值得深思的是,麻风病院的名字叫做“复活”,从精神失落到精神复归,这种精神“复活”的处境又和类玛丝洛娃的角色相似,实现了宗教性为本的人物塑造。

在进入麻风病院后,森田蜜的第一天辗转反侧,而山形修女再次唤醒了她心中的宗教性:“大家一起分享着相同的命运。不只是命运,连痛苦、难过也都一起分享^{[1]193}。”这种蕴含宗教哲理的观点正是以山形为代言人的远藤与自己内心宗教观进行的争斗,也是对于森田精神“复活”的进一步推动。而森田也在这样的场景中得到了室友妙子的影响:“真正痛苦的并不是身体。两年来,我总算体会到真正的痛苦是……忍受着没有人爱自己^{[1]197}。”至此,森田蜜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曾经只是被她视作护身符的十字架——即天主教。

森田蜜得知自己误诊后仍然留在麻风病院,并照顾病人直至车祸身亡,这种完全属于天主教的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为修女的山形也为之动容。森田对病人救赎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救赎的过程。在她极度孤独信仰失落时被所有人抛弃,秉持着“感受他人的痛苦”,她用自己属于天主的博爱感染病人,让病人拥有生的希望。让被社会孤立的人重获神的祝福,作为天主的人间行走而行事。这种与他人感同身受的、想要为之奉献一切的,牺牲自己的,忍受痛苦与孤独的,才能获得最终的“复活”与救赎,实现自我对自我的拯救。这一选择暗含远藤对宗教救赎的诠释:唯有通过承受苦难、分担他人痛苦,方能实现自我救赎。森田蜜的“圣女”形象,实为远藤对天主教教义的日本式转译——将神圣性根植于凡人的苦难与奉献中。

远藤周作在《我》中对吉冈努的态度并未完全表明,但借吉冈努之口对森田蜜的定性——“圣女”是他此刻宗教观的体现,森田蜜的自身救赎是远藤周作在对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产生怀疑后又自我和解的过程,只有落入极致孤独的境地,才能真正成为永远的“圣女”,也揭示了战后日本的精神困境——个体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异化与信仰缺失。森田蜜的“复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迹,而是通过伦理实践完成的世俗神圣化,标志着远藤宗教观从教条信仰向人道主义的初次转向。远藤通过森田蜜这一形象,初步尝试将天主教救赎观念与日本世俗伦理相融合,完成了天主教日本化的第一步探索。然而,这种个体层面的道德实践尚未解决天主教与日本文化传统的根本冲突,这促使远藤在《沉默》中通过罗德里戈的形象,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冲突与神学解构的更深层次思考中。

2. “圣父”的个人体验——罗德里戈的宗教性

《沉默》于1966年获得谷崎润一郎奖,这本书和《深河》一起,被远藤周作带入自己的灵柩。在这本书中,远藤周作进一步探讨了自己对于宗教的观点,而他的全新感受是通过江户时代从葡萄牙来到日本的传教士罗德里戈神父来体现的。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曾经作为罗德里戈老师的费雷拉神甫叛教,为了填补日本天主教会的空白以及寻找真相,罗德里戈等人偷渡前往日本。在日本经历的时光中,罗德里戈为他人洗礼、为了躲避将军幕府的追杀而东躲西藏,最终被幕府俘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关押后也选择弃教,改名换姓成了一个日本人,最终以日本人的身份死在日本。

在这本书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远藤周作着重想要表达的内容。首先是标题,即“沉默”。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沉默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文中罗德里戈一直所询问的:当基督徒受到迫害时,“神”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另一层则是指这些弃教的西方传教士在两方传教史上被作为耻辱而除名,陷入了历史的“沉默”中^[3]。后一层是历史角度的追问,前一层则是远藤本人对于自己内心宗教观念的第二次否定。

罗德里戈是一个信仰坚定的神甫,他虽然年纪尚轻,但很早就加入教会,对基督拥有至高无上的信仰。可这种信仰却一点点粉碎,最终成为弃教之人,在这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便是他从前的师父费雷拉神甫。他被捕入狱后幕府多次劝降他,反反复复谈到“形式”一词。让罗德里戈踩踏圣像不过是“形式”,巡街游行时让罗德里戈选择弃教也只是“形式”,在幕府方面看来,

你是否真正信仰似乎无关紧要，只是需要让神甫进行形式上的“弃教”，就可以放过罗德里戈。但罗德里戈并未选择顺从，他坚持相信着会有神来拯救他们，拯救像他一样的、像他不能保护的百姓一样的普通人。可神无动于衷。

罗德里戈曾经发问：“基督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对着为了三十枚银钱出卖自己的男人说出‘去吧’这句话呢？是因为愤怒和憎恨吗？还是出于爱？如果是愤怒，就意味着基督当时将这个人从世人中排除出去，不在救赎之列。把基督的气话当真的犹大，便永远得不到救赎了吧？而主就任由一个人永远堕入罪恶之中^{[4]77}。”在罗德里戈看来，犹大早已背叛了基督，可基督却无动于衷，并没有对犹大进行报复，但也并没有拯救犹大，只是说了一句“气话”，这种对待信徒的方式难道是正确的吗？在苦行的路上，罗德里戈无数次祈祷主的保佑，但只换来了沉默：“就连我们为你建造的村庄，你也任由它被烧毁吗？在人们被驱逐时也不赐予他们勇气，而是如同这黑暗般沉默吗？……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请不要再让我们遭受苦难了。司祭祈祷着，然而海依旧冰冷，黑暗也依旧固执地保持沉默^{[3]102}。”这种长久的沉默让罗德里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正确的。可以认为，罗德里戈的“圣父”形象在此刻出现了裂痕，他从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到徘徊不定，他痛恨神的沉默，痛恨神的不作为，这种痛恨实质上是远藤周作对自己的宗教观发出的深刻疑问——神是否存在并为人们发声？

这种沉默的意味蔓延到罗德里戈的内心，而第二次分裂罗德里戈想法的是他与费雷拉的会面，在此次会面中，费雷拉提出了“沼泽论”：“这个国家是沼泽。终有一天你也会明白的。这个国家比想象中更可怕的沼泽地。不管什么样的树苗，只要种在这沼泽地里，根就会开始腐烂，叶子就会发黄枯萎。我们在这沼泽地种下了天主教的树苗^{[3]159}。”费雷拉的深刻意思是想说，日本的国情就不能允许天主教的存在——日本人只信仰日本自己的神，天主教只是一个外皮而已。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远藤周作的宗教观进行了第二次沉重的变化，他借助费雷拉的“沼泽论”和罗德里戈的内心活动点出了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也是他在对自己的宗教观进行否定性怀疑后的第二次阐述。这一场景构成远藤宗教观的关键转折：信仰的本质非形式化的教条，而是对现世苦难的共担。

作为结果，罗德里戈面对铜版时听到了基督的心声“铜版上的那个人，因为被许多人踏过，已磨损、凹陷，正以悲伤的眼神注视着司祭。他的眼里似乎有一滴眼泪将要滑落^{[3]185}。”“踏吧！我最清楚你脚上的他疼痛。踏吧！我是为了让你们践踏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而背负十字架的^{[3]186}。”本该纯洁的、至高无上的圣洁的基督像的形象却是磨损、凹陷的，那基督像传来的呼声恰好对应上了“形式”的观点。一切只是形式而已，踩踏的痛苦、心灵违背的痛苦只是形式而已。如果不能够选择践踏，就不能够拯救无数无辜的百姓，也不能够拯救自己的生命。

在此刻，远藤周作提出了平凡人姓名和至上宗教信仰的二元对立论。如果选择拯救，那就要抛弃形式上的信仰和心灵上的绝对崇敬；如果选择了信仰，就要放弃全部的生命和无辜者的生命。在这样的选择中，费雷拉和罗德里戈都选择了前者，可这也就意味着，远藤周作本人的宗教观也是这样——日本人的、日本群众的生命，是高于所谓的天主信仰。他用基督的心声为自己做辩护，让基督自己说出“生来就是被你们践踏”的这一观点。

罗德里戈从一个纯粹的天主教徒变成了叛教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叛教。他说他在那一刻听到了基督的声音，听从了基督的指示。这种指示出自罗德里戈的个人体验，也是远藤周作本人宗教观的进一步深化。通过罗德里戈的“叛教”，远藤完成了对天主教普世性的解构。基督褪去神圣光环，成为与凡人共担痛苦的“人性之神”。这种将救赎置于伦理实践而非宗教仪轨的观念，为天主教“日本化”提供了哲学基础。罗德里戈的“叛教”经历虽然颠覆了传统天主教的神圣叙事，却为远藤的宗教探索开辟了新路。然而，神性的解构并非终点，如何重建一个兼具包容性与精神性的信仰体系，成为远藤晚年创作的终极关怀。这一思考最终在《深河》中通过天津这一形象，迈向多元共融的宗教理想。

3. “圣人”的人性探索——天津的宗教性

《深河》出版于1993年，并在1994年获得每日艺术奖，它是远藤周作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深河》出版三年后远藤因病去世，将《深河》与《沉默》一同放入自己的灵柩中，“深河”指印度的恒河，全文通过一行人因为各种原因前往印度游玩为故事主线，讲述了每个人的故事，最后汇聚在恒河边，远藤对于恒河的形容是“无论多么丑陋的人、多么肮脏的人，这条深深的河都不拒绝。”在印度，恒河也是作为印度人的母亲河而存在，这条河与印度的宗教相联系，

天生就带有宗教色彩。在这篇小说中有许多人物,形成了群像画廊,但着重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出现于美津子的故事中而后再被单独叙述,最后死于恒河边的大津。虎岩正纯认为,矶边、沼田与木口的目光停留在过去,他们希望从过去摆脱出来,而大津的理想却是在现在与未来^{[5]62}。研究看来,大津是作为远藤宗教思想的化身,对于人性和宗教的深层含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全新探索。

大津是美津子的同学,曾经被美津子勾引又抛弃过,而后成为一名神父。大津本是印度人,但先后在法国和印度担任神父一职,这与远藤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从1950年开始,远藤在法国留学了三年之久,而法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他的天主教思想和法国的宗教氛围格格不入,进而他开始思考是否日本的宗教环境与宗教信仰和他国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就导致了在诸多文学作品中,远藤皆提出了这一怀疑。这种怀疑体现在大津的身上,便是大津的信仰痛苦与转变。

在被美津子抛弃之前,大津并不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信仰,以他自己的观点而言,正是由于美津子的抛弃,才让他明白了信仰的意义。大津将这种信仰概括为“洋葱”,洋葱剥开使人落泪,这种感受既是要在“过程”中释放意义^[6]。尽管在美津子看来,她爱别人是在模仿爱,她“就像模仿爱一样,我在模仿祈祷^{[7]239}。”而大津的行为,以此观点为延伸,也无非是在“模仿”基督。在大津看来,“因此洋葱刻在了每一个内疚的人的心中,变成了他们难以忘怀的存在^{[5]209}。”“每次看到恒河,我就想起洋葱。恒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洋葱的爱之河也一样,再丑陋和污浊的人,都会被它接纳,在它的河中流淌^{[5]210}。”这种属于天主教的无私奉献的、博爱的价值观,也正是基于模仿每一个“过程”而出现的。而恒河包容一切污浊的意象,正是远藤心中理想宗教的终极象征。

作品发端于一首黑人灵歌,即黑人创作的内容来自《圣经·约书亚记》的宗教歌曲,而在文章中又多次出现《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他无佳形美容,也无威严。相貌憔悴而且丑陋。人们藐视他,厌弃他,如同被藐视的人那般他双手掩面,任人侮辱。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段话正是远藤所塑造的大津的形象,可以认为,在《深河》中,大津的形象与基督的形象高度重合,甚至融为一体。

而大津在追求信仰中所出现的信仰怀疑,其实也是远藤本人的怀疑。但远藤找到了答案——宗教多元论,其核心主张认为: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对人类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回应方式,尽管其教义、实践和体验形式各异,但都具有同等的救赎有效性,没有哪一个宗教拥有绝对唯一的真理。远藤曾在他1991年日记中,明确提到了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及“神拥有许多名字”^[8]运用到自身创作中,远藤周作将这一观点改为“神拥有许多脸孔。”

这种许多脸孔实际上就是他的宗教多元论体现,在《深河》中,除却天主教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印度教、佛教以及多重教会的身影,对于这些其他教派的描写则是让大津,也让远藤真切地意识到,只要能够拯救人们,拯救信仰,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思想最后都只能通向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潘尼卡的宗教多元论观点,即“宗教是通向生命圆满的道路。但每一条道路并不相同,而且不同道路途中风景各异^[9]。”在远藤看来,宗教与宗教之间有所区别,但内在的中心意指并无不同,正是这种共通的意指才让人们拥有信仰,在信仰中得到拯救。

大津的宗教思想变化实质上就是远藤本人的思想变化,借助大津这一“基督化身”的人性探索,在汇聚了诸多教派与生命的恒河处,远藤确定了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也让大津成了一个光荣的、为他人牺牲,即便被误解也并不解释,而是宽容一切、博爱一切的“圣人”。这种一切人得到拯救,一切人将重新信仰的宗教观点是远藤在晚年经过了长时间的怀疑和斗争后最终得出的结论。

大津的形象融合了基督受难者与日本“无缘佛”的双重特质。他背负临终者的尸体浸入恒河,实践“爱之河接纳所有罪孽”的理念。这种超越教派界限的救赎观,标志着远藤从“排他性一神论”到“多元共融”的彻底转变。通过大津,远藤为天主教注入日本文化中的泛神论基因,消解了东西方宗教的二元对立。

经由森田蜜、罗德里戈至大津的渐进塑像,远藤周作最终完成了其叙事神学的体系构建。这三个角色不仅标志作家个人宗教观的成熟,更整体呈现出天主教日本化的完整路径,为跨文化宗教传播提供了深具启示的文学解决方案。

4. 日本化的道德塑像

通过对《我抛弃的女人》《沉默》与《深河》的细读与分析,远藤周作借由森田蜜、罗德里

戈与天津这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形象，完成了其对天主教信仰与日本文化融合问题的三层辩证思考：从个体内在的、伦理化的“圣女性”，到文化碰撞中经由解构而重生的“神父性”，最终抵达超越单一宗教、包容多元的“圣人性”。这一叙事演进不仅艺术地再现了远藤个人信仰的成熟轨迹，更在文学层面上为天主教日本化提供了一套由微观至宏观、由冲突至和解的完整实践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抽身，进而从整体上审视远藤文学为天主教在日本这一特殊文化土壤中所进行的“道德塑像”。

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几经波折，最早由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1549年来到日本进行传教，可随着幕府的建立，在德川将军的控制下，禁止葡萄牙船队入海，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天主教在日本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就日本自身的宗教传统来看，日本的主流宗教一直是日本本身的神道教与中国传去的禅宗佛教。日本属岛屿地形，狭窄悠长，夏季多雨多雾，在这样较为昏暗的天气中，日本人培养起了泛灵论，而神道教的深入人心更是在宗教上转变为了泛神论，即万物有灵、万物皆神。可天主教的唯一信仰与日本本土宗教形成了排斥效应，这也就是远藤在《沉默》中借助费雷拉神甫之口所说的“泥沼论”，日本本身的土壤便是一个泥沼，天主教在此无法扎根。

这种无法扎根的程度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幕府时代的控制被解除，但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打压和人民的无法信任，可以认为，日本直到如今所接受的天主教也是经过了“日本化”的天主教，这种“日本化”的源头便是日本人从根本思想观念上无法接受排他与独一无二神的天主教。

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是，日本许多著名作家都接受过教会的洗礼，诸如岛崎藤村、正宗白鸟、夏目漱石甚至是森鸥外等人，他们都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宗教思想，可这种天主宗教思想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立身之本，就如正宗白鸟仅仅因无法接受传教士的悲惨遭遇而退教，岛崎藤村只是将天主教作为一个写作的政治工具，在日本作家，甚至日本人看来，天主教的思想与他们本身的万物有灵论是背反的，信仰本身与文学也是极度冲突的。

远藤周作是作家中的异类，他的创作自始至终都在探讨天主教信仰与日本的关系，探讨人性内部的幽微的宗教思想的变化，探索天主教“日本化”的合理性，也就是为天主教在日本进行一次盛大的道德塑像。远藤周作在《我和基督教》中谈到：“我虽然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但是我的身份和作为一名日本人的感性始终在相互碰撞着。实际上，在行动上我始终作为一名异教徒、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人在行动^{[10]35}。”

天主教无法脱离“日本化”而存在，想让日本接受天主教，那就必须要用日本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全新塑像。这种塑像反映在《我》中是那个被称作“圣女”的无知无畏的森田蜜，反映在《沉默》中是最终践踏了基督圣像转变成日本人的葡萄牙神甫罗德里戈，具体反映在《深河》中则是以凡人身行基督事最终化身基督的大津。远藤周作建立起属于日本人自身的宗教观念，用这种宗教观念进行人物塑像，一方面反映出自己思想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宗教观的不断完善。可以认为，远藤周作本人所信仰的天主教，也是经过“日本化”了的天主教。在远藤的思想中，基督是可以践踏的，甚至是“为了给你们践踏而存在的”，人就算被污蔑被抛弃依旧要拯救人们的精神与灵魂，像森田蜜和大津一样，身死的那刻却是与信仰之神合二为一的征兆。这种思想导致远藤被自己很喜爱的教父批评甚至断绝来往，但远藤并不后悔。

日本宗教土壤的泛灵传统与天主教唯一神论存在本质冲突。远藤通过三部曲主人公的塑造，构建出渐进式的调和路径：森田蜜将神圣性世俗化，罗德里戈消解教权至上性，大津最终实现多元共融。这种“日本化”并非简单的本土适应，而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重构宗教伦理。他用文学作品替天主教在日本化的进程中推进了关键的几步，而他的观点符合日本国民的宗教思想与本身需要，作为宗教化身的森田蜜、罗德里戈与天津在抛开宗教视角之外也是经典的文学形象，塑造了符合日本人自身道德的宗教塑像，用宗教多元论解决了天主教与日本传统教派自古存在的二律背反问题。

总而言之，远藤周作通过作品的塑造与建构完善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同时为天主教“日本化”作出了文学意义上与哲学意义上的塑像构建，缓和了天主教的排他唯一神性与日本的万物有灵论，解决了其间的冲突，给予诸多读者们精神上的宗教慰藉与信仰和解。三部作品中的道德塑像共同指向远藤的终极关怀：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为丧失精神锚点的日本人提供信仰慰藉？通过将基督形象与日本“菩萨”气质融合，远藤创造出“可践踏之神”——神圣性不在于全知全能，而在于对人性弱点的包容。这种宗教观既突破传统天主教的排他性，又契合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美学，实现了文学与哲学的双重突破。

参考文献:

- [1] 川西政明. 昭和文学史下卷[M]. 东京: 講談社, 2001.
- [2] 远藤周作. 我·抛弃了的·女人[M]. 林水福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 [3] 史军. 文学与信仰——远藤周作的宗教观[J]. 日本文学研究, 2008(3), 76-80.
- [4] 远藤周作. 沉默[M]. 李盈春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23.
- [5] 虎岩正纯. 重層性の寓話—「スキャンダル」「深い河」論[J]. 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 1993(9).
- [6] 史军. 救赎与信仰——论远藤周作的《深深的河》[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3), 115-120.
- [7] 远藤周作. 深河[M]. 崔健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23.
- [8] 王志成. 简论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哲学[J]. 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3).
- [9] 王志成, 思竹. 宗教多元论与宗教对话[J]. 浙江学刊, 2002(4).
- [10] 永藤武. 文学と日本の感性[M]. 东京: ペリカン社, 1983.

(主编: 侯本塔 编辑: 吴宗译 校对: 金黛彤)

智能时代媒体人的算法焦虑与应对策略

章彤^{1*}, 王雪涵¹, 刘敬如¹

(¹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智能时代的算法焦虑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而有关职业媒体人的考察尚且较为欠缺。研究表明, 职业媒体人的算法焦虑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在生产环节,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形成侵蚀; 在分发环节, 精准传播对公共性产生消解; 在职业层面, 媒体人面临显著的合法性危机。其成因可归结为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流量至上逻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以及智能技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颠覆。针对这一问题, 应当从主流价值引领、算法设计更新与人机观念持正三个维度, 构建“人机协同”的发展路径。将算法焦虑的研究主体从用户延伸至媒体人, 能够有效拓展该议题的研究视野, 为媒体人在智能时代的职业转型与价值重塑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算法焦虑; 媒体人; 智能技术; 人机协同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89>

Algorithmic Anxiety Among Media Professional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nd Coping Strategies

Zhang Tong^{1*}, Wang Xuehan¹, Liu Jingru¹

(^{1*}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algorithmic anxiety among professional media practitioner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xamining its manifestations, caus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algorithmic anxiety primarily manifests as the eros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dissolution of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precis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process, and a legitimacy crisis 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 The caus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opacity of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the impact of traffic-first logic o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disruption of traditional work patterns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for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instream value guidance, algorithmic design updates, and maintaining a balanced perspective o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algorithmic anxiety from users to media professional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this issue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areer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orientation of media practitioner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Algorithmic anxiety; Media professional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引言

自当下, 生成式 AI 与算法技术的迭代已将新闻传播行业推入“算法社会”的深水区。一方面, AIGC、多模态大模型与实时数据流显著提升了新闻采集、生产与分发的效率; 另一方面,

作者简介: 章彤 (2002-), 女, 浙江杭州, 硕士, 研究方向: 智能传播、视听传播。

王雪涵 (2000-), 女, 黑龙江佳木斯, 硕士, 研究方向: 数字传播, 跨文化传播。

刘敬如 (2001-), 女, 安徽阜阳, 硕士, 研究方向: 网络传播, 智能传播。

通讯作者: 章彤, 通信邮箱: 1426715361@qq.com

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与流量至上逻辑也加剧了公共价值的稀释，进而引发了普遍的“算法焦虑”现象。

所谓算法焦虑，可理解为一种对算法不透明、可操控与替代潜能的持续认知-情感紧张。然而，经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多将算法焦虑的主体聚焦于终端用户，忽视了职业媒体人作为“算法共事者”所经历的深层心理震荡与专业实践挑战。当生成式 AI 与推荐算法深度耦合，新闻生产链条被重新切割——信息采集智能化、内容创作模板化、分发匹配精准化——传统新闻业的运作逻辑与职业权威正面临根本性质疑。

因此，本文将职业媒体人（指在新闻机构中直接参与内容策划、采集、写作、编辑、审核、分发等核心业务流程的专业从业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算法焦虑的表现纬度与影响因素，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拓展以往的研究视野，并为媒体人在智能媒介时代安身立命寻找新的确定性。

1. 追根溯源：算法焦虑的概念界定

何相较于两个更常见的概念：技术焦虑和信息焦虑，算法焦虑具有其独特性。技术焦虑是指人们面临新的媒介技术时产生的紧张、挫败和烦躁的心理情感，是针对某种特定技术的恐惧。信息焦虑关注的是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信息过载带来的负面情绪。而算法焦虑是针对算法所带来的整体影响和潜在后果的担忧，关注信息的整体生产与分发过程，主要源于算法技术的不正当使用。

算法焦虑这一概念在学界尚未形成清晰而统一的认识。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用户在与算法技术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忧虑等情绪反应甚至是回避行为^[1]。有学者通过批判性反思，总结出了用户在算法焦虑中的四种表现，即信息安全焦虑、信息质量焦虑、信息获得焦虑、信息沉迷焦虑^[2]。另有学者通过量化研究验证了隐私关注、感知侵扰、感知威胁和系统功能过载会引发用户的算法焦虑情感^[3]。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以用户为主体视角，并未将专业媒体人纳入研究视野。事实上，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既有的国内外研究大多都将算法焦虑的主体限定在用户，忽略了媒体人作为算法的主要接触者之一，更会产生深层的心理震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同为算法的接触者，职业媒体人与普通用户的算法焦虑存在本质差异。普通用户主要作为算法的“接受者”，其焦虑多源于算法对信息环境的塑造（如信息茧房、隐私泄露、内容操纵等）所带来的个体认知窄化、决策干扰及失控危机。而职业媒体人则扮演着算法的“协同者”或“操作者”角色，在算法主导的内容推荐、数据解析、以及受众精准定位等关键环节，媒体人不仅需要承受技术适应的紧迫感，更可能对算法的伦理维度、职业自主性受损、以及工作流程的颠覆性变革感到深刻的焦虑。这种“操作者焦虑”源于媒体人在专业实践中与算法系统进行的直接、频繁且具有权力张力的互动，其体验更深刻，影响更直接关乎职业存续。

算法焦虑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心理现象，其内涵随着技术迭代持续演进。本研究在整合“技术焦虑”和“信息焦虑”理论基础上，结合新闻传播领域的特定情境，将职业媒体人的算法焦虑定义为：在新闻内容生产、分发及职业实践过程中，媒体从业者因算法技术的深度介入而产生的对技术伦理困境、专业自主性减弱、职业价值危机的持续性担忧、抵触、无力感等负面心理状态及相关的回避或适应行为。

2. 抽丝剥茧：媒体人算法焦虑的表现与成因

2.1. 生产焦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

工具理性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韦伯。他以“合理性”（理性）概念作为出发点，把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的稳步增长，因此合理性在他的理论中起了核心作用^[4]。韦伯在谈到社会行为时提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指导标准，前者是实用与功利的代表，期望根据其对效率、效果的判断，选择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注重结果的意义；后者作为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意识代表，将手段作为自觉思考的对象，其目的被赋予了信奉的特殊意义，始终如一、有计划地以理想与价值为取向^[5]。当下，如何将算法应用于新闻业的生产实践活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二者的矛盾性。

眼球经济时代，媒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信息的点击量和关注度成为媒体追求的目标。在此情况下，算法成为了符合目的合理性的载体。在内容生产环节，它不仅能自动算出时下热点信息的内容、关键词、表述结构，甚至可以指导媒体如何创作出能成为热点的信息；在内容分发环节，算法设计者可以通过调整目标权重改变特定内容投送的概率，从而提高用户点击量。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许多商业媒体的应用场景中，算法设计远非绝对中立的技术过程，其程序逻辑往往深刻内嵌了提升用户参与度与粘性的商业目标。这种设计偏向，本质上反映了设计者及其所属组织的特定价值观念与结构性意识形态，使得算法成为一套承载并执行其商业策略的技术工具。

然而，当媒体过度依赖算法的工具理性，新闻内容的生产与分发便可能异化为追求权力和利润的手段，从而偏离了新闻应有的公共性原则。在商业利益驱动下，一些媒体为赚取流量，倾向于制作泛娱乐化的、庸俗猎奇的新闻，并在算法设计中加大此类内容的推送权重。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用户黏性，带来经济效益。但若长此以往，娱乐变得社会化，公众在被污染的信息环境中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陷入到“黄色新闻潮”的狂欢中，渐渐丧失否定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6]。

当媒体被算法逻辑蛊惑，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等人类信念，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中，传统新闻业所恪守的专业主义基石——如学者舒德森所强调的公共服务、客观性、透明性、自治性、专业伦理以及对独特专业技能的信奉——也会遭到严重侵蚀^[7]。算法驱动流量至上原则，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服务”的内核，侵蚀了编辑记者基于专业判断的自主性，并可能模糊甚至颠覆业已建立的专业伦理标准。在此情况下，传统媒体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坚守的新闻理想就被消解了。

因此，如何平衡算法逻辑下的“流量收割”与“价值内嵌”，是职业新闻人焦虑的源头之一。

2.2. 分发焦虑：个人日报与信息茧房的博弈

算法技术在优化信息分发流程、提升边缘内容可见度以及深入解析用户偏好方面，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效能。通过大数据的精细化分析，算法可以显著降低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实现信息传递的定制化。通过对每一位用户进行精确的数据处理，符合个人特征的信息流定制服务被成功塑造，最终使尼葛洛庞帝预言的精准化“个人日报”成为现实。

然而，精准传播也意味着信息偶遇机制的缺失。精准的算法投喂机制阻断拦截了多元化的信息流，为用户构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其结果便是学者桑斯坦所描述的“信息茧房”现象——一个体日益被同质化的信息所包围^[8]。更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这种个性化算法实质上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筛选器（正如帕里泽提出的“过滤气泡”概念所揭示的那样），它倾向于主动过滤掉与用户既有立场、观点相异的信息，从而形成一道信息过滤屏障^[7]。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算法塑造的“回音室”里，个体反复接触的仅是自身已有认可度的信息和意见。这不仅导致视野趋向单一和狭隘，更可能固化原有的认知框架，甚至强化对特定社会阶层的刻板印象与偏见^[8]。

对于媒体人而言，这种分发机制不仅加剧了社会认知的分裂，更意味着其生产的具有公共价值但可能不符合个体用户短期偏好的严肃新闻、调查报道、多元观点等内容，被算法系统性地边缘化，难以有效抵达目标受众，从而削弱了媒体履行“促进公共讨论”的核心社会功能。路透社新闻研究院《2024 Digital News Report》指出，全球28国受访编辑中，61%认为“算法推荐导致公共事务报道触达率下降”，其中中国编辑比例高达68%（N=312）¹。该报告直接印证了媒体人对于算法分发机制的普遍担忧。

综上所述，如何揭示当代信息传播秩序的内在矛盾，如何寻求更加公正、透明的传播机制，使算法分发机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催生媒体人的焦虑。

2.3. 职业焦虑：媒体人工作的合法性危机

诚如上文所言，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技术能够以高效率，精准化，多模态形式完成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媒体从业人员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相较于一般大众，更早地体验到了智能技

¹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Digital News Report 2024,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4)

术所带来的冲击。随着智能技术的介入,大量基础性、程序化的信息传播任务逐渐被自动化系统所替代。写作方面,美联社自2014年起使用Automated Insights的Wordsmith平台自动生成企业财报和体育赛事报道,数量达到每年数千篇;腾讯的Dream writer、新华社的“快笔小新”等国内AI写作工具也广泛用于财经、体育资讯的快速生成。主播方面,新华社的“AI合成主播”、央视网的小C、澎湃新闻的“小菲”等虚拟主播/主持人已投入新闻播报实践。虽然目前主要承担标准化播报和简单互动,但其逼真度和应用场景的扩展(如24小时不间断播报、多语种播报)引发了从业者对播音主持岗位未来需求的担忧。

那些仅依赖于信息搬运和简单堆砌的媒体,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面临淘汰。与此同时,新闻行业催生了新的职业角色,新闻生产流程经历了重构,创新的新闻产品得以产生,这些变革推动了内容生产领域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新闻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其职业行为所依循的合法边界正逐步瓦解,其作为“把关人”和专业信息阐释者的传统权威受到严峻挑战。2024年,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名为《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4》的战略样本报告,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314名数字领导者(包括总编、数字出版总监、新闻产品经理等)参加了这份工作。在调查中,只有一半(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未来一年的新闻业前景充满信心,大约四成(41%)的人不确定,十分之一(12%)的人表示不太自信。可见,这场由技术驱动的行业变革引发了媒体人在时代转折点上对职业前景的深刻忧思。

迈克尔·舒德森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部分源于其对社会事件的专业判断和基于规范的运作独立性^[9]。当算法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信息筛选、价值判断、甚至内容生成任务时,媒体人独有的专业判断空间被压缩,其运作独立性受到算法逻辑和平台规则的强力制约,导致专业媒体所秉持的传统新闻权威存在被进一步削弱。

媒体人面临的核心拷问是:如何在接纳创新型技术的同时维护职业生存空间?如何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坚守新闻专业性?如何平衡人与机器的角色关系?以上种种问题的核心都是媒体人在利用机器的同时,如何不被机器淘汰?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媒体人付出时间和代价。未来发展方向和前途的未知使得媒体人陷入恐慌与焦虑之中。

3. 纾困之路:媒体人算法焦虑的应对策略

3.1. 价值引领: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并重

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发展与价值理性的衰落所带来的问题被称为“韦伯难题”。如何实现二者的平衡?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认为,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是在社会系统中产生影响的。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要让它回到其合法范围内——用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用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10]。

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媒体、平台、政府、公众等多方主体应协同进行算法优化。第一,

在完成对算法的道德评估并综合考量多元社会利益诉求后,要求算法工程师将对道德准则的理解根植算法设计过程之中,通过“道德铭刻”实践,将公认的社会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融入算法核心。第二,风险评估体系也应纳入算法设计之中。在最小伤害原则的指导下,平台应对算法风险进行日常的实时监测与预防。第三,加强传统把关人对内容的鉴别与筛查,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稿件,通过人工复核的方式辅助算法实现新闻价值的回归。

另一方面,规制的泛化可能导致创新活力的衰退,进而抑制技术发展的潜力,因此相关部门在设计规制时不能“因噎废食”,同样需要为优质算法创新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技术人员开发更具社会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算法程序,也激励技术开发者在算法设计中追求高标准和伦理责任。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数字媒介时代,技术的规制与创新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合理的引导,才能在保护社会利益的同时,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促进算法技术的良性发展。

3.2. 设计更新:个性化推荐与信息多样性的平衡

算法设计师在进行程序设定时,需要着重考虑几对矛盾的平衡。偶然与必然,习惯与奇遇,悦耳与刺耳。除了迎合个体的阅读偏好,让用户处于自身“舒适圈”中,也需要提供一些惯性之外的信息,帮助用户打破信息茧房。

第一,建立多指标推荐系统。除了社交关系、浏览记录、内容热度等常规兴趣指标外,算法工程师可以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算法模型中加入用户评价反馈、内容专业品质、内容来源规范等质量指标,优化算法推荐权重配比^[11]。例如,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通过其“Discover Weekly”功能,每周为用户提供一份个性化的音乐推荐列表,而除了传统的兴趣指标外,如社交网络连接、浏览历史和内容受欢迎程度,Spotify 还考虑到了歌曲的情感属性、艺术家的背景信息等因素,进一步丰富了推荐的内容多样性。通过向用户呈现经过严密加权运算得出的结果,用户可以挖掘到更多有价值的、新颖的信息,接触更开阔广泛的世界,了解真实世界的多面性。

第二,优化频道栏目分管机制。对于平台软件顶部的栏目设置,除了根据地域、流行度、兴趣等划分的栏目,添加重点要闻、随机推荐、关注置顶等频道区域。例如今日头条在其首页设置了多个频道,包括但不限于时事新闻、科技资讯、生活小贴士等,并且会根据用户的阅读行为动态调整各频道的显示顺序,这不仅可以改善信息同质化、娱乐化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算法披露,增强了算法的可解释性,从而提高用户对算法的理解程度。

第三,加强用户自主选择功能。算法设计无法避免一定程度上的人工干预,与其代替用户做选择,不如尊重用户的主体性,将信息选择的权利交还给用户。平台和算法工程师可以设计弹窗或者相应板块让用户选择是否需要算法决策、对算法推荐内容有何不满及建议。通过用户的选择,平台应不断调整算法参数,以优化用户的阅读体验。

总而言之,算法设计师在设定程序时,应在在不同的矛盾关系中寻求动态平衡,以构建出一个既能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又能促进信息多样性和深度的推荐系统。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用户认知的多元化,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也为更广泛的社会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3. 观念持正: 人机协同而非机进人退

媒体人须明确,智能技术与人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是时代的座驾,然而能驾驭技术从而影响时代进程的,永远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

算法虽然具有拓展信息采集能力、自动化生产、洞察用户需求以及精准预测未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但也存在着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算法歧视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算法没有情感,没有办法像人类一般对思想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进行深刻的共情与理解。冰冷的数据搜集不能代替有温度的感官捕捉,客观准确的判断依据也不能代替主观鲜活的认识评价。在很多时候,饱含情感的人的观点才是一篇新闻作品中的灵韵,也只有人类才能提出真正符合社会历史环境的、富有洞见性和针对性的观点。

实际上,在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各个层面,人与机器都各有优势和局限。对人而言,机器是延伸自我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认知自我的一种手段。彭兰教授还提出:“人机协同的过程,是人与机器相互学习、相互增强的过程,其理想的结果,是人与机器的共同进化。但机器的进化,不应该以对人的核心价值与能力的削弱为代价”^[12]。

“提示工程师”的出现或许给新闻人的职业转型指明了方向。随着传播生态中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新闻业的传统边界正趋向于模糊。然而,这种边界的消融并不意味着新闻工作者职业价值的终结,反而对其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呼唤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回归^[13]。新形势下“提示工程师”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应运而生,能够凭借高质量的提示词帮助智能技术挖掘出意想不到的潜能,改写新闻业的游戏规则。

智能技术浪潮之下,媒体人应认清自己的独特优势,培育智能媒介素养,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坚守人文价值,在与机器的新关系中做出合适的角色调适或转换,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信息传播与社会服务。

4. 结语

生成式 AI 的指数级迭代已将媒体人推至“与算法共舞”的历史拐点。焦虑本身并非终点,而是专业主义重建的起点。面对这一由技术革新引发的信息传播新图景,新闻传播学者及从业者若仅停留于对“算法焦虑”的情绪性反应,无疑将错失主动把握未来传播格局的良机。只有主动

适应这场智能传播的新风暴，致力于探索算法技术与人文价值深度融合的路径，才能重新界定并拓展传播的新疆域，帮助我们在信息洪流中安身立命，寻得新的确定性。

参考文献：

- [1] 陈嫣然. 基于扎根理论的青年群体算法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24.
- [2] 付思琪. 基于用户体验的“算法焦虑”问题研究[J]. 中国报业, 2022, 537(08): 18-19.
- [3] 杨选辉, 严章宽. CAC 范式下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算法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情报, 2024, 44(02): 130-141.
- [4] 约翰逊 D P. 社会学论[M].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257.
- [5]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4-56.
- [6]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7] Pariser E.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 [8] 凯斯·R·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8.
- [9] Schudson, M.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J]. Journalism, 2001, 2(2), 149-170.
- [10]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78-84.
- [11] 赵双阁, 岳梦怡. 新闻的“量化转型”: 算法推荐对媒介伦理的挑战与应对[J]. 当代传播, 2018, (04): 52-56.
- [12] 彭兰. 智媒趋势下内容生产中的人机关系[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8(01): 31-40.
- [13] 喻国明, 李钊. 提示工程师: 未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转变与逻辑重构[J]. 未来传播, 2023, 30(04): 2-12+140.

(主编: 侯本塔 编辑: 黄芊 校对: 金黛彤)

站到词与词之间：论托卡尔丘克《云游》的媒介超越性

姜星宇^{1*}

(¹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省 南京市 210000)

摘要：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当代波兰文学界举足轻重，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也占据一席之地。《云游》作为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展现出托氏反思逻各斯中心主义、意图超越理性的语言媒介从而呈现新的文学书写方式的尝试。

《云游》用碎片化的叙事以达“站到词与词之间”之目的，从而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本文借用德勒兹、梅洛-庞蒂等人的理论，试图深探托氏反抗传统的理性秩序语言的方式。首先，旅行心理学即是碎片化思维的隐喻，抵抗线性连续的语言传统；其次，托氏在《云游》中用发生于思考之前的知觉与无器官身体抵达游牧的状态，越过理性语言媒介从而与世界建立直接的连结；最后，机场成为网络节点的现实实践，通过平面网络式的世界架构打破线性时间的单一性，从而超越当下线性与秩序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托卡尔丘克；《云游》；语言媒介；知觉现象学；德勒兹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64>

Standing Between Words: On the Media Transcendence of Olga Tokarczuk's Bieguni

Jiang Xingyu^{1*}

(¹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Olga Tokarczuk holds a pivotal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Polish literature and has also secured a significant place on the global literary stage. Bieguni, her second novel, demonstrates Tokarczuk's attempt to reflect upon logocentrism and to transcend the medium of rational language in order to explore new modes of literary writing. Through its fragmented narrative, Bieguni seeks to “stand between words,” thereby articulating what resists articulation.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Gilles Deleuze and Maurice Merleau-Ponty, this paper probes Tokarczuk's strategies of resisting the rational order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Firstly, the psychology of travel functions as a metaphor for fragmented thinking, countering the tradition of linear and continuous language. Secondly, Tokarczuk employs pre-reflective percep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orps sans organs” to reach a nomadic condition, thereby surpassing the mediation of rational language and establishing a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Finally, the airport emerges as a concrete site of networked nodes, whose rhizomatic structure disrupts the singularity of linear time, thus enabling a mode of thought that transcends linearity and order.

Keywords: Tokarczuk; Bieguni; Language Media;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Deleuze

引言：越过媒介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Olga Tokarczuk) 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1989 年发表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开始写作生涯。2018 年凭借《云游》(Bieguni) 获布克国际奖。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019 年授予)。《云游》是其 200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品面世之后，首先引起广泛讨论的即是其所谓“碎片化写作”，116 个看似不相关的片段构成整部文本，其中虚实相间，

笔法错综。每每谈起此作，坊间惯用“星丛小说”（constellation novels）的概念指代^[1]，意指文本自由组合的方式，让人耳边回响起本雅明的声音。高兴也评价托氏的作品“颇有点波西米亚之风……无拘无束、活力四射”^[2]。然而许志强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托卡尔丘克（以及贡布罗维奇、科塔萨尔）知道，为非常规的形式寻找理论合法性，不如坦陈恶作剧式的幽默更有趣一些”^[3-1]。其实在以碎片拼凑故事进行写作的道路上，托卡尔丘克并不是第一人，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等人的作品都有如此特质。许志强将此种文体追溯至18、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耶拿浪漫派和施莱格尔兄弟，所谓‘渐进的万象文学’和作为‘断片’（fragment）的理论表述形式或‘语录体散论’等等”^[3-2]。碎片化写作的概念和实践先以有之，而托卡尔丘克的碎片拼接也不仅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星群式自由组合。实际上，贯穿托卡尔丘克创作的理念是某种身体的经验、神话元素与技术的结合。因此，本文试图指出，托卡尔丘克的碎片化写作是一种文本呈现的态势，《云游》中展现出的不仅是碎片拼接的自由组合，其深层的意图是，为转述“无法以词语转述”的事物，必须“站在词与词之间”^[4-1]。

在《云游》中《维基百科》一章，托卡尔丘克如此讲述^[4-2]：

我们应该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知识积累，以便和百科全书里有的那些知识相抵相衡——那些知识的反面或内在线索，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场，所有无法被任何一种目录框住的事物，不能被任何一种搜索引擎处理的内容。因为这种内容广博无边，无法以语词转述——你必须站到词与词之间，立于想法与想法之间深不可测的深渊。每迈进一步，我们都会坠跌。

《云游》——或是延伸到托卡尔丘克的其他创作——的一个目的即是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托卡尔丘克毅然站在启蒙可知论的对面，认为世界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万物生灵之间同时具有形体姿态与形而上的相似性。世间存在“无法以语词转述”的物，无法以语词转述意味着不可被语言媒介化。想要言说不可言说之物，必须超越当下的语言媒介。本文将试图从文本内容与文本架构两个方面探看托卡尔丘克如何超越语言的媒介，完成讲述一种“无法以语词转述”、“无法被任何一种目录框住的事物”的构想。

首先，我们不得不来谈论语言。语言是否能够无限地进行表达？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5]，这正说明语言具有一种“言说”的边界，我们只能言说处于我们认知之内的事物。然而是否存在一种超越当下语言的造物或媒介，能够讲述我们认知之外的世界？虽然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但不代表在沉默的地方我们不能有“思”。德勒兹（Gilles Deleuze）用“褶子”的概念指代语言外部的“不可言说”之物^[6]：

笛卡尔认为，是各个部分之间事实上的不同导致了可分离性：能够定义绝对流体的正是凝聚性或粘附性的缺席，也就是说，是各个部分之间可分离性的缺席，这种分离性实际上也只适合抽象的和被动的物质。笛卡尔这个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我们还会在不同领域里看到类似错误。在莱布尼茨看来，物质的两个在事实上不同的部分有可能是不可分的……易弯曲或有弹性的物体也有着黏附的部分，这些部分形成了一个褶子，因此不能再分离为部分的部分，而是无穷尽地被划分成愈来愈小、但始终保持着一一定黏附性的褶子。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代表的正是一种启蒙理性的分类观，而德勒兹在莱布尼茨的论述中注意到物质之中不可分离的部分，他用“褶子”来命名黏着在物之中的、不可被理性分类的部分，这一部分也正是处于逻各斯之外的、我们无法言说的物。总而言之，“言说”立于逻各斯的内部，以逻各斯为中心，背靠启蒙理性精神用语言将万物媒介化；而“不可言说”则意指逻各斯之外的存在，我们或许能感知到，也或许不能感知，但一定无法用秩序的语言描述这样的存在。

传统的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指向一种启蒙理性的文本媒介传播方式，世界因逻各斯的存在而有序，但是否存在一个处于语言逻辑之外的、纯粹的外部，完全没有被语言规训的地界？过去不同的人都提出不同的逃离逻各斯的方法，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归乡、无蔽，抑或是德勒兹和伽塔利的游牧、逃逸，都代表一种逃离语言秩序的尝试。托卡尔丘克正是站在逃离逻各斯的视野上用思绪构筑出上百个碎片，然而碎片之间并不是随机地拼凑，而是有目的的连结，以抵达“站到词与词之间”的目的。

1. 流动之思：旅行心理学

《云游》的内容看似散漫，却存在两个主题：旅行心理学与人体解剖学。旅行心理学在文本中是叙述者在机场听到的现场演讲，旅行心理学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静止是一种理性的、分类的、科学语言的认识论，而旅行隐含的运动状态是一种无序，完全脱离熟知的世界，用细小的旅行装护肤品构筑起不可预知的明天，恰似现代性的流动。旅行需要游走，无论何种交通方式都包含移动，因此托卡尔丘克否认“大地”一词的古老哲学含义，直言“我是安泰俄斯对立面”^[2-3]，回到世界一体的混沌之中。在《云游》中，托卡尔丘克用人物的声音讲述“旅行心理学”：“前几个月，我在好几个机场碰到了一些学者，他们在喧闹的旅程途中、在登机广播和起飞通知的间隙办起了小型讲座。”^[4-4]人物的声音讲述的旅行心理学实际上正是作者认为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二者的根基相同，都是将逻各斯构建的秩序打破为不稳定的、流动的身体知觉。然而小说中的机场讲座最终还是流向了迂腐的学科旧制，托卡尔丘克转而书写一把坏掉的雨伞^[4-5]：

我没再往下听。讲座太长了。他们应该把教学内容打散，每次少讲一点。

我转而去观察一个男人，他穿得挺寒碜的，浑身上下都皱巴巴的，毫无疑问是在一场漫长的旅途中。他发现了一把伞被人丢掉了，当即检查起来。但一看就知道，那把伞坏了，没法用了。伞骨断了，无法撑起黑色伞面。但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男人开始一丝不苟地拆伞，把伞面从支架、伞骨尖上拆下来，费了好半天。他全神贯注地做这件事，在往来不息的旅人洪流中静守一隅。终于拆下来后，他把那块布叠成一个小方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继而消失在人流中。

于是，我也转身而去，走上了自己的旅途。

真正的旅行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到达新的地方，而是一种思维的拆解与重构，安静地在机场拆解雨伞的男人把像雨伞一样的思绪拆成碎片，零落地装进口袋。这隐喻一种思想的重构。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与海神波塞冬的孩子，只要安泰俄斯与大地相连就可以获得无尽的力量。然而托卡尔丘克说自己站在安泰俄斯的对立面，想要追寻的即是通过反抗由秩序与逻各斯组成的大地，通过流动性与碎片化达到对语言与思维的重构之目的，从而构建一种混沌的、节点式的思想网络。

2. 器官的游牧：身体与解剖学

《云游》的另一主题人体解剖学则是内在性与游牧的展现。在《云游》的故事中，无论是热衷收集畸形胎制作成标本的鲁谢女儿夏洛塔，抑或是受幻肢痛折磨为断肢写信的费尔海恩，还是肖邦的心脏，都昭示一种游牧的状态。德勒兹和伽塔利（Félix Guattari）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提出逃离语言的秩序，进入“无器官身体”（corps sans organes，缩写为CsO）的状态，不把身体看成是统一的主体，身体没有器官，以生命的流溢的量逃逸出去，以一种生成（becoming）进入混沌之中^[7]。在托卡尔丘克之处，生成之后接入的是标本、断肢、器官，人不再可以被理性统一起来，这展现一种“我”之主体与“我的肢体”之间的不一致性。在《云游》的认识论里，身体的感知成为与世界连结的直接体验，而不通过语言文字的媒介认识世界。作为媒介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语言与认知之间永恒地存在隔膜，托卡尔丘克的方式是绕过这一层隔膜，以身体的内在性（immanence）直接与世界相连。

在《云游》之中，托卡尔丘克讲述关于命名“幻肢痛”的解剖学家菲利普·费尔海恩的故事。费尔海恩因小腿受伤，而后伤口感染，不得不截去一条小腿。很久之后，人们发现费尔海恩为自己的断肢写了一封信^[4-6]：

我的腿已从身体上切除出去，漂浮在酒精中了，可我感觉到疼痛并且只能忍耐的时候，惊醒我的究竟是什么？……当我碰触以尸体存在的肢体，也就是伪装成腿的一小段被保存下来的骨肉时，我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感受到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从物理学的角度说，那只是个空的空间，里面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可能产生感知的东西。疼得要命的东西并不存在。有如幻影。幻肢痛。

对于费尔海恩而言,肢体已经从所谓“完整的身体”之上分离而出,他能感受到断肢的疼痛,这种痛不是来源于伤口的截面,而是来源于离开的小腿本身。然而原本具有腿的地方此时只剩下“空”,对于“空”感受到的疼痛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物”,横亘在语言媒介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就是说,此刻,“腿痛”的能指并不能对应上其所指,因为腿早已离开身体。语言媒介在此失去统摄力,身体的知觉成为更加直接的与世界的连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指出:“在那里,有一种未确定的视觉,一种说不清楚的视觉。”^[8]于是“知觉/感知”成为一种整体化的景象,是在思考之前就已开始进行的经验过程。笛卡尔的“我思”主体在此与纯粹的肉体分离开,“我思”被“我感”所替代,身体的知觉也替代语言的媒介成为感知并理解世界的新的方式。

无论是旅行心理学还是人体解剖学,都在讲述一种“无器官身体”的生成。所谓“无器官身体”,是一种欲望的呈现方式。全然地瓦解我们用理性与科学话语建构起来的对于身体的理解,认为身体是有秩序的这种认知。而将身体还原为一种混沌的、欲望的、知觉的对象。因此,传统的语言媒介再也不能表述这样的欲望,只有用身体作为与世界的直接连结才能达到“站到词与词之间”的讲述目的。

3. 集成网络空间: 机场共和国

在《云游》之中,很多个故事都发生在机场。机场是一个集成的网络空间。一方面,现代机场早已不是单纯的为飞机提供起落地点的场域,其中包含各种商店、景观、功能区。机场中有餐饮店、酒店、艺术展览,有花园步道、购物商店等等。“机场不仅仅是旅行中的交通枢纽,而是一种特殊类别的城邦:地理位置稳定不变,但城民在流动。机场都是‘机场共和国’,是全球机场联合国的成员。”^[4-7]机场的集成性逐渐使其自身发展成一个城市,而真正的城市成为机场的附庸。另一方面,飞机作为现代不可或缺的一种交通方式,必须依赖全球所有的机场合作,才能发挥其效用。

机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网络的架构,每一个节点的改变都会使得网络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这也是托卡尔丘克文本架构的一个特点:网络节点式的文本。想要“站到词与词之间”,就必须抛弃当下秩序的、线性的语言媒介与书写方式,托卡尔丘克的“碎片拼合”就是一种网络节点式语言的尝试。并不是一个词一个词的逻辑的推进,没有时间线与前进的历史性,而是处于四维空间之中的一个网络,时间在此成为一个平面,所有的讲述都同时发生,每一个碎片就是一个节点,任意一个节点的改变都会导致整部文本的改观。《云游》中的116个碎片不仅仅是星群式的随机自由组合,其更像一片用代码写成的蛛网,节点与节点之间联系,像神经网络一样错综复杂又如代码构成的世界一般牵一发而动全身。类似《云游》的写法在后现代小说中并不鲜见,毕竟在历经现代性之后我们认识到一切稳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然而重要的地方在于,托卡尔丘克的文本生成是块茎式的(德勒兹语)。逻各斯的秩序来源于规定计数为一,然而块茎的生长不是在“一”上构建的“多”,不是树木从根系到树干到枝叶的繁茂,而是一种衍生与联结,在地底下形成一个网络,只要条件适宜,块茎在何处都能生发。“块茎具有强烈的去等级和去中心性质,其理念就是要打破以往西方传统的二元分化与线性统一”^[9]。在块茎的生长方式里,“多”是先于“一”的。《云游》之中的片段并非毫无关联的随机排布,而是相互接壤组成一块不规则的网络,在这一层面上,逻各斯中心语言媒介的力量再次被削减。

《云游》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机场或飞机上。讲授“旅行心理学”的专家们是在机场展开的讲座;作者在飞机上听见两个男人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暗”;作者专门用一句话形成一个章节,描述飞机上的时间比现实的时间更慢。这些章节分布在整部小说不同的地方,构建起一片块茎式的网络,在每一个角落都有生长的可能。于是从文本架构上来看,机场也被摔碎成不同的碎片散落在整个文本中。事实上,身体、解剖、旅行等等的话题也都如机场一般,在整部文本之中构建起不同的网络。由此,在文本架构上,托卡尔丘克以这种碎片化的方式达到“站到词与词之间”的目的,用网络节点式的叙述模式超越当前的秩序语言媒介,呈现一种需要感知而不是需要阅读的文本状态。

4. 结语

《云游》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启蒙理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混沌一体的网络空间，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与粘滞性，不是所有存在都可以用启蒙理性的、可分类的、可言说的话语去理解。因此，托卡尔丘克利用《云游》的碎片化形式，首先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秩序语言媒介。各个碎片之间的间隙形成德勒兹所谓不可言说的“褶子”，无法用语言与逻辑对其进行理解。在打破传统语言媒介之后，就由身体的知觉建立与世界的直接连结，此时的知觉在思考之前就已获得意义。通过身体的游牧越过语言的媒介，从而也超越逻各斯的边界，体悟不可被语言转述的存有。最后，碎片化的文本架构建立起来的是一种集成网络空间，恰如当今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每一块碎片之间相互链接，休戚与共。所谓“站到词与词之间”即是不应只对文本内容做逻各斯主义的、理性的理解，而是要看到语言的空隙中那些不可言说之处，深挖文本架构呈现出的形态，与托卡尔丘克对于世界与自我的思考。由是观之，托氏的文学创作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碎片化”，其作品展现出的是一种新的思考与认知世界的方式。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这种去中心化、反逻各斯的世界观也为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李韶华, 肖锦龙. 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论《白天的房子, 夜晚的房子》的写作方式[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3): 180-188.
- [2] 高兴. 故事背后, 或者溢出的意义——浅谈托卡尔丘克[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0, (02): 5-14.
- [3] 许志强. 部分诗学与普通读者[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4]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云游[M]. 于是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 [5] [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6] [法]吉尔·德勒兹. 褶子: 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M]. 杨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7] [法]吉尔·德勒兹, [法]费利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8] [法]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宇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沈伟. 论库尔塔格三部作品的“引用”现象——基于德勒兹“块茎”理论分析与阐释[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4, (01): 139-152.

(主编: 侯本塔 编辑: 金恒宇 校对: 金黛彤)

基于平台算法视角的热词语义演变机制研究 ——以抖音热词“红温”为例

李可欣^{1*}

(¹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以抖音热词“红温”为案例, 基于巨量算数平台的“关键词综合指数”与“用户画像”等指标, 考察平台算法对语义演变的作用机制。该词的扩散呈“尖峰式突变”特征, 显著区别于传统 S 型采纳曲线; 算法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监控与“流量池”叠加推荐, 加速语义由特定术语向情绪隐喻再到符号化的演变。为揭示其中的语言机制, 用“语义折叠”来形象化描述语义在算法驱动下的缩减性意义演变, 即语义空间由多义向单一化表达收束, 从而展示了算法权力在语言层面的具体表征, 补充了创新扩散理论在平台语境中的适用边界, 并为媒介语言学与算法研究的融合提供了可检验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 平台算法; 网络热词; 抖音; 语义演变; 语义折叠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49>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Semantic Evolution of Buzz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Algorithms——A Case Study of the Douyin Buzzword 'Hongwen'

Li Kexin^{1*}

(¹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ouyin buzzword 'Hongwe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platform algorithms on semantic evolution based on indicator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Keyword Index' and 'user portraits' from the Juliang Data Platform. The diffusion of this buzzword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pike-like sudden chang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shaped adoption curve. By monitoring user behavior data and implementing superimposed recommendations in 'traffic pools', the algorithm acceler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buzzword's meaning—from a specific term to an emotional metaphor, and finally to a symbolic form.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linguistic mechanism, the concept of 'semantic folding' is used to vividly describe the reductive meaning evolution of semantics driven by algorithms. Specifically, this refers to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emantic space from polysemy to a single expression. This stud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algorithmic power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but also supplements the applicable boundary of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platforms, and provides a testable analytical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linguistics and algorithm research.

作者简介: 李可欣 (1993-), 陕西西安人,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语义学。

通讯作者: 李可欣, 通讯邮箱: shinfiriri@163.com。

Keywords: Platform algorithms; Buzzwords; Douyin; Semantic evolution; Semantic folding

引言

短视频以时长短、制作门槛低、视觉冲击力强为特征，已深度融入当代社会，并在中国青年网民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3亿，其中10.68亿使用短视频，占比93.1%^[1]。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之一，抖音依托算法推荐构建个性化内容分发模式，月活跃用户达10.01亿，位居国内同类应用前列^①。抖音平台的高频互动与曝光特性，使网络热词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关注并跨圈层传播。

网络热词的传播，并非只是社交互动的自然结果，而是由平台算法的推荐与分发机制深度介入并引导的传播过程^[2]。已有研究指出，算法能够通过用户画像、推荐逻辑和流量机制重塑信息可见性与话语流向^{[3][4]}。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网络热词的语言特征、语用功能与文化内涵^{[5][6]}，鲜有直接探讨算法在语言传播路径及语义演变中的作用。这一缺口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2024年在抖音平台迅速破圈的热词“红温”为案例，借助“关键词综合指数”和“用户画像”（即平台基于性别、年龄、地域、兴趣等维度所建构的受众数据模型）两类平台数据指标，聚焦以下核心问题：平台算法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热词的语义演变？算法的这一介入促使网络热词呈现出哪些区别于传统传播路径的新特征？为解释这一独特的演变过程，本文进一步提出“语义折叠（Semantic Folding）”概念，用以揭示算法权力在语言层面的表征，并为媒介语言学（Media Linguistics）这一交叉学科提供一个审视算法影响的实证视角。

1. 算法时代的语义演变与语义折叠

语言是反映社会变迁的灵敏指标，其意义的演变始终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语义演变，学界存在不同界定：有学者强调整个言语社会的长期扩散与规约化^[7]；也有学者将其区分为创新性意义演变（Innovative Meaning Change）与缩减性意义演变（Reductive Meaning Change）两种形式^{[8][9]}。本文在使用“语义演变”一词时，既考虑到新义的产生与扩散（创新性意义演变），也兼顾其在算法驱动下的收束趋势（缩减性意义演变）。其中提出的“语义折叠”，正是对后者在数字平台语境下的一种具象化描述。

在传统语境中，语义演变往往是一个相对缓慢、依赖人际传播和社会文化沉淀的自然过程。然而，数字媒介的崛起，尤其是平台算法的介入，正在重塑这一过程。理解算法时代的语言生态，首先需要审视经典传播理论在这一新媒介环境下面临的挑战与失效。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 1962）的创新扩散理论经典描绘了创新事物在社会系统中的人际传播路径，即渐进式的S型采纳曲线^[10-11]：108-109。该理论强调模仿与社会渗透的自发性，在解释传统语言变异的扩散上具备重要价值。然而，这一理论的根基在于其核心假设：传播动力源于去中心化的人际互动。当传播媒介转向以平台算法为核心时，这一假设便面临挑战。算法凭借其中心化的调控能力，通过“流量池叠加推荐”等机制，推动语言变体呈现“尖峰式突变”扩散。

这种传播动力的转变，其背后是算法在数字空间中的全新技术权力。喻国明等学者提出的算法权力理论，揭示了算法作为一种具备隐性规训与分配能力的权力结构，如何通过规制信息流向与分配用户注意力来重塑话语格局^[11]。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算法在信息分发层面的作用，对其在语义层面的具体机制探讨不足。换言之，仍缺乏一种能够刻画算法如何在语义内部“挑选、放大、压缩语义项”的解释框架。

为填补这一空白，并提供一个将宏观理论洞见落实到微观语言层面的分析工具，本研究提出“语义折叠”这一理论概念，用以刻画语义结构在算法机制推动下的演变路径：原本可以在多义语义空间中自由流动的语义，被逐步“折叠”为最易于流行的单一表达。通过这一概念，本文尝试将创新扩散理论中的传播路径、算法权力理论中的规训逻辑，与语言学对语义演变的关切结合起来，从而揭示数字平台如何参与塑造语义演变的过程。

2. 研究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2.1. 抖音平台算法机制简述

作为通过预设规则与数据模型实现自动化决策的数据处理系统，算法在抖音平台不仅承担内容分发的基础功能，更通过算法推荐机制重构了信息流动的逻辑框架^[12]。抖音的算法推荐机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种模式：

其一为基于用户信息的协同过滤模式。平台通过分析用户间的相似性及其历史行为数据，实现符合用户兴趣偏好的精准推送，从而增强用户的内容粘性与个性化体验。其二为“去中心化”的精准推送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传播不再依赖“大V”或权威账号的中心辐射，而依据内容质量与互动效果，使每位用户都可能成为传播链上的关键节点，亦使普通创作者的表达具有突破圈层的潜力。然而，这种内容生产上的“去中心化”，恰恰依赖于平台算法这一高度中心化的调控系统。其三为基于“流量池”的叠加推荐机制。平台根据内容的转发、评论、点赞等互动数据，对表现优异的视频进行递进推荐，形成逐级放大的裂变式传播效应^[13]。

在缺乏算法干预的环境中，一个新词的流行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人际传播过程，其传播范围和速度受限于固有的社交圈层和地理阻隔。然而，算法能够迅速识别并放大具有流行潜力的词汇，通过上述推荐模式将其精准推送到潜在兴趣用户面前，从而形成累积放大效应，使某些词汇在极短时间内实现爆发式热度^[14]。这种由算法主导的传播模式，使得网络热词的生成突破线下的社会互动或传统媒体的单向灌输，呈现出创新性意义演变。

2.2. 热词选取与语料来源

本文所探讨的“网络热词”（后文简称“热词”），特指在特定时期内，因其在网络空间中的高频使用而广为人知，并具备传播和显著演变特征的词汇。与“网络流行语”或“网络语言”等更广义的概念不同，本研究聚焦于这类具备爆发性、强时效性和语义可变性的词汇。

为探讨平台算法如何介入网络热词的生成与传播过程，本研究以抖音平台上的热词“红温”为分析对象，这一选择主要基于其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显著的语义迁移与语境迁移，具有代表性

与观察价值。“红温”一词原属游戏领域术语，意指游戏角色在释放技能后进入特定属性加强但无法主动释放技能（即“沉默”）的状态，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中已被广泛用于描述因紧张、焦虑、羞耻等情绪引发的失语状态，成为一种跨语境、跨圈层的语言表达。

数据来源方面，本文选用巨量引擎旗下的“巨量算数”平台作为主要数据采集渠道。该平台聚合字节跳动系多终端数据资源，能够提供抖音、今日头条等产品的关键词指数、用户画像等指标，并支持关联分析，较好反映关键词在抖音平台的流行轨迹与受众特征。研究数据采集时间段为2024年8月13日至2025年2月13日。

2.3. 数据指标定义

在具体的指标体系上，本文主要采用关键词综合指数与用户画像指标，以辅助描述网络热词的生成、扩散及受众重构。

关键词综合指数是衡量某一关键词在抖音平台整体热度的核心量化指标，由巨量算数平台依据热词指数模型计算得出。该指标通过综合考量包含该关键词的内容供给量、用户对含关键词内容的观看行为、用户对该关键词的搜索频率等要素，追踪该词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声量变化，为推断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介入轨迹提供量化基础。

用户画像指标则用于刻画关键词相关内容的主要受众特征。平台依据用户的浏览、点赞、评论等行为数据，结合其注册信息，统计使用该关键词的用户在地域分布、性别结构、年龄层次及兴趣偏好等维度的表现，并以占比与TGI指数（Target Group Index，目标群体指数）为主要评估标准。

TGI用于衡量目标群体对某一属性的偏好程度（相较于总体用户水平）：TGI>100表示目标

人群更偏好某一属性，<100 则相反。通过分析不同人群的 TGI 值，可揭示热词在不同圈层的渗透路径，进而推断其传播语境的迁移方向与语言使用场域的扩展趋势。

3. 平台算法对“红温”传播与创新性意义演变探析

3.1. 平台算法驱动下的传播节奏与语义演变路径

3.1.1. 热词传播的阶段性与平台推荐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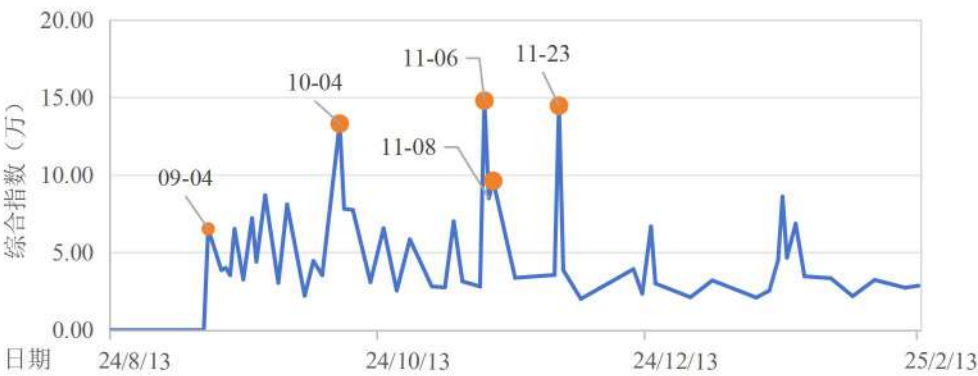


图 1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综合指数趋势图
(数据来源：巨量算数（2024-08-13—2025-02-13），作者整理，后同。)

表 1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综合指数传播阶段性特征		
阶段	时间点/段	特点
静默期	2024 年 9 月之前	综合指数接近于 0，尚未进入大众视野
初期爆发点	2024 年 9 月 3 日前后	综合指数首次呈现显著上升
持续活跃与波峰期	2024-10-04—2025-01-05	综合指数多次达到峰值，并关联热门内容/搜索
低位维持/衰退期	2025 年 1 月中旬至今	综合指数逐渐回落，并在较低水平上维持波动

观察 2024 年“红温”的关键词综合指数趋势图（即图 1）可见，该词的流行经历了由起源、爆发、推升至回落的多阶段演化（具体阶段划分详见表 1）。起初，该词处于较长的“静默期”，直到 2024 年 9 月初，出现首个显著上升节点（即 9 月 3 日前后的“初期爆发点”），标志着该词在平台数据层面的“激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节点在原始数据上没有代表“与突发热点关联”的红点互动标识，即该词的初期爆发并未与特定的突发事件或高热内容直接关联。事实上，早在 7 月至 8 月间，平台上已有多多个与“红温”相关的视频发布，如 8 月 14 日“补口红红温”视频、8 月 22 日“打游戏红温”视频等，这些视频在后期均累积了数十万乃至百万级的传播量。

这种平台热度与内容发布时间错位，结合百度指数同期数据②，呈现两点发现：其一，抖音和百度指数在数据统计口径及算法侧重上存在差异。抖音平台热词的生成并非单纯即时响应事件本身，而是与平台算法对用户搜索、评论、分享等多种行为的识别统计相关；而百度指数则更倾向于对资讯层面舆论的检测及统计。其二，内容传播存在“延迟效应”。这意味着某些内容在发布初期并未立即引爆全网，而是通过小范围传播，在数周甚至数月内持续获得互动，最终累积为百万级点赞。因此，巨量算数平台统计的波峰，可能反映的是这种延迟效应达到阈值或被算法大规模集中推送后的爆发点，而非内容发布的原始时间。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关键词的热度启动，反映的是用户互动密度在平台算法识别下达

到推荐门槛的结果，而不总是由突发热点直接引发。当用户开始在弹幕、评论区、视频标签中反复使用某一表达时，平台算法便可能将该表达的内容纳入“流量池”，并通过流量分发机制进行指数级扩散。这种“由下而上”的社群语用积累与“由上而下”的平台识别机制，共同构成了网络热词传播的起点逻辑。

此外，与经典创新扩散理论中的 S 型采纳曲线相比，网络热词的传播路径呈现出显著差异。根据罗杰斯（Rogers,1962）的阐述，创新在社群内部的自然传播通常表现为 S 型曲线，其增长过程前期缓慢积累，中期迅速增长，后期因可采纳成员减少而趋于饱和，动力主要来源于社群成员间的相互模仿和逐步渗透^[10-2]：108-109。然而，本文观测到的“红温”等网络热词传播路径却呈现出“尖峰式突变”，明显缺乏缓慢积累阶段。这种与传统模式显著相异的传播特征表明，平台算法的介入打破了传统扩散的自然节奏，重塑了网络热词的流行路径。

随后的 9 月至 11 月期间，综合指数曲线呈现多轮波峰，分别集中于 10 月 4 日、11 月 6 日、11 月 8 日、11 月 23 日等四个节点。为进一步解析“红温”传播中的关键节点，本文对抖音热度趋势图中四个主要波峰的核心内容特征、用户搜索行为及其背后的算法机制进行了整理（见表 2）。可见，这些波峰热度的来源各具特点：或源于高互动搞笑短视频，或见于明星相关的娱乐热搜，或由游戏主播及粉丝互动语境推动，或结合情感共鸣与大众好奇心。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可揭示平台算法在不同阶段对“红温”相关内容传播的多元影响。

表 2 “红温”词条语义阶段、语境与热度关联

波峰时间	热门内容	热门搜索词	热门内容点赞量	算法机制
2024-10-04	搞笑短视频，“作业写到红温”	牧童（游戏主播）红温图	220 万	跨圈层内容推荐： 算法识别“红温”在非游戏语境下的应用，并基于高互动率将其推荐给泛娱乐用户，促成词汇的语义泛化和跨领域传播。 用户画像匹配： 算法精准匹配对明星八卦、娱乐资讯感兴趣的用户，利用其加速传播； 放大情感化表达： 吸引追求情感刺激和共鸣的用户。 平台热点挖掘： 算法捕捉该词在社群内活跃度，并转化为搜索框热门推荐及热点内容； 垂直社群内部深耕： 算法识别特定粉丝群体，将相关互动内容精准推送至游戏垂直社区，巩固其在核心圈层的流行度。 语义泛化后的普适性推荐： 算法识别该词词义的进一步泛化，将其推荐给更广泛的用户群体； 好奇心驱动与知识科普： “红温是什么”等搜索词表明大众对该词的普遍好奇，算法据此推荐相关“科普”或语用场景视频，进一步扩大词汇的认知度和使用范围； 社会情绪共鸣放大： 算法通过识别视频内容中引发的情感，将其推送到有相似情绪需求的用户群体，形成大规模扩散
2024-11-06	明星采访，“整红温了”	吻戏甜到红温	28 万	
2024-11-08	游戏主播互动“被整红温了”	pigg 红温破防	40 万	
2024-11-23	情感类短视频，“阿姨红温了”	红温/红温是什么	119 万	

进入 2025 年 1 月后，热度曲线呈下降趋势，整体趋于稳定并波动于较低区间。这表明该词语已进入惯性使用阶段（即用户在特定语境中主动使用，无需算法大规模推动），虽热度下降但仍具语用生命力。这一过程，正是由于平台算法在早期流量倾斜与后期精准分发的双重作用下，成功地将“红温”从一个短暂的“热词”，固化为泛娱乐语境下一个稳定且具有情绪标签功能的网络表达。

3.1.2. 热词传播中的语义泛化

结合前文及表 2 可见，“红温”一词的语义在传播过程中，从其原始的游戏语境，逐步向更抽象的语义迁移、泛化，最终发展成可以指代任何强烈反应的单纯的网络热词（见表 3）。

表 3 2024 年“红温”词条抖音热度波峰驱动因素与语义演变阶段分析

阶段性语义 路径	主要语境	热度节点	主要推动力	语料例证
游戏术语用法	游戏技能描述	静默期	社群内小范围使用	兰博进入红温状态
游戏情绪隐喻 用法	游戏相关情绪 反应	10-04 波峰关联热门搜索； 11-08 波峰关联热门内容	用户共鸣、创作者内 容、算法初步推荐	主播心态爆炸，当场 红温
泛用情绪隐喻 用法	激动、窘迫等 情绪	11-06 波峰关联热门内容	用户高互动、算法标 签扩散推荐	这番变故把明星整红 温了
符号化 用法	娱乐化、幽默 化的语境	11-06 波峰关联热门搜索； 11-23 波峰关联热门内容	算法跨圈层推荐，捆 绑情绪标签	叔叔的关怀让阿姨红 温了；吻戏甜到红温

结合表 3 和波峰节点可见，“红温”一词的语义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从游戏术语到情绪隐喻，再到泛情绪符号和幽默化表达的演变路径。这一变化与热度数据中多次波峰密切相关，每一次高互动内容的爆发，都被平台算法捕捉并扩大推送，从而推动了词汇语义在用户群体中更广泛的复用和泛化。具体来说，用户在日常互动中自发拓展语义，创作者将新语义嵌入具有传播潜力的内容，而算法则基于互动数据精准识别这些用户拓展的语义与创作者嵌入的新语义，通过推荐机制促成其跨场景传播^[15]。由此可见，这一语义创新并非单纯由用户或创作者驱动，平台算法在加速、放大和引导语义泛化中发挥了中介和放大器的作用。

从本质上看，这种由算法主导的“对新语义的选择性强化”，正是本文所提出的“语义折叠”，而这一机制构成了热词语义泛化的核心驱动机制。

3.2. 用户画像分析与算法折叠逻辑

关键词综合指数反映了热词的宏观传播态势，而深入分析该热词相关的消费用户画像，则能进一步揭示算法是如何根据用户兴趣和群体特征，实现热词的精准分发和圈层渗透的。

3.2.1. 受众画像分层体现算法的精准分发策略

从用户人群画像分布来看，“红温”在抖音平台虽有广泛传播，但其受众在地域、年龄和性别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分层特征。这种分层格局可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平台算法在流量分发和精准推荐中主动引导、选择性推送的结果。结合用户画像数据，可分析算法如何通过分层推荐引导热词的传播路径。

表 4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相关消费用户画像省份分布排名表

排名	省份	分布占比	TGI 指数
1	广东	10.72%	117.00
2	江苏	7.41%	98.00
3	河南	6.99%	96.00
4	山东	6.78%	117.00
5	浙江	6.19%	107.00



图 2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相关消费用户画像城市级别分布图（资料来源：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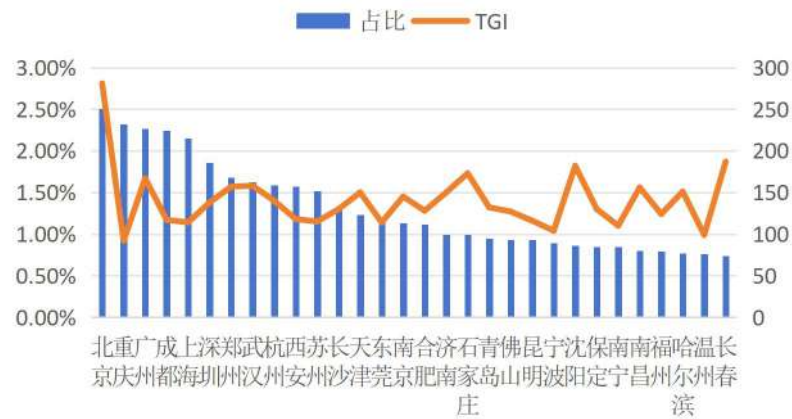


图 3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相关消费用户画像城市分布图（资料来源：同上）

在地域分布方面（参见表 4 及图 2、3），关键词“红温”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广东（占比 10.72%，TGI 117）与山东（占比 6.78%，TGI 117）等人口基数大、数字文化活跃的区域。从城市层级看，三线城市用户构成了传播的体量基础（占比 21.7%），新一线城市（占比 20.58%，TGI 119）承担了中层传播的主要通道，一线城市则凭借较高的 TGI（160）成为流量聚合与热度转化的高效节点。这种由低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向高线城市（一线、新一线城市）逐级渗透的扩散格局，暗示平台算法在热词分发中可能并非单纯按用户数量推荐，而是综合考虑用户密度、活跃度与社交影响力等指标进行流量分配。这一现象与平台算法“流量池叠加推荐”机制高度契合，即先在广泛人群中试探，再向高传播潜力用户群体集中推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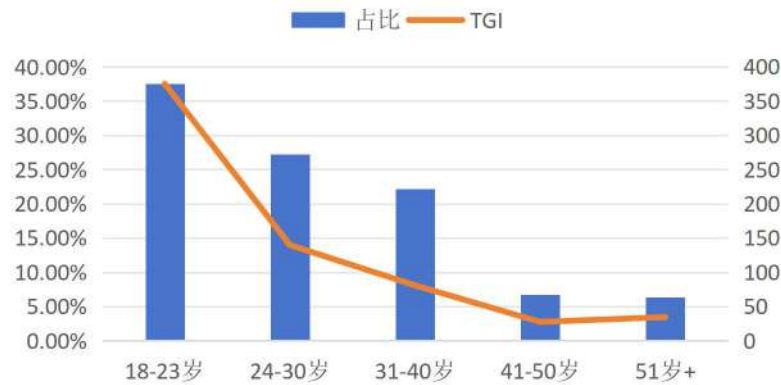


图 4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相关消费用户画像年龄分布图（资料来源：同上）

年龄维度的数据（图 4）显示，“红温”一词的高频使用者主要集中在 18-23 岁（TGI 374）与 24-30 岁（TGI 140）两个年龄段，呈现明显的年轻化分布特征。这一年龄结构并非完全出自用户自发偏好，而是在平台算法推荐逻辑中形成的双向作用结果：一方面，抖音用户基础本就年轻群体为主^③；另一方面，“红温”源自电竞游戏圈，具备较强的情绪表达力与语义延展性，因而在算法推荐中被快速捕捉并推送至互动频率高、情绪共鸣力强的年轻用户群体。这种匹配策略强化了热词在年轻群体中的语用固化和跨场景泛化。

相对而言，30 岁以上群体的 TGI 指数迅速下滑，反映出该词在中老年用户中的接受度较低。这种接受度差异也可能影响算法的推荐策略，即平台为了提升内容和用户匹配的效率，会减少向互动潜力较低群体的推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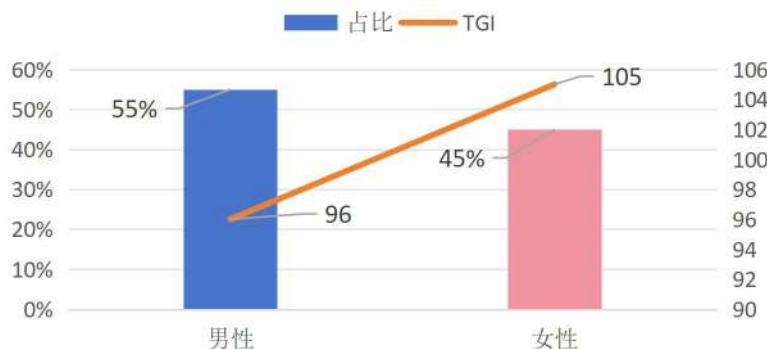


图5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相关消费用户画像性别分布图（资料来源：同上）

性别画像（见图5）呈现出值得注意的特征：尽管男性用户在总体占比上稍高，女性用户的TGI指数（105）却高于男性（96），表明“红温”一词在女性群体中表现出更高的兴趣集中度。考虑到该词最初源自男性用户占主导的电竞游戏圈，这一结果尤其值得关注。女性用户TGI高于男性的出乎意料表现，暗示了“红温”一词的流行已脱离其原始的男性主导的游戏社群语境，在向更具泛化性、社交性的情感表达演变。这与该词汇在抖音平台上经历的泛情绪化、符号化演变密切相关，正是这种表情达意上的软化与泛化，为其跨越最初的性别圈层壁垒、获得更广泛的女性受众基础创造了可能性。

此类高赞视频（例如“地铁上补口红被小孩哥夸红温了”），内容核心已并非最初的游戏机制讨论或失败情绪发泄，而是社交属性的情绪表达。女性用户对这类情感共鸣和趣味化内容的普遍偏好，使得相关视频获得了更高的互动。这与已有研究（例如Wang & Yokoi, 2021）的发现相符，即网民情绪与热词搜索量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情绪波动越大，热词搜索与传播越活跃^[16]。由此可见，平台算法正是捕捉并学习了这种高互动信号，它识别出将“红温”用于情绪化、幽默化语境的内容能够有效提升用户粘性和内容完播率，因此，算法将该类内容精准推送给具备相似偏好、尤其是对此类内容敏感的女性用户群体^[17]。这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女性）用户对情绪化内容的偏好→高互动→算法强化推送→更多用户接触并模仿这种用法→语义进一步向情绪方向演变。这种基于性别画像的精准推送，实际上在无形中引导并固化了“红温”作为一种情绪标签的语义传播，从而完成了其从电竞圈层到大众社交语境的语义折叠。

3.2.2. 从兴趣偏好看语义折叠的发生机制

将“红温”的消费用户画像（图6）与其实际语用场景（表3）对比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语义错位（Semantic Misalignment，即用户兴趣领域与热词语义源头、语用场景不匹配）现象。“红温”起源于游戏术语，后在传播中经历泛情绪化、符号化的语义扩展，相关热门内容多聚焦于情侣互动、日常窘态、情绪宣泄等轻松幽默语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互动用户的画像却高度集中于“时尚”“美食”“旅行”等生活类内容，而“游戏”类兴趣的TGI相对偏低。这种看似不对称的现象，实则反映出平台算法在构建用户画像和推荐内容时，并非优先依据词汇的语义源头或话题领域进行分类，而是依据用户的全平台行为轨迹、内容偏好与标签模型完成兴趣分发。简言之，热词内容“说什么”已变得次要，关键在于“谁更可能点开它”并产生互动。



图6 抖音平台关键词“红温”相关消费用户画像兴趣分布图（资料来源：同上）

在这一机制下，网络热词的扩散路径与语义开放性随之发生变化。本文提出“语义折叠”一词，指的是平台算法在构建热词语义模型时，优先依据用户互动数据和表层兴趣标签，而非热词的深层语用语境进行识别推送。这种机制虽未彻底抹除热词的多义性，却在分发过程中优先强化其中某些语用面向（如泛情绪化、幽默符号化），导致其语用重心偏移，传播路径趋于集中，这实际上是算法驱动下的一种缩减性意义演变。

以“红温”为例，它在平台传播中具备多重语用功能：既可作为游戏术语使用，也常被用户在情侣互动中使用，用以表达娇嗔、被逗乐或情绪爆发，在职场或日常吐槽场景中则承担某种反讽语气或幽默标签。然而，平台算法更关注其在评论区、标题、tag等高互动场景中所展现的情绪张力，从而优先将其分发至偏好时尚、美食、旅行等高互动兴趣标签的用户群体。此类内容因视觉刺激性强、情绪共鸣高，成为算法推荐的优选对象。

这一机制强化了“红温”的某一语用侧面，使用户对该词的认知更多依赖于所接触内容的语境暗示，而非原始语义结构。在实际传播与使用中，热词逐渐脱离多义语用空间，趋向简化为特定情绪反应的通用标签。平台基于用户画像的定向推送策略虽提升了内容匹配效率，却也在潜移默化中收束了热词的语义开放性，造成语义折叠、表达去个性化与语用空间的被动收窄。

4. 结语

抖音平台中“红温”一词的传播路径显示，平台算法已不再是单纯中立的内容分发中介，更成为深度介入网络热词创新性意义演变的重要外部变量。从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到借助用户画像与内容标签推动热词精准投放，再到通过“折叠”复杂语义实现传播效率的最大化，算法塑造着热词的创新性意义演变路径与传播边界。在此过程中，热词的语义趋于单一化、情绪化，传播路径则呈现出区别于传统S型采纳曲线的“尖峰式突变”特征。

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数字语境下的语义演变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也揭示了算法在语义生成与选择中的权力逻辑。本研究提出的“语义折叠”概念，用以刻画算法主导的排序与曝光机制如何选择性放大某一创新义项、抑制其他义项，从而使多义语义空间收束为单一表达；这一过程，接近于由多义向单义收束的缩减性意义演变。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填补现有研究在算法与语言关系方面的空白，其分析框架也具备一定的可推广性，为理解其他平台语境下的热词演变提供了参考。此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即提出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算法压缩语用空间、削弱语义多样性，使语言的社会功能在情绪化、标签化的快速循环中遭遇新的限制。然而，这种技术的力量并非万能。尽管算法加速了“红温”的扩散，但仍不足以推动其实现规约化。原因主要有三：“红温”语义模糊、依赖语境，难以形成稳定语义；其受众集中于低龄群体，缺乏跨社群传播基础；算法本身不具备创造力，语义创新的核心仍在发话人(Heine, Claudi & Hünemeyer, 1991^[18])。当前“红温”局限于娱乐与吐槽场景，尚未形成多功能用法，这限制了其向规约化语言单位的进一步发展。

未来研究需在更长时段、更丰富语料及多平台背景下追踪热词演变,兼顾用户时间与平台逻辑,方能理解语言在算法介入下的复杂动态,并反思这一过程如何重塑数字空间的话语生态。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2001)所言,在网络社会中意义的生成与传播已深度嵌入信息流动之中^[19]。由此观之,语言与数字技术互动不仅关乎语言本体的未来,更关乎数字时代意义建构模式的根本转变。

注释:

①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3 月,抖音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 10.01 亿,位居典型新媒体平台榜首。转引自快科技:抖音中国月活破 10 亿:平均每人每天刷 1.5 小时以上(网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0807201132766360&wfr=spider&for=pc>)。

② 百度指数显示“红温”搜索热度早在 8 月 23 日即有显著增长,且初期资讯多与电竞、明星话题相关。

③ 数据来自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转引自抖音用户数据分析(抖音用户偏好分析报告)-出海 club(网址:<https://www.chuhai-club.com/article/31923.html>)。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7-21) [2025-8-22].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 [2] 张志安,汤敏.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8,(10):174-182+2.
- [3] 常江,田浩.迷因理论视域下的短视频文化——基于抖音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写作,2018,(12):32-39.
- [4] ZHU H, WEI H, WEI J. Understanding User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ehaviors on Douyin, a Short Video Mobile Application in China[J].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2023, 83(20): 58225-58243.
- [5] 李铁锤.网络热词:一种亚文化传播的民意表达[J].当代传播,2015,(03):85-87.
- [6] ZHANG W, ZHANG X. Language Ecology in New Media: An Analysis of CCTV. com on Douy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22, 12(4): 1-1.
- [7] 吴福祥.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J].古汉语研究,2019,(04):2-10+103.
- [8] Blank A. Why do new meanings occur? A cognitive typology of the motivations[J].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1999 (13): 61.
- [9] Koch P. Meaning change and semantic shifts[J]. The lexical typology of semantic shifts, 2016, 58: 21-66.
- [10] ROGERS 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108-109.
- [11] 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J].编辑之友,2018,(05):5-12.
- [12] JIANG S.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Douyin[C] // Eliwise Academ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CIHCS 2022) (part6).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22: 231-237.
- [13] 赵辰玮,刘韬,都海虹.算法视域下抖音短视频平台视频推荐模式研究[J].出版广角,2019,(18):76-78.
- [14] LIANG H, YU H. Research on Hot Words Mining Algorithm of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C]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Proceedings of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Modelling, Simulation and Algorithms (MMSA2018).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Police Colleg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Economics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technology, 2018: 206-208.
- [15] LIU R.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Internet Hot Words[J]. Education Journal, 2023, 6(6): 61-69.
- [16] WANG F, YOKOI H.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Hot Words—Focu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etizens' Emotions and the Search Volume of Hot Words[J].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1, 4. 0(7.0).

[17] ZHANG L, LIAN Y, WU H, et al.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Information Cocoon in Recommender Systems[J]. 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5, (prepublish): 1-20.

[18] HEINE B, CLAUDI U, HÜNNEMEYER F.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9]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2nd ed., with a new pref.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0.

(主编：侯本塔 编辑：金恒宇 校对：金黛彤)

虚拟具身与数字交往：手游玩家主体性建构的具身传播研究——以《王者荣耀》为例

刘敬如^{1*}，王雪涵¹，章彤¹

(¹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游戏作为新兴媒介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且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可以自我延伸的虚拟空间，从而成为自我表达和完善的途径。文章以现象级手游《王者荣耀》为案例，采用具身传播理论的视角，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玩家如何在在线游戏中构建虚拟身体。研究发现，《王者荣耀》玩家的虚拟身体建构呈现出三阶段递进式演化逻辑：身份锚定—具身交互—虚实迁移，展现出数字时代身体观的深刻变革：虚拟身体并非现实的简单镜像，而是通过技术具身循环与玩家主体性持续互构。网络游戏作为新型媒介，正通过身体中介化机制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虚拟身体既是现实身体的延伸，也是技术规训的产物，其双向渗透效应导致“虚实交织的数字自我”逐渐形成。通过揭示虚拟身体的建构逻辑及其对现实主体性的影响，为传播学中关于身体问题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也为理解数字化交往中技术与身体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网络游戏；具身传播；线上交往；王者荣耀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11>

Virtual Embodiment and Digital Interaction: A Study on Embodied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bile Game Players' Subjectivity—Taking Honor of Kings as an Example

Liu Jingru^{1*}, Wang Xuehan¹, Zhang Tong¹

(¹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games, as emerging media,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ield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y provide players with a virtual space for self-extension, thus serving as a channel for self-express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aking Honor of Kings—a phenomenal mobile game—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use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analyze in depth how players construct virtual bodies in online gam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bodies by Honor of Kings players presents a three-stage progressive evolutionary logic: identity anchoring → embodied interaction → virtual-real migration, which reflect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作者简介：刘敬如（2001-），女，安徽阜阳，硕士，研究方向：网络传播，智能传播

王雪涵（2000-），女，黑龙江佳木斯，硕士，研究方向：数字传播，跨文化传播

章彤（2002-），女，浙江杭州，硕士，研究方向：智能传播、视听传播

通讯作者：刘敬如，通讯邮箱：2719639657@qq.com

concept of "body" in the digital age. Specifically, the virtual body is not a simple mirror of reality, but a product of continuous co-construction with players'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embodied cycle. As a new type of media, online games are reshaping human beings' way of existence through the body-mediated mechanism. The virtual body is both an extension of the real body and a 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 its two-way penetration effect has led to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virtual-real intertwined digital self". By revealing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virtual body and its impact on real-world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n the "bod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also offers a new interpretive pa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in digital interaction.

Keywords: Online games; Embodied communication; Online interaction; Honor of Kings

引言

艾斯本·阿瑟斯教授为《游戏研究》撰写创刊号的卷首语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将1969年称为互联网的元年，那么，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的历史比互联网还要长7年……为何没有人愿意研究游戏呢^[1]？游戏是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且不断发展的娱乐方式，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电子游戏依托电子设备运行，而网络游戏则是其与网络结合的产物。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技术进步，游戏作为大众媒介，不断延伸人类感知从现实向虚拟空间拓展，并持续影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游戏中的虚拟身体是玩家现实身体的映射，关乎身体存在的重要意义，但传播学领域中聚焦身体议题的研究仍相对稀缺，传统研究更多关注新闻、影视及广告等大众传媒形式。因此本文拟以当下火爆的移动端电子游戏——《王者荣耀》为例，借助具身传播理论，分析虚拟身体在游戏社交与互动中的建构机制及其特征，探讨玩家虚拟身体的主体性，从而揭示数字时代技术与身体的关系，丰富传播学中身体相关理论的研究。

1. 文献综述

“具身”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现象学，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对其做了系统性论述，集中体现为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这一概念。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主体”，赋予身体在存在论方面的地位，为具身性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直接的理论资源。但纵观整个传播研究史，身体问题在传播研究中几乎不受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识，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基本和身体无关^[2]。

具身传播就是将具身性引入传播与身体研究中产生的传播类型，指的是将身体作为支撑个体进行交往和传播的实体，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中介，沟通外部世界的主体性媒介。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具身传播真正被提上传播研究议程始于2018年，刘海龙指出传播研究应该重新反思身体问题的重要性，具身强调心智、身体及环境三者的一体化^[3]。

对于游戏的研究，国外学者起步较早，被誉为“游戏学之父”的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从游戏的定义、性质、观念、意义、功能及其与众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联进行论述，对游戏文化的研究起着开创性作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认为一切游戏都是人际交往的媒介，游戏可以作为社会上的一种交流媒介来满足人的各样需求。在游戏的虚拟交流中，玩家通过这一虚拟身体进行社会交往与角色互动，虚拟身体成为主要的实践主体^[4]。蓝江教授将随着电子游戏长大的那一类人群化为“游戏世代”，并且从虚拟身体的角度阐释了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游戏中的虚拟身体不仅仅只是操控的提线木偶，“而是以宁芙化的身体构建的感知经验也参与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自我感知和意识的建构”^[5]。近两年国内学界也在持续关注游戏与身体的关联。石磊等人提出电子竞技的体育属性源于其独特的“三重身体交互”结构，即现实身体、虚拟身体与集体身体的协同运作^[6]。高洋重新审视了游戏虚拟身体的具身性意涵，论证了玩家的虚拟身体并非简单的操控对象或替代符号，而是一种既受玩家意识主导、又能反向拓展和重塑玩家感知与主体性的技术-身体共生体^[7]。

综上，国内外有关网络游戏与身体问题的研究在朝着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对于网络游戏中有关虚拟身体的讨论也有了一定学术成果，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网络游戏身体问题，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或单向影响分析层面，缺乏对“玩家如何通过虚拟身体建构主体性，以及虚拟身体如何动态影响现实主体性”这一核心过程的剖析。尤其在具身传播视角下，虚拟身体不仅是玩家意识的投射载体，更是一种在技术环境、交互实践与文化语境中不断生成、调适与转化的能动性实体，而这正是本文试图突破的理论空白，以弥补当前传播学在游戏与身体问题研究中缺乏“动态的过程视角”的不足。

2.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王者荣耀》为研究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王者荣耀》拥有庞大的用户玩家，在国产手游界极富代表性，覆盖面较广；其次是《王者荣耀》背靠腾讯公司，可以通过 QQ、微信进行游戏登录，而目前这两大社交媒体又几乎人手一个，这样就可以将玩家已有的社交关系链接到游戏之中，有天然的网络在线社交优势；第三是在游戏本身的设计上，具备强大的在线社交功能，如游戏大厅组队、召集、局内语音文字交流等，为研究游戏玩家的虚拟社交行为提供了便利；四是《王者荣耀》的玩法是选择自己的英雄角色进入游戏，选择的英雄便成为了游戏虚拟空间中的玩家的虚拟身体，为本文研究玩家虚拟身体的建构提供了支持。

2.1. 深度访谈

本文采用目的抽样与深度访谈结合的研究方法，选择半结构式访谈，从身边玩《王者荣耀》两年以上老玩家入手，因为此类人群对游戏玩法、模式较为熟悉，且已经在游戏中有过在线社交的经验，比较符合本文的研究问题，通过滚雪球抽样选择 24 位玩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为了访谈的代表性，选择 12 名男生和 12 名女生，年龄和职业尽量选择覆盖面较广。访谈内容除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之外，主要了解他们的游戏过程和他们的游戏体验看法等，探讨玩家的社交过程及影响方面以及游戏对玩家的行为和生活方面的相关影响。为了保护隐私，故对访谈对象具体身份保密，代以游戏昵称，其本身也是玩家虚拟身体的一部分，代表的即是虚拟身体本身。且由于本次研究对象有些是游戏内添加的好友，故一部分的访谈是通过线上进行的，具体的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如下：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游戏信息

受访者	游戏 ID	性别	年龄	游戏时长	目前段位	游戏常用分路及英雄
P1	哥们真一般吧	女	22	7 年	至尊星耀	中路；小乔
P2	真不懂了奥	男	19	5 年	最强王者	打野：百里玄策
P3	本人不在	男	21	8 年	至尊星耀	打野：镜
P4	我都 OK 的	男	20	4 年	永恒钻石	对抗：亚连
P5	等会吃什么	女	18	5 年	至尊星耀	辅助：孙膑
P6	福星赐降语界	女	15	2 年	永恒钻石	中路：貂蝉
P7	比乙骨更沉迷	男	32	7 年	非凡王者	对抗：白起
P8	听雨铃音	女	24	5 年	永恒钻石	射手：虞姬
P9	叶梓	女	25	3 年	荣耀黄金	辅助：蔡文姬
P10	白云苍狗	男	27	6 年	最强王者	射手：李元芳
P11	殇雪花霜	男	19	5 年	至尊星耀	打野：孙悟空
P12	炸笨蛋喽	女	22	4 年	至尊星耀	中路：奕星
P13	软乎乎胖丁	女	22	5 年	无双王者	中路：扁鹊
P14	波波若若波	男	21	6 年	最强王者	对抗：孙策
P15	小狗才不笨呢	男	19	9 年	无双王者	射手：马可波罗
P16	何须誓言	男	28	8 年	永恒钻石	打野：凯
P17	冷似寒冰	男	17	4 年	至尊星耀	射手：公孙离
P18	等你刷把回响	女	20	5 年	永恒钻石	辅助：桑启
P19	依旧与你	女	27	7 年	至尊星耀	中路：甄姬

P20	Utopian_	女	24	8 年	荣耀黄金	中路：上官婉儿
P21	我来削你了	女	19	4 年	最强王者	中路：不知火舞
P22	哥们才不一般	男	20	7 年	无双王者	对抗：花木兰
P23	森林迷了鹿	女	23	5 年	最强王者	辅助：大乔
P24	小狗哪笨了	男	22	6 年	至尊星耀	对抗：李信

2.2. 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在抽样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引入参与式观察法以突破传统访谈的认知回溯局限，通过沉浸式田野观察捕捉玩家具身实践的动态生成过程。笔者以普通玩家身份在《王者荣耀》中进行了为期十二个月的沉浸式社交观察。整个研究周期内，笔者共参与超过 500 场 5v5 对局，累计观察时长超 400 小时。观察场域覆盖排位赛、匹配赛及战队赛等多元场景，重点关注玩家在团战配合、语音沟通、角色切换等关键节点中的具身化交互。这种“局内人”视角使本人能够捕捉到访谈难以触及的即时行为：例如玩家在遭遇五杀时的语音语调变化、塔下强杀后的表情符号使用频率，以及队友间通过“点赞”按钮建立的微妙社交契约。

笔者特别关注玩家在虚拟身体构建中的具身化实践。例如，在游戏对局中玩家选择英雄与皮肤时的行为模式及其在团队互动中的表达，试图揭示虚拟外观选择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以及其中的性别关联。此外，笔者记录了玩家在失败后通过甩锅行为重塑自我形象的策略，以及胜利时刻通过 MVP 动画强化虚拟身体荣耀感的仪式化过程。

通过这种兼具玩家身份的研究者视角，笔者得以在游戏情境中验证访谈对象的陈述真实性。例如，当一位女性玩家在访谈中声称“皮肤只是装饰”时，笔者在排位赛中观察到她连续三局更换不同风格的皮肤，且在获得 MVP 后优先展示带有蕾丝边装饰的虚拟形象。这种行为与言说的错位，恰恰为具身传播理论提供了鲜活的实证素材，也为理解数字化交往中身体的流动性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3. 虚拟身体的线上社交建构过程

3.1. 游戏前：虚拟身体的个人形象 ID 建构

3.1.1. 世界观建构：历史重构与未来想象的叙事融合

《王者荣耀》的游戏背景设定在未来，人类因滥用科技致使地球面临毁灭，于是，人类中的精英建造方舟，带着方舟的核心宇宙之心逃离地球，最终降临在荒芜的王者大陆。《王者荣耀》世界的各类背景框架就以此为核心进行创作。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但其中的很多游戏角色都是以我国古代历史人物和神话小说人物为原型设计的，许多皮肤也都以历史事实改编创作的。以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文化因素，完整搭建了属于《王者荣耀》的独有故事框架，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其游戏背景和故事框架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玩家虚拟身体的建构，会将玩家自身带入到王者峡谷的故事与羁绊当中，这些建构了玩家虚拟身体的身份背景，让虚拟身体有源可溯，同时也界定着虚拟身体的身份边界。

3.1.2. 数字名片塑造：游戏主页的自我呈现

游戏主页作为数字身体的“赛博名片”，借助头像矩阵、战绩看板和亲密关系链等可视化数据模块，构建了一套可供他者解读的符号身份体系。该界面遵循“数据身体”的建构逻辑，将玩家的操作痕迹转化为段位星数、英雄胜率等量化指标。正如现实中人们通过外貌和言谈形成初步印象，游戏主页也构成了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个人身份 ID 卡”，成为他人判断其虚拟身体形象的主要依据。主页较为完整地记录了玩家在游戏内的状态，承载了虚拟身体的代表性信息，陌生玩家可借此初步了解对方，并决定是否发起社交。

从游戏现实来看，很多玩家会选择观看其他游戏玩家的个人信息界面来结交朋友、成为游戏搭子进行组队开黑，访谈对象 Player1（ID：哥们真一般吧）就表示：我会通过看别人的主页来决定是否加好友，如果他头像是动漫男头，常用位置是澜和镜这种打野手法英雄的话，就说明他可能是个男野王，就会加好友让他带自己上分。玩家游戏界面就是玩家在虚拟世界的个人身份 ID

卡,是玩家虚拟身体的信息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游戏社交从虚拟转为现实,从游戏搭子转变为现实好友,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其所记录的符号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玩家在游戏世界的虚拟身体。

3.2 游戏中:虚拟身体的主体角色建构

3.1.3. 感官界面系统:视听模态的沉浸式身体嵌入

游戏声画的建构是游戏设计的核心所在,从视觉和听觉语言来看,游戏声画是建构游戏最主要的要素之一,能够最直观的呈现给玩家独特的游戏调性,从而吸引玩家进行游戏,而玩家的各种信息,包括头像、游戏战绩等都是以画面形式向其他玩家展示的,玩家以此来表达自我,呈现自我,再加上特有的游戏背景音乐加持,玩家的视觉、听觉全面投入于游戏中,自身感官嫁接于游戏设备,从而在虚拟游戏世界中建构自身虚拟身体。

在《王者荣耀》中,画面包括游戏主界面和游戏进行界面,主界面是玩家进入游戏世界的第一站,是玩家虚拟身体的主要活动地,在这里玩家可以进行游戏模式的选择、游戏装备的配备、英雄皮肤的购买以及聊天大厅的各种组队、交友等,是玩家进行虚拟身体建构的主要场所之一。该主界面就像迷你游戏世界中的小村落一样,玩家在此交往栖息生活,能够满足玩家在游戏中的一般虚拟要求,进而开启游戏人生。同时也是连接虚拟和现实的窗口,也就是线上交往的主要区域。

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单音音效到复合音效、从平面声源到立体环绕的更迭,如今“次时代”网络游戏的声音设计基本实现用 HRTF 分析声源数量与声源位置,更加有效的突出了声音设计在网游中的重要作用^[8]。在《王者荣耀》中游戏声音主要包括游戏背景音乐、英雄语音和各类音效三大类,从体验角度讲,它主要能让玩家仿佛置身于游戏世界中,增强沉浸感。所有的游戏声画要素共同建构了玩家虚拟身体的主要活动空间,带给玩家沉浸感和体验感,将玩家整体的融入于游戏的虚拟世界中,通过虚拟身体体验游戏世界的一切。

3.1.4. 游戏角色的建构:虚拟身体建构的载体

游戏角色即“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由玩家创建并控制的人物角色”,是玩家在游戏机器基础设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选择和定义的虚拟数字对象,也是玩家在游戏中自我呈现的重要方式之一^[9]。在玩家进行游戏时,所选择的英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自我,是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分身,承载着玩家在游戏世界的虚拟身体。此时的游戏玩家利用游戏中的英雄角色代替现实自我进行虚拟游戏与交流,玩家通过角色反馈来操作技术设备做出现实控制行为,进而开展游戏。

在《王者荣耀》中,游戏角色的多样性可供玩家自主选择进行游戏,其固有属性包括职业划分与游戏装扮,这些要素共同决定着玩家对于英雄的选择和使用,进而影响玩家现实。结合游戏现实情况和访谈结果来看,一般来说,男性玩家更倾向于选择打野、对抗等分路,更次的则是射手,但女性玩家则更偏爱于中辅的分路,尤其是选择一些建模好看、拥有华丽皮肤的女性英雄角色。访谈对象 P2 (ID: 真不懂了奥) 在问及为什么喜欢打野的时候说:因为打野发育起来能 carry 全场,但如果我选择辅助这些英雄,劣势情况下就很难翻盘。P5 (ID: 等会吃什么) 就表示:游戏输赢不是很重要,就喜欢玩一些美美的英雄角色,会花钱给她买皮肤、装扮,打的过程中享受、开心最重要。虚拟服饰使玩家在游戏中有了更多的自主装扮选择,玩家会将自己带入到英雄角色中,游戏装扮也成为玩家建构虚拟身体的一部分要素,侧面显示着玩家的现实需求与形象。在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中,游戏角色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它是玩家虚拟身体建构的载体,是玩家建构自我的极其重要的要素。因为大多数玩家都是具身在与游戏角色进行交流,玩家通过游戏身体将自我身体通过技术中介投射于游戏角色身体,将游戏角色身体视为自我虚拟的替身^[10]。

3.2. 游戏后:游戏社交的关系增殖与现实嵌入

游戏在营造亲社会情感(包括爱情、同情、钦佩和献身精神)方面,可以达到和现实世界一样的效果^[11]。因为《王者荣耀》本身依托于微信、QQ 两大社交平台,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社交群体,提供给了玩家交流、交往的社交空间,并且在游戏设置上将游戏和社交相结合,在一局游

戏结束后,设置了互相点赞和加游戏好友的方式与其他玩家建立联系,并且成为游戏搭子之后,还设置了绑定亲密关系,可以申请和好友绑定为兄弟、恋人、闺蜜、死党等关系,通过一起对局、送花等行为升级亲密关系,这样就使原来的弱连接逐渐升级为强连接,通过社交关系的绑定增强对游戏的依恋性。

并且《王者荣耀》提供给了玩家相当便利的游戏交流形式,传统的社交媒体交流主要以头像和ID进行交互,交流形式也仅限于文字和简易emoji小表情,但王者荣耀提供给玩家组队语音、全队语音等简单便捷的交流形式,玩家可以通过“开麦”与队友进行对局和团队配合上的交流,可以迅速拉近队友间的距离。并且这种社交形式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特征,玩家的每一次匹配排位,都会遇到和自己段位符合但不同的玩家进行对局,导致玩家可以有无数个机会结识陌生好友成为游戏搭子,这样玩家的虚拟社交便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由虚拟身体发展出的一整个社交网络,在通过不断的对局之后产生社交依恋进而发展成为线下的关系,虚拟身体的社交也从虚拟变成现实,影响着玩家的现实社交网络和生活。

《王者荣耀》为玩家营造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帮助玩家从时空、物理束缚中挣脱出来,建构出高灵活性和高流动性的社交关系网络^[12]。它给与玩家一个不同于现实空间的“第三空间”,使玩家能够在游戏世界中找到情感寄托,给予玩家更多的社交可能,是虚拟的精神世界,它是玩家和游戏设计者共同创造出的乌托邦世界。在此过程中,玩家身于虚拟身体,以此去了解、认知虚拟空间,进而与玩家本身合为一体,重塑自我。

4. 结语

《王者荣耀》玩家的虚拟身体建构呈现三阶递进式演化逻辑:身份锚定-具身交互-虚实迁移。在游戏前,玩家借助世界观叙事和界面符号系统实现虚拟身体的双重奠基:游戏背景融合历史与幻想,形成“文化基因库”,注入集体记忆;个人主页则通过数据化展示构建起“身份ID卡”,多数玩家通过英雄类型推断他人特质。在游戏中阶段,虚拟身体经由感官-技术耦合生成主体性:立体声画将生物知觉转为战术决策,英雄角色成为“可编程的身体面具”,如男性玩家多选对抗路或打野,体现性别规训的数字化迁移。最终在游戏后,虚拟身体转化为关系界面,多数强社交玩家通过战术协作建立共在感,将“游戏搭子”发展为线下社群。现实对话中“抓人”“开团”等术语的高频使用,表明虚拟经验已重构主体的认知框架。玩家通过在线游戏社交建构着虚拟身体,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在此过程中,玩家是“具身”参与到整个游戏中的,虚拟身体是玩家自身现实的延伸,在这个过程中玩家不断地与虚拟身体进行交流,逐渐完善自我的虚拟身体,但同时也受到虚拟身体的渲染,进而影响玩家现实。

这一过程揭示出数字时代身体观的深刻变革:虚拟身体并非现实的简单镜像,而是通过技术具身循环(操作反馈--认知调适--行为重塑)与玩家主体性持续互构。例如,操控英雄所形成的肌肉记忆构建了“数字身体图式”,购买皮肤则是通过视觉符号重塑虚拟身体的气质表达。这一具身实践带来双向渗透效应:玩家既投射现实身份于虚拟世界,也内化游戏身体经验,形成“虚实交织的数字自我”。研究进一步证实,网络游戏作为新型媒介,正通过身体中介化机制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当身体成为可编辑、可存储、可迁移的数字界面时,传播学研究必须重新审视“人-技-身”三元关系的理论范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三阶模型清晰勾勒出玩家身体建构的主线逻辑,但在真实游戏情境中,玩家的身体体验与身份认同过程常受到诸多非线性动态因素的显著扰动。例如,游戏内的突发事件——如队友突然退出、战局意外逆风、系统匹配机制的随机性,或关键团战的突发状况——不仅可能中断原有的身体沉浸与情感投入,更可能在瞬间激发玩家的应激策略和临场身体调适,从而打破三阶段的渐进逻辑,甚至触发身份感知的断裂、重构或多重跳跃。这些非线性情境深刻揭示了虚拟身体建构的流动性和脆弱性,未来需结合动态追踪与过程性方法,深入考察突发情境与常规阶段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对具身认同的持续影响。

当下,元宇宙成为网络游戏发展的新趋势,喻国明提出:游戏形态既是元宇宙运作的基本范式,也是元宇宙中社交互动的基本机制^[13]。与传统意义的拟态化不同,元宇宙中的拟态现实不仅仅是对现实环境的再现,它强调的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数字虚拟世界^[14]。而未来虚拟身体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数字化网络时代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可能会更加复杂,具体将会如何发展还需要未来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附录 访谈提纲

基本信息问题

- 1.姓名
- 2.年龄
- 3.游戏ID
- 4.游戏时长
- 5.目前段位
- 6.常用分路及英雄

二. 其他问题

- 1.你平时玩游戏多吗,一般选择什么时候玩
- 2.平时喜欢玩什么分路和英雄,为什么
- 3.你为什么会有现在的游戏ID和选择现在的头像,有什么小设计吗
- 4.你平时会看别人的ID和头像猜测对方的性格并且选择加游戏好友吗
- 5.你喜欢你的游戏好友玩什么分路及英雄
- 6.会在游戏中充值买皮肤和英雄角色吗,充值数额如何
- 7.你觉得王者里的游戏界面和音效怎么样,有没有提升游戏体验
- 8.你会精心装扮自己的游戏界面和主页吗,出于什么心理呢
- 9.在打游戏是会带入其中的游戏角色吗,你会觉得它是虚拟的自己吗
- 10.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性格,会对玩游戏有影响吗
- 11.在游戏中会认识结交游戏好友吗
- 12.平时通常是一个人玩游戏还是和朋友组队玩
- 13.喜欢和陌生游戏玩家一起玩游戏还是和熟人朋友一起,为什么
- 14.你会和游戏中认识的朋友进一步发展为线下的朋友或恋人吗
- 15.打游戏会影响你和朋友的关系吗,会因为打游戏而吵架吗
- 16.你觉得线上的游戏社交和线下的交往有什么不同吗,你更喜欢哪一种,为什么
- 17.你觉得线上的游戏社交对你平时影响大吗,是积极影响大还是消极影响大,为什么
- 18.你觉得《王者荣耀》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吗

参考文献:

- [1] AARSETH E. Computer Game Studies,Year One[J]. Game Studies, 2001, 1(1): 1-15.
- [2] 刘海龙. 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 国际新闻界, 2018(02): 37-46.
- [3] 刘海龙, 束开荣.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02): 80-89.
- [4] 孙雅然. “身体在场”的回归: 电子游戏中的身体实践探究[J]. 视听, 2022(04): 48-51.
- [5] 蓝江. 宁美化身体与异托邦: 电子游戏世代的存在哲学[J]. 文艺研究, 2021, (08): 92-102.
- [6] 石磊, 丁冉. 电子竞技文化的三重身体交互: 简论电子竞技的体育属性[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3(01): 86-92.
- [7] 高洋. 代理与幻/义肢: 再考“游戏身体”的具身性意涵[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5, (08): 51-62.
- [8] 惠阳, 张秦彬. 声音设计在网络游戏传播中的应用研究[J]. 新西部(理论版), 2016(11): 107-109.
- [9] 李彪, 高琳轩. 游戏角色会影响玩家真实社会角色认知吗? ——技术中介论视角下玩家与网络游戏角色互动关系研究[J]. 新闻记者, 2021(05): 67-82.
- [10] 祖锦. 网络游戏中玩家虚拟身体的建构与影响研究——以《王者荣耀》为例[D].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 2024
- [11] 简·麦戈尼格尔. 游戏改变世界: 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J]. 城市住宅, 2012(09): 91.

-
- [12] 龙美霖, 张博. 建构、脱离与转移: 基于场景理论的游戏玩家虚拟社交行为研究——以《王者荣耀》玩家为例[J]. 新媒体研究, 2023(14): 65-69.
- [13] 张洪忠, 斗维红, 任吴炯. 元宇宙: 具身传播的场景想象[J]. 新闻界, 2022(01): 76-84.
- [14] 陈小燕. 元宇宙与拟态现实下的身体认同焦虑研究[J]. 传媒观察, 2022(06): 29-35.

(主编: 编辑: 校对:)

晚清民国时期舟台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台湾日日新报》为中心

茅佳琦¹，李伟强^{2*}

(¹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00；舟山市史志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舟山市 316000；² 浙江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古文献研究中心，舟山市 316000)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舟山群岛因重要的战略位置与文化地位，在《台湾日日新报》中被反复聚焦。在《台湾日日新报》近半个世纪的报道中，既可见舟山群岛和台湾岛作为世界各国在东亚海域开展海权争夺的战略地位，同时呈现了台湾海峡两岸深刻的血脉联系。舟台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为侵略势力的影响而中断。

关键词：晚清民国；舟台两岸；交往交流交融；《台湾日日新报》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233>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Zhoushan and Taiwan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A Study Centered on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Mao Jiaqi¹, Li Weiqiang^{2*}

(¹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Zhoushan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Zhoushan, 316000; ²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ncient Marine Documents,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0)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the Zhoushan Islands were repeatedly highlighted in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due to their strategic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ver the nearly half-century of coverage by the newspaper, the Zhoushan Islands and Taiwan were portrayed as strategic focal points for global maritime 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n waters, while also revealing the profound familial and cultural 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Zhoushan and Taiwan persisted despite the influence of invasive forces.

Keywords: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Zhoushan and Taiwan;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我国台湾省，在台湾设立总督府，并创办各类报刊，利用报刊控制台湾省内各界人士的社会舆论，以强化对台湾省的殖民统治。《台湾日日新报》是日本割占台湾省时期，台湾省内发行量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报纸。近年来，学界对近代台湾省报刊的研究

基金项目：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近代普陀山游记数字化传承与活化利用研究”；2025 年度“普陀山文化与舟台文化交流”专项课题“近代台湾人往来普陀山笔记文献整理与两岸文化认同研究”。

作者简介：茅佳琦（2002-），男，浙江绍兴人，研究方向：明清史

李伟强（1993-），男，浙江嘉善人，研究方向：明清史

通讯作者：李伟强，通讯邮箱：liweiqiang1993@163.com

愈加重视,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刘璇《〈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所载谢汝铨译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考论》(《国际汉学》2024年第1期)、赵攀《〈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刊载小说研究(1905~1911)》(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忠纯《〈台湾日日新报〉的中国大陆报道——以张学良相关报道为中心(1924—1933)》(《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等。笔者爬梳《台湾日日新报》,发现在近半个世纪报道中,舟山群岛因重要的战略位置与文化地位,在该报中被反复聚焦,兹对该报反映的舟台两岸关系作出梳理,就教于方家。

一、台湾省沦陷背景下的新闻报道

台湾岛处于西太平洋航线的中心位置,控制着关键的海上交通路线,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防御屏障。1885年,为更好地治理并巩固台湾岛,清朝建立台湾省,管辖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周边附属岛屿。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次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周边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台湾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与中国大陆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台湾岛,遭到两岸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方档案也从侧面记载了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抗日斗争,如“林季成于六月二十三日归台,王秋煌于八日在水脚返与其会晤,王原为林之营官,归顺后背反往清国,去年十一月间派秋煌回台联络各匪首,而今林季成本人回来,卢阿野、李养、林火旺均有同谋之意”^[2]。

日本强占台湾岛后,在台湾岛设立总督府,以强化对台湾岛的统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妄图阻断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联系,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创办报刊。1896年,日人在我国台湾省创办《台湾新报》,次年创办《台湾日报》。1896年,日据台湾总督府总督儿玉源太郎支持日人守屋善兵卫合并《台湾新报》《台湾日报》,创办《台湾日日新报》^[1]。《台湾日日新报》创办后不久,因经费困厄,转由台湾总督府出资,该报遂成为日据台湾总督府的官方报纸。1944年,日本侵略势力陷入颓势,台湾岛物资匮乏,报社运行艰难,于该年3月与其他五家报社再次合并为《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退出历史舞台。《台湾日日新报》在创办期间,广揽中日学者、文人担任编辑,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台湾岛内发行量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报纸。

《台湾日日新报》创办于我国台湾省沦陷时期,其创刊目的是将日本殖民思想潜移默化地散播给台湾省人民。与日本殖民者企图相悖的是,该报的不少报道不仅体现了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抗日情绪,还反映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舟台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台湾日日新报》记载普陀山旅游

《台湾日日新报》记载许多台湾省人民前往舟山普陀山旅行。普陀山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化成为佛教名山,声名远播海外。如乔治·斯当东访华期间,对普陀山景色由衷赞美^[3]:

群岛之中有些引人入胜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普陀,被形容为人间天堂。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以后一些宗教信徒又去加以修饰。大约有3000个信徒在那里过着独身的生活。那里有400座庙宇,每座都附有住房和花园。和尚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寺庙的布施非常多。这个地方是全国闻名的胜地。

普陀山的宗教特殊地位及自然风光,持续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台湾日日新报》记载台湾省人民旅行普陀山,亦在此列。1907年8月11日,该报报道郑毓臣与普陀僧人子清上人进行诗文唱和,先为子清上人留诗于法雨寺,郑毓臣“丁未清和月,游普陀山,淹留法雨寺,于壁上读子清上人题句,写作俱佳,深以来得一见为憾。后得引缘大师为介绍,间谈半日,聊慰浮生。复承惠赠佳篇,铭感曷极,依韵奉和以志雪泥鸿爪,工拙弗计也”^[8-1]。郑毓臣诗作:“未得遗音继福台,分笺觅句愧粗才。折腰斗米陶元亮,何日高歌归去来”^[8-2]。诗中首联指沈光文,沈氏为浙江人,流寓台湾省,与郑毓臣身份呼应。该诗承载着台湾沦陷时期爱国诗人的精神共鸣。该诗刊登不久,《台湾日日新报》发布了一篇《江浙零闻》,其中介绍了普陀山,“浙省普陀山,绵亘以百方里计。寺观庙宇六七十所,僧侣以千计,其中无职业者多。遇有香客上山,托钵于途,口念阿弥陀,互求布施。凡礼佛来游之辈,每解囊相赠,相习成风,恬不知怪”^[5],在台湾省沦陷时期,加深了台湾省人民对普陀山的认识。1921年,《台湾日日新报》报道慎净和尚游历,据慎净和尚供文:“余偕闽僧达本老人一行四众云游大陆苏杭等处,既而栖泊上海。遇周学士与郑拱辰氏一行亦至申江,于东亚旅馆会晤,同参南海普陀。约一星期,余先下闽中,归台之后,

尚未晋谒，因题一律，以呈省园主人”^[6]。台湾省人民及僧众经普陀山了解大陆更多地方，加深了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台湾日日新报》报道的诗文中，普陀山被广泛提及。如《金魁星》小说，作者为台湾嘉义人白玉簪，笔名佩雁，该小说自1908年3月6日在《台湾日日新报》连载，至1910年1月16日停载^[7]，广受到读者喜爱，连载期间报纸十分畅销。小说第十二回和第五十二回两次提及普陀，一次以地名出现，一次记载普陀山高僧。

此外，普陀山还以戏剧形式呈现给台湾省人民。自1924年2月20日始，上海班上演戏剧《普陀山观音收十八罗汉》，倍受好评，“新舞台开演中之上海班，自二十一夜新排普陀山以来，各界人士，非常欢迎。初夜以天候晴霁，及早即已满座，停止再入，二十二夜重演又于七时过，已告满座，后至之人多以不得其门而入者为憾，为是同戏园监于一般人气，拟于二十四夜（礼拜日）再演，以酬会顾客之高谊云。日间观书走城，三本铁公鸡，天女散花古城会。夜间普陀山观音收十八罗汉”^[8]。该戏剧使更多台湾省人民和僧众慕名前往普陀山。普陀山僧众亦有不少前往台湾省，如“普陀山法雨古寺达圆方丈徒孙光佑禅师，及学静师自前月来，历游福建各地视察佛教，然后渡台，调查各寺佛教规例完毕。将于来十五日，搭外国船返国。稻市佛教信者许松革氏外数名，爰于去十三日午后七时，假王义兴商店为开饯别之宴云”^[9]。由此可见，舟台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台湾沦陷期间虽受到限制，但仍往来不绝。

三、《台湾日日新报》记载两岸军事及政治活动

舟山是中国与国外交际的重要窗口，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早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已到过舟山，随团的乔治·斯当东所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舟山有正面的记载：“这块地方的岛屿多，安全的停泊港也多，可以容纳任何大船。除了这点之外，这里还处在我国东海岸朝鲜、日本、琉球和台湾的中心地带，对于宁波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10]。在英国人看来，舟山是中国的东海门户，也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在此足可建立贸易基地、军事据点。因此，晚清民国时期，英、法、德、美等西方各国均对舟山充满觊觎之心。日本同样将侵华目光聚焦舟山，《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不少涉及舟山军事、政治类报道。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在1898年，虽只报道一件小事，即舟山架设海底电线^[11]，但仍可发觉日本对舟山的关注。

甲午战争后，日本争夺东亚海权日趋激烈。中国的海洋意识也逐渐觉醒，清朝计划振兴海军。日本对清朝的海军建设尤为关注，1907年6月，《台湾日日新报》就清朝海军基地选址问题作报道，清朝发觉舟山作为军港的潜质，认为“该地山峰屏蔽，流水回环，最适当于避风波。门户亦紧严，加以港内地势宽阔，水深而广，可收容多数船舶，虽二万吨以上之军舰亦于出入毫无阻碍。若建设砲台于山上，前后皆能相呼应。在中心砂碛一高地，面积约一千数百清里，可以建设造船厂、造兵厂、海军学校及海军诸官衙，实不易得之良军港也”^[12]。1908年，清朝建设北洋、南洋、粤洋三大舰队，舟山被选为南洋舰队的军港^[13]。日本持续关注清朝的海军建设进度，至1911年仍在报道清朝动向^[14]。遗憾的是，晚清舟山建设军港计划未付实施，清朝宣告覆灭。

台湾岛与舟山群岛的经度相近，且相隔不远。《台湾日日新报》曾作一篇报道，分析台湾岛与舟山群岛的地理形势，“台湾之在地球位置，于东经略等于扬子江口之舟山列岛，于北纬则近福州厦门。天气晴和之日，与琉球之与那国岛相望，在半热带寰”^[15-1]。台湾岛与舟山群岛位于中国东海，与日本隔海相望，日本以为该地战略地位对于日本尤其重要，“于外国则无甚切要，亦以我国之统治为便，而他国则鞭长莫及，统治当难。而台湾人之归我国，其较诸归他国，幸福实多。若溯台湾与我国之缘故，则不自近今始，而远自前明也。以台湾占形势之区，富饶之国，以我国之文明植民政政策统治之，其成效今已昭然人目，后此之更开发者，岂有限哉。盖台湾之文明，将与年俱新矣”^[15-2]。此见日本对我国台湾岛的公然觊觎。

民国时期，舟山仍然是列强侵略中国，互相争夺的重要口岸。1912年，日本高度关注美国租借舟山列岛的动向。早在1846年，英国决定退还舟山，与清朝订立《退还舟山条约》，规定“英军退还舟山后，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予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英国应为保护无虞”^[16]。民国政府在处理台湾沦陷问题时，尝试引入美国势力此牵制日、德等列强，美国则希望通过台湾岛实现其门户开放政策，与其他列强实现利益均沾，并占据舟山这一重要港口。1912年前后，民国政府与美国双方进行谈判，美国不惜以一亿为借款，试图租借舟山^[17]。该谈判最终未能达成，舟山始终受民国政府管辖，而日本则持续关注舟山。

台湾沦陷期间,日本殖民者通过报刊强化舆论宣传。1937年后,日本在我国台湾省掀起皇民化运动,实行废止中文政策^[18]。《台湾日日新报》所载关于舟山的军事、政治类报道,几乎全部用日语报道。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占领舟山嵎泗列岛,派出大量军事力量在附近活动。自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日军在舟山洋面活动达38次,出动舰艇百余艘(次),登陆12次(不包括侵占嵎泗列岛)^[19]。《台湾日日新报》持续报道日军在舟山附近的战事,自1939年至1943年,共报导15次,扫荡、剿灭等词反复出现报道。日军基本占领舟山后,《台湾日日新报》于6月25日发布一篇报道,称作“喜讯”^[21],借此向台湾省内人民宣传日军英勇战斗的形象。1941年1月20日,又发布了一篇报道,题目《舟山岛的扫荡战》,称“海军陆战队威风堂堂。陆战队活跃在大展庄附近”^[22],并随文附上日军的战斗照片,以营造日军侵略中国高歌猛进的现象。

面对日军侵略,中国人民进行顽强的反抗,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太平洋战争的进攻颓势,日军侵略舟山的力量也逐渐减弱。日军进攻舟山初期,兵力约800人,到1942至1943年,已减至500余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为应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的反攻,在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军事设施进行防御。1944年,日军逐渐恢复在舟山的兵力投入,至1945年7月间,已经约有千人^[23]。1944年,日本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反攻的影响,对台湾岛失去强力控制,台湾岛内物资匮乏,《台湾日日新报》也因资金匮乏,宣告停刊。

晚清民国以来,舟山群岛“东海门户”的战略地位被列强洞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清朝计划在舟山建设海军基地,舟山愈加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竞逐焦点。日本通过《台湾日日新报》,持续监视、报道舟山的情况,从揭露美国租借舟山的企图,到全面侵华期间鼓吹日军扫荡战、歼灭战的残酷暴行,其目的均在于巩固对我国台湾省的殖民统治。

四、结语

在《台湾日日新报》近半个世纪的报道中,既可见舟山群岛和台湾岛作为世界各国在东亚海域开展海权争夺的战略地位,同时呈现了台湾海峡两岸深刻的血脉联系。舟台两岸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为侵略势力的影响而中断。

参考文献:

- [1] 王天滨. 台湾报业史[M]. 台北: 亚太图书出版社, 2003: 39.
- [2] 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M]. 郭嘉雄, 主编. 台中: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1969: 299.
- [3] 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叶笃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87.
- [4] 丁未清和月游普陀山淹留法雨寺于壁上读[N]. 台湾日日新报, 1907-08-11.
- [5] 江浙零闻[N]. 台湾日日新报, 1907-09-03.
- [6] 余偕闽僧达本老人一行四众云游大陆苏杭等处, 既而栖泊上海. 遇周学士与郑拱辰氏一行亦至申江, 于东亚旅馆会晤, 同参南海普陀. 约一星期, 余先下闽中, 归台之后, 尚未晋谒, 因题一律, 以呈省园主人[N]. 台湾日日新报, 1921-05-15.
- [7] 李奎, 胡鑫荣. 稀见台湾章回小说《金魁星》考略[J]. 文学研究, 2018(4): 155, 157.
- [8] 新舞台之剧目[N]. 台湾日日新报, 1924-02-24.
- [9] 普陀山光佑禅师视察告毕来十五日回国[N]. 台湾日日新报, 1927-11-15.
- [10] 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叶笃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92.
- [11] 舟山岛的海底电线[N]. 台湾日日新报, 1898-02-24.
- [12] 清国海军根据地[N]. 台湾日日新报, 1907-06-29.
- [13] 海军再兴[N]. 台湾日日新报, 1908-06-10.
- [14] 清国海部实测军港案[N]. 台湾日日新报, 1911-09-24.
- [15] 台湾之形势[N]. 台湾日日新报, 1911-01-01.
- [16] 中外旧章大全: 第1分卷[M]. 陈幅培, 主编.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4: 198.

- [17] 美国议租舟山[N]. 台湾日日新报, 1912-11-30.
- [18] 吴兴文. 光复前台湾出版事业概况[J]. 出版号, 1997(52).
- [19] 舟山市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726.
- [20] 抗日战争在舟山[M]. 定海: 舟山市经纬文印中心, 1995: 134.
- [21] 舟山列岛占领[N]. 台湾日日新报, 1939-06-25.
- [22] 舟山岛的扫荡战[N]. 台湾日日新报, 1941-01-20.
- [23] 刘胜勇. 抗日战争在舟山[N]. 舟山日报, 2015-07-30.

(主编: 宋朝红 编辑: 王芳芳 校对: 金黛彤)

“时空结合”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张开^{1*}, 吴振华¹, 贺军亮¹

(¹ 邯郸市第五中学, 河北 邯郸 056002)

摘要: 本研究探讨“时空结合”理念在历史与地理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应用价值与实践路径。报告通过“以史释地”和“以地证史”的双向互释路径, 结合“时间轴+地图层”可视化、三维时空沙盘等工具, 构建了综合学习框架。研究以北宋汴京、茶马古道等五个典型案例为基础, 阐明了时空结合在促进学生对复杂历史地理现象的综合理解与高阶思维发展方面的有效性, 并提炼出“确认时空锚点”“选择时空外显”等关键教学原则。最后强调需依托 GIS 等技术工具并深化教学设计系统性反思。

关键词: 时空结合; 跨学科学习; 主题学习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09>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n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Zhang Kai^{1*}, Wu Zhenhua¹, He Junliang¹

(¹ No. 5 Middle School of Handan City, Handan 056002, Hebei,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n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rough the two-way interpretation paths of "interpreting geography through history" and "verifying history with geography", and combined with tools such as the visualization of "timeline + map layer" and 3D temporal-spatial sand tabl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learning framework. Based on five typical cases including Bianji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he study illu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n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henome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igher-order thinking. It also refines key teaching principles such as "identifying temporal-spatial anchor points" and "selecting temporal-spatial manifestations". Finally, the study emphasiz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echnical tools such as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deepen the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teaching design.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Thematic Learning

基金项目: 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一般资助课题《基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中学地理实践力培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03171)

作者简介: 张开 (1986-), 男, 河北邯郸, 学士, 中教一级,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

吴振华 (1980-), 男, 河北邯郸,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地理教育。

贺军亮 (1979-), 男, 河北石家庄,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地理教育。

通讯作者: 张开, 通讯邮箱: hbhdzk04@163.com

1. 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知识爆炸与问题复杂化的时代，单一学科知识难以应对现实挑战。跨学科主题学习（ITL）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历史与地理学科天然具有时空交织的属性：历史事件发生于特定空间，地理变迁烙印历史进程。因此，“时空结合”（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成为实现史地深度跨学科融合的核心纽带与有效切入点。《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也强调应围绕真实问题整合多学科^[1-1]。

然而，当前中小学史地教学中，“时空结合”或流于史实地名机械对应，或限于单维浅层分析，未能充分发挥其互释印证的育人价值。探索如何有效运用时空结合的理念、方法与工具，系统构建史地融合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模式，不仅是对国家课程改革的响应，更是培养学生时空综合素养、历史思维与地理实践力的迫切需求。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其理论价值、学科体现与实践路径，为一线教学提供框架与案例参考。

1.2.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目标

“时空结合”（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指在认知与教学实践中，将时间维度（历史变迁、时序进程）与空间维度（地理位置、空间分布与环境特征）有机融合的视角与方法。它强调时空的不可分割性，旨在通过分析空间在时间中的演变或历史在空间中的表征，揭示现象的本质与动态规律。“跨学科主题学习”（ITL）指围绕一个整合性的核心主题或真实问题，有目的地融合两门及以上学科的知识、方法及思维模式，引导学生开展综合性、探究性学习，以发展其高阶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及对复杂世界的整体认知。

本研究旨在：1. 论证“时空结合”在史地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核心价值，探究其构建教学路径、开发应用工具与形成学习框架的作用；2. 解读历史“时空观念”与地理“时空综合”素养的内涵自洽性与教学互补性；3. 基于典型性原则设计并分析教学案例，提炼设计原则与关键反思点，为一线教学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例。报告遵循“价值-体现-实践”逻辑主线：首先阐述时空结合对跨学科学习的整体价值；继而分析其在史地学科中的具体体现与协同需求；最后通过案例群深入展示应用策略与反思要点。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跨学科主题学习（ITL）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焦点。在史地融合领域，蓝勇等认同时空结合是核心纽带：历史地理学强调长时段人地互动对文明进程的塑造^[2-1]；而唐晓峰等指出时空思维是理解历史动态的关键^[3-1]。李并成关于丝路环境变迁的实证研究等成果，为本研究构建“工具-案例-反思”一体化模式提供了重要基础^[4-1]。技术层面，Staley 等指出 GIS 与可视化工具的应用潜力被广泛认可^[5-1]。但以上研究存在理论深化不足、工具实践薄弱、工具实践薄弱等问题，在中学教学中仍存在显著局限。

2. 时空结合对跨学科学习的核心价值

时空结合理念为史地跨学科主题学习（ITL）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抓手，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构建互释路径、赋能技术工具、整合学习框架三个层面。

2.1. 构建“双向互释”教学路径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一般资助课题《基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中学地理实践能力培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03171）

作者简介：张开（1986-），男，河北邯郸，学士，中教一级，研究方向：历史教育。

吴振华（1980-），男，河北邯郸，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地理教育。

贺军亮（1979-），男，河北石家庄，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地理教育。

通讯作者：张开，通讯邮箱：hbhdzk04@163.com

时空结合的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以史释地”与“以地证史”的双向认知路径：1.以史释地：赋予空间深度。历史视角揭示地理景观的动态成因与“历史厚度”。例如，茶马古道的遗迹唯有结合唐宋以来贸易需求、民族迁徙等复杂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其空间形态与功能的演变。2.以地证史：揭示环境约束。地理环境构成历史进程的“硬约束”。分析开伯尔山口作为南亚屡遭入侵的关键通道，必须理解其作为兴都库什山脉中少数低海拔、易攻难守隘口的地理特性，该特性深刻制约了雅利安人迁入及后续多次外族入侵的路径与结果。此路径超越了知识叠加，构建了解区域发展的综合性、解释性框架，印证了“离开空间的历史虚妄，离开历史的空间浅薄”的洞见。

2.2. 赋能技术工具开发与应用

时空结合的动态复杂性催生了对可视化与分析工具的迫切需求，这些工具本身即是跨学科学习的载体：1.“时间轴+地图层”双维联动：在 GIS 平台联动时间事件序列与空间分布/变迁图层。学生操作时间滑块，可直观观察汴京城市空间演变或开伯尔山口控制权更迭，将抽象的时空关系具象化，显著降低认知负荷，促进时空思维协同。2.三维时空沙盘模型：整合基础地形（DEM）、动态历史事件标记/演变动画、关键环境变量层。该模型模拟人地关系动态演进，如分析开伯尔山口地形剖面、希腊地形对城邦影响、或小冰期对丝路兴衰/气候对茶马古道的影响。3.比较分析矩阵：支持结构化跨时空对比。通过设定时间、空间、变量等多维度，清晰识别不同时空背景下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关联性与差异。

2.3. 整合四要素学习框架

依据《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时空结合理念能有效贯通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四要素^[1-2]：1.情境与问题：天然指向基于特定时空场域的真实问题，问题本身蕴含时空维度。2.知识与能力：整合史地核心知识与关键能力。3.实践与体验：强调运用时空工具进行模拟分析，实现动手动脑的深度探究。4.评价与反思：评价指标侧重时空关联性理解深度、工具运用能力及长时段人地互动认识；反思聚焦时空本质的深化。时空结合为四要素的有机整合提供了内在逻辑与具体抓手，显著提升了跨学科学习框架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

3. 时空观念在史地学科中的体现

历史与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均高度强调时空观念，两者在内涵上具有深刻的自治性与互补性，构成跨学科融合的坚实基础。

3.1. 学理基础：内涵自治与课标支撑

1.时空三维度协同：时序思维（历史侧重）：理解事件序列、变化速率与分期。空间定位（地理侧重）：识别位置、分布、格局与区域联系。时空综合（共同目标）：分析空间在时间中的演变或历史在空间中的表征，揭示现象动态性与复杂性（如汴京空间演变是历代累积的结果）。

2.学科素养协同：地理的“地理实践力”（空间认知）是理解历史“舞台”的基础（如爱琴海格局之于希腊城邦）。历史的“时空观念”（时序思维）为地理空间赋予演化“深度”与成因（如理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需追溯历史开垦）。

3.课标高度一致：历史课标要求将史事置于具体时空、把握时空联系、理解变化/延续/多样/整体，并强调在现实认知中考察时空条件（指向“以史释地”）^[6]。地理课标的“综合思维”包含“时空综合”维度，要求分析地理事象的时空格局、过程、机制及趋势预测，并强调 GIS 等工具运用^[7]。两份课标在强调时空不可分割性、动态性、联系性和工具运用上高度一致，为基于时空融合的跨学科学习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与学理基础。

3.2. 教学需求：时空维度的双向互补

教学实践凸显史地学科对彼此时空维度的内在需求：

1.历史教学需空间依托：缺乏空间背景易使历史教学“悬空”。理解希波战争需温泉关地形分析，罗马兴衰需地中海格局考量，宋朝困境需结合燕云十六州地理价值。地理空间提供历史事件的“舞台”和“约束条件”。

2.地理教学需时间维度：脱离时间序列易使地理教学流于“静态”。解读长三角城市群需明

清商贸、近代开埠、改革开放等历史背景支撑,认识全球变暖需置于地球气候长周期中考量。历史时间序列提供地理现象演化的“剧本”和“动力机制”。

这种双向需求深刻表明,时空结合是史地学科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各自教学深度与吸引力的有效途径。

4. 时空观念之教学实践上的案例

本章依据前述原则与框架,结合具体案例,展示“时空结合”在史地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实际应用。

4.1. 案例设计原则

为确保案例的示范性与可推广性,设计遵循以下核心原则:

- 1.典型性: 聚焦蕴含重要学科概念且具显著时空演变特征的内容,如漕运线路变迁(政治、技术、自然互动)、长城功能演化(防御→融合)、丝绸之路重心转移(朝代、技术、环境驱动)。
- 2.可行性: 紧扣国家课程标准对历史时期(如汉唐)与地理区域(如西北)的要求,并善用校本地域资源(如邯郸学校可深挖赵王城/邺城遗迹的时空背景)。
- 3.动态性: 选择能清晰呈现人地关系动态调整的案例,如马六甲海峡贸易重心随航海技术(帆船→轮船)的转移、气候变迁(如小冰期)对茶马古道线路/贸易方式的影响。
- 4.比较性: 通过相似地理背景下不同文明发展路径的对比(如希腊海洋破碎地形 vs 印度大陆封闭地形→城邦林立 vs 帝国更迭),凸显时空互动的多样性规律。

4.2. 案例具体设计

以下选取五个典型案例展示设计思路(篇幅所限,每个案例仅概述核心设计):

案例 1: 北宋汴京城市空间与商业地理

时空背景: 北宋汴京(960-1127 年)的繁华都市格局(城墙体系、御街、瓦解的里坊)与商业分布(沿汴河密布的“市”),是政治、经济、技术及自然地理(黄河平原,汴河穿城)多重时空因素作用的产物。

跨学科实践设计:

- 1.古今叠加可视化: 利用 GIS 将《清明上河图》关键场景(虹桥、城门、店铺、河道)地理配准,叠加于开封卫星影像/宋城复原图,直观呈现古今空间变迁过程与历史层积,突显汴河作为漕运命脉对商业的核心支撑作用。
- 2.模拟商路规划: 设计任务: 作为汴京商行老板,需规划江南货物(粮/瓷)运输路线。学生基于 GIS 平台分析提供的地形图(平原利于陆运?成本?)、水系图(汴河是核心但易淤?)、道路网及气候数据,模拟最优路径决策,深度理解地理环境(尤其是水系)对商业格局的空间约束与塑造力。此任务整合史地知识与空间问题解决能力。

案例 2: 茶马古道的历史地理透视

时空背景: 茶马古道(唐宋起源,明清兴盛)是连接西南、青藏乃至南亚/东南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其线路与兴衰受制于复杂地形、气候、民族、政策及环境变迁(如明清小冰期)等时空因素交织作用。

跨学科实践设计:

- 1.气候变迁影响论证: 整合历史气候重建曲线图(冰芯/树轮数据)与 GIS 中的古道关键点地形/海拔图层(如康定、昌都),结合史料(雪灾记载),引导学生分析论证小冰期气候变冷/降水增多如何显著提升高海拔险峻路段的通行风险,进而驱动线路迁移、运量波动或运输方式调整(如牦牛驮运增加),直观量化环境变量对长时段人地互动的制约。
- 2.贸易网络时空演化: 利用 GIS 空间分析工具,基于不同时期(唐、宋、明、清)驿站/集镇/贸易点位置数据,生成时空密度图(如核密度热力图)。通过叠加对比各时期密度图层,清晰可视化贸易网络的空间重心转移(如滇藏线→川藏线?)及密度变化区域,并结合背景分析成因(政治、市场、战争),动态呈现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规律。

案例 3: 北部山口(开伯尔山口)与印度文明演进

时空背景: 开伯尔山口作为兴都库什山脉中连接中亚与南亚(印度河平原)的核心陆路通道,

贯穿了南亚次大陆从雅利安人迁入（约前 1500 年）到近代的重大征服历史（波斯、亚历山大、贵霜、阿拉伯、蒙古、英国），深刻塑造了印度文明的多元性与历史进程。

跨学科实践设计：

1. 动态地图展示控制权更迭：利用 GIS 时序功能，动态展示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 500 年间山口周边政治势力范围变化，直观揭示其作为“南亚门户”的枢纽地位与脆弱性。

2. 地形剖面分析与“地理锚点”：基于详细 DEM 数据进行三维地形剖面分析，论证其关键地理特性（长度、谷底平坦、低隘口海拔）导致的“易攻难守”本质。结合历史战例，确证其作为塑造南亚历史关键“转折点”的地理锚点（如决定入侵路径与防御可能）。

3. 商队路线时空决策模拟：设置贵霜帝国时期商队任务（巴克特里亚→旁遮普），学生需综合分析地形（山口选择？）、气候（季风/降水风险）与安全因素（劫掠区），规划最优时空路线，体验古人对该通道的利用逻辑与挑战。

案例 4：希腊地理环境与城邦文明

时空背景：爱琴海岛屿星罗棋布与伯罗奔尼撒多山地形（高海岸线破碎度），塑造了古希腊“破碎性”空间格局，深刻影响其发展：催生独立城邦（Polis）、航海贸易/殖民扩张及海洋文明特质，并因资源禀赋差异（如雅典贫瘠 vs 斯巴达肥沃）导致制度分化（民主制 vs 军国制）。

跨学科实践设计：

1. 资源约束因果链可视化：在 GIS 平台叠加城邦位置、可耕地范围（坡度/土壤图层）、港口、矿产（如劳里昂银矿），直观揭示雅典（贫瘠→依赖海港/银矿）与斯巴达（平原广阔→农业/陆军）的地理资源差异如何驱动经济基础并最终塑造迥异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

2. 制度比较矩阵：基于 GIS 分析结果，利用矩阵结构化对比雅典（海港型）与斯巴达（平原型）的核心地理要素（海岸通达性、可耕地）、经济活动（贸易 vs 农业）、政体（民主 vs 寡头）及军事（海军 vs 陆军），深化理解地理空间作为“长时段变量”对制度选择的潜在规定性^[8]。

3. 季风贸易路线模拟：提供地中海风向/洋流图，学生规划雅典至亚历山大港/黑海的理想季风航线，需综合季节（避冬季风暴）、风向（夏季北风）、洋流、港口补给及风险区，体验地理环境（风/海）对贸易网络的时空约束与机遇。

案例 5：丝绸之路的时空演变

时空背景：丝绸之路是动态的欧亚交流网络，其主干道重心与节点（如汉玉门关→唐安西四镇）随朝代更迭、技术、政治博弈（汉匈、唐蕃争）及关键环境变迁（如塔里木盆地河流改道、气候干冷化）发生显著空间位移与功能转型。

跨学科实践设计：

1. 驿站时空标记与环境关联：在 GIS 平台整合不同时期驿站/古城遗址坐标、海拔数据及古环境信息。生成动态图层，直观展示：驿站分布东/南移趋势（如汉唐玉门关位移）；核心区（如罗布泊）遗址海拔变化（反映风沙/水位下降）；叠加历史气候干湿曲线。引导学生论证环境恶化（干旱化、河流断流）如何导致楼兰等古城废弃，使其成为“丝路变迁的时空坐标”^[9]。

2. 长时段因果链建模（楼兰）：基于历史水系变迁图（古河道）、地质证据及气候数据，引导学生构建“气候变化→河流改道/断流→楼兰绿洲萎缩/供水断绝→农业崩溃→城市废弃→交通线南移”的因果模型，深刻理解长时段地理过程（水文变迁）作为“看不见的手”对历史聚落兴废与路网演变的决定性作用^[4-2]。

4.3. 案例设计反思

通过上述案例实践，提炼出深化“时空结合”教学的关键反思点：

1. 确认时空锚点：精准定位地理要素深刻塑造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即时空交汇点。例如：开伯尔山口地形（唯一通道、易攻难守）是南亚入侵史的地理锚点（案例 3）；塔里木盆地河流改道是楼兰兴衰与丝路位移的环境锚点（案例 5）；雅典与斯巴达的核心资源差异（港口 vs 平原）是制度分化的空间锚点（案例 4）^[10]。

2. 外显时空联系：

工具外显：运用古今叠加（案例 1）、时空密度图（案例 2）、动态控制图（案例 3）等工具，直观呈现抽象的时空演变过程。

事件外显：聚焦“地理塑造历史的瞬间”，如山口地形决定入侵必然性（案例 3）、萨拉米

斯海战地形（狭窄海域+海军优势）成为希波战争转折点（案例 4），引导学生识别关键时空互动。

3. 聚焦时空本质：超越表象，理解长时段地理要素的稳定性与历史变迁的深层互动。例如：楼兰消亡是气候干冷化趋势作用于脆弱生态的必然结果（案例 5）；爱琴海高破碎度地形长期塑造希腊城邦分立与海洋策略（案例 4），直至外力改变。引导学生把握“地理常数”驱动历史的长时段逻辑。

案例比较（深化维度表）^{[2-2][5-1]}：

分析维度	案例 4：希腊城邦	案例 3：开伯尔山口与印度	案例 5：丝绸之路（楼兰）
核心空间约束	海岸线破碎度 >70%	山口控制点 <5 处	绿洲依赖稳定水源（稀缺）
长时段过程	地形隔离的持续性	山口通道价值的恒定性	气候干冷化趋势（1000 年+）
关键时间效应	殖民运动持续 300 年	入侵频率 ≈1.5 次/世纪	城市兴衰周期 ≈500 年
时空互动本质	地形稳定→政治单元碎片化	地理唯一通道→历史脆弱性	环境恶化→文明承载力下降
教学聚焦点	空间如何规定制度选择可能性	空间如何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推手	长时段环境变化如何设定历史舞台

5. 结论与展望

5.1. 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系统论证了“时空结合”在史地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核心价值：构建了“以史释地、以地证史”的双向互释路径；推动了“时间轴+地图层”可视化、三维沙盘模型、比较矩阵等创新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并为整合四要素提供了逻辑框架^[1-3]。历史“时空观念”与地理“时空综合”在内涵、课标及教学需求上的高度自洽，奠定了融合基石。基于典型案例群（汴京、茶马古道等），证实了运用 GIS 等工具实现时空可视化与深度论证的可行性，并提炼出“确认时空锚点”、“外显时空联系”“聚焦时空本质（长时段互动）”三大关键反思点，有效提升学生对复杂人地关系的理解与高阶思维。

5.2. 研究启示与建议

强化工具赋能（推广 GIS 等技术应用）；深化教学设计反思（运用“锚点-外显-本质”框架，注重本地化案例）；构建资源库（整合时空数据、工具模板、案例）与跨学科评价体系（纳入时空关联理解、工具运用、长时段思维）。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案例普适性、学段适配性及技术门槛需实证检验；古环境数据获取与教学转化困难。未来应：开发轻量化时空工具；加强跨学科合作提升古环境数据应用；拓展至更广跨学科主题（如+科技史）；评估工具对空间认知与历史思维的具体效能^{[3-2][11]}。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89-102.

[3] 唐晓峰. 从混沌到秩序: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4] 李并成. 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40-160.

[5] Staley, D.J. Computers, Visualization, and History: How New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M].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 [8] Horden, P., & Purcell, N.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9] Zhang, D.,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the Silk Road[J]. The Holocene, 2011, 21(1): 11-20.
- [10] 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 [1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Learning to Think Spatially: GIS as a Support System in the K-12 Curriculum[R].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6.

(主编: 宋朝红 编辑: 范记川 校对: 金黛彤)

新时代英模人物宣传学习：价值意蕴、内在机理和优化机制

王升^{1*}

(¹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坚持宣传和学习英模人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时代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需以全面了解其独特历史背景、丰富时代内涵和显著价值特征为前提。这要求我们立足多维视角，从英模的内涵特质、形象塑造、事迹传播到精神传承等维度进行全面考察，从根本上把握英模人物宣传学习的内在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构建科学化的表彰制度体系，培育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通过教育浸润将英模精神具象化为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准则。

关键词：新时代；英模人物；宣传学习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90>

Promotion and Learning of Model Figures in the New Era: Value Implications, Internal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Mechanism

Wang Sheng^{1*}

(¹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Persisting in promoting and learning about role models is an excellent tradition of our Party. In the new era, optimizing the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and learning about role model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rich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t valu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rerequisite. This demands that we adopt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essence and traits of the role models, image creation, event dissemination, to spirit inheritance,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grasp the internal logical mechanism of promoting and learning about role models. On this basi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ystem of commendation and recognition, cultivate a social atmosphere of upholding morality and goodness, and through educational influence, concretize the spirit of the role models into the daily behavioral norms of the general public.

Keywords: New era; Model figures; Publicity and learning mechanism for model figures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 and 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1]。中华民族历来是崇尚英雄的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英雄群体和英模人物。“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讲话场合和署名文章中多次论及英雄，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英雄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新时代让每个人都有人

作者简介：王升（2001-），男，湖北黄冈，硕士，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通讯作者：王升，通信邮箱：3036481268@qq.com

生出彩的机会、为普通人成为英雄创造舞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为英雄的诞生提供了最广泛的实践疆域——这是崇尚英雄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4]。因此,在新时代进一步研究党和国家宣传学习英模人物工作的时代内涵与价值特征,深入挖掘并把握其内在的逻辑机理,为我们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提供了路径指引与现实启示。

1. 新时代英模人物宣传学习的价值意蕴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英模人物的宣传学习和表彰工作。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对英模人物宣传和学习,对党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具有根本性、引领性的价值意义,其作用贯穿于政治历史认知、核心价值培育、社会精神动员等多个维度。

1.1.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树立正确党史观和英雄观的必然要求

英模人物是我们党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鲜活见证者与精神符号,其事迹与贡献深度嵌入党的百年奋斗史、国家发展史和民族复兴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5]。英模人物的真实经历与崇高精神,本身就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他们用生命书写的“党史细节”,比任何歪曲言论更能还原历史真相;他们用忠诚铸就的“精神坐标”,比任何虚假叙事更能坚定信仰根基。

然而,新时代以来,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时有泛起,有人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有人侮辱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精神,有人歪曲袁隆平院士的科研贡献……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民族情感,更企图消解党的历史合法性与人民的信仰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依法审理侵犯英雄名誉权案、侮辱革命烈士案等系列案件,推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构建起“法治保障和思想引导”并驾齐驱的双重防御体系。“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将英模作为虚无的重中之重,在于英模具有重要价值,诋毁英模能产生较大破坏性。英模是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杰出英雄模范”^[6]。因此,在新时代进一步宣传学习英模人物,从正面建构的角度来挖掘英模蕴含的价值特性,通过鲜活的人物事迹与大众的情感共鸣,能帮助人们进一步树立“尊重历史、崇尚英雄”的正确认知,从根源上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1.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宣传学习英模人物,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具象、最有温度的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真切切地体现在人们日常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追求之中,英模人物正是这一价值观的鲜活载体、自觉传播者与坚定践行者。

新时代以来,英模群体的“代际谱系”和“领域贯穿性”更加鲜明。如中央宣传部推出的“时代楷模”中,有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王仕花夫妇,有将荒漠变绿洲的塞罕坝机械林场集体,他们用坚守诠释“爱国”与“敬业”;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中,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互联网+”行动的探索者马化腾,他们用创新践行“富强”与“进步”;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表彰中,钟南山院士以“共和国勋章”彰显“担当”,张伯礼、李兰娟等“人民英雄”用逆行诠释“友善”;2021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扎根大山教书育人的张桂梅、牺牲在脱贫一线的黄文秀,他们用奉献书写“为民”与“忠诚”。这些英模的事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道理”转化为“身边事”,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力量,推动核心价值观从“文本要求”内化为“全民共识”,从“价值认同”转化为“行为自觉”。

1.3.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真实写照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7]。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英模人物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个人的贡献,更在于他们能凝聚起集体的力量,成为全社会团结奋进的“精神引擎”。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李大钊、董存瑞,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王进喜、焦裕禄,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吴仁宝、孔繁森,到新时代的张定宇、陈薇,英模人物的事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每一个阶段,覆盖了扶贫、抗疫、科研、教育等每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领域。虽然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变的核心特质是他们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

家命运”紧密结合,将“个人理想”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宣传学习英模人物,就是要让全社会看到:英雄不是“高不可攀的神话”,而是“普通人的不平凡”,他们可能是扎根基层的干部,可能是坚守岗位的工人,可能是逆行而上的医生,也可能是默默奉献的教师。这种“可亲近性”与“可复制性”,能激发人们“向英雄学习、向榜样看齐”的内在动力,让“崇尚英雄”成为社会风尚,让“争做英雄”成为时代潮流,最终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2. 新时代英模人物宣传学习的内在机理

新时代宣传学习英模人物,若要实现教化大众的目标,首先必须系统阐释英模人物“群体画像”背后的深刻内涵,把握其独特的历史与时代价值,深刻理解其演变的内在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英模形象、英模故事、人物精神”三位一体的宣传学习体系,进而实现宣传学习机制的优化。

2.1. 全面科学解读英模内涵

英模是英雄与模范的统称,其核心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社会历史条件不断演进发展。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实践、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社会经验的借鉴密切相关。

古希腊神话中,英雄是指具有卓越才能、勇敢无畏且能为民除害之人;在中世纪的欧洲,英雄的含义逐渐扩展,多指为国家与民族而战的勇士。在中国古代,英雄这一概念承载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常指兼具突出能力与超凡智慧的人物个体并且其行为与成就始终与“忠”“仁”“义”等中华传统美德紧密绑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英雄”这一名词,用以彰显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展现出的英勇精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7]。新中国成立初期,英雄这一概念逐步以“英模”的话语形式进行宣传和呈现。这一时期的英模主要指向革命战争的英雄战士与广大劳动人民模范;进入新时代,其内涵进一步拓展,其不仅包含创立与建设新中国伟大历程中涌现的英雄模范,更涵盖了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贡献的普通人。他们既承载着历史赋予的厚重英雄使命感,又彰显着时代赋予的鲜明特征与价值导向。因此,新时代我们需全面、系统、科学地阐释英模内涵,深刻理解其背后演变的逻辑机理,赋予其鲜明时代特色,方能更好实现宣传学习英模的目标。

2.2. 求真务实塑造英模形象

英模形象既是英模人物本身光辉形象与个人特质的规范化阐释,更是一段反映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人民大众生活现状的真实影像。“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8],英模源自人民,同样具有具体性、现实性。要完整展现其立体形象、使其可知可感,关键在于以“求真务实”为根本准则塑造英模。

“求真”,就是要客观真实地刻画英模人物,坚持敢说真话、敢讲真事,塑造真实可信、令人尊崇的形象。既要注重真实呈现英模的先进事迹与崇高精神,又要避免因夸大其词、虚构情节损害其真实性;报道英模事迹时,更要把握“平衡感”,既突出其先进性、典型性,又不忽略其普通性、平凡性,让英模人物既有“可圈可点”的高光,也有“可亲可敬”的温度,既实现公众全面认知的效果,又杜绝过度神圣化、完美化的倾向。

“求实”,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扎实开展英模先进事迹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挖掘英模事迹、收集相关资料、听取群众意见,都要扎根于人民的视角,通过实地考察、与群众深度访谈等方式,全面把握英模人物的形象特质,确保英模形象的塑造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2.3. 生动鲜活讲好英模故事

讲好英模故事,是展现英模形象的重要载体,更是传承和弘扬英模精神的关键环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9]。唯有以生动鲜活的方式讲述英模的先进事迹，才能真正引发群众的情感共鸣。

“生动”，要在故事的感染力与表达技巧上守正创新。要让英模故事积极向上、感人肺腑，需在讲述技艺上深耕细作，创新表达形式。一方面要紧扣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另一方面要注重宣传形式的丰富性与宣讲人的能力提升。具体而言，一是表达方式要以人物故事为核心，突出主题思想，着力塑造英模持续传递社会正能量的鲜明形象；二是宣传手段要整合各类媒介资源，结合线上线下等多种媒体平台，多角度、全链条、全方位地传播英模事迹，切实提升其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先进事迹更具感染力和鼓舞力，达到引发大众共鸣的效果。

“鲜活”，就是要始终聚焦人物的真实性与情感的共鸣。要用叙事化的语言还原英模有血有肉、深入人心的形象。英模不是虚假的幻影，也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与人民大众血脉相连的真实存在。唯有将英模故事讲深、讲活、讲透，才能让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认同、崇尚、学习英模。

“讲深”，就是要挖掘故事的精神内涵。既要研究英模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背景，又要精选关键事件展开深入解读，更要结合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让宣讲既能呈现理论深度又能彰显政治高度；“讲活”，就是要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细节、灵活的形式展现英模的鲜明个性，让故事既赋予温度又引发共鸣；“讲透”，就是要以宽广的人生视野与透彻的学理化阐释，既能融会贯通相关知识，又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揭示一个个动人的英模故事背后所彰显的价值特性与目标导向。

2.4. 多元立体宣传英模精神

英模精神是英模的深刻内涵、先进事迹、光荣形象与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要让英模人物深入人心、发挥示范作用、凝聚社会力量，必须以多元化、立体式的宣传策略强化英模精神的传播渗透。

“多元”，核心是通过多种手段、多种形式、多个角度来创新宣传载体，让英模精神厚植于人民大众的心灵深处。英模精神不能仅停留在单一化、象征化的抽象表达，而应融入现代媒体生态从而实现具象化的传播。一是要夯实传统媒体的宣传根基。依托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通过深度新闻报道、专题访谈节目、人物专栏等形式，全面系统展现英模的先进事迹与崇高精神内核；二是要借助网络平台开展文艺化表达。通过音乐剧、电视剧、纪录片等艺术形式，将英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有温度的艺术形象，如礼赞“燃灯校长”张桂梅的音乐剧《绽放》，纪念脱贫攻坚战场牺牲英模黄文秀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讲述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真实人生的电视剧《功勋》等。这些基于现实题材的主旋律作品，依托现实基础的叙事手法与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还原了英模人物的感人事迹，让英模精神从“文本”走向“生活”，从“榜样”走进“人心”。

“立体”，关键是推动英模精神时代化、大众化，扩大其影响力与号召力。宣传学习英模精神不是孤立、静止的过程，需将英模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结合历史语境与当代需求进行解读。既要提炼英模人物的共同品格，如忠诚于党和国家、奉献于社会和人民、坚守初心和使命等，也要挖掘其独特精神特质，如张桂梅扎根大山的教育坚守、黄文秀放弃城市工作的扶贫担当、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科学执着等。具体而言，一是注重英模精神的时代化表达，用符合当下的时代语言解读英模精神的现实意义，如将“艰苦奋斗”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将“牺牲奉献”诠释为“为人民幸福的担当精神”，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契合人民群众的认知需求；二是创新宣传的维度层次，既有宏观层面的精神概述，如描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家国情怀”，也要有微观视角的细节刻画，如英模生活中的平凡瞬间、决策时的内心挣扎、与群众互动的温暖片段，让英模形象从“高大全”变得“有血有肉”，更加地饱满鲜活、真实可感。

3. 新时代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的进阶

优化英模宣传学习机制，是一个蕴含丰富价值理念与时代内涵的重要课题。然而，要让这一机制真正走深走实，必须打破国家、社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隔阂，既要国家坚实的制度保障为基础，又要营造群众普遍认同的社会氛围，推动英模精神自觉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最终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3.1. 健全英模人物表彰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10]。进一步健全英模人物表彰嘉奖制度,是充分宣传学习英模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开始为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挥员、英勇战士颁授“红旗勋章”“红星奖章”,开启了英模表彰的早期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进行总结性表彰,逐步形成了覆盖各个领域的英模褒奖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英模表彰工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价值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体系更趋规范。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等标志性文件,构建起系统完备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框架,推动表彰工作从经验层面上升到法治层面,实现了科学化、规范化运行。二是表彰体系日益完善。全国性勋章与特定时期奖章的设置更加精准,英模表彰覆盖领域从传统行业向新兴领域延伸、内容从单一贡献向综合贡献拓展,逐步确立了以“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和国家功勋簿为核心的“五章一簿”荣誉体系。同时,国家奖章颁发的价值导向更加鲜明,从为“两弹一星”元勋颁授功勋奖章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授予荣誉称号,每一次表彰都在紧扣时代主题,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英模人物的尊崇与重视。三是精神引领持续强化。英模表彰从“物质嘉奖为主”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自为英模人物颁授勋章、发表重要讲话,给予英模人物政治上的崇高礼遇。这种“仪式感”与“荣誉感”的结合,不仅让英模个人感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更通过媒体传播、事迹宣讲等方式,将英模精神转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

3.2. 营造崇尚英雄模范的良好社会氛围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11]。英模人物群像中,既有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里涌现的革命先烈、时代先锋,也有扎根基层、守护人民,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党员干部群众,他们或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或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平凡英雄。“英模人物具有引领作用、示范功能、标杆价值。把英模人物的典型事迹及其形象选出来、树起来,有利于在全社会塑造正确价值导向、扩大主流价值版图、形成正面价值舆论、营造向上向善氛围”^[12]。因此,如何传播好英模先进事迹、弘扬好英模引领精神、营造出全社会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发挥英模人物重要作用的核心关键。一是要精准挖掘典型人物,强化示范效应。不同时代的英模人物各有特质,但典型人物始终是时代英模精神的“浓缩精华”,是英雄精神最具辨识度的象征。典型英模往往折射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既能为文艺创作提供独特审美素材,更能激发人民大众的情感共鸣,在营造社会氛围、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践证明,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能收获什么样的效果”^[13]。二是要善用网络新兴媒体,加强舆论引导。要依托现代网络技术与平台,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专题专栏等形式,生动展现英模人物的精神内核与先进特征;同时要强化网络监管,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防止英模形象被歪曲、英雄精神被消解。

3.3. 将英模精神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教育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核心是引导人们见贤思齐、争做先锋。宣传学习英模人物,关键要把其先进事迹、正义形象与光辉精神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4]。唯有以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方式传播英模精神,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和教化大众的作用。其一,要从细节处深耕。需完善宣传学习机制,契合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浸润效果,将弘扬英模精神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针对不同群体,如针对社区居民、学生、企业职工制定差异化方案,推动英模精神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例如,学校可将英模精神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联动:利用红色场馆、烈士陵园等公共

资源,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学习,让英模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事迹从“课本”走进“心田”;其二,要从身边事做起。践行英模精神无需宏大叙事,而是要让一件件小事落地。“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15]。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引导、支持并带动身边人,像英模那样做善事、行善举,关注社区里的老人需求、帮助同事解决困难、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等,让人们能真切感受到英模精神不是“高不可攀”的符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英模事迹就发生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9.
- [2]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6-30(02).
- [3]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J]. 求是,2024,(07):08.
- [4] 张文华,郑宇红. 书写群星璀璨的新时代——谈习近平关于英雄重要论述指导下的总台英模报道实践[J]. 电视研究,2024,(12):37-40.
-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7.
- [6] 储成君.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模的批判与治理[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03):18-25.
- [7] 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9-03(02).
- [8]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2.
- [9]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
- [1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7.
- [1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20.
- [12] 刘雪璟,赵宗仁. 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J]. 社会主义论坛,2024,(09):35-36.
- [13]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28.
- [1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19.
- [15] 习近平主席十年新年贺词金句[N]. 人民日报,2023-01-01(02).

(主编:刘玮 编辑:殷玥 校对:金黛彤)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

樊超^{1*}

(¹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 山东 滨州 256600)

摘要: 社会公平正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目标。新时代背景下,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 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 承继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优良传统, 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要素。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核心要义可以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个维度加以诠释。进一步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 需牢牢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这是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的关键所在; 将公平正义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作为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的有效举措; 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的重要物质条件。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 公平正义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498>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Core Essence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Fan chao^{1*}

(¹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0, China)

Abstract: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re the core value goal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n fairness and justice, mainly originates from the thoughts on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Marx and Engels, inherits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absorbs the element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equality of rights,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and equality of rules". To further realiz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to firmly grasp the "key minority" of leading cadres, which is the key to realizing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aking the measure of runn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dicature, and law-abiding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realiz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condition for realizing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Fairness and justice

作者简介: 樊超 (2001-), 男, 山东滨州, 硕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通讯作者: 樊超, 通讯邮箱: fan851461768@qq.com

1.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优良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先哲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

1.1. 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

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未曾发现关于“公平正义”的单独的专门论著，但从其系列著作中不难发现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特别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公正压迫和剥削以及在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中人人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过程中，内蕴着对实现“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严格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非公正现象，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规划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蓝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中指出“平等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也是共产主义的政治论据”^[1]，指明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公平正义皆能得到切实保障、皆能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可以从经济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描绘等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在经济决定性作用层面，基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中的“经济因素”，它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与演变，无疑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2]。因此，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会脱离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必然是伴随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实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的公平正义是决不会实现的。第二，在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上，特别是对以往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性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实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社会制度，公平正义也随之发生变化”^[3]，体现着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制度必定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否实现。第三，在对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描绘来看，马克思对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彻底性批判，在摆脱了实现公平正义的抽象性、空想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公正性的同时，也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即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实现人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思想的守正创新，也是结合新时代法治中国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4]，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对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性。

1.2. 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优良传统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公平正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在一大纲领中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归社会共有”^[5]等目标，高度彰显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由此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改变中国近代社会不公平现状和社会制度而奋起抗争。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并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与土地革命相关的法律法规，依照其中的公平正义原则“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将地主所有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37年-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党中央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可以一切团结的力量，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原则等，极大维护了社会各阶级利益，形成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局面。党的七大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团结带领人民，推翻封建腐朽专制的蒋家王朝，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目标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6]，通过筑构坚实的物质基础，不断满足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多次强调公平正义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快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7],力求通过各项制度举措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公平正义问题融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当中,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继与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我们党正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等目标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9]。同时也强调在“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10],为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加充分可靠的法制保障。

1.3. 吸收了中国古代先哲治国理政中的智慧结晶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发展进程中,历朝历代先哲们的治国理政经验无不透露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公平正义价值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11]。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正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社会公正思想,结合新时代实际予以创新发展,赋予其更为饱满的科学蕴涵和新的时代特点。

依儒家学派思想,“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中“义”即正义,是中国历代人民所孜孜追求的社会价值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12],体现了孔子对正义的目标价值追求。孟子提出:“仁所以养人,义所以教人,辅世长民,天下之师也”^[13],指明“义”对育人成长成才的重要价值。道家主张“万物生而平等”思想,庄子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4],在《庄子·齐物论》中指明了世间万物本皆公正平等,需要彻底消除某些是非看法才能实现真正平等。老子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反刍狗;圣人不仁,以人为反刍狗”^[15],体现了老子平等看待现世万物、公正待人待物的价值观念。从法家学派思想来看,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公平正义的法学文化思想源远流长。虽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皇权至高无上,存有“人治大于法治”的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历朝历代通过制定系列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秩序。诸如,战国时期的商鞅主张“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16],韩非子指出君王统治天下“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17],认为官员在立法、执法、司法中应当做到廉洁公正用法行权。

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程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正是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学智慧结晶中吸取滋养,引经据典,实现“礼法结合、德法共治”“援法断罪”等传统治国理政主张与新时代法治公平正义理念的交相汇融。

2.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核心要义可以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个方面来研究、理解和把握。

2.1. 权利公平: 确保人民大众平等享有法律给予的各项基本权利

权利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所在,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9],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意涵。就权利主体层面,我国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宪法根本上严格规定所有公民平等行使各项基本权利;就权利客体层面,我国宪法法律通过保障公民行使个人基本权利,能够充分保证自身合法权益的实现,诸如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等;就权利内容层面,从根本上彻底消除损益平等的特权,真正使人民平等行使广泛民主权利,不能因出身、职业、财富等不同而区别对待;就能否顺利实现来讲,必须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有力保障,维护人民合法正当权利。

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公平是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平等分配社会财富和生产

资料,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同时,在人民权利合理分配过程中,必须以权利公平为原则,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实现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协同共进,打开通过分配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格局。

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权利公平是全体人民能够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阶层及特权现象的彻底绝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21]。

2.2. 机会公平: 实现人人能够享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

机会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构成,是全体人民大众平等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各项正当权利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22]。

从其内在而言,机会公平讲求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人民群众并不会因特权思想等极端歧视思想而在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时被边缘化或被排斥,它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而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互相兼容的共同体。从其外延来看,机会公平包含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公平、教育公平和劳动就业公平等方面。其一,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上,我们党面对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大众对于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这一新变化,下大气力往下扎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及边疆偏远地区等基本公共文化基础资源缺乏地区。其二,在教育和劳动就业公平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3]。只有平等分配教育资源,使人民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才能在以“按劳分配”的社会竞争中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找到符合自身能力的社会职位,平等参与分配社会各项服务和社会财富。

2.3. 规则公平: 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平等遵循宪法法律规则

规则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所强调的是任何人、组织和国家政府机关都必须一律平等遵守宪法法律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各种社会活动、竞争或交往中,依照一定规则对所有参与者一视同仁,不特殊倾向于某一方,确保竞争或互动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1-1],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凌驾于现实规则之上。

规则公平的实现,一方面要实现法律规则的透明化、公正化,被人民大众所熟知,同时还应增强宪法法律规则权威性,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所遵行;另一方面要增强人民大众对法律规则的认同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即心存法律规则,将其作为不可逾越的一条“鸿沟”“红线”,在平等参与某种社会活动时时刻以活动规则或宪法法律为界,摒弃特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24-2]。规则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和人民大众决不能违背法律规则行事,这也是实现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的重要节点。

3.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观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是可持续性推进、基础保障扎实、能够落实到位的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需要依靠有力的“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全方位法治保障以及扎实的物质基础,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共同架构起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

3.1. 牢牢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所在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25]。领导干部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理政的关键推进力量,代表党具体行使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等各项权力,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同时在法治实践中部分领导干部中也存在法治意识相对不足等问题,将影响实现社会公平整体进程。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熟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以及运用制度保

证领导干部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打造高效能干的领导干部队伍。

第一，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模范作用。争当尊法之模范，尊畏法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养，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地位的内心敬仰，促使领导干部彻底摒弃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传染；做学法之模范，懂得学习法律是领导干部守法用法的首要前提，应加大力度推进领导干部学法常态化、制度化，夯实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理论基础；做守法用法之模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法律“红线”不逾界、法律“底线”不触碰，要心有法纪戒尺，在推进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先行找法用法。若有法不守，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的践踏；若有法不依，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的严重挑战，对维护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提升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要提高依法治国理政能力，必须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下大气力彻底扫清领导干部队伍中的“法盲”，打造一支真正懂法用法的干部队伍；必须加强领导干部依法处理各项事务过程中的程序正当性，在自身管辖行政区域内，严格履行法定决策程序，充分保证程序正义；必须始终牢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强化人权保障思维，剔除遗留在领导干部中的“特权”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贯穿依法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为人民想事做事、行权用权。

第三，正确运用相关制度激励激发领导干部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持续推进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部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依旧欠缺，必须发挥考核的检验棒作用，将法治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建立完备的全方位监察问责制度，利用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加强行政监察、预防贪污腐败乱象，决不能让党纪国法成为任人宰割的“稻草人”。

总之，抓住各级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坚持公平公正为人民用权、各项权利为人民所享，才能保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的实现始终在历史坐标系中准确把握前进方位，在实践征程上踏稳落实之道，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优势的強大政治保障力。

3.2. 将公平正义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举措

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着眼社会主义法治运行过程而言，必然存在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之中，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战略全局的眼光，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整体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以良法善治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基调。

将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立法工作的价值意蕴。立法作为法治运行的起始环节，将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嵌入立法，是社会公平正义在全社会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完备背景下，人民群众对法律尤其是立法阶段的要求不再是被动感应，而是转变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主动谋划参与，立法环节上的供需平衡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因此，未来所要面对的是，新时代立法工作应当是由立法数量不足问题向高质量立法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26]。为此，可以做到：一是以公平正义为立法原则，维系全体人民权利义务的平等给予。我国《宪法》规定每个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所给予公民的权利、义务，不会因性别、种族、地域、职级、岗位、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等而存在差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并非仅止于简单的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还应有最初条件上的公平，也即人们在实现自身各方面权利上“可塑能力”的公平。譬如，如果成长于地域贫富差距过大的儿童及青少年，在教育培养的重要阶段自身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及受教育程度过于悬殊，也就必然会出现自身能力的参差不齐，最终影响“可塑能力”的公平享有。因此，在法律为维系人民公平享有权利义务的前提下，必须通过立法积极剔除影响公平行使权利的外界不利因素。二是以加强政策性人文关怀为重点，综合运用“立改废释”方式并举，增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社会公平正义的反面是社会不公等的不合理，须以公平正义为标准推进政策性立法，提升人们对法律法规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又如，在就业问题上，诸多行业在职员工收入、待遇、保障上偏低的问题长期存在，应当通过立法实现“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27]，从而使人民幸福感通过立法得以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在立法上得以体现。

将公平正义作为严格执法的内在要求。执法作为我国法治理政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28]。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能否在工作中落实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有着最直接、具体的体验和感受，将会直接涉及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能否得以落实。需要注意的是，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过程中，不仅要有“力度”，而且还要有“温度”。首先，严格执法必然是“严”字当头，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凭现有国家法律体系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执法办案，着力营造不想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其次，在严格执法前提下，应积极推进人性化、灵活性执法，切勿机械呆板、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执法”理念相结合，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24-3]，使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以维系社会公平正义为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29]。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公平正义作为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把公平正义与司法为民紧密相连，彻底解决司法不公对公平正义的致命危害作用。为此，首先应当注重方向引领，走好司法工作正确路线，严守司法清正廉洁阵地，要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始终坚持党领导司法工作实践，以公正司法为目标，当好司法工作“掌舵人”。同时加强司法人员自我监督与外部监督，提升自我净化能力，严守“贪腐”底线不动摇，为公正司法提质增效。其次，牢固树立为民司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诉求关切。一方面，要摆好自身位置，弄清严格公正司法“是为谁”“依靠谁”，努力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者，把人民放在司法工作目标的最高位置。另一方面，处理好司法与人民群众关系问题，在司法工作中既要讲法理也要讲情理，彰显司法有质效更有温度，拉近与人民群众感情，增进群众的司法认同。最后，应当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等基础性司法制度，持续完善国家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好司法行为，保证“不走样”。

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初心推进全民守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揭示了人民群众自身法治观念的未来贡献和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彰显出全民守法作为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系有着非凡意义。坚持全民守法，必须“推动全体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引导所有社会成员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原则”^[30]，使人民群众熟悉运用法律，争取公平正义。同时还需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既要“法治”也要“德治”，在我国法律相对具体完备的情况下，现实社会中仍有部分事件不单是仅靠法律所能处理的，也要靠人们自身内心的道德规范和自觉要求。此外，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一项长期性持久性工程，在青少年这一关键时期必须要扣好法治观的“第一粒扣子”，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24-4]，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进大中小学课堂教学，真正使青少年将法治信仰厚植于心，成为外化于行的日常规范，努力使全体人民成为公平正义忠实崇尚者、坚定捍卫者。

3.3. 推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物质条件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首要因素和重要物质基础。就社会公平正义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言，依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31]，公平正义能否实现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32]。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对新时代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推进落实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词汇，强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33]，新质生产力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必将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新生驱动力。如何运用好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一招，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极为重要。通过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百姓

幸福感。通过立足科技创新这条主线,利用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壮大新兴科技产业、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物质基础,是作为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平正义的又一重要路径。

4. 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以其系统性、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与实践性,为新时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清晰的价值目标方向和路径,将实现公平正义置于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法治建设等重要复兴战略全局,积极落实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多元化诉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升华,具有可靠的政治保障、完善的法治保障以及充分的物质基础,是能够可持续性发展、能够深入落实的社会公平正义,在新时代征程上,保障中国正稳步迈向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正义、更加美好的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 王晓青.邓小平公平正义思想探析.前沿[J]. 2011(03): 45-49.
- [7]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8]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论全面依法治国》[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2] 钱逊.《论语》读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3] 唐文治.《孟子》气节学[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15] 老子.《道德经》[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社,2021.
- [16] 商鞅.《商君书·说民》[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22.
- [17] 韩非子.《韩非子·饰邪》[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社,2021.
- [18]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9] 贾中海,祁靖贻.习近平公平正义思想研究理论探讨[J]. 2018(05): 27-32.
- [20]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4]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5]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17/content_5562085.htm

- [26]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8]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2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 [30] 陈柏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民守法理论[J]. 法学, 2024(02): 3-18.
- [31]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33]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4-02-01(01).

(主编: 刘玮 编辑: 殷玥 校对: 金黛彤)

双向赋能：广东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耦合机制及实践路径研究

周小红^{1*}

(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广东红色文化在融入高校思政课之时，存在内容同质化、融入模式单一等困难挑战。广东红色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本文从互动耦合的视角进行分析，“内容-形式-实效”的赋能机制与“年轻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传播机制，实现广东红色文化和高校思政课的互动耦合。从“挖掘运用红色资源、建设红色文化校园、打造专业教师队伍、激发校地企多元活力”方面不断深化思政课教学内容、增强思政课教育实效、提高思政课课程质量、健全思政课保障机制，提升广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

关键词：广东红色文化；高校思政课；耦合机制；实践路径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10>

Two-way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Guangdong red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ou Xiaohong^{1*}

(¹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When Guangdong red culture is integr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challenging obstacles such as homogeneous content and a singular integration mode. Guangdong's red culture is rich and diverse and has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coupl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content-form-effectiveness" and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youthful-era-popularization" to realise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of Guangdong's red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excavating and utilising red resources, constructing a red culture campus, establishing a professional teaching team, and stimulating the diverse vitality of schools,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duc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refin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aug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Guangdong's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Guangdong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es in higher education; Coupling mechanism; Practical paths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般类）《广东红色资源与地方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协同创新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项目编号：2025JG17）

作者简介：周小红（1998-），女，重庆奉节，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周小红，通讯邮箱：884719098@qq.com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化形态、精神形态和制度形态成果的总和^[1]。在“大思政课”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具有多重且深刻的重要性。它既是落实“大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也是增强高校思政课针对性、实效性的关键路径,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

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可以看到是高校对红色文化的重视度不断提升,教师将红色文化融入教学的意识不断提高。同时,各校各地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活动显著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明显提升。根据目前研究现状来看,红色文化的内涵、类型、育人功能研究成果较多。众多学者认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具有高度的契合点。还有学者从大学生、教师、实践路径等方面说明当前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困难挑战。陈礼荣、刘小文(2023)认为高校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重视不够、氛围不足^[2]。此外,为解决相关问题,许多学者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融入方式以及考核评价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利用红色文化开展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实路径。例如,石磊(2020)认为要将红色文化嵌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筛选整合优质红色文化资源,规范实践教学活动的的设计安排^[3]。总之,在上述所呈现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已经对红色文化进行大部分的研究,也充分展现了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具有高度的契合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呈现出比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突出地域特色的广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性和建设性、广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有待增强。

1. 广东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互动耦合

1.1. 广东红色文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发展

第一,丰富思政课内容。地方红色文化深刻反映着中国共产党追寻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百年波澜壮阔艰苦卓绝奋斗的伟大历史,蕴涵其中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时代精神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4]。在中国近代,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先行地,爆发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凝聚了无数革命先辈的心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历史,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提供了思政课教学所需的案例和素材^[5],当今思政课在教学内容上存在内容同质化的问题,缺乏地方特色,大学生在理解知识点之时,很难具象化知识;在知识讲授过程中,各思政课程所运用的素材、案例、影视作品具有相似之处。广东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将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是丰富教学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增强地域针对性,实现思政课从“宏大叙事”到“地方叙事”,帮助大学生了解地方史实,增强爱国情怀。

第二,创新思政课形式。思政课重点在于讲好故事。讲好故事也就意味着以理服人,让大学生在讲授过程中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但是目前思政课主要以理论灌输为主,容易造成学生听课疲乏。广东红色文化较多以物质形态呈现,包括名人故居、革命纪念馆、遗址遗迹、烈士陵园等。实践教学是思政课不可或缺的一环,实践教学能有效连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加深学生对特定主题的直观感受,在整个教学流程中起到巩固理论知识的作用^[6]。增加实践教学课进行辅助教学,带领学生从课堂到这些红色场所,能够有效创新思政课形式,有效实现思政课从“课堂讲授”到“实践体验”,提高教学效果,弥补实践教学资源不足,让书本上的汉字变成有血有肉的可视化实物。同时,在讲授过程中,也可以利用红色场所的官网、小程序等,进行线上参馆,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教学,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实现课内思政教学与课外社会实践双向互动。

第三,增强思政课实效。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7]。思政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大学生在课堂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有限的,但是思政课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对大学生的家国情怀的培养,对感悟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对领悟先进楷模敢于奋斗的拼搏精神是无限的。如果说在课堂接受的思政教育是主要的,那么在课外所能接受的思政教育是辅助性的。随处

可见的红色文化宣传标语、革命纪念场所等,可以让学生联系思政课堂所学知识。在课堂经过老师的详细介绍,进而大学生对于本地的红色文化产生一定的兴趣,主动在课外去走访、参观红色文化场所,主动将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从“认知认同”到“行为自觉”,增强思政课的引力和实效性。

1.2. 高校思政课促进广东红色文化传播

第一,推动红色文化的“年轻化”。大学生思维活跃,紧跟时代潮流,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接受度,大学生通过学习了解红色文化,增加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年轻群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老师可以根据课本知识,联系身边的红色文化,组织学生以短视频、漫画、互动游戏等形式进行广东红色文化的宣传,让红色文化在内容表现方式上“年轻化”,如通过短视频拍摄经典影视作品的转场,拍摄视频重现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用AI技术让历史人物穿越时代进行讲话,拍摄剪辑红色文化重要场所,用“剧本杀”形式设计“中共地下党在粤情报传递”剧情,让红色历史从“教科书”走向“社交平台”,实现广东红色文化的内容创新。同时,在广东红色文化话语表达方面也更加“年轻化”。在具体的红色文化介绍之时,可以用Z世代熟悉的“梗文化”和“网言网语”解读红色精神,使其具有时代特色,如将“蛇口精神”总结为“敢为人先的‘卷王’精神”,通过通俗易懂,大学生可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承红色文化,在“接地气”的表达中拉近与年轻群体的距离,可让红色文化突破“传统宣讲”的局限,使其更加“年轻化”。

第二,深化红色文化的时代解读。“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8]”。高校作为传承广东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思政工作者要做好“领头羊身份”,在教学过程中,可结合时代课题、时代热点话题、地方性时事,赋予广东红色文化新的阐释。广东地理位置优越,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针对“大湾区建设”,解读广东红色文化中的“开放基因”,将近代侨乡“下南洋”的开拓精神与当代大湾区“互联互通”有机契合;结合“共同富裕”话题,挖掘广东红色文化中的“民生底色”,将革命烈士彭湃“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广东探索相结合,让红色文化始终与时代同频,赋予广东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广东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第三,促进红色文化的“大众化”。广东红色文化背后所展现的历史事件、英雄烈士、革命精神、革命文物,都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证明,是我们党取得一个个重大成就的见证。让广东红色文化真正“活”起来不仅在于解读和宣传,更重要的是在于将实现广东红色文化的“大众化”,让更多人了解广东红色文化。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责任重大,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自觉承担起推动广东红色文化的“大众化”任务。具体而言,可通过多元路径让红色文化从历史文本、革命遗址走向大众生活,从理论话语转化为大众认同,最终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励奋斗精神的文化力量,让红色文化变为大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鸣的精神滋养。

2. 广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2.1. 挖掘运用红色资源,深化思政课教学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过:“把红色资源利用好”^[9]。红色资源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充分挖掘运用红色资源,是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一,弘扬红色精神。习近平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10]”。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精神写照,从革命先烈的舍生取义,到革命精神的代代相传,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品质特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东创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互利合作、命运与共的改革开放精神,书写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这些红色精神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忆,更是激励广东乃至全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政教师可适当根据课程内容,将红色精神融入课堂讲授过程中,充分发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的作用,让红色精神成为大学生在克服前进道路上困难挑战的精神动力。

第二,讲好红色故事。习近平曾强调:“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11]。”广东拥有极其丰富和厚重的红色历史,在这里发生了许多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同时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革命英雄的英勇事迹都是我们思政课的重要育人素材。选好红色故事是推进思政理论课创新发展的前提^[12],在广东大地上,诞生了较多的红色故事,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开创了中国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先河;在香港和广州的工人举行了规模空前、震惊世界、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在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举行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成为忠贞革命爱情的象征。广东的红色故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故事可有效宣传广东红色历史,提高广东红色文化的叙事成效,带动更多人挖掘红色故事。

第三,引用红色经典。进入近代之后,广东率先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广东也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拿起笔杆子奋笔疾书,号召人民进行激烈反抗、爱国救亡,从农民运动的星火燎原,到工人运动的波澜壮阔;从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到敌后抗战的浴血坚持;广东这片热土上镌刻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诞生了无数多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是当时人民挽救国家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重要见证。红色经典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13]。在课堂讲授之时,教师可引用经典著作、一手数据、名人名言,感受先辈振聋发聩的救亡之声,直观体会广东人民的生活之艰难、国家之贫困,民族之不幸,从而更加坚定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2. 建设红色文化校园,增强思政课教育实效

第一,打造红色文化场景。学校是宣传广东红色文化得主阵地。打造红色文化场景,构建浸润式的环境熏陶,是大学生在课外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打造宣传红色文化的场地,校园广场、教学楼走廊是宣传广东红色文化的重要地点,在此处设置“广东红色文化长廊”,增加红色文化的曝光度。同时,打造雕塑等形式展示“广州起义”“蛇口改革”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在图书馆设立“广东红色文化阅读角”,陈列关于广东革命史、红色文化、深圳奇迹等书籍,方便学生阅读,增加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升华。此外,高校应积极组织新媒体团队培训^[14],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新媒体等新形式在校园APP、公众号开设“红色广东”专栏,定期推送“每日红色故事”和“红色文化问答”,带动大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强化思政教育。

第二,开展宣传红色文化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红广东红色文化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让更多大学生了解红色历史事件、红色人物事迹和红色精神内涵,开展相应的活动不断增强思政课教育实效。首先,举办各类比赛活动。例如,红色文化主题辩论赛”“红色文化短剧大赛”“红色文化歌曲改编赛”,让红色文化与青年兴趣“接轨”。其次,开展红色文化社团。例如,“红色文化研习社”“研学实践社”等大学生社团发展,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让大学生从参与者变为传承者。最后,举办重大节日庆祝活动。在建党节、国庆节等节点,组织“红色文化主题快闪”“革命家书诵读会”等活动,借仪式感可强化大学生的广东红色文化情感认同,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发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以上举措,不断推动红色文化融入社团学习生活,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

2.3. 打造专业教师队伍,提高思政课课程质量

第一,开展校内培育,强化教师的广东红色文化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并对思政课教师素养提出六点要求。思政课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应当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等。为了更好地让大学生了解广东红色文化,首先可以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参与“广东红色文化研修班”,系统学习关于广东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和新时代的不同细节,掌握“红色文化与思政课知识点”的相互关系。其次,开展以“红色文化融入教材”为主题集体备课,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思政课程的特点,共同进行案例选取、教学设计,形成“标准化+个性化”的教案库。最后,鼓励思政课教师带头选聘学生组织广东红色文化

宣讲团,让更多人民了解广东红色文化。思政课教师也可以兼任红色社团指导老师和研学实践带队老师等,在指导大学生活动中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运用,培养综合型思政课教师。

第二,开展校外引智,弥补资源与经验短板。2024年5月,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15]。”引入外部智力、经验和资源是建设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精准弥补自身短板,为打造“红色文化导师库”注入新动能。具体而言,各高校可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作,聘请党史专家、纪念馆资深讲解员为校外导师,定期到校开展红色文化专题讲座、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方法指导,同时邀请场馆专家到学校承担“红色文化实践课”教学。此外,选派思政课教师到红色场馆进行挂职锻炼,担任临时讲解员、参与展览策划等任务。这既能深化思政教师对广东红色文化的理解,又能将鲜活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课堂的生动素材,是破解思政教育理论脱离实践难题的创新路径。通过挂职锻炼,思政教师在文物解读、场景还原、历史叙事中加深红色文化的理解,将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实践认知。

2.4. 激发校地企多元活力,健全思政课保障机制

第一,校地协同打通资源共享通道。部分高校存在教学资源有限和经费不足的问题。高校与广东各地红色纪念馆、改革旧址等签订合作协议,可有破解“红色文化融入”的资源瓶颈。首先,各地纪念馆、旧址等挂牌“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给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基地。通过广泛承接研学活动的同时,增加场馆的知名度,也可帮助大学生在亲历红色历史的过程中深化自身的理想信念,实现良好的学习效果。其次,高校寻求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经济支持。高校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局、教育局,争取红色研学专项经费、红色文化进校园项目支持,缓解资金压力,为广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提供经济支撑。

第二,校企协同激活红色文化转化动能。广东红色文化不仅要进课堂、进头脑,更要进入大众视野。首先,研发相关产品,实现广东红色文化的跨界转换。广东红色文化的文创开发,可有效宣传红色文化,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高校可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红色文化从“文化遗产”向“文化产品”的转化。具体而言,高校与本地文创企业合作,依托高校设计、传媒等专业优势,联合开发广东红色文化主题文创,开发打造“东江纵队”主题文具、“深圳特区”“中共三大”“黄埔军校”等纪念徽章的文创产品或各类红色主题盲盒等。这既解决企业的创意不足困境、产品难以销售的问题,又能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红色文化传播的平台,增强大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些文创产品可增加学生对广东红色文化的关注度,也可带动经济的发展,打出自己的品牌。其次,设计开发一定的红色研学路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红色研学路线的开发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关键。高校可依托旅游管理专业人员,设计开发“广州—梅州—汕头”革命足迹线、“深圳—珠海—顺德”等改革体验路线,能让大学生在情感共鸣中理解红色文化。通过以上有效措施,可有效促进广东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广东红色文化的转化动能。

总之,习近平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他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16]。”这为我们高校思政课融入红色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广东红色文化是广东人民挽救民族危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见证。在广东沃土上,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历史,创造了具有深刻内涵的广东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由此可见,广东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与思政课具有高度契合点。在未来思政课教学中,将广东红色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政精品课,不断提升思政课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培养担当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 [1] 范方红.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 (06): 73-75.
- [2] 陈礼荣, 刘小文.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探究[J]. 新西部, 2023(5): 138-141.
- [3] 石磊. 问题与路向: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思考[J]. 黑河学院学报, 2020(9): 22-23.
- [4] 谢安国, 纪安玲.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探析[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5(02): 88-91.
- [5] 张志强, 郝琦.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 (10):

61-63.

- [6] 赵蓓茁, 孟晓东.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 (02): 69-72.
- [7]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 2020(17).
- [8]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 [9] 习近平.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N]. 人民日报, 2014-12-16.
- [10]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6.
- [11]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 共产党员, 2021, (22): 4-6.
- [12] 胡忠英.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选择——评《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耦合发展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 (06): 110.
- [13] 王玲, 陈昱霖.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和实现[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 (11): 86-88.
- [14] 郭培荣, 徐永超.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 (08): 75-76.
- [15]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 2024-05-12(1).
- [16]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J]. 党建, 2024, (11): 10-11.

(主编: 刘玮 编辑: 任志鹏 校对: 金黛彤)